

中共党史资料丛书

3

1050739-41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土地革命文献选编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

本书选编组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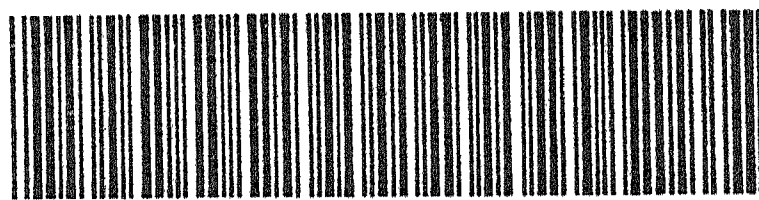


在中国土地上

苏联顾问回忆录

(1925—1945年)

何智涛 李元吟等译 苜萝 兴权 校



10001221287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НА КИТАЙСКОЙ ЗЕМЛ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етских добровольцев

1925—1945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4

根据“科学”出版社东方文献总编辑部

莫斯科1974年版译出

译 者 的 话

1974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在中国土地上》一书。这是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中后期与抗日战争时期前来中国的苏联志愿人员，关于他们在中国活动的回忆录。

回忆录的作者们从他们各自所接触的范围内回忆了当时中国社会情况，表述了他们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看法。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文中有的记载与史实不符，如“回忆叶挺”一文中对南昌起义的记述，“往事追记”中对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交代等都属于这种情况。再者书中也有谬误之处，这里不一一指出，为保持原著面貌，行文中也未予逐条订正，只在最必要处加了简要的注释。敬请读者注意。

我们翻译此书，主要是为了向党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些材料，作为研究这个时期历史的参考。因此删去了原书中史料价值不大的个别篇章和段落（如丘多杰耶夫为本书俄文版写的前言，卡利亚金的“民族统一战线”一文，“往事追记”中的最后一部分）。契列潘诺夫的“武汉战役总结”一文因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该作者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一书中的章节完全重复，我们也将之删去。原书插图若干幅，因不甚清晰，我们均未采用。

1981年9月

目 录

在国民军第二军	A · Я · 克利莫夫 (1)
在冯玉祥的军队里	C · H · 纳乌莫夫 (11)
炮兵顾问的回忆	T · C · 鲍罗金 (17)
在中国南方	И · П · 舒万诺夫 (29)
回忆叶挺	E · B · 捷斯连科 (73)
在革命中国工作的一年	M · E · 沙斯 (91)
蒋介石分子袭击苏联总领事馆记实	B · T · 苏霍鲁科夫 (111)
在中国上空的空战	C · B · 斯柳萨列夫 (115)
在战斗的中国	C · C · 别洛利佩茨基 (155)
往事追记	C · П · 康斯坦丁诺夫 (221)
沈阳卫戍司令	A · И · 科夫童 - 斯坦克维奇 (257)

在国民军第二军

A. Я. 克利莫夫

1924年底至1925年初，华北建立了所谓国民军。国民军的产生，一方面是各军阀集团内战加剧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中国革命斗争与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反映。

1924年夏，又爆发了一场直系军阀（吴佩孚、曹錕）和奉系军阀（张作霖）之间的内战（即所谓第二次直奉战争）。当时，北京已驻有以加拉罕为首的苏联大使馆。应孙中山的邀请，以鲍罗廷和巴甫洛夫为首的苏联顾问团也已抵达广州。

1924年10月22日，吴佩孚的亲信将领之一冯玉祥离开了对张作霖作战的前线，突然占领北京，逮捕了总统——直系“文职”头目曹錕。同时他还把受直系奉给的前清逊帝溥仪^①逐出禁宫。冯玉祥声言转到国民党方面，宣称自己是孙中山的信徒。他的军队主力据有京畿和内蒙，号称国民军第一军。冯玉祥的另一个军团由胡景翼将军指挥继续南下，赶跑了河南的吴佩孚残部，驻扎河南，称为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成了这个省的督办（军事省长）。孙岳指挥下的部队折转西向，把吴佩孚逐出陕西，成为国民军第三军。

1924年11月初，各派军阀会议，暂时结成同盟。在北京组成了代表张作霖和冯玉祥两派的联合政府。双方公推安福系首领段祺瑞将军任执政。由于冯玉祥的力主，段祺瑞不得

不考虑民族解放运动的增长和孙中山的巨大声望，而同意邀请孙中山来北京谈判和平统一中国问题。拟定召开特别的所谓善后会议，由国内所有的政界名流参加。

就在这个时候，即1925年1月初，我来到北京，立刻就见到了早在1922年就已在中国的许多同志，特别是见到我们大使馆的武官格克尔②。

加拉罕③很快就接见我，并谈了很长时间。他对我从事的工作和我参加过远东国内战争颇感兴趣。似乎还顺便检验了一下我对中国的知识。过后，加拉罕建议我去河南，到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当政治顾问。他说，大使馆对胡景翼和国民二军的情况都不太了解，这个军在几个月前去河南追歼吴佩孚的部队。

加拉罕说，胡景翼④曾去过他那里，要求派政治和军事顾问。他说，关于军事顾问问题，暂不好解决，因为我们不了解胡景翼的军队。又说，你们去后的任务是详细了解河南状况，要把一切都弄清楚。一般的不要干预中国事务，只是在别人有所要求时，才可提出自己的建议。如果中国人采取我行我素的态度，也不要气馁。

大约在这次谈话两个星期以后的一天，格克尔让我晚上到他那里去。我同格克尔和翻译瓦西里耶夫三人一起驱车离开大使馆。上哪里去，我不知道。汽车很快就到了北京站，一直开上月台，停在最后一节车厢旁边。我们走进车厢刚刚坐定，汽笛长鸣，列车就开动了。在车厢里，我认识了将和我一同到胡景翼部队去工作的所有同志，他们当中有一位姓方〔音〕的共产党员，是奉李大钊之命和我们一起出京，到国民二军去工作的。

早晨，我们通过一座大木桥，跨过黄河，到达郑州。事

先通知我们说，司令要亲自来迎接我们。

不一会儿就来了一位肥胖的将军。此人就是胡景翼。他和我们寒暄后说他要到洛阳前线，也邀我们顾问团一同去。格克尔、布拉依洛夫斯基和翻译瓦西里耶夫去了前线，我和其余的人继续上路到开封胡景翼的司令部去。这样我们就开始在国民二军工作了。

首先我们决定了解一下司令部的工作和准确地弄清战事情况。事实上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一切要靠传闻办事。过了两个星期，我的同事来说，到底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一无所知……当时，我决定亲自去一趟前线弄清情况。

过了一段时间，准备好了专用列车，我可以到前线去了。车站上熙熙攘攘，有商贩、妇女，有提包袱的姑娘，还有许多外国传教士。车走得很顺利。但是，到了郑州后，车不能再向前走了，因为前面出了事故。

和胡景翼的司令部联络通了以后，我请顾问接电话，随便哪一位都行。半小时以后，格克尔来接电话说，国民二军打败了吴佩孚的军队，今天就可解放洛阳⑤，顾问们即可从前线归来。格克尔建议我继续乘这次列车到出事地点，到时候，他们由西边赶到那里。

半小时后列车开动，向西驶去，沿途几乎是一片荒凉。我和共产党员方某同行。到了出事地点，我们的同志改乘我们的火车，一同返回郑州。郑州车站上举行了盛大欢迎会，有仪仗队、乐队……

在路上，格克尔告诉我军事行动的情况。士兵要“武装”上雨伞。午饭和睡眠时间，交战双方信守不渝。炮火只能在暴露阵地发射。把大炮推出来，向敌方射击一通，然后再拖回去加以隐蔽。

格克尔幽默地讲述了流言在打仗过程中的功效。双方在洛河上对峙了两个星期。胡景翼的部队据守河的此岸，敌军在彼岸。河上仅有一座铁路桥。这座桥未经炮轰，也未毁坏，可以通过此桥发动攻击。但双方对发动攻击都下不了决心。一方散布流言说，我们将在某时过河。对方不甘示弱，放风说：我们也要在某时发动进攻，我们的力量更强。就这样彼此恫吓。哪一方先被吓倒，哪一方就退却而去，然后就是相安无事。

格克尔终于忍不住了，建议召开军事会议。“我对他们讲，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这样做：压制火力点，在炮火掩护下向大桥冲锋，过桥打到河对岸去。”于是，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来带兵？格克尔自荐说：“那有什么，我去也可以！”胡景翼很尴尬……部队在炮火的轰击中冲过桥去。敌军逃遁。

占领洛阳以后，胡景翼设宴招待我们。宴会上笑话百出。当我们走进大厅时，一下就听到了“上帝，佑我沙皇”的乐声。我们站住了。胡景翼看到我们局促不安的样子，弄清原因以后，差点没有把乐队砸了。事后，他向我们表示道歉，说他命令找俄国国歌，可他们找到的却是这玩艺儿……他们没有《国际歌》歌谱，我们答应送给他们一份。

胡景翼为人怪癖，爱做怪事。他从不忙于做决定。有一次在进餐时，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场面：司令部的一名军官向他报告事情，而他却在假寐。看他那肥胖的身躯，这倒不足为奇，更何况是早晨五点钟。事后发现，这在他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他每遇棘手的事，都要做出睡着的样子，而当部属走后，这位将军立即就会睁开眼。

胡景翼周围有一批传教士。有一次通知我们说，督办想

为自己的外国友人举行宴会。届时我们去他的官邸，出乎意外地在那儿遇到一大群人，有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和德国的传教士，共六十来人。

后来才知道，这些传教士很想知道，我们是何许人。是布尔什维克吗？有一次直截了当地向布拉依洛夫斯基顾问提出这个问题。他戴的菲斯卡帽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当问及他时，他沉默不答，突然一个传教士说，这都是土耳其人！就这样我们成了土耳其人。

胡景翼常来看我们。他对一切都有兴趣。有一次来了，大发雷霆。翻译瓦西里耶夫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胡景翼说：“你们知道不知道帝国主义者这些畜牲？他们的女人用香精洗澡！”后来知道，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份广告。这份广告上有一个香水瓶，一个女仆向浴盆倒入少许香精。于是，他得出结论，西方的富人用香水洗澡。

我在国民军第二军期间，遇到了农民运动问题。这是1925年的3月。关于农民运动，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还没有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即使提出，也不过是泛泛而谈，可是，由于下述机会我便具体地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当时，“红枪会”^⑥在河南的活动很活跃。方某好象给我讲过，有一次，红枪会员们占了豫西的一座小城镇，此前那里驻有国民军第二军的一个营。看样子，士兵们对老百姓欺压得很厉害。最后营长出来收拾局面，俘虏了一些红枪会员，并开始审讯他们。

一个农民起义者当着士兵们的面说他刀枪不入：“我打了二十年的仗，可子弹从没有碰到过我”。

营长问道：“这么说，子弹打不死你啰？”他答道：“打不死！”营长端起毛瑟枪就是一枪。当然一下子就打死

了。这以后似乎红枪会员们相信子弹还是能“打死”人的。营长当时就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告诉他们应当怎样擦拭武器，保养武器，说那样准“打死”人，等等。后来他又转向另外一些红枪会员说道：“看，你们上了多大的当。”红枪会员都很窘。忽然又一个人走到营长跟前，声称他也是刀枪不入的。“刀枪不入？！”为了要彻底“说服”全体人员，营长当即把他给毙了。

得知这次枪杀后，我在见胡景翼时对他说，作为国民军的一个领导者，怎么竟至不去保卫老百姓，反倒枪杀他们呢。胡景翼起先还不相信有这等事，于是我指出了出事地点，并且建议他去核实。

事情得到了证实。胡景翼把营长喊来，又把军部的人都召集拢来。营长来的时候还满心希望受到嘉奖。他报告了事情的原委。胡景翼听着听着，然后便字字句句学着我的话说开了：“你为什么枪杀老百姓？真给国民军抹黑！你应当保护谁的利益？……”说呀说的……把个营长说得发起抖来，一下子跪倒在地。胡景翼命令枪毙他。当我知道由于我的干预而产生的结果时，我感到很不好受，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1925年的5月1日即将来临。正在准备过节。方某的积极性很高。这时在郑州各企业的工人中间已开始成立工会基层组织。这段时间我到处跑，跟工人们接触。也有过去的，1923年间被解散的工人组织⑦的代表来我这儿。我们谈论工会，关于成立工会和庆祝“五一”的事。在某种程度上说来，这也应该表示出我们工作的成果。

此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人告诉我，警察局长向胡景翼报告，说工人们准备“五一”节罢工。警察局长过去曾给

吴佩孚当过差。当他报告了胡景翼之后，胡就说：“我得给他们点厉害看看！”当时警察局长想给自己留个退路：“且慢，你还是跟俄国顾问谈谈。工人们常去找他……”

督办有一次到我这儿来谈起此事。这是一次妙趣横生的谈话。他对我说，工人们“五一”节要罢工。“但是我要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那时我回答他：“您给他们点什么厉害呢？想证明您是个一般的军阀吗？”我于是给他讲了我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是怎样纪念“五一”节的，解释了“五一”节的意义。

胡景翼在跟我谈过话之后声称：“我要下一道命令，让所有的人五月一日都罢工！”我表示反对：“这样做也是不必要的。要是他们愿意罢工，就让他们罢去；不想罢工的人，就让他们不罢工，什么命令都不需要发布”。最后他没有发布命令，但警察局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反对游行示威者。开封、郑州与河南的许多地区都组织了“五一”集会。

郑州附近有一家以女工为主的缫丝厂。我得知那里已经开大会了。有一个国民党左派在讲演。他是留法学生。他一边讲，女工们一个劲儿地鼓掌。我问方某，为什么老鼓掌。他皱着眉头很不乐意地作了解释：讲演人说，妇女们在家里是奴隶，这是不应该的。她们就是为他这番话鼓掌。

后来又鼓起掌来了。怎么回事呢？他说的原来是：不要裹脚，否则脚就变残了。他用这样的口气足足讲了不下一个小时。他结束讲话时，又爆发起一阵掌声，然后大会主席——一位妇女站起身来宣布，现在由你们大家都认识的某女工讲话。

听众报以掌声。一名瘦小的、谦恭的中国女人站了起来，向主席团鞠了一躬，又特别朝那位国民党左派也鞠了一

躬。她讲了一分半钟的话。她是那样地温顺，那样地谦恭，可她的讲话比那位国民党左派的演说却更胜一筹。

她说了下面一席话：“刚才那位讲得很好（说了那位国民党左派的名字，又朝他鞠了一躬）。我不是演说家，我不会把女人的命运描写得那么透。我只想说几句话。让我们一天干八小时活，再多发点工资就行了”。可你们听听罢，这以后的一片掌声！

……1925年的4月初，完全出乎意料，胡景翼死了。他在打麻将时，手上深深地扎了根刺，几天以后他突然身患化脓性蜂窝组织炎。喊来了几个他的外国传教士朋友，其中有一名外科大夫，建议他作手术，手术后由于血液中毒，将军就亡故了。

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中国北方的革命民主运动，都是巨大的损失。胡景翼的一生盛衰荣枯，曲折多端。他参加了辛亥革命，参加了农民的“白朗起义”^⑧。后来又陷身绿林，被当局逮捕入狱。1921年冯玉祥救他出狱，起用了他。胡于是平步青云，直到当上了河南督办。

胡景翼的丧葬延续了数日。随后灵柩运往郑州。我护送灵柩。当时是人山人海，因为照中国的风俗，死亡能使众人和解，所以连各式敌人也都委派了代表。当列车载着灵柩徐徐驶近郑州时，乐队奏起了……狐步舞曲。参加葬礼的传教士们喜笑颜开，甚至合着乐曲的拍子手舞足蹈起来……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胡景翼之死确是一大损失。

过了一段时间，我问加拉罕，剩下的领导人中我们应当指靠谁？他答道：岳维峻^⑨。岳的那个师驻扎在洛阳附近。这是一个勇敢的人，但决非政治人物，虽然他是胡景翼的知交^⑩……

附 注

作者简介：

A·Я·克利莫夫(1898—1970)——1918年加入苏共，远东革命运动和国内战争的参加者。多次被捕，在白匪后方从事地下工作。曾任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滨海革命指挥部书记。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从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部毕业之后在中国工作(1924—1927年)；起初任国民军第二军顾问，后任驻张家口领事。从中国回国后领导过远东太平洋工会书记处，以后调到外交部工作。后来几年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历史学副博士。

A·Я·克利莫夫的回忆录是根据他1964年1月在苏联老战士委员会的讲话录音整理的。

①溥仪(1906—1967)是1911—1913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被推翻的，自十七世纪起统治中国的清王朝的末代皇帝(年号宣统)。随后几年由各军阀集团供养。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溥仪被日本人封为“最高执政”，不久又被封为伪满洲国皇帝。1945年8月关东军被歼后，溥仪为苏军俘获，作为战俘在苏联度过了将近五年。1950年7月，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的要求，溥仪和他的侍从以及原伪满洲国政府的成员被一并移交中国。见：《我的前半生。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回忆录》(莫斯科，1968年版，译自中文)。

②有关A·И·格克尔详见：A·B·勃拉戈达托夫的《中国革命札记。1925—1927年》，莫斯科，1970年版，第20—21页。

③И·М·加拉罕(1889—1937)——苏联著名的外交家，1924—1926年任驻中国全权代表。详见：M·C·贾比才的《列夫·加拉罕》，载于《著名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一书，莫斯科，1970年版，第5—21页。

④胡景翼是国民军领导人中第一个向苏联要求援助的人。1924年12月底，这位将军邀请加拉罕到他在开封的官邸去。后来他派出正式代表团同加拉罕大使进行谈判。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中包括共产党人李大钊。

⑤攻克洛阳是中国军队在苏联专家协助下在中国北方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为禀报这一胜利，胡景翼给孙中山拍发了私人电报。

⑥“红枪会”起于二十年代初期，是与军阀的横行霸道作斗争的一个农民自卫组织。它固有传统的中国秘密社团和帮会的许多特点，如入会者务须经过专门的训练——祈祷，喝浸过符咒的生水，炼得一副好身板。经过这些训练之后，会员就被认为刀枪不入了。

“红枪会”同河南国民军第二军之间的关系，于1925年底到1926年初紧张起来，因为胡景翼的继承人岳维峻将军因准备同张作霖开战而加征特别税，并强行摊派给养。以致引起了1926年1月“红枪会”举事反对国民军第二军。这次举事对华北的政治斗争影响甚大。

⑦1923年2月，吴佩孚击溃了工会组织，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

⑧白朗领导的起义（1912—1914年）史称“白朗起义”，是1912年夏季河南省内掀起的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起义。起义乃是清王朝被推翻以后中国农村阶级斗争激化的明证。后来，它合进了反对袁世凯独裁的义举。1914年8月遭镇压。详见E·A·贝洛夫的文章：《白朗领导下的中国农民起义（1912—1914年）》，载《历史问题》，1960年，第2期，第167—180页。

⑨岳维峻——国民军第二军的一员将领，胡景翼逝世后任该军军长兼河南省督办。1926年2月，国民军第二军因败于吴佩孚的军队，旋不复存在。

⑩A·Я·克利莫夫的讲话录音至此中断。

（元吟译）

在冯玉祥的军队里

C·H·纳乌莫夫

我于1925年4月到中国。在莫斯科，我们小组由B·K·普特纳①培训。他不仅常常招待我，而且凡派在他手下的人他都招待。除普特纳之外，从事这一工作的还有A·Я·拉品②，他担任参谋长的职务。

出发前的准备工作用了好几个月。普特纳小组分两批从莫斯科启程。一批去满洲里，而另一批拟取道乌兰巴托。我属于第二批。

此行颇为不易。我们坐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特别快车到乌兰-乌德（当时叫上乌金斯克）。在上乌金斯克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我们耽搁了一个星期。后来只好坐雪撬走了一段。那是严冬季节，我们有几个同志的腿脚都冻坏了。总共用了五、六个昼夜才到达乌兰巴托。

在乌兰巴托滞留了十来天。又出现了交通问题——我们要越过戈壁沙漠。有几个人半真半假建议装备一个骆驼队。自然，这个方案没有成立。决定继续坐车前进——乌兰巴托和张家口之间有公路可通。但起初车子不够，因为原来我们想全组一起走：这样安全些，据说那时候公路上还有白匪出没。

不久，搞到了必要数量的汽车，我们乘车穿越整个沙漠，抵达了中蒙边界。离边境不远处，有冯玉祥专门派来的

小分队在迎接我们，以护送我们行进。中国人得到情报，说白匪企图在某个地方截击我们。结果没有发生什么情况。诚然，有人曾发现远处有骑兵侦察班，但这些骑兵侦察班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到头也没有弄清楚。在护送队的伴送下我们抵达了当时冯玉祥元帅的大本营所在地张家口。

很自然，在我们抵达之后的最初几天，国民军第一军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政工人员将做些什么具体工作。坦率地说，我们很快也就明白了，在冯玉祥的军队里，除去宣传基督教（因为元帅本人信基督教）之外，什么政治工作也不开展。各部队都有一批传教士。士兵清早起来要做祷告，晚上睡觉前要唱赞美诗。传教士给士兵们灌输基督教教义。

当B·K·普特纳把我们介绍给冯玉祥，说这些同志是组织和进行政治工作的专家时，元帅立即答道，“啊，这么说，你们是想开导我的兵了？这种工作我们倒是也一般地搞一搞”。他按一下铃，进来一个人，元帅跟他耳语了几句，几分钟后有两三个人来到屋子里。看来都是牧师。冯玉祥声称：“就是这几个人在我们这里干你们准备干的那种工作”。我们明白，这就表明他们不需要我们效劳。所需要的是通讯、炮兵、步兵方面的顾问，而不是政工人员。

然而，普特纳还是作了试探，总想把我们留下，后来谈妥了：在国民军第一军的几个最大的部队里将组织驻军俱乐部，开展“对于上述工作之辅助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计划之内的事。

应当指出，在这些俱乐部里已有中国共产党员在积极地工作了，虽然他们并没有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我跟杰夏特钦科和巴库林最终还是留在了这些俱乐部里，并找了些

事情做。

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从哪儿下手，开展哪个方面工作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很年青，而且也都没有什么经验可言。

为了求取必要的建议和指示，我们经普特纳准许之后去了北京。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Γ·H·维经斯基^③跟我们谈了话。他对我们帮助很大。在维经斯基协助下，我们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我们跟这位极有魅力的人物有过多次接触。

第一次谈话时，李大钊对我们说，他不太相信在冯玉祥的军队里我们能把当前的政治工作照我们想象地那样搞起来。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必将对总的事业有所裨益。他说，“你们到了俱乐部以后，要经常地对那些来听讲话的人介绍红军的政治工作是怎样组织的。你们应该给他们介绍红军政工人员所遵循的纲要，以便使他们获得最大的教益。这也是和敌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一种有效的、而且是重要的方式”。

李大钊预言，我们的基本听众将是军官，我们将很难指望有士兵来听讲。他说，即使冯玉祥给全军下了命令，师长们也会任意解释命令，他们不会让你们去接近士兵。

李大钊的这一预言很快就完全得到了证实。冯玉祥下了一道相应的命令，而他的参谋长张之江将军〔原文如此。——译者〕——一个疯狂的反动分子，却就其权力之所及搞了种种名堂，以阻挠我们有效地工作。这一套他很擅长。他只要对任何一个师长说上几句话，后者就会把他的指示贯彻下去。而我们的机会就会大受囿限。

我们就这样工作了将近一个月。

最后，当B·K·普特纳确信我们在第一军的安全有了

保障之后，才让我们去了北京。

冯玉祥设宴欢送我们。这是一次普通的中国式的宴会，但有一件事使我对这次宴会印象很深。宴会已经结束了，我们在翻译陪同下到了隔壁房间，我们注意到那里出现了一幅政区图，就问为什么突然要把这幅地图弄出来。翻译马上答道：这是中国的耻辱图。

我问道这上面划虚线的地区是什么意思。翻译解释说这是“洋鬼子”从中国人手里占去的土地，而且已经占了不止一年，也不止十年。翻译解释道，“这里划的是被英国人、法国人强占去的土地”。

“那这又是什么呢？”我们指着地图上划了虚线的苏联远东地区。

“这是远东”。

那天晚上我们再也没有更多地谈论这个题目。到北京以后，李大钊很想见见我们。他想知道我们在冯玉祥军队里开展政治工作的尝试有些什么结果。我们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我们的一个同志，塔尔汉诺夫（他虽然不是政工人员，但对我们的工作一直很有兴趣）向李大钊提出一个问题，问他怎么看待那张“中国耻辱”图。李大钊在书房里踱来踱去说：“要是冯玉祥元帅赞许这样一张地图都会使你们吃惊，那你们就太天真了！你们以为冯玉祥当真有志于革命活动吗？即使他再活这么多年，他也绝成不了革命家。最多也不过是有激进情绪，这可能反映在他的具体实践活动上。当然，我不怀疑，冯玉祥元帅可能是孙中山所提倡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热烈的信徒。请不要忘记，中国可能有这样的时代，到那时不仅会涌现出冯玉祥元帅这一类型的人，而且还会涌现出口袋里装着共产党党证，但思想情绪跟他不相上下的人……”

就这样我们离开张家口，到了北京。这已经是1925年的5月了。京城的一部分地区由冯玉祥的部队控制着，另一部分地区则在张作霖部手里。城里可真是泾渭分明。有人提醒我们，哪条街上可以放心大胆地走动，哪条街上可去不得。我们牢牢记住了。那时候冯玉祥想在北京办一所培养大学生当指挥官的专门学校。这是为他的军队培养军官的军事学校。B·M·普里马科夫^④已经在那里积极工作了。后来又派了另外几名政工人员去协助他，而他自己就当了解全军队的顾问。还按各兵种配备了助手，有炮兵的，有通讯兵的，当时他们都在北京。

我跟巴库林和塔尔汉诺夫受领了去这所学校协助普里马科夫的任务。这是一项军事政治性的紧张工作。这所学校的学员都是大学生，绝大多数人会外语，有的会法语，有的会英语，有的会德语。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感到有些为难，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要认真地学习一门外语是办不到的。

在北京，我们见到了李大钊和他周围的人。我们一起讨论在这种或那种具体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同学们谈些什么。李大钊对我们说：“我们给你们出些主意，而你们再把你们的经验加上”。这办法十分有效。

在学校里约摸呆了一个半月之后，我们获悉将去开封岳维峻的国民军第二军。

我在开封住的时间不长。1925年8月底，我和一部分同志得到指示先去北京，再由北京去符拉迪沃斯托克。1925年9月“蒙古街号”轮船（顺便提及，这就是契诃夫当年到库页岛去时搭乘的那艘“贝加尔号”）把一批顾问送到了华南遥远的广州。

我一生中新的一页开始了——到黄埔军校去工作。

附 注

作者简介：

C·H·纳乌莫夫(1968年卒)——老党员，国内战争参加者，乌克兰第一批共青团组织的创建人之一。1918年参加红军，先后参加过平息马赫诺和格里戈里耶夫等匪帮叛乱的武装斗争；国内战争结束后，从事部队的政治工作。1925年4月作为志愿人员赴华，曾在冯玉祥部工作，1925年11月任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顾问。北伐时期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1927年5月回国后，从事苏军的科研与教学工作。

C·H·纳乌莫夫这段回忆是根据他1964年1月在苏联老战士委员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的。

①B·K·普特纳是红军中一位卓有才华的指挥官，1925年率领苏联顾问小组去中国张家口，在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工作。关于普特纳，详见：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札记。1925—1927》，第34—35页。

②A·Я·拉品是红军著名指挥官之一。他参加了莫斯科的十月武装起义和反对高尔察克，波兰白匪和远东日本干涉者的战斗。关于拉品，详见：A·B·勃拉戈达托夫前引书，第13—15页。

③关于Г·И·维经斯基，详见：B·И·格卢宁的《Г·И·维经斯基（1893—1953）》，载于《著名的苏联共产党员……》，第66—87页。

④B·M·普里马科夫（1897—1937）是著名苏联军事将领，曾任苏联在华军事顾问张家口顾问组长。关于B·M·普里马科夫，参阅他本人所著《志愿军札记·中国的国内战争》，莫斯科，1967年。关于他的更详细的情况可见P·A·米罗维茨卡亚为上书所写的序言。

（元吟译）

炮兵顾问的回忆

T·C·鲍罗金

我于1925年7月到中国后，被派到河南开封工作，在当时由岳维峻将军指挥的国民军第二军担任首席炮兵顾问。岳维峻将军表面上不反对苏联顾问的帮助，可是事实上对我们部队和军校的工作处处作梗。1926年2—3月间，国民军第二军被吴佩孚将军的部队击溃，从此也就不再存在。我在开封的时间不长。当时在开封的苏联顾问组组长是Г·Б·斯卡洛夫（西纳尼），顾问组参谋长是А·Я·拉品（谢伊福林）。

1926年3月，我被派到广州国民革命军工作。1926年3月18日我抵达广州，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炮兵教官。刚开始工作就赶上了“三月二十日事件”^①，黄埔军校的顾问工作变得十分困难。那些倾向蒋介石的学校领导人，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的工作。但是，布留赫尔（即加伦——译者）仍指示我们不要离开黄埔军校，应该寻找各种途径更有效地进行工作，不要断绝同学员的联系。我所在的炮兵科的情况还过得去。尽管有困难，但我还是几乎每天都能够上炮兵课。这首先是因为黄埔军校没有中国炮兵教官，其次是因为我的翻译康燮武（音。——译者）（他是朝鲜人，中共党员，但他同时也是国民党员）同黄埔军校领导人的关系很好，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可是，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日期日益迫近，所有部队，其中包括蒋介石直接指挥的部队，都急需军官。这时候，蒋介石已明白，他的政变搞得太匆忙了。不久，我们就又大干起来。

炮兵科总共约一百五十名学员，成份复杂，其中有炮兵军官，也有直接从普通学校招来的学生（即受过高等教育、不完全高等教育或中等教育的人），还有其他兵种的军官。这就造成了各种困难。此外，我的翻译从未在军队工作过，有些炮兵术语他经常翻译不出来。所以我只好采用这种工作方法，就是在讲课前两三天写出提纲，然后把提纲译成中文发给学员。这样，学员们就能事先了解问题的要点，能更好地理解讲课的内容。

教学大纲的课程定为八个月，包括下列科目：炮兵引论、炮兵射击理论、炮兵与步兵的协同动作、测地学、炮兵侦察与炮兵射击观察、炮兵兵器、通讯联系。这些科目提供的知识范围，相当于我国排长和炮兵连长应掌握的知识。

大约在北伐前一个月，广州运到了十二门1909年式的76.2毫米山炮，八门罗森贝格式的37毫米加农炮和八门90毫米迫击炮。

每门炮拆卸成六件，重量为五——七普特，用有专门装具的马运载。我对这种山炮非常熟悉，因为我在沙皇军队里正好是在装备这种火炮的山炮连当过兵。1913年我从炮兵训练班毕业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土耳其战场就是使用这种火炮。由于非常熟悉这种火炮的兵器部分，瞄准装置和带有测角器的周视瞄准镜等，我的教学工作顺手得多。

国民革命军司令部作出决定，立即着手研究这些火炮，并培训约四十名炮兵军官（炮兵连、营长），要求他们学会

从遮蔽阵地进行射击。

1926年以前，所有中国军队的炮兵军官都不会从遮蔽阵地进行射击。中国所有的军队过去装备的不是德国造的克虏伯加农炮，就是日本造的有坂野炮，而这些火炮只能从暴露阵地上进行射击。射击时，是用方向表尺和准星进行瞄准的。

由于培训军官进行遮蔽阵地射击的任务紧急，这就给我提出了一系列复杂问题。首先是培训期实在太短，最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需要和学员一起研究火炮的兵器部分，反后座装置、瞄准装置以及测角器方向盘和蔡司炮队镜。不懂这些就根本无法进行遮蔽阵地射击。此外，还必须教会学员在战斗过程中排除火炮的各种故障。糟糕的是，我那位翻译还不会准确翻译瞄准装置的术语。

幸好，这时候从苏联来了一位刚刚在莫斯科某炮兵学校毕业的新翻译。

从头几堂课起，我就非常满意，因为我的学员对数学公式、几何图形和三角图形理解得并不费力。这就使我相信学员们能够顺利地掌握全部知识，尤其是遮蔽阵地射击的知识。这些学员终于及时毕了业，而且成绩还不错。当然，这可费了我不少劲。我经常一天工作十四至十六小时，但是我非常满意，因为我的劳动没有付诸东流。

在学员正式毕业后，B·K·布留赫尔把我找去，问我能不能当着广州政府委员和国民革命军领导的面进行表演，说明这一批毕业军官已确实训练合格并学会了进行遮蔽阵地射击的本领。第二天，他们建议我带几个学员到广州郊区选一个适合于进行炮兵观摩表演的射击场。

我们在广州东北二十至二十五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块合

适的冈峦起伏的地方。根据我的指示设置了表示敌人步兵、炮兵和骑兵的靶子，而炮兵阵地和观察所，则由我指定担任这次射击任务的炮兵连、营长自己选定。

在预定的那天，由三个连组成炮兵营开到了事先准备好的阵地。炮兵连长和炮兵营长的观察所之间架设了野战电话线，用来下达口令和指挥射击。在三个炮兵连长的观察所还安装了指示目标和转移火力用的蔡司炮队镜和方向盘。

中午，政府委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人员前来观看炮兵示范射击。布留赫尔、国民革命军的其他顾问和广州政府的委员们被安排在一个高地上，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炮兵连长的观察所和标示敌人的目标，但是看不到炮兵连的阵地。我当时在炮兵营长的观察所内，从那里用电话给各炮兵连下达指示。我的翻译在进行射击的炮兵连观察所，翻译我发出的口令，并在射击方面给连长一些帮助。

从遮蔽阵地进行试射和击中目标以后，火炮就巧妙地从一个目标向另一个目标转移火力。观众中一片喝采声。在示范射击的过程中，每个炮兵连各射两个目标，并示范火力转移。在集团射击时，炮兵营也打了两个目标。无论是首长，还是观众，对这次示范射击都很满意，而我也得到了国民革命军通报嘉奖。

* * *

1926年7月，北伐开始了。我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的首席炮兵顾问。炮兵司令是位姓蔡〔音〕的上校，他是蒋介石的追随者，是个酒鬼，而且是个优柔寡断、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的人。几乎所有国民革命军的炮兵命令都由我起草，或至少

由我签署。我和蔡上校相处得不错，这就为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提供了方便。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建立了一个炮兵预备队，配备的干部都是学过遮蔽阵地射击的军官，他们掌握十二门火炮。实际上，这个炮兵预备队是我的属下，因为蔡上校不懂炮兵，其余的火炮和迫击炮都分给了国民革命军的各个军。

从广州到湖南长沙几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国民革命军翻山越岭，沿着崎岖小道蜿蜒前进，又正值酷暑时节，一个个都疲惫不堪。中国士兵，特别是脚伕，一天行军六、七十里（三十到三十五公里），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真是令人惊讶。大炮上，每个拆开的部件由八个脚伕分两班换着抬，根据道路状况，他们每隔一至二小时换一次班。不难算出，搬运一门大炮需要四十八个人，十二门大炮就需要五百七十六人。此外，还要给每门大炮携带五百发炮弹和其他军用物资，一句话，仅仅一个总司令部的炮兵预备队，它的行军纵队就有几十公里长。按当时的条令计算，一个战士要三个后勤人员服务，那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有三万名战士，就有一支大约九万人的后勤支援队伍。

我们这些顾问在这次行军中也是够受的，太阳帽挡不住炎热，更消除不掉疲劳。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影响了健康，从中国回去的顾问，没病的人不多……

当行军纵队越过山垭口，开始从山区向湖南省挺进的时候，部分辎重和人员搭乘平底木船沿山间激川顺流而下。这些小河在陡崖峭壁之间奔流，有时急转直下，滩险流急，航船非常危险。在流速每小时达六十公里的蜿蜒曲折的山间河川里操舟前进需要有极大的胆略。我有两天就是沿着这样的河川航行的，有时船好象马上要撞上峭壁，简直是吓得魂不

附体，可是中国船工的技术高超，舵手在激流中操舟自如，化险为夷。我回忆起我青年时代在巴库当海员的情景。我在里海过了四年海员生活，曾见过不少有才干的海员，在使船颠簸无度的大风暴中，他们在大海上时而张帆时而落帆，乘风破浪前进。而中国船工在驾驶技巧方面比起他们来也毫无逊色。

当时在粤北湘南约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带，霍乱猖獗，又无法绕过这个“霍乱区”。国民革命军横穿这一地带，死掉了许多士兵。在我们继续北上时，沿途见到公路两边躺着没有掩埋掉的死于霍乱的士兵尸体。

在“霍乱区”中心的一个县城里，我的翻译告诉我说：城里有一个得了霍乱的苏联顾问。我立刻设法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个病号。原来他是国民革命军的军需顾问洛德津斯基，当时由于没有采取任何急救措施，他已不省人事。

过去我曾学过一点必要的医学知识，其中包括霍乱病人的急救。我和翻译轮流照看病号。抢救了三天，我们终于胜利了：洛德津斯基得救了。这时，由我们的医生奥尔洛夫担任顾问的国民革命军卫生处也到了县城。我们把病号交给他们，自己就前去追赶国民革命军的炮兵司令部。

* * *

1926年8月中旬，国民革命军进入湖南省会长沙。长沙到武汉通铁路。总司令部设在几节车厢里，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的北进而沿着铁路线向前转移。当然，军事总顾问布留赫尔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国民革命军各部门的首席顾问，也随总司令部一起前进。

1926年8月27日，第四军部队抵达咸宁时遇到了敌军的

顽强抵抗。四军实施了巧妙的机动战术，并第一次把三个炮兵连投入战斗，从遮蔽阵地进行了射击，这起了决定性作用。结果，咸宁之敌全部被歼，我俘虏敌军近五千名，缴获大量火炮、迫击炮、步枪及其他军用物资。

咸宁一仗以后，国民革命军部队向长江右岸的要塞岳州加速推进。从咸宁溃退下来的敌军已无力抵抗，经短暂的战斗之后，革命军攻克岳州要塞。

第四军没有在岳州耽搁，而是派十二师（顾问是波罗）担任先锋队，加速向武昌挺进。快到武昌时，第四军为攻占坚固设防的两湖（梁子湖和黄塘湖。——译者）间的狭窄地带（构筑有三道战壕并设置有铁丝网等障碍物），曾经历了一场艰巨战斗。根据两湖间狭窄地带的设防特点和工事体系来看，可以肯定，这是按日本教官或英国教官的建议搞的。

中国内战中，实际上从来没有在夜间和下雨天打过仗。布留赫尔决定在夜间攻击敌人在两湖间的筑垒阵地，否则白天攻击会给国民革命军带来重大伤亡。他建议各师的顾问先给部队和分队指挥员讲一讲夜间战斗的性质和特点。在我的指导下，把炮兵分配到适于夜间射击的阵地，白天从遮蔽阵地对敌军各道防线进行了试射。

第十二师奉命于晚上十二点整发起进攻。敌军官兵由于没有想到我们会在夜间发起攻击，正在睡大觉。结果第一道防线几乎未经战斗就被攻克。敌军在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开始顽抗，并不时进行反冲击。国民革命军的炮兵与前面的部队保持着电话通讯联络，并根据观察员的指示行动，逐次摧毁了敌军的各道防线，使步兵得以顺利前进。攻占两湖间狭窄地带的战斗打了近八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进攻的部队击退了敌军四次刺刀冲锋。

8月31日，第四军的部队兵临武昌城下。

对武昌城的总攻预定在9月2日。可是由于四军各部配合不好，炮兵又缺乏必要的组织，再加上没有得到七军、八军的支援，总攻没有成功。四军各部只好仍退回出发地区。第二次对武昌城的总攻预定在9月4日，由于同样原因，这次攻击也被敌军击退。

当时我在岳州组织炮兵防御敌人登陆的工作，9月3日，我应召从岳州赶到武昌为炮兵参加攻城做准备。

由于交通困难，我于9月4日傍晚前，离总攻只剩四小时，才到达武昌城下。当时部分步兵和全部炮兵已经进入出发阵地。天黑之前没有对敌军防线进行试射，又没有电话通讯联络。要在四个小时内（何况还是夜间）把炮兵转移到新的阵地上以及排除所有缺点，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炮兵在这次总攻中的作用也就实际上等于零。总攻的全部重担都落在步兵肩上。当时决定，如果拂晓前总攻不能成功，黎明时分部队将从城下撤回出发阵地。

总攻在凌晨三点开始。四军和一军的第二师仍和以前一样奋力强攻。但是冲击受挫，到拂晓时，国民革命军的部队甚至还未来得及从城墙下撤离，因而遭到了敌军机枪和步枪的直接扫射和手榴弹的杀伤。

夜间总攻时，四军第十二师的部队曾五次登上城头，但都被敌军火力击退。

一军第二师得以打开第一道城门，可是在第二道城门前卡住了。这样，一整天就被夹在当中，遭到很大伤亡。天黑之后，部队才撤回出发阵地。这次总攻的损失是：一军第二师损失约三百人，四军损失约五百人，七军损失约一百人。这就看得很清楚，总攻时谁积极，谁只是走走过场。此外，

9月5日在我们缴获的仓库里和鄂军第十八师和第二十五师的兵营里，发现了十二门完全作好战备的有坂野炮和大量炮弹。原来，八军早在9月3日就发现了这些大炮，但没有告诉任何人。

9月6日晚（在第二次总攻失利后）召开师、军长会议。会上八军军长唐生智建议，武昌不宜以强攻夺取，最好先由四军包围之，与此同时，唐生智率所部渡到左岸攻占汉阳、汉口。这一计划在会上通过了。实际上，八军的一个师已经在几天前就渡过长江，并于9月6日晨占领了汉阳，只是总司令部不知道这个消息，唐生智在会上没有提及罢了。估计唐生智曾背着总司令部同军阀刘佐龙将军进行过谈判。刘佐龙于9月7日倒向了广州政府，而唐生智只是到了9月7日晚上才报告说，“经激战后”他已占领汉阳和汉口。

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都暴露出第七军和第八军之间有勾结。它们力图保存自己的部队，削弱直接来自广州的各个军，目的是为了今后控制广州政府。毫无疑问，总司令部也看到了这种情况，所以它一直在设法破坏这种勾结。在攻占汉阳和汉口以后，总司令部终于取得第七军军长的同意，让七军开赴江西战场，而八军则负责肃清湖北省内的残敌。

包围武昌的任务由四军的第十和第十二师担任。当时给四军配属了两架飞机，飞行员是谢尔盖耶夫和克拉夫佐夫。除了各师的炮兵外，由六门山炮和十二门有坂野炮编成的总司令部炮兵预备队也都进入了阵地。这些大炮由我统一指挥，它们的任务是压制敌军的炮兵和迫击炮。山炮都配置在遮蔽阵地上，而有坂野炮则照例配置在暴露阵地上，并加以伪装。

敌军的大炮配置在城墙上，也都进行了伪装，但要找到这些大炮，对我们来说并不困难。国民革命军的每个炮兵排

都有自己的射击地境，对所有目标都及时进行了试射。所以我们能够随时集中火力打击敌军的任何地方。我们的飞机每天早晨和傍晚轰炸武昌，使敌人整天提心吊胆。在飞机起飞以前的十五到二十分钟时间里，炮兵对敌军阵地进行短促的猛烈射击，使敌军难以对付国民革命军的飞机。

武昌被围困了三十五天。在这段时间里，共打了四千多发炮弹，飞机投掷了二百多普特炸药。

1926年10月10日，攻克武昌。

我想提起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在炮击武昌城的时候，我正好在一个炮兵排的阵地上。突然敌军一发炮弹落下，在我们阵地附近爆炸，掀起的土块打在炮手们身上，一个战士的腿被弹片打伤。炮兵排的士兵们害怕了，丢下大炮跑走了。我们炮兵有一条守则：如果敌人用火力找到了你的阵地，那么你就不应该停止射击，而应该加强自己的炮火，以此来迷惑敌人。我看到我炮兵停止射击，再也忍耐不住，就跑到大炮跟前进行瞄准和装填炮弹，并亲自打起炮来。这样干了约五分钟。在这个时间里，我摧毁了敌军一门大炮。不久，全班炮手重新各就各位。

这个情况不知怎么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他对布留赫尔说，他不满意我的做法。后来，布留赫尔把我叫去，批评我说，我的勇敢和俄国炮兵的守则，在这里是不适合的。

在攻克武昌后不久，我得了一场重病，住在我国驻汉口的领事馆治病，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对炮兵在北伐中的作用问题进行分析 and 总结。

* * *

北伐开始时，国民革命军的大炮总共只有七十门，当时

已经是老式的克虏伯式和有坂式75毫米山炮，每门炮有十到十五发炮弹。要想在战斗中指望这几门炮发挥出真正的巨大威力，是困难的。

诚然，除了这几门炮以外，8月4日有一个配备有黄埔军校学员的炮兵团从广州开出。这个炮兵团共装备有苏联运来的三十八门火炮和迫击炮。炮团开到前线后，罗森贝格式加农炮和迫击炮转给了各军，并直接配属给了步兵，炮团只留下十二门76.2毫米山炮。可是火炮的备件和各种工具没有随火炮同时到达，从而致命地影响炮的使用。如一些火炮由于反后座装置缺少液体或空气这样的小事，就失去了战斗力，而只要有工具和备件，这些故障不用两小时就可以排除。此外，由于新火炮只是在北伐开始前一个月才运到，所以问题就更复杂了。这是现代化的、专门用来进行遮蔽阵地射击的火炮，中国炮手从未见过。当然，一个月的时间，最多只能使军官和黄埔军校的学员了解这种火炮的性能，而要想学会灵活地指挥这种火炮和在战斗中根据战术要求来使用这种火炮，在一个月內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不过有这十二门火炮本来是可以完成不少任务的，问题是有一个纯粹的政治因素在起阻碍作用。各军军长一直把炮兵看成是来自广州的部队的财产，他们认为，既然来自广州的部队有精良的炮兵，那么就让它们在前面开路。此外，各军军长在战斗中使用部队的问题上一直在勾心斗角，这就需要对总司令和各军长间的关系作某些调整，也就是给各军分一些炮兵。结果，给四军、三军和八军各分两门炮。根据八军军长的请求，留两门炮防守岳州（毫无疑问，没有这两门炮岳州也是守得住的），还有四门炮随一军和四军行动。

分散使用炮兵，射击效果就差了。在行军时，炮兵经常

落后于步兵，赶不上战斗，而在参加战斗时，又往往使用不当或者无所作为。

我根本无法照顾到分散在各军的所有火炮和帮助各军正确使用这些火炮。我最多只到过我们附近两、三门火炮所在的地段，而且当时又完全没有电话等联络工具。所有这些因素降低了使用炮兵的效果，不过炮兵在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还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我们在中国的日子已经到最后几天了。1927年7月，在蒋介石政变以后不久，包括我在内的顾问团就回祖国了。我国驻汉口的领事租了一条日本船，我们就乘这条船沿长江到上海，然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在上海港，苏联领事科兹洛夫斯基乘汽艇驶近我们的船，他警告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要上岸，因为蒋介石已下令逮捕我们。海关警察要求船长送我们上岸，可是船长拒绝了。我们在上海港停了三天。最后，这条日本船终于进入了辽阔的海面，向符拉迪沃斯托克驶去。

附 注

作者简介：

T·C·鲍罗金（1891—1970）出身于农民家庭，1912年应征到沙皇军队服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11月参加赤卫队，1918年入党，曾参加第六届苏维埃特别代表大会的工作。国内战争期间，鲍罗金当过炮兵连长、营长，参加过反对邓尼金、弗兰格尔和马蒙托夫匪帮的战斗。1921年，他参加了消灭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安东诺夫匪徒的战斗。1925年到中国工作，曾参加过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还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

①1926年3月20日凌晨，蒋介石依仗忠于他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在广州进行反革命政变。政变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在“三月二十日事件”后国民党右派集团的政治影响明显加强了。政府由谭延闿领导，而蒋介石本人攫取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主席等职务，着手建立他的个人独裁。

（达南译）

在中国南方

И·П·舒万诺夫

我越来越经常回想起我亲身经历的那些好象就在不久前发生的事情。

1926年7月底，通过必要的手续拿到出国护照后，我和妻子就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去中国。收拾行装并没用很多时间，我们很快就随红军指挥官小组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这个组的组长是师级干部叶弗列莫夫^①（阿尔诺利德）。

几天之后，我们就搭乘苏联“格奥尔基号”轮船向日本海岸驶去。

我们抵达日本之日，天气晴朗异常。还在海上的时候，就有两条载海关官员和警察的快艇向我们轮船开来。他们顺着放下的舷梯登上我们轮船，一位警官用俄语给船长乌沙科夫下达必要的指示，而海关官员开始详细检查这条船。这时全体船员排列在船尾甲板上，日本海关官员非常仔细地打量着每个水手，甚至还查看了几个水兵的手掌心（看看他们是否是知识分子）。我们大家呆在船上的公共起坐厅里，几个俄语讲得很好的日本警官十分仔细地检查了我们的证件，并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刁难我们。他们对我们去中国的目的特别感兴趣，总想把话题引到我们每个人的证件所注明的职业上来。扮演经营花边生意的“红色商人”的角色，我感到十分费劲。两个警官向我提出了有关苏联贸易规章制度的许多

问题。看来，我还是顺利地应付过去了。

轮船要到晚上才能启航，于是我们就到甲板去欣赏岸上风光。岸上绿树成荫，布满小花园和色调鲜明的小洋房。港口挤满了各种木船、汽艇和大轮船，它们往返于门司到下关之间，运送着旅客以及从外国货轮和日本货轮上卸下来的各种货物。暮色降临后，所有船只灯火齐明，照耀得分外好看，而岸上的村镇、花园和海滨公园也在灯光掩映之中。风平浪静，一切都象一个奇妙的童话世界。

晚上11点钟左右，来了两位警察，其中一位向一直留在船上的警官报告了什么以后，警官就下令准许我们出海了。一位警官在离开我们轮船时大声说道：“苏俄给广州政府送去了一份不坏的礼物！”

到上海大约有一千多公里路程，这段路程对我们旅客来说是很艰难的，迎面扑来的狂风使我们这艘不大的轮船颠簸了两天多，到第三天风暴才停息下来。

快到长江口的时候，我们已开始碰到中国货船。这些船大部分是木船，挂着各式各样的布帆。有的船上还装备有火炮，人们告诉我说，这是为了防备江洋大盗的。不时有西行的英国驱逐舰和炮艇超过我们轮船。

长江确实气魄很大，一眼看不到它的北岸。我们这艘不大的轮船沿着南岸的航道，在外国大轮船之间穿梭前进。

我们遇到的木船越来越多，有相当大的货船，也有则是全家都住在上面的小木船，他们靠运货和渡人挣钱糊口。这些小木船的船尾都挂着养鸡鸭等家禽的笼子或筐子，有的船上还养着猫。这是劳动者的住所。但是也碰上另外一种船，这种船精雕细刻，悬挂着各种各样的灯笼，装饰非常漂亮。

这种叫花船的水上饭馆，入夜后，在灯光照耀下显得特别迷人，从船上敞开着窗口传来用中国民族乐器演奏的悦耳的音乐声……

我们渐渐接近吴淞江，前面已经看到碇泊场，轮船开始减速前进，让中国海关官员登上船。他开始检验证件和检查船舱。我们有几个同志还被盘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去干什么等等。终于等到了领港员，他引导轮船沿吴淞江中速向上海前进。越接近上海，河里的船只越挤。河当中停泊的外国轮船的装卸作业都是手工操作，船上的起重设备放着不用。当然，我们对此有些纳闷，但是别人给我们解释说，这里的人力比用机械便宜。

疲惫不堪的中国码头工人都戴着既遮太阳又挡雨的大沿草帽，身上只穿裤衩，肩上搭着一条汗巾，沿舷梯将货物扛上轮船，然后自己抓着船边的粗绳子向下滑到运货驳船上。在卸船时，他们用绳索或沿舷梯把货物装到小驳船上。所有码头工人都汗流浹背，他们呈古铜色的身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靠岸货轮的装卸工作稍有不同：笨重的木箱和货包都捆在很粗的竹竿上，码头工人用肩抬着，一边和着步子，哼着吭唷、吭唷……这种凄凉而单调的号子。码头工人就这样按几百年来形成的规矩，不慌不忙，认认真真地干着。

大多数码头工人都住在岸边附近的窝棚里。窝棚最多只能使他们淋不湿，晒不着，里面什么家具也没有，他们都是席地而睡。至于他们什么时候休息，这就很难说了，因为港口的工作是昼夜不停的。

不久，左岸已经显出工厂烟囱林立的上海，右岸则是库房和各种生产用房。

在紧靠上海的江心中，日、英、法国的兵舰，一艘挨着一艘地排列着，兵舰的炮塔都对着上海市。

我们的轮船停靠在公共租界对面的右岸码头。我们从领事馆得知，去广州的轮船最早要一星期以后启航。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可以住宿的旅馆的地址。

晚上，我们一起到外滩散步。轮船上明亮的灯光辉映在水中，江面银光闪闪。船户们在忙碌一天之后，把自己的水上之家划到岸边，排成几列，一艘紧挨一艘。小木船点燃着暗淡的中国式小灯笼，这些小船上的生活还没有停息：有的在做饭，有的在掷骰子，有的在演奏民族乐器，有的在休息，有的在睡觉。从旁边经过的轮船和汽艇掀起波浪，使得这些小船互相碰撞，轧轧作响。一大清早，这些水上人家就启碇离岸，急急忙忙驶向码头、渡口或大轮船，去挣钱糊口。

上海的市内交通工具也是五花八门，使人眼花缭乱。那里有拖着两色车厢的有轨电车，欧洲人坐白色车厢，中国人坐绿色车厢；有无轨电车、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有男人、小孩甚至妇女拉的板车；有拉人或拉货的人力车。人力车的装饰也极不相同，有一般人坐的普通黄包车，也有有钱人坐的造价昂贵、装璜相当阔气的洋车。还有一种独轮车，结构非常特别。它是在一个非常大的木轮的车轴上架两个带撑脚和把手的长条凳，可以坐四到五个人，由一个车夫推着走，速度非常慢。这种最便宜的车，其乘客通常是外国纱厂的中国女工们，因为她们一天干了十二到十四个小时的活之后，根本就走不动了。

再就是富商，他们乘坐自己低矮宽大的四轮轻便马车在城里到处游逛。街上还有用竹扁担挑送货物的脚伕。黄包车夫在这些五花八门的车辆之间躲闪穿行，每时每刻都有被汽

车、电车压死撞伤的危险。只要稍一违反交通规则，就要被罚款或至少挨警棍。

法租界由外滩向西延伸，它的主要街道是一条盖有许多洋房的大马路。这些洋房的第一层都是商店和服务行业，如理发馆、裁缝铺、帽子店、编织店、绣花店、衬衣店、洗衣店、便餐馆、餐厅，还有烤肉馆。再向西去是住宅区，都是一些盖得很好的洋房或中式房子，还有带坚固的砖围墙的别墅。每幢房子都有小草坪和花坛，空气中充满了芬芳的花香。这里显得特别清静，连黄包车夫也放慢脚步，轻轻地跑着。

在上海的最后几天，我还到上海的非租界地区去转了转。这里的房子矮小，都是中国式的建筑，有点古老的气味。居民住得很拥挤，街上人来人往，非常热闹。这里有用骨头、银子、大理石、粘土、宝石、毛皮、竹木、甚至棕榈叶制成的各种物品，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中国的能工巧匠们所制作的这些手工艺品，工艺精细，玲珑别致。

中国的裁缝和鞋匠，在我们看来，真是地道的艺术大师，每件活都是几个人坐在人行道上、门槛上或窗台上同时干……

在上海停留的几天过得特别快。不久，我们就搭乘一艘比我国“格奥尔基号”轮船大一点的瑞典轮船离开上海。又照例是检查证件、行李、船舱，再次经过繁忙的吴淞江和雄伟的长江。

我们夜间进入东海，而一早就驶抵汕头。我们的船通过狭窄的海湾进入象一个深口碗一样的天然港。很快，当时在汕头的切列潘诺夫来到我们船上。他请我们下船参观汕头市。同他一起去参观的有以前在中国工作过的捷斯连科和切

尔尼科夫，还有新来的瓦西列维奇。这个港口的生活夜里也不停息。我们欣赏了这个美丽的城市，晚上很晚才睡觉……

最后一段到香港的航程，对我们来说是最艰难的了。我们饱经炎热和颠簸的折磨，根本没有心思去欣赏风景。

*

*

*

我们到达广州已经是晚上了。轮船停在离广州大约十公里的泊地。开始时我们有些发慌，因为没有人来接我们，而我们又不知道应去何处和在哪儿落脚。但是，一个半小时以后，领事馆秘书列文坐小汽艇来了，我们就乘小汽艇上了岸。

我们被安置在旅馆里过夜，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尽管已是深夜，还是闷热得透不过气来。热带的炎热真是名不虚传。我到阳台上乘凉，可是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滨江大街上车水马龙，象白昼一样热闹，买卖非常兴隆。黄包车夫拉着乘客或货物来回奔跑。为了招徕顾客，小贩们用各种调门吆喝着。他们把商品装在小筐里和带格子的小食品柜里，点上小灯笼用扁担挑着穿街走巷。扁担两头还系着金属环、小棍儿和小铃铛之类的东西，走路时发出悦耳的响声。在灯火通明的商店里，人就更多了。快到天亮的时候，街上才开始安静下来，我们也才睡了一会儿……

我们要住的地方是广州郊区的东山，所以一早我们就出发去东山了。沿途我们经过广东大学、总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办事处和我国领事馆，沿着狭窄的街道到了东山。这是郊区一个绿树成荫，风景优美的地方。地方不大，在四周街道上有为这里居民服务的各种商场和店铺，不远处还有一个市场。远处有不少漂亮的花园洋房。

我们在军事总顾问的办事处停了一会，顾问团参谋长沃

林简要地给我们介绍了中国的国内情况和军事情况。晚上，首席顾问师级干部叶弗列莫夫宣布了我的任命。

我被分到李济深将军^②的军司令部作战处工作。我请求派我到作战部队去，但没能如愿。

翌日，我和翻译到司令部报到。李济深将军接见了。随后，李将军的秘书把我领到作战处长那里。作战处长向我介绍了部队的部署、人员、装备、训练以及驻地条件等情况。所有这些资料只是一些笔记，地图上也没有标示部队的配置情况，只标示了各部队的司令部。

各师师长在他们部队驻地的作战是独自进行的，军司令部不给他们下达任务。向军司令部呈送的情报只说打了哪些仗、战果怎么样。我问了问同驻扎在各省的部队的通讯联络情况和军司令部是如何指挥它们的，但没有得到回答。

谈工作就到这里结束了，接着作战处长和我被请去喝茶。在军司令部的一个象亭子那样没有门窗的大房间里摆开了几张方桌。军官们四个人一桌坐在那里喝茶吃点心。李将军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招呼着一个走进来的军官，并把我介绍给他。这个人开始用英语向我问长问短，问我旅途的情况和初步印象。他还把我们的谈话翻译给将军听。下午四点钟左右，我离开司令部。

第二天是我了解作战处的工作。我得知，除了正规部队和地方部队（这次没有具体谈到地方部队的情况）外，还有工会队伍。我问工会队伍的任务是什么，由谁发薪水，由谁供应它们武器装备，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答复。我请他们给我介绍各师的训练情况和战斗能力，他们笼统地回答说，都训练得不错，枪也打得准，善于剿匪和清剿反革命。

第三天，我开始结识作战处的参谋。那天他们都在忙于

编写情况汇报，有几个人在向地图上标注部队北伐的进展情况。我向处长建议，把广东和云南驻军的位置以及沿进军路线留下的守备部队的位置标在地图上，同时也把这两个省里进展不顺利的地点和北伐军后勤部队的位置标出来。我对应该如何标图作了示范。这一天最后剩下的时间里，我讲了讲作战处的工作如何同情报处协调的问题，可是毫无效果，因为他们告诉我说，情报材料是绝密的，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第二天我整天教参谋们标图和使用指挥尺。有些参谋掌握得很快，并有所创造。他们用彩色铅笔标记各种图例。其中有一人会讲英语，这使我们能够借助字典取得互相了解。我的翻译很年轻，他刚毕业于美国专科学校，根本不懂军事术语。

我反复对处长说，应该训练部队指挥官和司令部参谋学会组织和进行战斗。可是我的这些理由都起不了作用，处长认为已定的规则应坚持到北伐结束。

我曾两次想找情报处长谈话，但是我的要求都以不同的借口遭到拒绝。

司令部的整个情况表明，他们不欢迎我的帮助，我就向叶弗列莫夫报告了这个情况，并请求调动工作。一星期以后，我接到李济深将军的介绍信，介绍我到驻扎在广州南面的江门、中山和珠江口地区的十三师工作。

在等候十三师师长来广州的这段时间，我和翻译学习了英文军事术语，并帮助我国军事总顾问办事处做了一些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李济深将军的邀请，参观了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它的校舍宽敞，特别清洁。在各方面都可看到我们顾问做了大量工作。墙上挂着

连营在各种条件下的战斗实施要图，到处放着射击训练用的模型和仪器。校方为李济深将军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我们参观了学校和学员们的上课情况。

被派往北伐军工作的顾问们正准备离开广州去部队。这段路程还是相当复杂的，要乘一段火车，坐一段轮船，有的地方还要步行。顾问们事先都准备了行军路线图，因为地图非常不准确，所以一定要把路线很醒目地画出来，还必须设法使广州同作战部队保持联络。

中国军官和翻译非常关怀我们的同志，帮他们准备了行军所必需的东西和中西药品。勤务兵自己挑选顾问，自愿服侍他们。这些勤务兵、传令兵和通讯兵都归班长领导，通过班长归警卫长领导。他们都是一些十八到二十二岁的士兵，大都没有文化，可是都打过仗，甚至在细小的事情上都极力为我们同志服务，都尽最大的努力，准确地去完成顾问交下的任务。没有几天，一支由俄国人和中国人组成的小队伍团结成了一个患难与共的和睦的家庭……

我去十三师的时间拖了下来，因为李济深将军司令部通知我说，徐景唐将军要来接我一起去广东南部本师的驻地江门。我利用这个机会研究了师驻地一带的经济状况，并给我的翻译上课。我真不走运，这位翻译不仅军事术语知识甚少，而且广州话也不行。

最后徐景唐将军派一位军官来接我。我们先去接了翻译，比约定时间提前十五分钟赶到了码头。码头旁停着一条不大的轮船，它象一条驳船，可是用铁甲防护，还有可遮盖的炮眼。轮船船首和机舱的装甲都加到水线部位。已经是装甲护身的舱面船长室还加了一个用钢板制成的圆形遮棚。这条船装备有几门小口径炮和几挺重机枪。船上共有二十一名

士兵、两名军官和十四名船工。在船首、船尾以及烟囱上都刷上了“13”的数字，表明这是属于十三师的船。

徐将军六点整乘车赶到，在汽车两边车门踏脚板上站着八名士兵，这是将军的私人保镖。我们互相寒暄后，就上了船。汽笛鸣响第一声，这高亢的声音有点与小船不相称。将军听完军官的报告后，向列队欢迎的士兵致意。六点三十分，轮船离开码头，马上就全速前进。原来，这条小船装备的是大马力发动机。

吃饭时，除了徐将军外，我还同船上的两名军官以及陪我前来的那位军官聊了一会儿天。这位军官是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员，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大学时还学了英文。他们都对苏联的生活情况感兴趣。当时我谈话很困难，我还不习惯通过翻译和人交往，对英译汉的准确性也信心不足，因为我自己有时也被难住，须要查字典。但是在交谈中我发觉，我们能够彼此了解。

在离江门三十公里左右的一个小岛上，驻扎着三十八团刚到这里的营。这个营担任保卫在这条江上航行的船只和剿匪的任务。有一部分营房即将竣工，士兵们正在构筑工事。徐将军指示新到的军官们，要同师司令部建立通讯联络，要严守纪律，每天给士兵上课，进行登陆训练，巡逻时要有警惕性。在没有特别命令之前，应扣留过往的拖轮及木船。视察营房后，徐将军同士兵谈了一会儿话，然后向列队欢送的守备部队告别。我们又继续前进。这时已经开始退潮，轮船在有些地方走得很慢，怕船搁浅，经常测量水的深度。我们到江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到码头接我们的有参谋长、师政治部主任和司令部的一些参谋。

在第一次同桌吃饭时，徐将军问我想做什么工作。我请

求允许我先熟悉三十八团的一个分队，了解这个分队的作息制度和军官的学习情况。饭后，我和三十八团团长就驱车出城到某营去。这个营的营房是由毛竹、茅草和棕榈皮搭成的简易棚子。团长听取了值日军官的报告。我请求给我一份军官学习计划以及班长和士兵的训练计划。原来什么计划也没有。军官根本不学习，班长和士兵的训练也是由连长们自行决定。我们来到操场，正好士兵们在操练步法，练习操枪动作和军人礼节。这些训练都是在烈日下进行的，乏而无味，当然引不起士兵们的兴趣。这些训练结束后，士兵们开始三百米跑步。跑步中变换持枪姿势，练习托枪和枪放下，没有结合战术动作。跑到终点的人再走回来，排到本纵队的队尾。

跑步结束后，以连为单位进行了靠拢队形的队列作业。一小时后，全部作业结束。

营长和连长们让士兵回营房，自己来到我们跟前。团长称赞这些训练进行得不错，可是我根本不满意。我打听了一下，分队是否进行射击训练和在各种条件下实施战斗的科目。回答是，士兵们枪打得很好，他们在剿匪时学习实弹射击。

师参谋长当着团长的面问我对这些训练的印象如何。我回答说，等我看了其他分队的操练和在战斗中的动作以后，再谈我的意见。

在一次遇到徐将军的时候，我请他给我派两个木工来，我想做几个固定步枪的简易瞄准架和一个电动模型。晚上就来了一个参谋和两个木工。我们准备好图纸，木工就干了起来。这时候，政治部主任和徐将军的侍卫长来到我们这里。这个侍卫长是个富有好奇心、肯钻研、机灵和有见识的人，

是个很好的小伙子。他详细询问我们，做的是什麼模型。我给他解释说，所有这些都能大大有助于射击训练，能更快地教会士兵射击，而不致白白地浪费子弹。我请他设法找一个工厂做步枪驳壳枪的子弹和制造一些铁的部件，并详细地给他讲了我为什么需要这样做。

政治部主任是位国民党左派，毕业于北京大学，会讲一点英语。他一直看着我们工作，注意听我和侍卫长的谈话。等侍卫长和翻译走开以后，他说，看来我和这位翻译的工作很困难，因为徐将军不大懂北京话，而他本人也不得不经常用北京话重新问翻译，然后把我们的谈话用广州话说给将军听。

我们谈到了师政治部的工作以及我国军队政治机关的体制。我们借助字典一直谈到深夜十二点钟，结果我们拟出了师政治部组织编制表和政治干部职责表。

师政治部主任临走前请我教他和另几位军官学俄语。我同意了。

翌日晨，我们继续昨天开始的工作。后来，我和侍卫长一同到答应给我做瞄准架和模型的木工那里，他当着我的面做起这些教具，每个部件都加工得很细，而且做得又快又好。我赞扬了他的工作，他答应明天就把这些教具送给我。

我回到住房时，有五位想学俄语的军官已在等我。开始上课时，因为我没有教学经验，就从最简单的话开始教起，顺便教字母。两个小时的课进行得颇有成效，下课时我的学生用俄语对我说再见，而我对他们说汉语。后来上课时，政治部主任也来了。我的学生中间有一个是师政治部干事，共产党员，他精通德语。在学习小组里他最聪明，很快就掌握了所学的材料，是我上课时的好助手。

白天我到师司令部去看了看。这是一间大屋子，徐将军的办公桌面对房门，背靠正面的墙。墙上挂着孙中山的像。在徐将军桌子旁边有一张空办公桌，屋里左右两边靠墙放着参谋们的两列办公桌。师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坐在徐将军的旁边，在他们前面坐的是司令部参谋。坐位按军衔排列，越靠近门的人，军衔越低。从大门到将军的办公桌铺了一条草垫。当我们和师政治部主任进入司令部的时候，除徐将军外，全体起立致意，很快他们又坐下继续努力工作。将军请我和翻译到他在司令部隔壁的办公室去。

办公桌上放着一张标满各种符号的地图，将军给我解释图例的含义。接着，他指给我看了本师各部队的驻地。尽管我已经知道，但是我还是认真听徐景唐的介绍，并向他提出我所关心的问题，以便更确切地弄清楚各部队的驻扎环境。我把居民点的名称、部队和分队的番号以及土匪的活动地区和人数都标在一张空白地形图上。

标示地图，这是一项非常琐碎而细致的工作。我总想把我在侦察敌情、给侦察兵下达任务和审讯投诚官兵等方面的经验传授给他们。侦察参谋是位认真细心的人，他把需要哪些情报和怎样处理情报都记录下来。他请我帮他处理现有的情报，教他如何不断增加情报，直到完全查明土匪的活动、土匪头子的性格、现有武器的数量，等等。

晚饭前，徐将军建议我到新会去两天，去检查三十八团部队的训练情况和将要进行的夜间演习。

我回到住处的时候，正好碰上木工师傅给我送模型来。这样，我计划要做的全部工作都由参谋完成了。我检查了这些仪器做得是否正确，并给学俄语的学生们留下了作业。我的勤务兵离开后，我就和翻译做明天出发的准备工作。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去新会。

新会部队的训练在旷野上进行，内容和我在江门看到的一样，不过这里的科目搞得活一些，要求也严一些。有一个营长是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他问我红军是怎样进行这些训练的。因为我对翻译的准确性有怀疑，所以我对他说，等他到江门来的时候，我详细给他介绍，并答应给他写一份作业计划和课程表。

鉴于徐将军要对训练进行讲评，我事先就请他准许我不去讲评会上讲话。他同意了，不过他要我给他写几条对训练进行的意见。我仔细地写完了，力求翻译准确。

过了不久，我请团长给我介绍即将进行的夜间训练计划。徐将军叫人送一张标有训练各阶段情况的地图来。这次训练的目的，是检查部队对居民点及其附近地区的警卫勤务的掌握程度。我了解了预定的练习过程之后，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让没有任务的军官和班长们担任调理员和充当“敌人”，并采用灯光信号和模拟器材。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对练习计划做了相应修改。

练习按预定时间开始。参加者和参观者的兴趣逐渐高涨起来。模拟器材和灯光信号用得恰到好处，出现了“俘虏”。指导者设置了不少很有意思的补充情况，使得官兵们真正满怀激情地去执行命令。调理员为引导参加练习的官兵正确行动而出了不少力，否则，在“战斗”紧张时刻“俘虏”敌人时会互相打伤的。

练习结束后，徐将军征求我的意见。我充分肯定了这次练习，指出唯一的缺点是没有各阶段的双方行动要图。

调理员提出练习优秀的士兵和班长的名单，并记录下姓名，团长总结了练习各阶段的进行情况，指出了一些缺点。

徐将军这次高度评价了演习，表扬了司令部参谋和调理员，并嘉奖了优秀者，他的侍卫长当场给他们每人发了三个桔子。

吃过早饭以后，我们视察了建在城郊的营房。每个连盖一个简易大屋和几间当办公室及仓库用的小屋。大屋子的中央放着几张长桌子和竹椅子，靠墙放两排铺着草垫和草席的木床。营房很清洁，有士兵昼夜值勤。

士兵的伙食由士兵自己管理，官长只是偶而查查他们的口粮。每个士兵每月扣伙食费八块大洋，占他们每月薪饷的一半。士兵派出全权代表同包伙的大师傅订立合同，食物、柴禾、炊具和碗筷均由大师傅购买。大师傅的工作相当复杂，尤其是在剿匪打仗的野战条件下，为了弄到食物，须要相当机灵才行。伙房的全套家什和部分食物也都由大师傅和徒弟挑着。有时，他们包办两、三个连的伙食。军官们单独开伙。大师傅赚的钱相当可观，但是他们的活计也是够繁杂和艰巨的。

在水渠旁边盖了供医务所用的一间棚式的大屋子，房间用苇席隔出，因此传染病号的隔离是非常不可靠的。可是屋内很清洁，药品和医疗器具都放在很好的玻璃柜子里。病号的伙食费由师里付，病号用的卧具视病情决定：只有重病号才铺褥子。

我们慰问了所有的伤病员，徐将军问他们的自我感觉怎么样，将军的副官还给他们发了水果和香烟。

我感兴趣的是检查一下士兵的射击训练情况，因为我记得，在江门的时候团长对我说：“枪打得很好”。我请求徐将军指定一个连，进行每人三发的二百米和四百米的实弹射击。

连队进行实弹射击时，我抽空给司令部参谋介绍了如何制订分队战斗训练计划和教育工作计划，如何给军官和班长进行辅导，以及如何做统计优秀官兵的工作。我提请他们特别重视射击课和政治课，并加强督促检查。

实弹射击是在一个深壕沟里进行的，开始是二百米全身靶射击，每发一枪显靶一次。一排的射击成绩不好，七十五发只中十发。二排进行了四百米射击，七十五发只中七发。在这之后，排的射击就停止了。八个老兵进行了二百米和四百米射击，他们的成绩是六发中二到四发。只有营长的射击得了满分。

在离开部队之前，徐将军指示团长挑选几个军官明天一起到师司令部来。回到江门后，我给徐将军和几个参谋看了做好的教具，并给他们讲了使用的方法。侦察参谋还把我讲的内容作了记录，不过为了翻译准确这些内容却花去了很多时间。第二天早晨，这些教具挪到了师司令部。徐将军在他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会议，会上他谈了这次在新会检查的结果，说部队的射击训练太差，要求大家特别重视射击训练。接着，他给到会的人示范了如何使用教具，并请他们准备关于士兵射击训练的书面建议。

散会后，大家都到射击场进行手枪和驳壳枪射击练习。总的来说，成绩还可以，但是有几个军官一枪都没有中。最后一个射击的是徐将军，他用勃朗宁手枪和带枪托的驳壳枪进行五十米射击，百发百中。他同射击技术不好的军官们开玩笑说，他们可能都是财主，他可没有钱供他们乱放枪。

将军建议我打几枪。一般说，我的枪法还是相当好的，可是这几个月来我连枪都没有摸过，所以我先试了三发子

弹，然后进行效力射。我打的是二十五米勃朗宁手枪，五十发中了四十四发。后来，我又解答了不少关于射击训练的问题。

晚上，我同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就红军政治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的形式交谈了很长时间，我帮政治部主任制订了俱乐部工作计划。

俄语课进行得较正常。两个星期后，我的学生学会了字母，有的还学会了按音节拼读。我也学了些中国话，但没有学书写。

我和政治部主任几乎每天晚上都见面，长时间地谈论苏联各族人民的生活和风俗习惯，谈论国内战争和工农业的发展情况，我也向他询问了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各省工农的生活状况。

以后几天，我在司令部里准备消灭小股土匪的作战计划。在研究了现有情报和进行了实地勘察之后，把将担任这次战役的某营所在的三十八团团长召到了师司令部，师长亲自给他下达指示。我没有提任何建议，我想观察一下他们如何准备和进行战斗。

傍晚时候，这个营开始上船。拖轮停在码头上，老百姓在岸上看热闹，同士兵们聊天。轮船烟囱上都用醒目的颜色刷着“13”的字样，一点伪装也没有！天黑后，整个船队按出发顺序开到泊地抛锚过夜。早晨五点钟，团长同我和翻译登上最前面的一艘轮船，随即发出了启程的信号，所有轮船在宏亮的汽笛声中浩浩荡荡出征了。这就是说，我们在现场一个土匪也找不到，因为好心人早就通知他们了。

晚上，第一艘拖轮和驳船靠岸。开始卸载，用了近两个小时才卸完。不论在途中还是在卸载时，轮船都大声鸣汽

笛。人员都上岸后，我和团长、营长走在一路纵队的前头，讨伐就这样开始了。我们沿着方形稻田之间的狭窄田埂前进。我是生平第一次参加这种既不派出警戒又不进行伪装的队伍行军。我们走上乡村的道路后，休息了一会儿。

这时我们改成四路纵队继续行军，仍旧没有组织警戒和向前派出侦察兵。我真想向团长提出正确组织预期战斗的行军的建议，但是我不愿意破坏他的威信，所以只好暂时仍当旁观者。

走了五公里之后，部队又休息了一次。这时候各连的大师傅挑着全套炊具从纵队后头赶到前面，他们准备在土匪聚居的村庄附近给士兵开饭。这一次我可忍耐不住了，我把团长请到一边，建议他改变行军的方式，我给他解释说，土匪可能突然向这一营开火，使营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我建议赶快派出侦察兵并组织警戒。团长命令大师傅们仍然跟在纵队后头，他派了侦察兵，但是仍没有组织纵队的警戒。

快要接近村庄的时候，我见到村边上我们的侦察兵同当地的老百姓在聊天。营包围了这个村庄，我们带上半连兵力进了村。原来土匪（约四十人）都跑光了，可是任哪一个老百姓也说不清楚，土匪是什么时候逃跑的，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团长下令抓十个人作为人质带出村庄，但是这也没有帮助我们弄清土匪的去向。在土匪已离去的巢穴里，我们见到有相当阔气的住房，有瞭望台和设备齐全的厨房。在伪装得不易发现的地窖里，士兵们搬出了好几大玻璃瓶自己酿造的白酒，两三袋大米和其他食品。在对土匪窝进行了仔细搜查之后，团长下令放火将其烧掉。为了进行恫吓还打了几枪。我们审问了人质，可是这个办法也毫无结果。

商人和富裕农民给士兵准备了晚饭。晚饭后，士兵们又

返回上岸的地点上船，等开始涨潮的时候就返航回江门了。

翌日，我向徐将军汇报了我对这次“作战”的印象。我们就准备与实施这类行动的题目谈了近两个小时，甚至还拟定了一个概略的计划。晚上，在上完了俄文课之后，我同新来的翻译拟定了在不同条件下剿匪作战的几个方案，并给徐将军写了一个指导性的报告。

第二天早饭时，徐将军一句话也没有讲。后来，他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问我过去参加过这种作战没有。我事先考虑过这个问题，就从我的实践中举了几个例子。随后我把昨天晚上为他准备的报告交给了他，并作了说明。他问我这次剿匪中曾给团长提过哪些建议。我报告说，很遗憾，除了在接近村庄时提出过改变纵队队形的建议外，没有可能提什么建议，因为我认为当着下级面破坏指挥官的威信是有害的。我还向徐将军预先说明，将来在部队作战或训练时，我也不会干涉指挥官的处置。我请求徐将军事先把拟进行的作战或训练告诉我，以便我能够对计划进行周密考虑和研究并同徐将军讨论我的意见。我的建议只有在将军批准后，才可通过参谋长向执行任务的指挥官提出。看来，我对这个问题发表的看法使徐将军感到满意，他的忧郁情绪也随之消失了。

晚上，我和徐景唐一起审查了军官训练班的教学大纲，讨论确定了每个科目的内容。我们规定了训练班学员在学习期间穿列兵服，每个学员轮流担任班排长，在当班的那天左臂戴臂章。学员们都要担任内务值勤（包括打扫宿舍），夜间和上课时除外——这个时间的勤务工作由临时配给训练班的一个加强排的士兵担任。

我们没有来自黄埔军校的教官，徐将军把上课任务交给

了政治部、司令部和师各部队的军官和参谋。各部队的指挥官到达之后，徐将军召集他们开了一个会，会上他详细讲了训练班的目的，宣布并说明了教学大纲，同时还告诉他们，苏联专家同意帮助办好训练班，因此让他们有什么问题或需要什么帮助时，可以来找我。散会后，我们视察了设在庙宇里没有人住的地方的训练班用房。那里已经用苇席等材料隔了好几间房间，放上营具，四面贴了标语口号。我们大家也都动手打扫和整理内部，到傍晚时就完全准备就绪。

根据徐将军的请求并在他的参加下，我同教官们进行了一次关于红军军校教学工作特点的座谈。这次座谈进行得很活跃，他们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

座谈会结束后，徐将军把政治部主任请到办公室，我们一起重新讨论了学员在学习期间的军服问题。看来，将军担心学员们不能正确理解这一措施的必要性，所以他请政治部主任事先就这个问题给他准备一个大会讲话稿。

第二天，我和徐将军及教官们去检查选作教练场和靶场的地方。这是一块空地，地方当局把它交给本师使用。这块地方构筑一个连的防区，可进行组织和实施行军，也可以进行各种战斗的科目。找到一个合适的山谷作靶场。

在划定了教练场的范围之后，我们决定，为了实践，全部工兵作业由学员自己完成，他们从定线开始，直到把堑壕和其他防御工事挖到够标准为止。

师长给学员作了关于学习任务、内务规定、学员守则以及穿着列兵服便于作业（尤其是野外作业）等问题的报告。他还对违反制度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警告说，今后将对肇事者及其顶头上司给予纪律处分。

散会后，我们看了他们的上课情况。注意观察了一天的

课程安排。教学情况基本上不错，教官都认真地备了课。也有些小的缺点，我们都及时给班主任指出了。几天以后，全部工作都上了轨道。学员学习努力，成绩显著。

*

*

*

徐将军请我在短时间内给他准备一个歼灭小股土匪的作战计划，并嘱咐要严守秘密。

我们先在地图上研究了行动地区的情况，确定了现场勘察路线。我们派出几名军官进行侦察，任务是定出接近村庄的隐蔽的道路和选定在码头以外可以上岸的地点，查明匪巢的位置、土匪的人数及其同村里老百姓联系的特点。派出去进行侦察的军官，都是单独受领任务，出发的时间也不一样。

担任剿匪的支队事先进行了战斗准备。士兵们接连分别在城外进行夜间和凌晨根据紧急集合信号登陆的演习，各分队和司令部里没有具体任务的军官和参谋则担任调理员帮助支队搞演习。

大约过了一星期，侦察人员送来了相当全面的情报。他们查明，有一股约六十人的土匪从一条轮船上绑架了几名乘客作为人质，想从他们的亲友那里勒索大量赎金。船上的其余乘客也都被抢劫一空。匪巢四周筑有简易工事，土匪装备有驳壳枪、手枪、步枪、手榴弹，还有几挺轻机枪。当然，侦察人员没有能查明，土匪将在什么时候全部聚集在匪巢。

获得了情报后，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我们把全部拖轮和驳船开到城外同预定目标相反的方向上。在所有拖轮和驳船上都派了哨兵，不准船工上岸，河的两岸也严加防卫，拖轮和驳船一条紧挨着一条，它们之间其他船只无法通行。所

有驳船都覆盖了席箔，看不出所装系何物。在轮船的烟囱上都贴着商行的标志。徐将军不顾船长们的反对，下令拆下汽笛，把信号灯也减少到最低限度。

天黑后，剿匪支队开始上船。士兵们利用各种伪装，分批上了船。在每一条船的船长室都有一名短枪手和一名军官，由他们给船长下达航线和航速的指示。开始时，船队向南（向相反的方向）航行，而到了河道分岔的地方就调头北上。关于上岸地点，除了侦察参谋外谁也不知道。上岸计划和附有放大行动要图的进攻命令都在密封的信封里，这些信封要在快到上岸地点时，随同师长关于进攻的时间和战术的指示一并发给每个指挥官。所有这些预防和伪装措施都是第一次采用，对中国人来说，是十分不寻常的。上岸后，部队从三个地点同时发起了进攻。

部队前进路上所碰到的人，暂时一律扣留。一小时后，部队包围了村庄，切断了所有道路。街上空旷无人，一片漆黑，也不见起炊烟。只有匪巢里的一个烟囱在冒烟。不久双方交锋，对射。土匪们顽抗了一阵后，招架不住了，企图分小股向河边乘小船逃窜。但是那里被我们机枪和驳壳枪的密集火力严密封锁，土匪们没有逃掉，他们开始投降，半个小时后，战斗即告结束。共打死土匪十名，打伤十二名，其余的被生擒和投降。共缴获约一百二十支枪和几箱子弹。我们的伤亡是死六人，伤四人。全体伤员都得到了抢救和治疗。我们从地牢里救出了人质，他们都带着脚镣手铐，其中有的在这个地牢里呆了半年左右，每天半饥不饱，身体十分虚弱，只好把他们抬出来。

在匪巢里搜出大批存粮，十大坛家酿和两箱白兰地酒。箱子里装满着丝绸、毛料、布匹、衣服、器皿、首饰和其他

日用品。我们在现场审讯了被逮住的土匪，他们都是外乡人，有的还是广州人。尽管我们宣布宽大处理，但没有一个土匪肯交待出土匪头子。一个老百姓事先听到徐将军保证说一定要枪毙土匪头子，才私下向将军揭发了出来。这个土匪头子是一个中等身材，体格强壮的人，面容凶悍，一双贼溜溜的眼睛。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土匪，操此肮脏勾当已近十五年。他曾两次被捕，可是两次都越狱逃跑。他带领的这伙土匪都是一些杀人凶犯和强盗。被捕时，他和他的同伙一样，都没有拒捕，身上也没有武器，但是在他的钱包里发现有美钞近一千元，港币几百元和广州纸币两千多元。

审讯土匪以后，组织了一次全体村民大会。农民们上台指名道姓地控诉这伙土匪的罪行。两年来这伙土匪几乎使每个家庭的生活都不得安宁，简直使人整日提心吊胆。他们经常性的索粮、要款和勒索其他物品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了。村民不敢把这伙土匪的情况告诉任何人，怕危及性命，况且有两家去告发过的住户已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那情景始终历历在目。这两家的财物被抢光，房屋被摧毁，木料被用来修他们的匪巢，土匪还强迫村民去拆这两户的房子和搬运木料。村民们感谢我们师消灭了这伙土匪，并答应今后只要村里出现可疑的人，就通知我们。徐将军在讲话中号召老百姓提高警惕，协助国民革命军建立革命秩序。他建议选举能够根据革命法规正确而公道地解决各种生活问题的正直的人管理村庄。他允诺一旦出现土匪，就立即采取措施。

老百姓给官兵准备了午饭，他们还为伤兵和牺牲的士兵募捐。吃完饭后，老百姓欢送剿匪支队开赴河边，上船返航。

剿匪支队在江门城外弃船上岸，返回营房时，一路上采

取了警戒措施。

被俘的土匪在重兵押送下绕城示众后，被送进监狱。土匪头子单独押送，他在现场就戴上了重型脚镣手铐。人们成群结队地跟在被俘土匪后面，鸦雀无声，好奇地打量着这帮土匪。

徐将军履行了向村民们许下的诺言。根据侦讯结果和法院判决，土匪头子及其主要帮凶当众枪毙。

回到师里的第二天，在俱乐部召开了一次有全体军官、班长和士兵代表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带有组织剿匪战斗的座谈会性质。徐将军详细地报告了这次作战的战果。他强调说：只是由于全体参战人员正确了解受领的任务，周密地进行了侦察和伪装，以及所有分队协调一致地行动，才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几天以后，我同训练班的几位教官到江门四郊转了转，目的是想勘察一下地形，为进行战术作业和手枪、驳壳枪、步枪射击选择场地。我还有一个个人目的，就是利用这机会深入了解这些教官。我们一起拟定了行军路线的略图，修正了地形图上的错误。为了满足这些军官的求知欲，我和翻译这一天可真做了不少工作。他们对我国的体制、城乡人民的生活、贸易、工业发展情况以及国内战争的历史都感兴趣。我给他们讲述了我在夏伯阳师里当兵时亲自参加过的一些战斗场面。他们给我介绍了自己的战斗经历。后来，我们选了一块合适的地方进行射击比赛。我和翻译因为每天都进行射击练习，所以打了个“优秀”，训练班主任和射击教官也不次于我们，但是其他人就差了。这一天过得很有意思，也很愉快。

不久我结识了徐景唐的副师长，他同时兼任驻在崖门湾

和西江地区进行剿匪的三十七团团长。他是位四十五岁的将军，个子不高，机灵好动，面貌聪颖，沉默寡言。他很自重，据了解，是相当有军事修养的指挥官，他从青年军开始戎马生涯，曾参加过打击反动军队和剿匪的战斗。

徐景唐邀请我听他的副师长的报告，这是关于消灭土匪战役的汇报。那次作战取得一定的战果，但没能彻底消灭土匪，过了一段时间土匪又恢复了活动。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有几股土匪到处游动，经常变换巢穴。

我和师长仔细分析情况后得出结论，就是必须添置一部分常备的运输工具供迅速调动部队之用，必须在居民中广泛建立我们的情报网，必须同当地部队密切配合。副师长当场就邀请我和他一起去进行一次战斗，以消灭在他那一团的驻地出没的土匪。我们就如何以最小的损失去消灭土匪的问题交谈了很长时间。我说，剿匪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周围形势和准备工作是否充分。我举了苏联剿匪作战的几个具体战例，还谈到了三十八团最近两次剿匪作战的教训。

到达三十七团后，我和副师长花了两天时间为这次作战进行准备工作，而他在去师部以前就已经准备了两个星期。一切都经过周密考虑后，便下达了相应的命令。

深夜，支队登上轻便驳船出发，在距离匪巢三公里左右的地方，驳船不再用拖轮牵引，而顺着一条支流小心翼翼地撑着篙向目的地前进。

侦察人员查明，土匪在通往土匪窝的地方设置了警戒信号网，以预报外人的接近。

士兵们在军官指挥下隐蔽地接近匪巢，迅速包围了土匪，向他们开了火。前一天，土匪们抢劫了一条轮船，这时候正在得意忘形地庆祝胜利呢。

突然袭击，一网打尽。土匪们窜向小船企图逃命，可是我们埋伏在那里的射手用火力迎击，结果打死五名，重伤五名，其余十五名土匪见到已无出路，只好交枪投降。他们慢慢吞吞、垂头丧气地向我们走来，浑身发出一股刺鼻的酒味。

匪巢在一片小树林的边上，靠近香蕉园，村庄离这里有三、四公里。我们派人到村里通知说已经消灭土匪。搜查匪巢后，便放火把它烧了。

在整个战斗期间，副师长一句话也没有说，指挥官们都独立行动，完成事先受领的任务。

师长在我向他汇报这次战斗的结果时说，三十七团团长早就在准备这次战斗了，而过去他打仗经常失利。师长还补充说，我们很快要去三十七团进行全面检查，但他提醒我一定要严格保密。他还说，在检查后顺便到孙中山出生和生活的村子去看看。

在约定的日子，我、徐将军、政治部主任和几名司令部参谋出发前往三十七团。先是检查司令部的工作。总的来说，司令部工作符合要求。徐将军在会上表扬了司令部工作中好的方面，也指出了要克服已发现的缺点，建议他们设法改正。

接着，检查了城内警备工作的组织情况，检查结果也令人十分满意。使徐将军不满意的是一营士兵的训练。这天，士兵们操练步法、操枪动作、匍匐前进和跑步。在课程表里，射击学和射击训练的时间安排太少，而且根本没有讲登陆作战、进攻战术和围敌战术的课。这个营的军官倒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大部分人有作战经验。师长给他们指出了上述不足的地方，并指示他们改进训练计划。

二营的训练组织得较好，营长是个精明的当地军官，他

教给士兵们的内容，恰恰就是剿匪所需要的东西。

*

*

*

第二天早晨，我们带了一个驳壳枪排前往孙中山出生和生活过的村子。孙中山的故居是一座非常漂亮的两层楼房，房前有穿廊，房子外面修了很高的石头围墙。形状别致的大门洞敞开着，但是我们没有马上进去，而是呆在门口。不久，出来三个中国人，年纪最大的一个给我们介绍说，镶在房子墙上的这盏灯是孙中山亲手制作和亲自安装的，房子旁边的那棵树也是孙中山亲手种的，已经快四十年了。然后，请我们进屋。我们先到会客室，室里挂着孙中山的祖父、父亲和母亲的相片，还有其他亲属和孙中山本人的相片。整个房间都装饰着人工做的花束，书架上和桌子上放着孙中山用过的各种东西。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走进会客室来，她是孙中山的姐姐。她问徐将军和我们喜不喜欢这个房间的陈设，她说这是她自己布置的，她希望今后在这里搞一个纪念馆。她说，现在来参观的人很多，有的还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后来，他们请我们喝了茶，而我们请孙中山姐姐和我们一起在房子前面照相留念。徐将军给她送了礼物，并请她原谅我们的打搅。接着，我们在一位老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孙中山当年所喜爱的地方。

树林边上放着几张石凳，当年孙中山经常在这里的树荫下会见战友。在春天涨水的小河上有一座桥，这是根据孙中山的设计并在他的指导下修建的。后来我们看的那个棚子是为修造小木船而建造的。据给我们讲解的人说，孙中山非常喜欢在这里同工人聊天和看他们劳动。

在城里的戏院里召开了民众大会，会上徐将军和政治部

主任对中山县城里的老百姓和这个地区的居民代表讲了话，请他们协助三十七团的剿匪工作，同时还呼吁所有地方武装部队同师部密切配合行动。在大会上发言的地区、县城和商界的代表表示，一定千方百计地协助部队消灭土匪。

从中山县回来后，我和徐将军决定去一趟广州，到总司令部请示解决一些问题，争取11月7日以前赶回师部，因为师部和江门地方当局决定隆重庆祝我国的国庆节。去广州前的几天里，我和政治部主任拟定了庆祝计划，考虑的活动内容有：正式庆祝大会、市容的布置、举行群众集会、俱乐部和市里各广场的文艺演出等等。

*

*

*

到广州以后，我得知将在李济深将军的直接领导下举行射击比赛，于是我就参加了我们顾问小组的射击练习。比赛的前一天，我们都乘车来到靶场进行实地练习。靶场已经作好迎接比赛的一切准备，构筑了射击线，竖起了钢板制的靶子，这些钢靶安装在铁支架上，子弹中靶会发出刺耳的响声。靶场上还挂了不少有关射击训练的标语，搭起了供裁判员和电话兵使用的亭子和帐篷。

射击比赛的那天，上午十一点前我们全部都到靶场。这时已经有军司令部和广州警备区部队的不少将校军官在场。李济深将军到达后，参加步兵武器射击比赛的人开始抽签，然后按抽签的号码在射击线上各就各位。响起了开始射击的号声。可是第一发都打完后，始终没有听到子弹中靶发出的应有响声。响起了“停止射击”的号声，示靶员检查靶子，一发也没有命中。又响起了“开始射击”的号声。在第一组射击的人中间，只有一名军官中三发，另几名军官中两发或

一发，其余的都是零分。射击一组接着一组进行。有几名军官打出了好成绩，五发五中。全体观众都等着顾问们站到射击线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好象有点不自在。响起了“开始射击”的号声，我们大家一齐站到射击线上。第一个打的是叶弗列莫夫，于是靶子连续发出五下清脆的响声。第二个打的是埃利西斯（二十师的顾问），他下面是我，我们两个的成绩都是优秀。参观的人热烈鼓掌。其他顾问中四发，只有一个顾问中三发。驳壳枪和手枪射击，我们打的几乎都是“优秀”。我们荣获了冠军，在靶子旁边给我们照了相，评判委员会还奖给我们“优秀射手”徽章。晚上，叶弗列莫夫将我们召集在一起，建议我们加强射击练习，给部队进行示范，耐心地教会官兵射击。

翌日，徐景唐将军带着儿子到我们这里作客。他的小儿子和切尔尼科夫的小女儿在一起玩耍，玩得十分高兴，好象他们互相都懂对方的话似的，翻译只是偶尔过去给他们帮忙。这时，徐景唐沉思起来，他说他一定要让儿子学俄语，以便将来到莫斯科大学学习。他临走的时候，建议我们搬到靠近运河的洋房去住，说那里比这里要安全些。

不久，我们就和叶弗列莫夫一起搬到离我们俱乐部不远的地方居住。这是同属一个主人的四幢完全一样的洋房，座落在绿树成荫的花园中，四周有高高的围墙。

*

*

*

没有几天，我和徐景唐就返回江门。那里的俱乐部正在加紧进行迎接十月革命节的准备工作：姑娘们在绣标语，扎纸花；士兵们和市民糊纸灯笼，还在灯笼上画各种画；画家们在放大列宁和孙中山的画像。城里正在搭彩牌楼和看台。

晚上，我和政治部主任准备了在群众大会上的英文和俄文讲演稿。在节日的前三天，司令部里来了几名军官，他们带来了差不多两个连及其全部武器装备。他们原来是在地方部队服役，现在想加入我们师。当时就决定接收他们。参谋长在这支队伍前面致了欢迎词，给他们讲了服役的条件和本师担负的任务，并指出也不排除派他们去补充北伐部队的可能性。

伟大的十月革命节那天，政治部的干事们来向我祝贺节日。阅兵的时候，师长和全体官兵都向我祝贺节日。各分队的分列式走了约十五到二十分钟，随后他们都列队到师司令部大院参加群众大会。我和政治部主任在另一处召开的全市群众大会上发了言。我们提前到了会场。我们非常惊奇，见广场上只插有三十多面大小旗帜，而且是稀稀拉拉，每面旗帜附近站着一两个人。后来，又有带着旗帜的人陆续来到广场，他们照例把旗帜插在地上，留一个人看守，而其余人又分头走开。原来他们是先来为他们的组织占领位置的。群众大会预定十二点开始，近开会时，广场上已挤满了人。

十二点正，锣鼓齐鸣，大会主席宣布庆祝大会开始。他作了关于十月革命及其对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意义的报告。在提到列宁的名字时，全场鼓掌，呼喊祝贺苏联人民、党和政府的口号。接着，政治部主任发了言，他详细地介绍了俄国革命的发展过程和工农夺取政权的情况。他讲完后由我讲话。

我问大会主席，我用英语讲还是用俄语讲。出席大会的人嚷着要我用俄语讲。政治部主任给我当翻译。我讲到了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介绍了是什么帮助红军、帮助工农粉碎外国武装干涉者的军队和白卫军。我介绍了国内战争以后所取

得的成就，在结束发言时，我用中文高呼祝贺中国人民的口号。得到的回答是暴风雨般的掌声和热烈欢呼。大会开了近两个小时才结束。

第二天，徐景唐邀我一起去驻扎在三水（广州以西五十到六十公里）地区的三十九团。这次出差的目的，是检查三十九团的班长和全体人员的训练情况。这是原先计划的。三十九团团长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成持重的上校军官。他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参加过不少战斗，在部属中间享有威望。

在三水，我们受到团长及其副官和几名参谋的迎候。在倒行寒暄之后，我们就直奔学员正在操练的操场，在那里一直呆到全部操练科目结束。这些训练进行得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徐将军不太满意的只是操枪动作和队列步法。他命令队伍站成方阵队形，自己拿过枪，示范正确的操枪动作和各种转法。他叫几名军官和班长出列，走了一遍行进间步法和分列式步法，然后叫他们入列并检查他们对各种动作掌握的情况。

后来，我们前往团司令部。它设在一座过去显然是属于大地主的庄园内。徐将军和我商量后，对如何改进训练计划给予了必要的指示。我们还驱车到城郊游览一番，不久就回到了江门。

*

*

*

几天以后，又在江门西南十五公里处的礼乐镇围剿了一大股土匪。这帮土匪的头子是过去曾在反动军队当过差的上校，而成员都是些惯犯和过去被击溃的匪帮的惯匪，还有几个军官。这帮土匪的装备精良，经常在香港、澳门到广州之间的珠江及其无数支流上袭击来往客商。通常他们抢劫中国

的客轮、货轮和小船，抓人绑票，把人质钉上镣铐，关在礼乐镇当铺的院子里。没有土匪头子的许可，礼乐镇的居民不得离镇外出。

礼乐镇的西面和南面是一片长满芦苇和小竹子的沼泽地，北面是开阔地，东面从河岸一直延伸到大树林都是稻田，在树林后面才是礼乐镇的房舍。这种地形非常不利于作战。经过侦察和准备之后，决定暂时停止在其他地区的一切行动，在最近几天内围剿礼乐镇的土匪。我们用三天的时间经过周密考虑，制定了统一的行动计划。天黑以后各分队开始从水路和陆路汇往集结点。在规定的时间内，即发起进攻前一小时，各分队没放一枪就进入了进攻位置。徐景唐将军率领几名参谋检查了进行战斗的准备情况，并规定了开始冲击的时间。

在剿匪作战开始前几分钟，向礼乐镇中心打了几发照明弹，并对土匪的司令部打了几炮。镇里一下子就乱作一团。武装土匪从四面八方空地跑去，他们结成小股，向树林和沼泽地方向退却，由于遭到我步机枪的射击和手榴弹的杀伤，没有成功。到处可以听到枪声。

拂晓时候，学员队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沿开阔地发起对礼乐镇的进攻。约有三十名土匪迎面窜来，妄图进入事先在礼乐镇外围构筑的堑壕，但我学员们捷足先登了。残存的土匪又向其司令部奔去，但又遭到了我火力的压制。好多受伤的土匪在路上躺的躺，坐的坐；我们建议他们缴枪投降，他们不听，而是一面骂娘一面又打起枪来。学员们实在忍不住了，从屋后面向打枪的土匪们扔了几颗手榴弹。

我同翻译和一个学员班前进到镇的南边时，看到有大约二十五人排成散兵线向我们迎面走来。从家里逃出来的农民

提醒我们说，这是土匪在进攻。我们让他们接近到四百到五百码的地方时突然向他们开火。有几个土匪一下子被撂倒，另外几个土匪拔腿就跑，但是有一部分土匪就地卧倒进行还击。这时候有一个分队进到他们背后，两面夹击消灭了这一部分土匪。

徐将军担心着我们的安全，派自己的警卫员来接我们。我们在警卫员的护送下向炮楼走去，将军在那里等我们。在炮楼的棚子里躺着我们挂彩的士兵，当时正在给他们治疗。而打死和打伤的土匪已送到土匪司令部。俘虏的土匪由我们的驳壳枪手看守着，随时准备对他们开火。

专门指定的军官带着驳壳枪手，逐一搜查了各居民户。士兵们也对镇的四周进行了一番仔细搜索。到晚上七点钟，射击声才停息下来。

我们士兵依托工事包围了关人的炮楼，但是没有立即进去营救被关押在里面的人，因为医生建议在太阳落山以后再把这些人领出来，以期保住他们的视力。

过了一段时间，我军命令几名土匪将进入炮楼的门砸开（因为没有钥匙）。仔细查看炮楼的上面部分之后，一名革命军军官向四周大声宣布，如果谁从炮楼打枪或扔手榴弹，那么在押的土匪将统统被枪毙。不久，就开始从炮楼的地下室抬出所有被关押的人。这些人看起来十分可怕：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都戴着镣铐和铁链条，只要稍一动弹就疼痛无比。铁匠们小心地给这些可怜的人打开镣铐，医生和卫生员给他们治疗，分给他们每人一碗米饭和一碗茶水，然后把他们送到棚子里的草席上。侦查员当着他们的面审问了土匪。

我和翻译在警卫员的陪同下去看了土匪的刑讯室。当我

下到地下室的时候，一阵难以忍受的恶臭袭来。我从地下室上来时，看到有一个人被我三个警卫牢牢地押着，他们是从炮楼里的一堆破烂被服里发现这个家伙的。通过审问查明，在我们面前的原来是这伙土匪的头子。根据判决，把他枪毙了。

徐将军命令留下来的警卫部队把这土匪巢穴放火烧掉。

不久，我们又回到了江门。江门的很多居民爬到屋顶上观看礼乐镇上空烈焰熊熊的大火。

这一仗取得了完全胜利，共打死、俘虏和逮捕近二百人。显然，师驻地附近的土匪已末日来临了。

两三天以后，单个的或小股的残匪不断到师司令部来投诚，表示决心不再干这种可耻的勾当，希望我们既往不咎，允许他们改邪归正。

*

*

*

不久，我们检查了学员的学习情况。通过认真检查、同全体学员座谈了解到，学员在训练班的收获还是很大的。而在剿匪战斗中，这些青年军官也表现很好，他们善于判断情况，行动果断。

徐将军召集全体教官训话，命令他们三天内结束教学大纲规定的其余课程，准备举行庆祝训练班结业大会。在庆祝大会上，师长祝贺军官们胜利结业，祝他们工作和生活顺利，还嘉奖了指挥官和教官。

结业的军官在发言中对师长、政治部主任和全体教官对他们的关怀表示感谢，并保证将学到的知识用于训练和教育士兵忠于革命的事业上。

司令部很快又开始了按部就班的工作。从此，师团两级

领导也越来越重视官兵的训练，政治部在加强同居民的联系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军官和政工人员的威信也越来越高。

这段时间我和翻译从事红军战斗条令的翻译工作，这在当时十分必要，因为国民革命军里对分队战术的研究实际上是人云亦云，没有成文的东西，而且各地讲法不一。

空闲的时候，我们也出去散散步，看看城市生活情况。

这里小自耕农的劳动相当繁重，他们用原始的木制农具耕地，主要是手工劳动，有的也用水牛。我还观察了菜农的劳动情况，经常同他们聊天。种菜的整个过程安排得很细，而且有一套固定的耕作方法。菜畦的宽度正好能用带喷嘴的木水桶浇上水，水流只能浇到播种的地面，浇水也有一定的时间。菜农摘菜上市去卖以前，都是随摘随种，摘完就把空地种满，然后挑担去市场。种菜用的肥料是人粪尿、家禽粪便，有牛的人家还有牛粪，当时中国还没有化肥。农民们一年四季都辛勤地种着自己的这块地，根本不让它闲着。在收获季节，他们广泛采用互相帮工的形式。总之，给我的印象是，整个这种原始经济都安排得非常合理。

街上有修鞋、补碗和修理各种日用品的手工业者，他们修补得又快又好。他们把各种修补用的工具和材料装在两个筐子里用扁担挑着走。市场上卖鸡鸭鱼肉的人真是会做生意，手脚利落，主妇们可以任意选购一块鸡，一段鱼和一小块猪肉。买得的鱼和肉不用纸包，而是用细细的棕丝捆扎，提着非常方便。

我非常喜欢在街上看小孩子们玩耍。他们玩得好热闹，孩子们轻松愉快，无忧无虑，好奇心强，真是讨人喜欢。他们和睦相处，有什么误会，说说就解开了，从不打架，处处都模仿大人。

我的翻译非常善于和他们攀谈，我们还经常给他们发糖吃。不久他们就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谈论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孩子们在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时，总是争先恐后，互相补充，力求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回答。

有一次，我同政治部主任谈起遇到这些孩子的印象，并提出了有必要建立少先队和让他们受初等教育的想法。过了一段时间，我被邀请参加了少先队的成立大会。当时给少先队拨了一幢经过专门装修的房子，里面既有少先队员娱乐休息的地方，也有上课的教室和进行少先队工作的办公室。尽管当时困难不少，师政治部和江门市有关部门在建立了第一支少先队之后，还陆续组织了不少支少先队。这样，青少年工作就走上了轨道。

1927年将到。我们认为，新的一年将给中国人民带来彻底的胜利——中国将统一，将彻底驱逐帝国主义者出中国。这期间，师的生活一切照旧，而国民革命军胜利地向北和向西推进，广州政府迁都汉口。为此，江门市和军队都开群众大会庆祝，演说的人在会上号召支援国民革命军，巩固国民革命军的后方，还对官兵提出了加强政治教育和深入研究红军作战经验的任务……

很快就要到“三八”妇女节了。我非常想看看中国是如何庆祝这个节日的。

尽管根据宪法中国妇女享有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可是实际上妇女解放的进度十分缓慢。仍然存在着一夫多妻制和买卖妇女的现象，到处都有妓院，妇女为生活所逼而沦为妓女，妇女的工资比男子低，妇女不参加社会活动。

当我们讨论如何庆祝“三八”节的问题时，碰到了很多困难：如由谁来领头组织这件事，由谁出钱，由谁代表妇女

在庆祝大会上讲话，在什么地方召开大会，请不请鸭儿参加庆祝大会，等等。但是这些困难也都逐一得到了解决，我们找到了一批积极主动、得力能干的妇女，由她们来筹备这次庆祝活动。

大家建议我在会上讲一讲国际妇女节的意义，介绍一下苏联妇女有哪些社会、政治和国家义务。

全区的城镇都开了庆祝大会，而且开得非常热烈。出席江门市庆祝大会的妇女听了关于妇女在社会生产上和家庭中应有的权利的报告。她们都是来自附近的村镇，是来向人们诉说所受的欺凌的……

三月份，我和徐将军去广州。在向叶弗列莫夫汇报了我在师里的工作以后，我翻阅了北伐军的战报，了解了国民革命军攻克的各省的情况。从材料来看，好象一切都正常，可是叶弗列莫夫的翻译告诉我说，国民革命军同外国人的关系有些恶化，因为外国人可能阻挠国民革命军攻打上海。在关于中国国内情况的通报中说，各帝国主义国家正在上海和沿长江集结兵力。如果考虑到国共两党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这些消息不是什么好的兆头。关于国共两党的关系，我们中间谁也说不清楚，因此有必要作好应付突发事变的准备。我们全都感觉到快要爆发重大事件了。顾问会议决定，继续工作，并请总顾问再给我们介绍一次有关前线的作战情况以及军界政界的情绪。

我们师里的情况也与以前迥然不同。无论在饭厅，还是在司令部里，军官们再也不象过去那样谈笑风生，大家都好像很谨慎小心，沉默寡言。连我的翻译也消息不灵通了，有时连报纸也不送来。师首长已不同我进行坦率的谈话，我们见面越来越少，学俄语的军官也不来上课了。

三月底，我给叶弗列莫夫发电报，请他告诉我正在发生的变化，因为我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报纸上的消息已得出结论，感到事情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从叶弗列莫夫给我（当时我已在广州）介绍的情况来看，局势已经非常复杂和紧张。我国驻北京使馆被捣毁，不少工作人员被抓；在上海，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枪杀手无寸铁的工人，捣毁工会组织。很明显，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现在正在屠杀中国真正革命的爱国者和进步人士。

反革命恐怖的浪潮也冲到了广州。清晨，有几名军官来到叶弗列莫夫的住宅，其中一位代表李济深将军有礼貌地通知说，我们俄国顾问未经特别许可不要上街，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冲突”。他受命负责保护顾问及其家属以及住在我们这里的苏联公民的安全。

这些军官离开后，我和叶弗列莫夫就爬上屋顶观察，看到我们这几幢洋房的四周布置了近两个连的兵力。根据发生的情况，叶弗列莫夫给李济深打了电话。李济深的秘书对我们这里“突然”出现部队表示道歉，并通知说傍晚前部队将撤走。过了一会儿，我们的翻译陆续来了，他们可以自由出入。从翻译的谈话中得知，广州城正在大搜捕，街上到处都是警卫队和巡逻队。码头上特别严格地检查离开广州的人的证件。晚上，李济深的秘书来到叶弗列莫夫的住处，并通知说，警卫部队要留到明天早晨。如果我们想上街或进城，可以去，不过他个人建议我们最远不要超过东山。这天晚上，我们几乎都没有睡觉。我们决定，在没有得到布留赫尔或我国驻上海领事的指示之前，仍旧继续工作。警卫部队到第二天中午才撤走，可是换上了警察。警长来见了叶弗列莫夫，他解释说，我们的住宅将昼夜有人警卫，而他本人将带几个

人整天在我们俱乐部的房子里值勤，必要时我们可打电话给东山警察局长联系，或找他这个警长，也可以找值勤哨兵。每幢住宅将派四个岗，室内两个，室外两个。

警长走开之后，叶弗列莫夫、格雷（海军顾问）、埃利西斯和我就带了两名翻译坐汽车进城去了。经过几条主要大街时，我们还到几家商店买了些东西，没发现有任何变化。只是在沙面感到有些戒备森严：河里的小船都被赶跑，升火待发的浅水重炮舰已经取下炮衣，机枪也作好了射击准备。

我们驱车回家的时候，顺路到我国领事馆去了一趟。领事馆的中国警卫队也加强了。我们的同志都泰然自若，可是仍旧没有收到上海来的消息。

几天以后，收到了布留赫尔的指示：先撤我们的家属，后撤顾问回符拉迪沃斯托克。叶弗列莫夫应最后离广州，而建议我留下担任李济深的首席顾问，直接听李调遣。

我们立即开始为撤顾问及其家属和办理离境签证等事而奔跑。终于到了要送走叶弗列莫夫的时候。一天傍晚，领事馆的同志和翻译来我们住处同叶弗列莫夫告别，因为他第二天早晨就要离开广州。

我们同关（音。——译者）翻译和波罗申参赞一起乘车来到码头。叶弗列莫夫运气不佳，他必须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海上旅行生活，因为他搭的轮船是一艘货运客运混合轮，沿途每个港口都要装卸货物。

我们亲切地告别了叶弗列莫夫。我回到住所后，好象感到特别不舒适，屋内空旷得使人觉得不习惯。不久，关翻译来了。看来，他非常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他建议我和我妻子一同去散散步。我们先到东山公园呆了一会儿，后来到

堤岸边看了一会儿人们游泳。接着我们逛了东山的主要大街，还到我们经常去买食品和水果的商店转了转。熟悉的商人和一些东山居民同往常一样，客客气气地向我们打招呼。所有这一切使我的心情好了一些。

在住所吃饭的时候，翻译给我讲了北方发生的事情。他告诉我们说，布留赫尔及顾问们已由南京抵达上海。他建议我去找李济深谈谈我回国的时间问题。

几天以后，李济深将军接见了我们。我请求他准许我离广州回国。他不赞同。他说，他无法保证我离开广州后的安全，他不愿意在苏联政府面前对我的生命承担责任。他请我暂时仍继续翻译红军步兵战斗条令的工作，并解释说，这非常必要。

有一次，我国领事馆的秘书乌科洛夫告诉我说，有几个顾问被捕了（上海两个，汕头一个），建议我们搬到领事馆住。我不愿引起李济深不必要的怀疑，就拒绝了搬迁。可是传到莫斯科的消息是，我在广州被李济深扣起来了……

不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件，广州钞票贬值，市场和商店一律不收广州钞票。我认为这是南方财政制度的崩溃，它将造成商人的破产，引起老百姓的不满。可是，这次财政上的大波动没有持续很久，几天以后就平息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接着，发生了抵制日货和英货的运动。这在广州市内发展成群众性的游行示威，召开群众大会，各界代表慷慨陈词。沙面派出大批工人纠察队，不准顾客购买被抵制的商品，违者没收。市内的纠察队员监视着门上贴着“抵制”通告的英国商店和日本商店。在市中心的各条大街上，举着号召抵制英货和日货标语牌的人群如海，东来西往，交通阻

塞。有几个纠察队员问关翻译我是哪国人。听清了关的回答后，我们互相致意，他们也就放我们通过了。回住所时，我们没有敢再走市区街道，而是坐船走水路回到东山。号召抵制运动的群众示威进行了好几天。市内的情況紧张复杂。总的来说，这次抵制运动显示了广州无产阶级是团结的，有组织的。

不久，我决定去见李济深，以便最后解决我的地位和让我回国的问题。

这时候，我们已经完成了步兵条令的翻译工作。关翻译把最后一部分译稿送到司令部去的时候，顺便请他们确定一个接见我的日子。终于在三天以后，他们请我们去司令部。秘书请我们在会客室稍等。我不愿意同那些来接替我们当顾问的德国军官碰头，幸好那天他们没有在场。大约两个小时以后，秘书把我们领到一间已经摆好酒席的房间。房间里有好几位军官，可是在他们中间我没有见到李济深。我和关翻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我琢磨着当着这些军官的面怎样同李将军谈要谈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李济深和吴将军从对面房门出来，笑着走到我跟前，友好地同我握了握手。入座时，李将军请我坐在他的旁边。他首先向我打听我妻子的健康状况（当时她患肠伤寒），问她什么时候出院。我说，她过几天就出院，这时候我马上就提出了什么时候同意我回国的问题。当时李济深和吴将军说了几句话之后，吴将军就离开饭桌出去了一会儿。他回来时把两张大信纸给了李济深，原来一张是同意我回国的证明，另一张是公函，命令赴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线沿途的地方当局给我以协助。

*

*

*

离广州前夕，我国领事馆的全体同志都来到我们住所，

想和我们一起度过最后一个夜晚。我们的翻译也都来了，要同他们分别，感到特别难过，因为我们在中国生活的全部时间都和他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大家的情绪不太好，都知道中国的局势急剧地恶化了。

最后一夜我几乎没有睡觉。我从阳台上凝视着我熟悉的居民的小木屋。眼前掠过我们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一幕幕情景……

我们搭乘的是一条非常漂亮的大轮船，可是给我的印象不好。我发现，舱面室和头、二等舱以及它们旁边的甲板用相当厚的钢板同其他舱室隔开，而钢板上面装有尖刺，钢板上留有可以扫射下甲板的射击孔。这象一座水上监狱，因此我感到有些不痛快。来送我们的军官给我们介绍了轮船的大副，他请我们上船，把我们领到船上的公共起坐厅。这时候，我们领事馆的同志和翻译也都来到码头。我请求让他们到船上来。领事馆秘书乌科洛夫找机会把我叫到舱里告诉我说，上海正在准备对我领事馆和我国的正式代表机关寻机挑衅。他建议我们到达上海后不要马上去领事馆，而应先弄清情况，然后再决定住在什么地方等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轮船。他让我到达上海后给他拍个电报。

不知不觉地两个小时过去了，已到了和朋友们分手的时刻。当时没有想到，这竟是与某些同志（如乌科洛夫、哈西斯、伊凡诺夫、马卡罗夫和波波夫^③）的诀别！

第二天早晨经过香港。我看了看下甲板，见到不寻常的景象。中国大师傅用竹筐子向底舱送饭，竹篮里装着碗筷，木桶里装着米饭。我问值日警官，这是干什么的。他把我领到底舱口，这时底舱已打开，正用绳子把准备好的东西往下吊。我明白了，原来轮船的底舱里载着招募来的士兵，有一

千多人。在底舱的四壁是好几层通铺，中间是空的，人们用很窄的竹梯上下。人们只穿着裤衩，浑身是汗，急忙去抢他应得的一份饭食，底舱里一片不可想象的喧嚣声。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这些人将一直被关在底舱里。显然我当时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警官发现之后立刻建议我离开底舱口。

分发晚饭的情景我是从右甲板上的射击孔看到的。我问值日警官，船上的救生器材和救生艇为什么这样少，一旦出事，只够船员和头式等舱的旅客用，那么底舱的人怎么办？回答很简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和轮船一起葬身鱼腹。

11月7日早晨，轮船进入吴淞口，中午才靠岸。我借了望远镜瞭望我国领事馆，发现领事馆的情况不妙，没有升国旗，百叶窗被打坏，有的地方玻璃被打碎，房子附近扔有不少破木头。原来昨天领事馆遭到流氓歹徒的袭击。我们决定去找一年半以前我们向其租房住宿的那位女主人，请她解决住宿问题。我们把行李拿到甲板上让海关检查，但是一位负责的警官下令不要打开箱子……

等了一个月才等到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轮船。我们终于乘船回到了祖国。

附 注

作者简介：

舒万诺夫（1896—1967），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1918年参加红军，随夏伯阳师在乌拉尔进行消灭高尔察克的战斗，后来在北高加索参加过剿匪。1926—1927年，在中国国民革命军当顾问。回国后当军事教员，曾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

①叶弗列莫夫（1897—1942），是红军杰出的指挥官，曾参加过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曾在莫斯科近郊指挥过第三十三集团军。

在战斗中牺牲，死后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26—1927年，叶弗列莫夫在中国先后担任广州顾问小组副首席顾问和首席顾问。

②李济深（1886—1959）——国民党的元老，曾担任过重要的军政要职。二十年代末是广东省军事领导人之一。1927年4月，他支持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并同其他国民党将领勾结，在广州策划了反革命政变。1927年12月，他是镇压广州无产阶级起义（“广州公社”）的策划者之一。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李济深开始反对蒋介石。1933年，他是福建起义的参加者和领导人之一，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的投降政策。从此以后，李济深继续进行反蒋活动，1948年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主张同中国共产党联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济深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③1927年12月，在广州无产阶级的英勇起义（“广州公社”）遭到镇压之后，国民党分子袭击了苏联领事馆，逮捕了以波赫瓦林斯基领事为首的领事馆工作人员。有五名苏侨惨遭国民党匪徒杀害。

（达南译）

回 忆 叶 挺

E·B·捷斯连科

1927年，我在中国任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的后期，有幸曾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独立师传奇式的指挥员叶挺师长共事。该师刚毅不拔，屡挫军阀，素有“铁军”之称。叶挺是爱国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是苏联的好朋友，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的一生清楚地证明他是忠实地为人民服务，真正忠于国际主义义务。在本回忆录中，我将叙述与这位非凡人物共事的印象，并补充一些我所了解到的关于他的生活及其活动的事实①。

1920年，二十四岁的叶挺毕业于当时中国著名的保定军官学校，保定位于北京西南一百公里处。该校为各派军阀培养了指挥官，可是军阀们却为争夺地盘内战不休。叶挺积极投身于当时以华南为中心的革命斗争。

保定军校毕业后，叶挺赴广州，并于1922年被任命为孙中山的卫队团营长。

1924年初，孙中山派叶挺赴苏联学习了一年多，他正是那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他返回广州，并于11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该军实际上由张发奎将军指挥。

在革命事件风起云涌的时期，张发奎将军玩弄狡猾的“自由主义”政策——他讨好共产党，以致在他的军里和叶

挺独立团里集聚了大批共产党人。

在叶挺部和第四军中服役的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青年军官，向部队讲解当时比较先进的战术，对军事训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种工作，促使整个军，特别是叶挺部，在北伐时期成了一支可畏的力量。

叶挺独立团，是指其形式而言。实际上它的士兵数量几乎相当于一个师。这样一支力量之所以称作“团”，是为了隐蔽，避免引起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猜疑。

1926年6月，湘南地区爆发了反对地主和高利贷者暴虐专断行为的农民起义。起义矛头也指向该省督办赵恒惕将军。赵恒惕部一个师长，唐生智将军，利用有利形势而哗变，迅即加入国民革命军。该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了北伐。

在上述事件前夕，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叶挺独立团被调至湖南省南部省界。完全可以看出，蒋介石旨在达到如下的阴险目的，他盘算：叶挺部将在国民革命军主力到达前陷入军事行动，并将为优势之敌所歼灭。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主力开始北伐。北伐的战略计划是在布留赫尔领导下以及我们许多顾问的积极参与下制定的。

不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抵达（当时的形势迫使叶挺独立行动），叶挺就转入进攻，并在起义的农民支援下击败优势之敌，占领攸县城。他继而乘胜追击溃散的军阀残部，并与唐生智将军的第八军会师。

叶挺完全掌握了军事指挥官的重要本领——同毗邻部队有效配合。在作战中，他一贯积极主动援助毗邻部队。他的这个特点使他与当时中国其他将军截然不同。在很多情况

下，当某部浴血奋战之时，邻军往往毫无援助之意，且摆出一副姿态，似乎这与它并不相干。

和第八军会师后，叶挺发扬主动精神猛攻相助，并占据了株州。这很有利于后来第八军占领湖南省主要城市——长沙。叶挺参加军事行动，所以远离本军部六十——七十公里。当时，第八军正在进行醴陵攻坚战。

叶挺决定火速援助国民革命军的进攻部队。他迂回机动插入敌后，发动突袭，攻克该城。

第四军和叶挺部追击敌人直到平江地区的汨罗河畔。这时，第七军和第八军也从第四军左翼沿汨罗河左岸进入了阵地。于是形成一条长达四十公里的严密防线。

汨罗河一线和平江城的防御工事得到大大加强。吴佩孚责成有经验的陆澐将军守卫该区。战斗在全线展开。第四军担任主攻。任该军的第十师和第十二师多次冲锋，未获成功。该城和敌人全部防线的命运是由叶挺独立团解决的。独立团巧妙机动突然插入敌后。陆澐将军陷于绝望，开枪自杀。

为扩大平江之役的战果，第七军和第八军于8月21日攻占重要枢纽岳州，第四军攻入通城。

吴佩孚不得不立即从武昌和湖北省调遣新的增援部队前往战区助战。并重整溃败的军队，在汀泗桥和梁子湖及黄塘湖之间的狭窄地带急忙构筑了防御工事。

在这两湖之间五——六公里的区域，有北京——武昌——株州铁路线通过（当时株州为终点站，其支线通往萍乡）。

吴佩孚企图控制汀泗桥和两湖隘口，阻止国民革命军继续挺进。汀泗桥是各军进击路线的会合点。8月26日，叶挺

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首先逼近该城。第七军和第八军略微晚些。在他们未到之前，第四军打响了夺取汀泗桥的攻坚战，第十师和第十二师参加了战斗。叶挺独立团为预备队。交战双方各有胜负。黄昏，敌军插至第十师和第十二师的接合部，切断了他们之间的有效联系。为阻止敌人突围，叶挺以两营兵力从其右翼进击敌兵。为扩大战果，叶挺独立团和第四军，于第七军和第八军抵达之前攻下了汀泗桥。叶挺独立团乘胜追击，攻克通往武昌要道的最后一个据点——咸宁。

汀泗桥附近溃败的军阀部队乱作一团，仓惶向两湖之间的狭长地带退却。奉吴佩孚之命，这里又调来新的增援部队。从防卫观点看，敌人的防御阵地具有很大优越性：地带狭窄，进击部队没有机动作战的余地；侧翼安全可靠；防御阵地坚固（有好几道战壕、交通壕和机枪巢，个别地方还有铁丝网）。

吴佩孚认为保住武昌最后一道防线的意义非同小可，便亲自督战。

突击于8月30日开始。目标是山坡火车站。国民革命军分两个梯队进击。黄埔第二师和第七军为第一梯队。第四军的第十师和第十二师以及叶挺独立团为第二梯队。

第一梯队未能粉碎敌人的抵抗，第二梯队完成了这一任务：叶挺独立团英勇冲锋，突破防线，攻占了山坡站。敌人残部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撤回武昌。

吴佩孚为整顿丧魂落魄、狼狈逃窜的军队，采取了穷凶极恶的措施，命令枪毙撤退的官兵。他甚至还亲自枪毙了几个人。这也无济于事，最后连司令本人也险些被俘。

湖泊隘口战斗结束以后，第四、七、八军和第二师逼近

了位于长江右岸的湖北省主要城市——武昌。当时，武昌四周的城墙又高又厚，只有很少的几扇城门。在中国人看来，武昌要比广东省东部的惠州要塞更为难攻。国民革命军于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②时，曾以强攻占领惠州。

蒋介石作为总司令的威信，还在北伐第一阶段就已严重下降，他千方百计力图挽回。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调遣第二师和第七军的一个师强攻武昌。这两个师两度冲锋，毫无成效，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回原阵地。结果，在进攻部队里造成了失败主义的情绪，因而蒋介石更加威信扫地。蒋介石窘迫不堪、灰心丧气，将第二师从武昌撤下，离开武昌前线，跑到第二、三、六军以及第一师活动的江西省去了。

江西省面临着粉碎军阀孙传芳的重大战役。因接连受挫而失望的蒋介石，当时甚至建议布留赫尔“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随大本营离开武昌之前，布留赫尔命令顾问们准备攻城。此任务责成第四军的第十师和第十二师以及叶挺独立团来担任。采取了如下准备措施：逼近城墙处由工兵作业、备足云梯、构筑炮兵阵地、装备装甲车（铁路从离城墙不远的地方通过）、详细侦察敌防御中的薄弱环节、对参加强攻的部队进行战术训练，等等。

这一切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经查明，我们将要强攻的要塞内的守军由三个师组成，计二万——二万二千人。

10月10日，向武昌发起冲击，第四军的第十师、第十二师以及叶挺独立团参战。

激战持续了几个小时。强攻部队遭到重大伤亡，但这并没有削弱进攻的锐气。叶挺独立团首先突入城区并展开了巷战。此时勇敢的苏联飞行员克拉夫佐夫驾战斗机赶来，开始

超低空轰炸敌军阵地。武昌守军的抵抗终被摧毁，只好缴械投降。有一个整师投诚。战役就此胜利结束。叶挺，象往常一样，再次出色地完成了交给他的任务。

攻克武昌后，决定将叶挺独立团扩编为第四军的第二十四独立师。该师在武昌组建之后，即成为该城卫戍部队，以保障当时刚由广州迁到武汉的政府的安全。除叶挺独立师以外，在武昌还驻有共产党员卢德铭指挥的留守团，担负值勤任务。

*

*

*

粉碎孙传芳部以后，我在南昌和其他顾问一起从事改组国民革命军的工作。蒋介石把这个问题放在首位，并非偶然。他需要赢得时间集聚反革命力量，为此，他故意将进攻南京和上海的战役推迟两个月。最后，于1927年2月15日，蒋介石带着全部军款（当时存在国民革命军军需部，放在南昌）赶赴浙江嫡系部队。

1926年12月末，布留赫尔召我速去汉口。在汉口苏联总领事馆，我和全体苏联侨民一起迎接了新的1927年。1月2日，我赴司令部正式报到。布留赫尔的司令部设在长江边，紧挨日本租界。

在布留赫尔办公室，坐着一位陌生的中国将军。布留赫尔给我介绍说，这是二十四独立师传奇式的师长叶挺将军，接着轻轻地补充道，是共产党方面的。我和叶挺紧紧握手。布留赫尔又说，从今天起我被任命为叶将军的顾问。

叶挺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瘦瘦的，中上等的个儿，体格很好，衣冠严整，好像一见面他就令人产生好感。叶挺生活俭朴，竟至贫穷，他同妻子和一个三岁的儿子住在

武昌偏僻街道上的一个小房子里。我们之间很快建立了同志式的关系。我曾到他家里去过几次。

开始工作时，我们首先分析了击溃吴佩孚的整个战役。在讨论叶挺没有参加的战役时，我则详细报告了情况（特别是击溃军阀孙传芳的战役）。我和叶挺一起制定了师的战备计划、措施、不仅包括战术方面，而且包括政治工作方面。

师里约有三百五十名共产党员和许多从革命青年中来的战士。叶挺在师里享有极高的威信。一般说来，他言语不多。战斗期间，他下达命令简单明了。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粉碎敌人这一点上。叶挺十分尊重战友。他真心爱戴朱德和贺龙，爱戴中国共产党政治活动家瞿秋白和张太雷。

我们经常谈到俄国革命和苏联。叶挺对十月革命及其准备过程，对共产党在军队里以及在工农中开展秘密工作的情况，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师长向我详细询问了关于建立红军及组织红军的情况，关于国内战争时期粉碎干涉者和白匪的情况。他十分敬佩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组织者列宁的天才。

叶挺称赞我们的成就，并渴望中国人民尽快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国内反动派的压迫。叶挺同时强调指出，中国只有依靠苏联的友好援助，方能取得胜利。

我在师里呆了几天。1月7日，我和布留赫尔的副官格拉米拉因急事同往南昌。有几位苏联顾问由勃拉戈达托夫（罗兰）率领留在南昌继续工作。该顾问小组留驻南昌，直到攻下南京（3月24日），而后转移至南京。

我们途经九江，从那里沿铁路线到南昌计有一百二十公里。快到九江时，我们并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1月8

日早晨，我们靠拢码头并打算去旅馆时，还没动一步，就被手持长矛和步枪的纠察队包围了。我们被捕了。当时我们想，这是一场误会，一旦弄清情况，就会释放我们。原来，事情要比想象的严重得多：我们被误认为是“英国鬼子”。此事发生的前一天，在九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九江的工人以武汉的战友为榜样，占领了英国租界并焚烧了英国人开的腌猪肉厂及旅馆。一看到我们，武装纠察队便认定，这是从武汉逃来寻觅“避难所”的英国人。我们的各种解释他们一律不相信。我们出示了蒋介石亲笔签署的“护照”（这些护照系北伐期间为保障苏联顾问活动安全而颁发的），但亦未收到应有的效果。我们被拘捕并被武装纠察队押送到已烧毁及半的旅馆，在那里整整被拘留一昼夜。究竟怎样澄清了我们的身份，至今仍不清楚。1月9日早晨，以九江车站站长为首的工人纠察小分队提着一篮子水果和罐头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微笑着，请我们谅解他们这个令人遗憾的错误。我们和工人们一起前往车站并很快在纠察队护送下抵达南昌。

* * *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不久，武汉政府出师河南去讨伐北方军阀张学良部。参加征伐的有第四军（由第十师和第十二师组成）和第十一军（不包括叶挺第二十四独立师）。唐生智被委任指挥此次战役，由奥利舍夫斯基担任顾问。1927年7月初，河南战役以张学良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在武昌，自上述各军开赴河南前线以来，叶挺第二十四独立师成了最可靠的一支部队。此外，在武昌还驻有卢德铭部独立团（负有保卫武汉政府的任务，和一个由共产党人掌

握的四百人的教导队。二十四独立师的装备十分充足，因为击溃吴佩孚部，虏获甚多。该师很快得到工人志愿兵、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们（共产党员计有三百至三百五十人）的补充。这支队伍在粉碎夏斗寅将军反革命叛乱之前，一直驻在武昌。

5月10日，布留赫尔把我召去并通知说，反动将领杨森从四川方面进攻武汉，而当时杨森部驻在沙市以西（该市位于武汉西南方向长江岸边）。命令我务必于5月14日前赴夏斗寅将军师部，以便在与叶挺合作的同时，兼任夏斗寅的顾问。夏斗寅将军是前不久与四川军阀断绝关系反正到武汉政府一边来的。我的具体任务就是熟悉夏斗寅师的有关情况，组织该部兵力保卫沙市，遏止杨森部继续向武汉推进，情况许可时，则歼灭之。我用了几天时间做出发的准备。同时，我还继续与叶挺一起工作。这时，又接到消息说，夏斗寅已发动叛乱并挥师武昌，要推翻政府。

5月14日，我整天待在师部。傍晚，我到叶挺住处去了。这时，有人给他送来一包公文，叶挺读后对我说：“重要消息，夏斗寅部正向岳州方向调动，这十分可疑，非常危险。”我们即刻讨论了对策，以应付武昌所面临的现实威胁。

我和叶挺交谈后，随即前往布留赫尔处，报告我所获悉的一切有关夏斗寅部调动的情况。布留赫尔也获悉了类似的情报，并断定说，发生了反革命叛乱。至于我去夏斗寅部一事，现在也就根本谈不上了。

我接受了必要的指示，当夜返回师部，与叶挺一起制定了平叛计划。

5月15日，武汉一片混乱。政府张皇失措，一筹莫展。据说，政府官员甚至准备逃跑。叶挺则镇静自若。他那一师

官兵随时准备迎战。做好战斗准备的还有卫戍团和卢德铭指挥的教导团。

5月16日晨，往岳州方面派遣了一个团。当天下午，主力部队——叶挺第二十四师的两个团、卫戍团的一个营和教导队也出动了。当即还向农民队伍派了共产党员（这时湖南省已爆发农民起义），目的是引导起义军参加平叛。

5月18日，在土坪和小台（音——译者）地区，夏斗寅部被扼止，并随着我们主力部队的到来，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将其全部歼灭。

平息叛乱以后，开始平静下来。形势似乎有所稳定。实际上，局势依然动荡不安。几天以后，5月21日，许克祥上校于长沙发动叛乱，开始镇压湖南起义的农民。武汉政府官方认为，湖南的农民起义是共产党挑动起来的匪乱。所有这一切情况总和起来，都成了反动势力积极活动的借口，并最终导致武汉政府于1927年7月的叛变，和转入蒋介石的营垒。

* * *

1927年6月初，叶挺部及共产党教导队被调至武昌东三十公里处的贺胜桥。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防止上述部队被何键的反动军队——第三十五军围困在武昌城内。唐生智的第八军和第三十六军也从河南前线返回武昌地区，第四、十一、二十军重新部署在九江——德安——南昌铁路沿线。

农民向驻贺胜桥的叶挺求援，以对付许克祥上校（很快晋升为将军）惨无人道镇压起义农民的讨伐队。尽管一再围剿，起义运动依然不断发展、壮大。农民捣毁和焚烧地主庄园，拿粮食，牵牲口，分财物、用具，并销毁卖身契。许多地主官吏弃置一切，仓惶逃出领地。

农民起义激怒了武汉政府和反动派。唐生智部第八、三十五、三十六军尤为不满。这几个军的领导层中许多人出身是湖南地主，他们要求狠狠惩治农民。

叶挺目睹起义农民的悲剧，十分激动，曾不止一次提出：应采取什么措施保护他们？为此，他可献出一切，但党纪军法束缚着他。我向他解释说，农民运动有时表现为异常激烈的形式，这是难以避免的，并列举了历史上的各种事例。

我还不止一次地向布留赫尔拍发密码电报，提出援助起义农民的问题，请求允许叶挺率师增援正开赴长沙的农民队伍。

我和叶挺认为，击败许克祥的讨伐队并不太困难。只要一声令下，叶挺随时可以完成此项任务。但命令却始终没有下来。我们仅能做到的是，将二百六十支步枪和为数不多的子弹送给农民队伍。

不久，布留赫尔召我到汉口去。谈的是我要求援助农民的电报问题。布留赫尔对我说，我错了，政治形势远比我所想像的复杂得多。从他的解释中我了解到，他为起义农民的悲剧深感痛心。布留赫尔在谈话结束时暗示，叶挺部另有所用。

几天后，该师调至位于长江岸上的大冶镇。大冶有个日本钢铁厂，不远处还有座正在开采中的铁矿。工厂已停业，日本人四散奔逃。我们在此等候下一步的部署。该师在大冶驻到7月17日。不久，该师奉命往南昌转移。

这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急剧恶化。反动派转入进攻，革命运动陷入低潮。反共活动甚嚣尘上，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眼看即遭破坏，共产党人可能遭到处决和屠杀。掀起了反苏运动，并开始中伤我国顾问。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处在危险之

中。英、美、日帝国主义列强活跃起来。事情已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们竟用自己的舰船调遣反动军队，并派驻有登陆部队的军舰封锁战略要冲，这是不折不扣的干涉。

与此同时，镇压起义农民的残酷讨伐还在继续。何键、刘兴和唐生智将军指挥的第三十五、三十六和第八军等湖南军队，在摧残共产党人和镇压农民活动中尤为卖劲。活下来的共产党人转入地下或留在叶挺的第二十四独立师以及贺龙的第二十军里。这两支部队不怕反动派的猖獗，公开为他们提供避难场所。

在这种形势下，1927年7月中旬选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临时政治局组织了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前，国民革命军在南昌地区的部署如下：第十一师和第十二师驻九江；第四军军官教导团驻德安；叶挺第二十四独立师、贺龙部第二十军和共产党教导队驻南昌。在南昌及其郊区还驻有前些时候投到蒋介石方面的朱培德部第三军和第九军。

7月末，为领导起义而组成的革命委员会的共产党代表于德安会集。起义部队的计划是解除第三军和第九军的武装，并进驻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广东省。

必须在起义开始前做出最后决定，哪些部队参加起义。革命委员会就从这一问题开始讨论行动计划。首先必须摸清动摇不定的张发奎将军的立场。他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这两个军，是一支可畏的力量。无疑，把他们争取到起义军方面来，至关重要。共产党在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中保存了自己的干部，因为起义开始前不久，这些部队才从河南前线回来。但是，就是在这些军中，对共产党的攻击也日趋频繁。张发奎本人同意该军参加起义，但条件是必须把本部队的共产党

员驱逐出去。这首先涉及到第二十四独立师。这个师尽管是挂名，但仍归他管辖。

叶挺首先识破张发奎的阴谋，断然拒绝这一要求。他得到贺龙和朱德的支持。与张发奎谈判的尝试失败后，通过了不要张发奎参加而举行起义的最后决议。革命委员会责成叶挺、贺龙和朱德负责指挥，解除第三军和第九军武装的战斗。

起义前夕，驻南昌部队中留有两名苏联顾问：一位是本文作者，在叶挺第二十四独立师；另一位是M·Φ·库马宁（疑为唯一参加南昌起义的苏联人“纪功”。——译者），在贺龙部第二十军。

鉴于政治形势的复杂化，布留赫尔发密码电报把我们召回，命令我们立即回国。我是在起义前五天于德安收到这份电报的。驻南昌郊区的库马宁没有收到电报，所以参加了后来发生的事件③。

参加起义的部队如下：叶挺部第二十四独立师——近六千人；贺龙部第二十军（编制三个师）——一万二千人；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五千人；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的一个团——五百人；共产党教导队——四百人。

早些时候，朱德领导的军官教导团对起义表示拥护，但未积极参加。

张发奎从该团清除了他所发现的全体共产党员。后来，该团同张发奎的其他部队一起回到广州，在那里他们站在广州无产阶级一边，积极参加了1927年12月11日至13日的武装起义。在这个团里终归还是保存了一大批共产党骨干。这些人在南昌起义期间侥幸躲过了军警密探。

南昌起义部队中共党员的数量是：叶挺部第二十四独立师——四百人，贺龙部第二十军——七百到七百五十人，共

产党教导队——四百人，朱德部第二十五师——一百人，第十师——一百人，第二十六师的一个团——三十至四十人。起义部队的远期计划，是进驻广东省并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重要的是确定起义部队下一步从南昌至广东的行军路线。曾有过两种方案：第一方案——沿江西东部边界前进，经瑞金、会昌赴汕头；第二方案——走赣江河谷。

第一个方案不便于大部队行动：地形复杂、大路很少，而且只能鱼贯前进。此外，还应考虑到另一情况，即对该路沿线居民几乎从未进行过充分的政治工作。

从战略方面看，汕头对起义部队也有潜在的严重危险。因港口一直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战舰巡逻，舰上驻有登陆部队。此外，在汕头市外没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它有可能成为起义部队的陷阱。顺便举个例子，在1925年的两次东征中，广东的敌人在距汕头一百公里远的地方被击溃，因该城根本不能坚守，敌人从这个陷阱中仓惶逃命或者被俘。

而横渡赣江的行军路线具有较大的优越性：地势比较平坦，道路较多。该地区的居民对国民革命军的态度很好，因为国民革命军曾经过此地，并进行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另外，一旦出现失败的威胁，还可以中途撤至井冈山山区。

但是，根据叶挺的建议，还是采取了第一种方案的行军路线。

就基本问题统一认识以后，1927年8月1日的凌晨，起义部队向南昌市内及其郊区的第三军和第九军兵营发起猛烈攻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近六个师几乎全被解除武装。只有一小股部队逃至浙江省。所有的犯人均获释放。起义军缴获了大量武器（主要是步枪和近百挺机枪）。起义部队在战斗进程中亦受到很大损失。伤亡约计五百人。

8月2日，革命委员会向当地资产阶级征收军税一百多万元，作为部队生活费用。革命委员会没有其他的财源。整个征款和下一步行军的组织工作进行得十分匆忙，必须毫不迟缓地向南方挺进。因此，起义部队在南昌没有颁布任何政治性文件。

在叶挺、贺龙、朱德领导下，起义军在南昌及其郊区呆了五个昼夜，继而按第一条行军路线向南挺进。

起义的第二阶段自8月5日开始，一直延续至9月30日。

起义军的领导人提出如下任务：避免与敌人发生冲突，尽快赶完八百公里，突然出现在汕头。

与此同时，反动派也没有睡觉，他们正聚集力量对付起义军。在广州，李济深将军立即命令所属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并严密注视南昌起义军的动向。

这时，在广州，他手下有两个战斗力比较强的师——第十一师和第十三师。李福林将军的第五军也驻在这个地区。广州以北，在韶关市驻有黄绍竑将军的三个师。在汕头地区和福建、广东两省交界处有钱大钧将军近两个师的兵力。总的来看，敌人兵力配置比起义军多二至三倍。

起义军对于同敌人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因而发生了一系列失误。第一，没有任命起义军的总指挥。叶挺，虽享有很高声望，但总不能自己提出任命自己的问题。起义军中没有清洗反动分子和动摇分子。没有马上建立政治委员制度。革命委员会没有发表告公民书和告敌军书，以讲明起义的目的和任务。最后，本来拟派往农村做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共产党教导队被当成一般的战斗部队参加到分队去，没有发挥其作用。

由于缺乏侦探和远距离军事侦察，致使起义军没能掌握关于敌军数量及其战斗力的情报。

在部队南进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给起义军战斗力带来了消极影响。

当时，军事装备和伤病员的运送，主要靠担架队。但是要在短时间内集中充足的脚伕是不可能的。因此，绝大部分重荷都要由战士来承担。他们不仅要背负自己的步枪和所配发的子弹，而且还要运送战利品、弹药和伤病员。

所有这一切，都给部队的行动带来困难，起了拖延时间的作用。起义军队伍长达数十公里。这些情况为某些人的临阵脱逃、叛变和士气低落提供了方便条件。不久，第四军的第十师一个不剩地背叛了起义军。根据反动军官指令，所有共产党员均被杀掉，而第十师背叛起义，去浙江投奔蒋介石，也没受到任何惩罚。

第十师背叛后不几天，贺龙将军的参谋长也背叛了，并带走整整一个团。此后，整营整连地逃跑；只身逃跑的更不在话下。结果，还在与敌发生第一次交锋之前，起义军就已丧失七千人左右。

越逼近广东省界，艰苦战斗的威胁就日趋临近。居多倍优势的敌军从三个方面截击起义军。

第一次交战在8月26日发生于瑞金市附近。贺龙部第二十军作为起义的先锋队正在挺进。接近该城时，贺龙和钱大钧将军近两个师的兵力相遇。没等叶挺部到来，就坚决地向敌军发起攻击，大败敌兵，攻克城市，迫敌往会昌方向逃遁。

获悉瑞金战斗打响，叶挺和朱德加速前进，于8月29日在会昌附近与贺龙部会师。钱大钧溃不成军的两个师盘踞着该市。另一个南方军阀黄绍竑将军则率领十个团前来援助。

叶挺、贺龙和朱德决定在黄绍竑将军到来前进攻会昌的敌军。当天，8月29日，他们开始与钱大钧部交战，留贺龙部的一个师作为预备部队。经过一整天的强攻，拿下该城。敌人遭到全歼和生俘，只有小股部队溜掉。

参加瑞金和会昌战斗的起义部队同样受到严重伤亡。这使起义军的处境更加复杂。携带如此多的伤病员，继续前进是不可能的。没有药品，而且说实在话，也没人会治病。经过长时间的转移和战斗，战士们已疲惫不堪，若继续转移，有可能完全丧失战斗力。因此需要一个喘息的机会，需要休息。考虑到这一情况，指挥部决定返回瑞金，并从那里向福建汀州进发。在那里可以使部队得到休息，整顿后勤，然后再向汕头挺进。

在汀州休整十天后，起义军沿着福建省西部边界，经三河坝和潮州，向汕头挺进。

9月23日，叶挺攻占了汕头市和港口。部队休整五天。为保障部队生活，在汕头征收了一大笔经费。

从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至叶挺攻占汕头（9月23日）止，起义军竟减员过半。而同敌人的决战尚在后头。

李济深将军的第十一师和第十三师从西边——广州方面逼近汕头。黄绍竑将军率十个团逼近潮安（潮州）。他们从东北和西面切断起义军的来路，形成钳形攻势。日本人派陆战队在汕头登陆。随着李济深部和黄绍竑部不断逼近，日军登陆部队开始压逼起义军出城。

起义军已无力守住汕头，且无从求援。因此，在汕头呆了五个昼夜之后，叶挺弃城挥师西行，向澄海——陆丰——海丰进发。这些地区交通方便，地势比较平坦。

9月30日，叶挺师接近澄海，同时，李济深的第十一师

和第十三师也从西面向他紧逼。叶挺部的右翼是贺龙部第二十军。朱德部占据着三河坝和潮州。军阀黄绍竑的十个团逼近潮州。

李济深部和叶挺、贺龙部在澄海附近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虽然双方力量悬殊，敌军在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但双方各有胜败。此外，敌兵是新调来的部队，不曾为苦战和长途辗转拖累。战斗在相互反冲锋中进行，双方均遭较大伤亡。不知什么时候，双方撤出了战场。但叶挺错过了这个机会，并继续向潮州挺进。敌军开始追击已分散了的叶挺部队。这时，黄绍竑把朱德的守城部队赶出潮州，接着又急忙向澄海进发。叶挺部和贺龙部已被钳形包围。结果被击溃，只有个别部队未遭全部覆灭。朱德的两个团突入福建省，而叶挺部只有近千人到了海陆丰，与那里的起义农民会合。

附 注

作者简介：

E·B·捷斯连科（1893—1972），191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青年时期为顿巴斯工人，后应召参加沙皇军队。参加过1917年的二月革命。在国内战争时期，参加过红军对尤登尼奇、邓尼金、弗朗格尔和马赫诺匪帮的战斗。捷斯连科在总参军事学院毕业后赴华（1925年5月），先在黄埔军校，后来在广州第一独立师（后为十七师）任军事顾问。1927年1月至8月在叶挺部第二十四独立师任军事顾问。离华回国后，捷斯连科在军事工业部门担负领导工作。

①关于叶挺（1896——1946）的活动，参见绍唐（音——译者）的特写《叶挺》，收录在《广州公社（纪念广州起义四十周年）》，莫斯科，1967年版，第149——154页。

②第二次东征（1925年10月——11月）——指国民革命军讨伐军阀陈炯明。第二次东征的结果，于1926年初建立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③库马宁关于南昌起义的回忆。参见《苏联志愿者谈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莫斯科，1961年版，第140——157页。

（彭训厚译）

在革命中国工作的一年

（财政顾问的回忆）

M·E·沙斯

1926年9月的那个夜晚使我一生难忘。我们列宁格勒的三位经济学家乘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快车长途旅行，出国工作。这是我们应邀赴华担任孙中山逝世后建立于广州的中国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顾问。

我们面临的是全面改组中国财政和经济这一严肃而艰巨的任务。

顾问小组组长是当时列宁格勒著名教授、财政学家B·M·施泰恩。他曾两次到东方（参加过蒙古的货币改革，并随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代表团访问过中国）。顾问小组成员还有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亚历山大·鲍里索维奇·叶利亚舍维奇教授和本文作者——该小组最年轻的成员，当年正在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科学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从事研究工作。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施泰恩。

除施泰恩以外，我们中间谁也没有受过在华工作的专门训练。我们很感兴趣地听他介绍中国的经济形势。当时我们还没有关于这些问题的专门书籍。得空时，我继续攻读英文——我们与中国译员共事时使用英语，因为几乎没有懂俄文的中国人。一上火车，我们的领导就禁止我们用俄文交谈。

一路上我们欣赏西伯利亚大自然的美景。每逢晚上，我就和亚历山大·鲍里索维奇相互朗诵诗歌。后来我们在广州住所的平台上也读了不少诗。

贝加尔湖一掠而过，接着是清澈透明的安加拉河。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火车突然拐向南行。最后我们抵达清洁明亮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这里有著名的“金角湾”和又直又长的大街。我们在此地一家旅馆等候客轮——它将首先把我们送到上海，停歇一周，继而到我们工作的地方——中国最南边的广州。

霓虹灯映照下的大上海，有富丽堂皇的外国租界，也有贫穷可怜的华人区，有豪华的邸宅、商店和别墅，也有乞丐、衣不蔽体的人力车夫和食不果腹的苦力。他们四出谋生，有活儿就干。这个上海似乎就是当时中国社会极端矛盾和鲜明对比的化身。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她有广阔的大地和江河湖海。这个国家一面濒临浩瀚的太平洋，另一面有喜马拉雅山和戈壁大沙漠将其与西方世界隔开。这个国家从南方绚丽多彩的亚热带到单调的蒙古大草原，有多种多样的植被。我们看见设在各大城市最佳地区的许多外国租界。这里耸立着高大的石筑大楼（室内有温湿调节器），沿太平洋中国海岸有环球快船来往行驶，船上提供各种各样的舒适条件。同时，还有酷似中世纪的中国街坊区，例如著名的广州“窄街”乃是曲里拐弯的胡同网，胡同里是一座座古老的作坊，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在那些奥妙的机床上制作要求付出惊人手工劳动的、著名的象牙雕刻。这里还有别具一格的刺绣制品——各种中国式的绸缎披肩。

初到中国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为强烈的是殖民主义的

典型现象——最为残酷的民族、社会压迫和侮辱。我大概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傲慢的英国军官。他站在码头上，十分专注地看着我们（“赤色分子”）下船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位军官身着殖民主义者通常穿的服装：身穿皮夹克，头戴软木盔。他的目光充满敌意和轻蔑，充满帝国主义者的自信：似乎英国人有天赐的权利在这个国家作威作福。我久久不能摆脱这个印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帝国主义的化身，不是在公文，也不是在当时我已阅读过的书本里，而是在活生生的现实中。

直至今日，我脑海里仍保留着其他许多场面。例如，日本、英国或美国海员殴打赤手空拳的人力车夫，并将他们的人力车抛掷水中。或者：在中国沿长江航行的英国轮船上，有一次我和英国人以及其他外国人同坐一桌，警察（本身也是中国人）从一等舱的公共餐桌上赶走一位中国打扮的富人，而将其安排在专设的一张小桌上，因为英国人自认为与中国人同桌就餐是不体面的。再如：江面舢舨上住着中国最贫困的穷苦人家，那里有不少未成年少女。醉醺醺的美国水兵只消花上一枚银币，这还合不上我们的二十戈比，就可以拿姑娘寻欢作乐。

这就是我到中国后最初的表面印象。它说明殖民主义势力依然存在，说明殖民主义对各国人民来说意味着何等可怕的灾难！

*

*

*

来到珠江江畔素有“中国巴黎”之称的广州这个阳光明媚、喧哗热闹的南国城市之后，我们先在旅馆落脚，后在郊区东山租用一些房间，大部分苏侨都住在这里，国民党和中

国国民政府的总政治顾问鲍罗廷公馆亦座落于此。

诚如所有认识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①的人所说，一见面他就给人以很好的印象，这个印象后来完全得到证实。鲍罗廷身材高大，体态匀称，泰然自若，端庄稳重，他在履行对他来说是十分明确的政治家的职责。他习惯于从更加广阔的整体观念来看待任何一个具体问题。这些观念经他深思熟虑，反复斟酌，构成了他世界观的基础。他有完美的内心世界与富有魅力的外表。他眉清目秀，美丽而聪明的眼睛目光敏锐，深邃，富于洞察力。鲍罗廷的低嗓音音质优美，他的谈吐从容不迫，而且还可隐约听出美国口音，因为他多年生活在美国。

鲍罗廷的黑发背在头后，夹杂着越来越多的白发，这发型和蓄着的胡须很适合他的脸型。一些人认为他那小胡子是英国工人领袖们所特有的，也有一些人，如切列潘诺夫，则认为这同样也是俄罗斯工人的典型的胡子。

鲍罗廷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精通英语，能十分迅速地吸引住任何听众，并给他们留下很好的印象。但与此同时，当他向自己的部属阐述某项计划或想法时，则往往不把这些计划或想法当作已成文的、不容讨论的模式提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常常以疑问的语调而告结束：“是不是这样啊，嗯？能不能有四、五成采纳他们所提的办法呢？”

正如M·И·卡扎宁在有趣的《在加伦将军司令部里》一书中所叙述的，有些美国人企图挑起孙中山对鲍罗廷的不满，问道：“您知道吗，鲍罗廷——这是个假名字。您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吗？”

孙中山回答说：“知道。”

“他的真姓是什么呢？”

“拉法埃特，”——孙中山中断了谈话，说出一位法国贵族将军的姓氏。这位将军在十八世纪末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与美国战士一起为争取自由反对英国君主势力而战^②。

1926年10月抵达广州后，我们财政顾问小组的同志便前往鲍罗廷家登门拜访（他办公也是在家里）。与我们相识后，鲍罗廷答应安排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③与我们会晤。在约定的那天，鲍罗廷把我们每个人介绍给宋子文，并当场拟定我们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条件。不久，鲍罗廷同我们专门座谈，谈话中间他更加具体地说明了革命中国的总形势和我们在组织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活动中应服从于当前的经济和政治任务。

我们的财政小组既是鲍罗廷整个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在中国财政部上班，并从财政部领取财政部和中央银行顾问的工资。中央银行为我们拨出的专门办公室就是我们的公馆。我们就在这里靠一名中国译员的协助进行工作，同译员打交道用的是英语。

1926年11月末，财政部和中国中央银行办事处从广州迁至汉口（施泰恩同去）。我和叶利亚舍维奇在广州又呆了一段时间。

在这一时期，我对中国的经济和财政文献进行了许多研究。就某些问题搜集了相当多的图书。同时，我还要钻研海关报告和当时的报刊等。每天早晨我们去银行上班，在李译员的协助下分析银行活动的主要指标。此外，叶利亚舍维奇还受委托就某些问题为司法部质疑。而我的任务是走访广州统计局并给以必要的帮助。该局领导是一位年轻的中国人，他曾在美国某大学受过高等专门教育。他专心致力于研究当时时髦的经济行情分析问题，制定物价指标之类，并把他根

据主要在广州搜集的资料而编写出版的有关文集赠送给我。这些资料是中英对照的。我们之间不用译员即可通过英文交谈。我赞扬他的工作，但问他统计局为什么不从事人口统计工作和研究其他某些问题时，这位统计局局长对我所提的关于广州市人口的问题回答说：“约七十万至二百万人”。我为如此之大的可变幅度感到吃惊。但他们向我解释说，中国从来没进行过人口统计。因此这方面的数据，说得委婉些，都是大略的数据。

有一次，统计局局长平川成（音，下同——译者）请我介绍苏联统计的基本原则和组织。大概一周之后，我以学习笔记的形式完成了这一工作——说明我们的统计核算的任务和原则，明确了国民经济中最重要部门的指标、综报方法以及把原始材料整理成为个别企业、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指标的方法。

我虽然不是统计学专家，但由于在列宁格勒所从事工作的性质，还是相当熟悉经济工作这个重要部门的情况。对我来说，最复杂的事情是用英文表述这些材料。在这个方面，叶利亚舍维奇帮了我很大的忙。他的英文比我好，因为他被派在伦敦工作时，曾准备过部分学位论文。

此后不久，有一天，平川成局长带着一大叠中文手稿来到我们这里。原来他把我的报告译成中文，并准备出版单行本。他写的序言把我描写成一位著名的苏联统计学教授，说我已来到广州并对广州统计局的著作很感兴趣。我完全不需要这种宣传，表示反对，并坚持说这是集体的劳动。况且局长本人所起作用最大。因此，他的姓名应作为主要作者写在书的封面上。

我和亚历山大·鲍里索维奇很快说服了平川成局长，删

除序言中一些不必要的细节。没过多久，他给我拿来一大包装帧十分漂亮的小册子：平川成著《苏联统计组织要则》。……

我是怎样与我们的顾问——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相见，命运是怎样把我同他们一起带到广州，迄今记忆犹新。

鲍罗廷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中，我常见西纳尼（斯卡洛夫）。他在鲍罗廷外出期间代行其职。我还见过塔尔汉诺夫、约尔克、沃林。我在鲍罗廷办事处的石印《广州》杂志社工作过，同他们一起散步，在我们俱乐部打台球，特别是经常与基列夫和叶弗列莫夫在一起。布留赫尔走后，叶夫列莫夫留在广州任首席军事顾问。

在我们俱乐部里，我经常碰见基列夫。他的妻子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是一位关心别人、不知疲倦的女主人。根纳季·伊凡诺维奇·基列夫在广州任炮兵顾问。他出身于工人家庭，独具一种出众的魅力，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

在广州，我还遇见一位老熟人、老同事捷鲁尼，他在国内战争期间负责北高加索方面军政治部的工作（当时我们经常一起骑马在罗斯托夫郊区蹀躞），在中国，捷鲁尼协助布留赫尔进行政治工作，回苏联后仍与布留赫尔一起工作。

有一次，应叶弗列莫夫的邀请，我与我们的顾问小组一起去参加当地的李济深将军为黄埔军校军官们组织的射击比赛。射击用的是步枪。我记得，每人打五发，而中国军官中没有一个人超过二至三环。此后，李济深请叶弗列莫夫做技术表演。我们都屏住呼吸看着他。叶夫列莫夫满有把握地、沉着地发射，全部命中。中苏观众欢呼雀跃，称赞不已。

* * *

1927年1月初，叶利亚舍维奇和我，就象早些日子施泰

恩一样，接到指示离广州去武汉政府的所在地——汉口。前些时候政府官员及顾问们往那里转移时，经过一段艰难的旅程（当时铁路还没有修成，只能步行或乘小船）。亚历山大·鲍里索维奇和我决定乘海船，经上海，再沿长江至汉口。我们打算乘美国定期环球远航的大轮船到上海。但是，这些轮船都不到广州，只在香港停留。

叶利亚舍维奇把他还是在革命前写的一书本——关于英国地产问题的学位论文送给了英国领事。此后，获取赴香港为期一天的签证问题就很容易地解决了，我们得到了二、三天的时间可以看看许多有趣的事物，首先是香港本岛——英帝国主义的古老堡垒。香港四周环海，是世界大港，景色美丽异常。

这里简直就是伦敦的一角：码头、货场、庞大的银行和商业大楼。岛的另一端是华人区。这里到处是乞丐和贫穷可怜的人，就象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样。围绕香港螺旋式上升的盘山公路，使我们能够从各个角度综观其貌。通过香港进行大宗对外贸易业务。同时，这个殖民地也就成为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最大基地。

在《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上度过的两天十分有趣。这是一艘定期远航的大轮船，只有一等舱，各种舱室和设备应有尽有。为数众多的服务人员全都是中国人，餐厅招待对就餐者照顾得无微不至。

第二天，《克利夫兰总统号》准时把我们送至上海。我们在那里停留两天，继而乘英国，也许是日本轮船（记不清了）沿长江赴汉口。

汉口市面并不象上海那样富丽堂皇，看起来朴素得多。英德租界业已取消。为俄国茶商波波夫、维索茨基、莫尔恰

诺夫家族服务的俄国教堂和俄亚银行分行的房屋依然存在，使人们想起，此地昔日有过俄国租界。苏联早已放弃了沙皇制度的殖民主义权利。

我们在英文名为洛克比路大街的罗德公寓找到了住房。这里离江岸不远。

当时罗德④公寓已住满了人，绝大部分是我国的顾问。我弄到唯一一间空闲的、相当宽敞的客厅。在这里，我认识了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他给所有见到他的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十分英俊，个子不高，但很结实，可以感到他坚强刚毅。布留赫尔幽默地讲述了他在汉口蒋介石那里逗留的情况。蒋介石十分器重布留赫尔，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部队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布留赫尔一分功劳。警卫人员站在布留赫尔汽车的踏板上戒备森严地保卫他的安全。他千方百计想摆脱他们，但是做不到。

在公寓里我还遇到了军事总顾问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切列潘诺夫。从红军诞生之日起，他就在红军里服役。在中国一系列最重要的战役中他发挥了很大作用（他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最早组织者之一，很了解孙中山）。还有阿列克塞·瓦西利耶维奇·勃拉戈达托夫（罗兰）当时在蒋介石的大本营担任领导工作（勃拉戈达托夫现为中将，已退休）。

我还遇见了叶菲姆·瓦连京诺维奇·捷斯连科（捷列辛科）。有一段时间他曾给传奇式的军事统帅、共产党员叶挺担任过军事顾问。叶挺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的英勇战士、是闻名全国的共产党独立团的指挥员。我还曾见过我们英勇的飞行员克拉夫佐夫、谢尔盖叶夫、塔利贝尔格等人。

在汉口，我和鲍罗廷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再度相逢。早在广州工作时期我们就已认识。我和彼得罗夫（尤里·尼古拉

耶维奇·马科夫斯基）交往甚厚。他是鲍罗廷办事处的领导人之一。根据他的建议，后来我们搬出罗德公寓，住到一个独院里（与施泰恩和叶利亚舍维奇同住）。我在上海出差期间，我们经常见面，也常住在一起。

在汉口，我又有机会多次同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进行交谈。

我和鲍罗廷第一次见面是一天夜里，在汉口长江岸边。还在广州时，当中国革命的前景大有希望之际，当我们以为我们将在这里长期工作的时候，许多顾问写信把家眷从苏联接来了。在汉口，我也等待着妻子的到来。根据我的要求，有人在上海接她，让她住一、二天公寓，就送她乘英国轮船赴汉口。当时，鲍罗廷也在等待妻子鲍罗廷娜归来：她去上海送儿子诺尔曼回莫斯科学习，而本人就回汉口来。

突然，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在顾问中间流传开来：鲍罗廷娜和与她同乘苏轮《列宁纪念号》赴汉口的许多苏联公民在浦口地区（长江下游）被山东省省长张宗昌扣留，当时那一带归他管辖。据现有情报得知，苏联轮船上的所有旅客和全体船员均被驱赶下船，遭到逮捕。我很担忧，我的妻子很可能就是因为愿意和这些苏联妇女同路而乘这艘船从上海动身的。

深夜，我在江岸徘徊，忐忑不安，紧张地注视着远方。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看见一个熟悉的、高大的身影，他正在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轮船从上海开来的方向。我认出了是鲍罗廷，就向他走去。原来，焦虑不安的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一直在期望妻子安全归来，并一直沿岸徘徊，期待远方会马上出现给人带来希望的灯光。我们怀着希望在江岸漫步，海阔天空地聊天，谈的主要是关于当时的政治事件和我们的

工作。这一天夜里和第二天夜里的谈话，使我更加了解了鲍罗廷的为人。

几天后情况清楚了，鲍罗廷娜和《列宁纪念号》轮船上的其他苏联公民确实被捕并被解往山东省会济南市。

我的妻子买的是英国船票，所以安全到达汉口。

张宗昌企图利用逮捕鲍罗廷娜这一事件，通过鲍罗廷向武汉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他给鲍罗廷写信说，考虑到长江附近地区局势不稳，又兼妇女乘江轮时有危及人身安全之虞，他认为，“请鲍夫人下船并将其安置在安全之处”是适当的^{注1}。他同时暗示，他对鲍罗廷夫人的“好”意，应该激使鲍罗廷采取相应的政治行动作为对张宗昌的报答。他们时而把鲍罗廷娜关进监狱，时而又为她举行招待宴会。鲍罗廷的确给张宗昌以应有的回答，向他阐明苏联的政治活动家从来不把自己的政治行动与个人的私事和利益联系在一起。鲍罗廷娜本人也没有为了获释而通过丈夫采取任何措施。

根据北京法庭的判决，鲍罗廷娜和与她一起被捕的几位外交信使在1927年7月下旬方才获释。就是在北京判决以后，鲍罗廷娜又被多次拘留。她回苏联后在《在中国暴吏的拷问室里》一书中叙述了这些拘留的情况。《列宁纪念号》轮船上的我国海员在狱中备受煎熬，过了一年多，直至1928年才获释。

尽管个人心绪不宁，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仍象往常一样，冷静地完成大量的要求全力以赴的政治工作。

不久，根据鲍罗廷的提议，我被任命为湖南省财政顾问。该省由中国的主要军事将领之一唐生智将军管辖。唐的部队

注1 未查证原信。——译者

已占领武汉，他的名字首先同继续北伐的计划联系着。

尽管唐生智讲了一些革命词藻，但他在汉口却有蛊惑家和冒险家的声誉。众所周知，这位佛教徒将军在长沙拥有土地（庙产土地）、工商企业、轮船、房屋和旅馆。有人告诉我说，妓院等也属他所有。必须利用他仅存的声望和实力以，与蒋介石抗衡，看来为此决定，除给他派遣一批军事专家外，还要再派一名财政顾问去。鲍罗廷把我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财政专家”介绍给唐生智，对我进行了某些过分的赞扬。我将只身赴长沙，当时那里连一个我们的顾问都没有，我还要把湖南这一团混乱、复杂的财政经济管起来，未来的情况一连几天都使我很不安，但后来没有去成。因为唐生智本人已在汉口定居，并不忙于去长沙。他同我商定，他将把他的财政部长从长沙召来，暂时在汉口工作，由我领导。不久，我就认识了这位部长。他比较年青，曾在日本受过高等教育。从那以后我们每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谈论财政问题。但由于唐生智并不打算向我公开其财政底细，我们的谈话也不过是理论性的。我只好象念讲义一样给部长讲授组织财政经济的原则和形式。

我在唐生智部的工作就此结束。汉口正面临财政危机，我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国中央银行的财政顾问。在这些地方我遇到了复杂而艰难的形势。这时，许多顾问已返回苏联，其中叶利亚舍维奇也回去了。施泰恩因有鲍罗廷交办的任务在身，仍与家眷一起留在上海。

*

*

*

1924年在广州创建的中国中央银行及其在汉口的分行，起码在最初阶段贯彻了科学的、合情合理的发行政策，据市

场的需求竭力限制纸币的发行量。这就使银行不仅在中国范围内，而且在外国人中间也博得了巨大的信誉。

1927年春，形势开始复杂化。当时，国民政府内部分歧加剧，蒋介石及右派的行动导致上海与汉口之间，以及内地其他区域的进出口贸易急剧缩减，经济形势恶化，实际上使武汉地区受到经济封锁。汉口中央银行一度曾达到一千五百万美元的白银储备开始急速下跌。

所有这一切迫使武汉国民政府于1927年春天采取了一系列新的财政措施。

在这些日子里，中央银行大厅一直是银声铮铮：中国商人用大口袋从银行提出白银。这种凄凉的音乐，不可能不成为挽救政府货币和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的前奏曲。由鲍罗廷认可，我作为财政顾问，同当时财政部陈代理部长共同制定这些措施。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颁布了与财政政策有关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法令。这些措施包括：

- 1) 禁止滥发银锭（形似长靴）和银元。

- 2) 控制各银行的白银储备，暂停以纸币兑换白银。

同时，因不再办理货币兑换，中央银行暂时空闲起来。今后，凡赎回钞票，除中央银行外，其他银行一律禁止。只有三个国家银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纸币还保留有合法的支付力量。其他银行发行的钞票可自由兑换为中央银行的纸币。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是所有白银储备统统转归财政部控制。财政部当时就封存了二十三家私立银行的白银，计约近六百万美元^⑤ 这些白银一直冻结至1927年8月。

有趣的是，宣布缓期付款以来，此前日趋缩减的中央银行白银储备又重新开始增加：中国的银行没有实行用白银偿

还储户的款额，因白银流通已为法律所禁止。

宣布延期付款后，四月中旬，纸币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平价；只是到了五月中旬才逐渐下跌15——20%。

当时金融形势特别有趣的一个方面，是白银不受外贸的影响，从汉口和其他城市不断往上海倒流。首先是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极力想携带全部现金迁往上海的外国租界居住。这些钱有一部分已被回收，但总的看，上海的白银储备，尤其在汉口宣布延期付款之后，开始迅速增加。

据上海杂志《资本与贸易》报道，据估计，1926年初的白银储备为一亿零二百万两，至年终已有一亿二千二百万两。据《中国每周评论》报道，1927年3月的储备为十三亿八千六百万两，而1926年4月只有一亿一千八百万两。

根据同上海许多银行和商行达成的协议，武汉财政机关按照我们的建议，调拨部分资金支付从上海运至汉口的货物用款。各种商品，首先是运到汉口来的石油产品，包括外国商行运来的商品，开始用白银支付，但用的不是汉口的，而是汉口以外的，即上海的白银（持相应证件，汇票或中央银行的外汇）。

这样，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就开始贯彻某些计划性原则。

武汉政府财政部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货币委员会，以调节寄往上海的“汇票”。我被选入该委员会。在向进口商提供汇票之前，必须先按计划确定对于本地区全部经济的正常活动特别重要的一些部门和商行。

为此，我本人曾多次同著名的纽约美孚石油公司的代办打过交道。该公司得到了汇往上海银行的相当一大笔“汇款”。

我们向外国商行发出上海“汇票”时，预先进行检查，

看他们是否打算关闭企业，是否打算真正同我们继续商务活动（检查时要出示运货单据等）。

武汉政府利用所谓“境外”的上海白银储备的想法，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研究著名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论印度货币改革》一书所受到的启发。作者详尽分析了外汇金本位制，按此制度当时从印度往英国出口货物的支付和印度卢比行情的维持，都是因为印度在英国存有特殊的金币储备。

我们提出调整武汉政府货币流通的“白银外汇制”，就其社会含义而言，当然同凯恩斯极力吹嘘旨在加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剥削的外汇金本位制毫无共同之处。

施泰恩在其《中国财政危机概略》一书中指出，困难是由于汉口中央银行中断钞票与白银的兑换而造成的。同时，他又写道：“对于在上述状况下国民政府纸币贬值相对之缓慢，只能表示惊奇”⑥。

*

*

*

自蒋介石（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以来，武汉政府的形势日趋恶化，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武汉政府正在经历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冯玉祥、唐生智和其他军事将领背叛革命。李济深将军在广州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武汉政府颁布了关于撤消蒋介石一切职务并予以逮捕的命令。但此命令不过是一纸空文，显然，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继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右派分子之后，连国民党左派也开始叛变革命。1925——1927年革命的失败愈来愈明显了。

苏联专家陆续应召回国，因为他们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

威胁。1927年6月中旬，有人企图毒害布留赫尔，顾问卓托夫被毒死；我国的军事顾问被捕；驻上海苏联领事馆受到白匪袭击。12月份由于广州发生了无产阶级起义（“广州公社”），中国军阀对苏联领事馆工作人员实行血腥镇压。

必须指出，苏联顾问在中国的活动，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国的反动势力——军阀、大买办资产阶级及其形形色色代理人的激烈反对。例如1927年8月，在上海出版了卑鄙拙劣的，由英国反间谍机关直接参与而炮制的《赤色分子魔爪下的中国》。该书作者是冒险家兼奸细的叶夫根尼·皮克。他骗取顾问团部分同志的信任以后，曾一度在汉口活动。当时我没有和他直接见过面。皮克感到顾问们对他的怀疑日趋增加，他便在英国人的帮助下从汉口逃至上海。在那里他就开始公开地与英国反间谍组织一起活动，同时继续在上海的英国《字林西报》一类报刊上针对我国顾问发表告密文章。

鉴于当时形势所迫，鲍罗廷回国的问题提出来了，但他不能途经上海。因那条道路不无危险。原武汉财政部长宋子文及其姐姐、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正从上海到汉口来。宋子文认为，上海不会给鲍罗廷带来什么危险，但宋庆龄却把这个声明称为“陷阱”。

五月的一天，我应召赴鲍罗廷办事处。可是后来发现，找我的不是他本人（他临时到一个小疗养地去了），而是不久以前来此担负领导职务的洛米纳泽。他告诉我说，正在准备打发一行人专门护送鲍罗廷经蒙古草原返回苏联。

“这需要汽车和一大笔钱，但现在由于我们同上海的正常联系已经中断，只有派特命全权代表赴上海取钱，别无他策。经商量，我们决定派你去。有关方面都知道你是特派经

济顾问。这为你提供了方便，你可以顺利完成此项使命。当然，一路上并非没有危险。是否同意我们的要求，这取决于你”。

我当然表示同意，并于当日乘英国轮船赴上海。

由于所负使命的关系，我在苏联领事馆多次见到C·A·维利杰，他当时是副领事。维利杰长期身居要职，是一位不知疲倦和勇敢无畏的共产党员，曾不止一次多方帮助我及其他顾问。

IO·H·马科夫斯基（佩特罗夫）直接帮助我完成筹划所需美元的任务。他是顾问团里最积极的工作人员之一。他把我送到码头上，我要乘英国轮船把这个装满美元的沉甸甸的箱子由上海运到汉口。

在轮船上，马科夫斯基把我介绍给两位返回汉口的我国军事顾问，并做了一些指示，诸如一旦出现复杂情况，特别是苏英断绝外交关系后，我们应采取的行动等等。当时英国报纸号召轮船公司不要在中国水域运载苏联“捣乱”分子。

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顺利地回到了汉口。鲍罗廷一行所需费用如数凑齐了。

1927年7月16日晨，鲍罗廷动身回国。和他同行的还有办事处的另外几位工作人员。荒漠里行程艰难。同行者中一位叫塔尔汉诺夫的，在其著作《中国短篇小说》中生动描绘了冒着炎炎烈日沿戈壁沙漠旅行的情景。作者写道：

“9月6日下午4点钟，我们经过长城，见一堆堆石块，因年深日久，已经风化。

这就是野蛮人的地方了，——向导对我们说。

有一天早晨，我们登上小山岗，只见一片无边无际的沙的海洋，白色和黄色的沙流向四面八方蔓延开去……

我们不时地把陷在沙里的汽车拖出来，日复一日地前行……”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接到再次赴上海取钱的指示。和我同船前往的还有我们的商务办事处工作人员马舍维奇。

这次出行的情况更加复杂。

南北方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在长江航行的英国轮船不是单独行动，而是在驱逐舰的护卫下整个船队共同行进。为弄清旅客的国籍，还需填写调查表（这是英轮上的特殊情况）。

主要的困难是到上海如何下船。为避免碰上蒋介石的奸细，需要在公共租界码头下船。

可是快到码头时，我们的轮船被中国快艇拦住。我们两位苏联公民被中国奸细驱逐下船。他们手持转轮手枪，冲着我们太阳穴，把我们赶到离租界码头不远的中国轮船上。

既不懂俄文，又不懂英文的中国军官，把我们的东西翻了又翻，但没发现任何他们感兴趣的東西。我们在船上整整被扣留了一个上午。

后来军官离开了，把我们留下，仅由两个中国士兵看管。

我们很快发现，我们和公共租界仅一小桥之隔。于是，我们悄悄地走近小桥，提着箱子一溜而过。中国士兵惊呆了，没敢开枪。

我和马舍维奇坐上过路的一辆出租汽车，半小时后顺利抵达苏联领事馆，诉说了方才发生的一切情况。根据副领事维利杰的意见，我当时住进了法国租界的一个公寓。几天后，法国巡捕搜查了我的住处。又过了一夜，我本人被传至捕房。

但是，就象曾碰上叛徒皮克和英国反间谍组织那样，事情竟出人意料地平安结束了。

1927年8月9日，在白匪报纸《上海曙光》上曾登载过如下一则特别简讯：

搜查苏联教授

“星期日法国巡捕房捕头搜查了路过上海的苏联间谍沙斯。他住在柳布尔日大街257号一间兼供膳食的房子里。巡捕详细查看了沙斯所有的公文、证件和来往函件，没发现任何犯禁之处，遂离去。

沙斯的公开身份是‘政治学教授’，从事‘政治常识专业’”。

鉴于所出现的复杂情况，当时决定我不能再携款由上海回汉口，而应同其他顾问一起返回苏联。我的妻子应离汉口来上海。

我在上海码头等候妻子时，看见皮克和一些英国侦探。船刚刚停下，他们便与我一起奔上我妻子乘的船舱，搜查了她的东西。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就把我们放了。

回苏联前夕，我受特别委托在上海向原武汉政府财政部长，宋庆龄的弟弟宋子文告辞。宋子文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精通经济，他口头上极其敬崇中国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也愿意装扮成鲍罗廷的狂热崇拜者。

我们在上海他那极其讲究的邸宅的凉台上交谈。宋子文很明显假惺惺地让我转达对鲍罗廷的衷心问候，并保证说苏中之间一切都将走上正轨，得以解决，而中国必将与自己忠实的俄国朋友并肩前进。

众所周知，后来宋子文在蒋介石政府里担任了领导职务。我们走后，他聘请了正在亚、欧许多国家进行货币改革的、以著名财政专家凯麦瑞尔为首的美国专家为顾问。

我在莫斯科读了有关凯麦瑞尔活动的材料后，于1931年

写了《凯麦瑞尔的委员会与宋先生的财政改革》一文——论述在买办资产阶级、军阀制度和外国资本统治下的中国企图改善财政制度，完全是徒劳的⑦。

当我和妻子乘苏联轮船从上海出发时，皮克和一群英国侦探妄图潜入轮船。可是我们的海员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一场搏斗很快就结束了。我们的轮船驶出了长江口，朝着祖国开去。

海上秋雨绵绵。透过茫茫云雾可以看见上海银行石筑的高大房屋越退越远了。再见了，中国！尽管有许多不快和麻烦，我们每个人都将永远怀念这个地方。

附 注

作者简介：

M·E·沙斯（1899——1969），教授、经济学博士，苏联经济建设领域的著名专家。1926至1927年间，在罗斯托夫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被派遣赴华任革命政府财政顾问。在以后的年代里，沙斯在我国基本建设计划部门工作，并从事过大量科学教育工作。

①关于M·M·鲍罗廷，可参考《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文集中米·罗维茨卡娅的特写：《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第22——40页。

②M·И·卡扎宁：《在加伦将军的司令部里》，莫斯科，1966年版，第127页。

③宋子文（1894——1971），国民党领导人之一。与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一起同属“四大家族”。1925——1927年革命失败后，“四大家族”领导反动的国民党上层。1928——1931年间宋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后来任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外交部长，后又继任行政院长（1945——1947）、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垮台后，逃至美国。1971年4月死于旧金山。

④塔尔汗诺夫在《中国短篇小说》中详细而生动地描述了这所公寓。“罗德”一姓他改成了沃德。

⑤美元和两的比价是：七十两（银子）等于一百美元。

⑥参见B·M·施泰恩著：《中国财政危机概略》，列宁格勒，1928年版。

⑦《经济生活》1931年版。

蒋介石分子袭击苏联总领事馆记实

B·T·苏霍鲁科夫

1927年6月我到了汉口。这时蒋介石已背叛革命，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参加北伐的我国顾问，或单独地，或分批地沿长江前往上海，再从那儿回国，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最后离开汉口的是B·K·布留赫尔、洛米纳泽和拉祖莫瓦^①。

汉口苏联总领事馆内尚留有几位带家眷的工作人员，计约十至十二人。中国内政局势日益紧张。1927年12月初，广州爆发了共产党人领导的起义。公社宣告成立。军阀们将这次起义淹没在血泊之中。就在这时，广州苏联总领事馆遭到暴徒袭击，五位工作人员惨遭枪杀。我们留在汉口，准备应付革命叛徒国民党行将进行的打击。

我们通过一部野外式小型电台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保持联系。1927年12月26日夜，我获悉一项十万火急而又准确可靠的情报：汉口军事当局接到蒋介石发自上海的命令，将于当夜捣毁汉口苏联总领事馆，逮捕工作人员，并按广州的作法残害我们。

获悉此项确凿可靠不容置疑的消息后，我即刻将面临的危险通知了总领事馆的全体人员。及时、准确地获悉蒋介石的阴险计划，使我们争取了最后一点时间彻底销毁所有尚未烧尽的文件和材料。我们通过电台向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莫斯科报告了即将来临的袭击，并说领事馆全体人员已做好准

备，应付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种种横逆。我指示值班的报务员瓦西里·扎赫瓦托夫及其副手立即销毁整个设备。

苏联全体人员及其家眷安置在三座不大的二层楼房里，楼的四周围有两米高的砖墙。大门紧闭。这一夜谁也没有就寝。没有灯火。我们透过窗户注视着江岸和领事馆对面街道上的动静。我携眷属——妻子和一个三岁的小儿子——住在二层楼上。

夜里十一点至十二点之间，装备有来福枪、毛瑟枪和机关枪的一支队伍悄悄包围了我们的房屋及其附近地区。士兵们翻过围墙，潜入领事馆内，占据了住房及办公室的所有出口处。有不下一排士兵潜到我的房门口，但他们没敢撬门，而是分散于楼梯间等待黎明。早晨八点钟左右，士兵们开始用来福枪托砸门，边砸边拚命号叫。我打开门，于是有二十五至三十名士兵闯进屋来，端着来福枪冲着我和我的妻子。有几个人立即奔去搜查房间，翻桌子、保险柜和箱子。我们私人的东西顷刻间一抢而光。蒋介石分子在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发现了一包中国银元。于是一场贪婪的分赃开始了。在他们争吵时，我凭自己那点可怜的中文知识，力图向士兵们讲明他们的行为实在不成体统，并威胁说将向上海报告所发生的情况。但这对他们毫无作用。士兵们把手下之物洗劫一空，既没找到武器，也没找到文件，就离开了我们的住所。

于是，只剩下我们自己的人了。

九点钟，我携妻子、儿子离开住所，向领事馆大楼走去。除了总领事普利切和副领事米宁，全体工作人员都已在那里聚齐了。普利切和米宁早在黎明时就被蒋介石的士兵带至中华民国外交部汉口代表团。其他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则被手持

毛瑟枪的武装警备队看管起来。不一会儿就向我们全体宣布，我们将被押解入狱。我们提出抗议，并坚决要求立即释放，解除监押。我和同志们商定，无论如何不去监狱，而继续抗议中国当局的行径，要求释放。武装“看守”简直是形同持枪的匪徒，他们拖来了绳子，恫吓我们说，要将我们所有的人统统捆绑起来强行押解入狱。蒋介石分子这回又碰上了我们这个硬钉子。滥施淫威，粗暴威胁，都丝毫动摇不了我们的决定：争取释放或就地在我领事馆内听凭处治。我们已失去了同外界的任何联系。

这样一直持续至下午五点钟。看来，在这段时间内，袭击我们的中国匪徒向自己的长官报告了情况，得到了指示，也请示了蒋介石本人。事情终于收场了。他们宣布说要将我们全体人员押送至南京，听候蒋介石处置。我们怀疑这个消息。但是早晨被捕的普利切和米宁同志突然回来了。他们证实了将把我们押送至南京的消息。我们不得不屈从于中国当局的专横做法，但内部商定，在南京仍要强烈要求把我们转移至上海，无论如何不在南京停留。一艘快艇开到我们领事馆对面的码头上。由于我们已没有任何行李，很快就上了船。晚七点左右，快艇沿长江顺流而下。

经过一昼夜，我们抵达南京，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在南京，当局的代表要我们上岸，我们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要求立即赴沪。我们和蒋介石分子的争论持续三小时之久，终于获准乘该快艇赴沪。我们就怀着轻松的心情拔锚离岸而去。

我们期望着以科兹洛夫斯基为首的总领事馆代表会在上海迎接我们。然而，在上海码头上我们先看到的却是一群外国租界的巡捕。说实话，当发现我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熟悉的

同事们前来欢迎我们，我们立刻精神振作起来。大家沿舷梯上了岸，通过长长的巡捕队伍，就到了同胞们的包围之中。来到总领事馆院内后，我们便明白，现在中国当局更难对付我们了。

难怪有人告诫我们，必须乘头班轮船尽快离城。总领事馆费心为我们搞到了次日离沪赴日的日轮《长崎丸》的船票。我们一路顺风，安抵神户。苏联外交代表在那里接迎我们。我们在我国领事馆大楼安顿下来，参观了神户、大阪，两天后乘火车赴津轻海峡。在那里，我们受到苏联领事馆的同事们，特别是总领事 Д·Д·基谢列夫热情的、同志式的欢迎。

接着，我们乘船从津轻海峡至符拉迪沃斯托克，一路受尽暴风雨袭击和极为剧烈的颠簸，两昼夜后平安到达。

朋友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迎接我们，热烈祝贺我们返回苏维埃国土。叛徒蒋介石未能摧毁苏维埃人的意志，也没敢对我们下毒手。

附 注

作者简介：

В·Т·苏霍鲁科夫（1898年生）——1917年入党，参加过国内战争。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后，于1925——1928年间在中国工作。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

① В·К·布留赫尔于1927年8月11日离华。

（彭训厚译）

在中国上空的空战

C·B·斯柳萨列夫

1933至1934年间，由于远东事态的发展，我们远程航空兵遵照苏联政府的指示，集结在我国的远东地区。

当时我在外贝加尔军区第二重轰炸旅担任机长，驻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地区。我们旅一直处在高度战备状态，差不多天天搞战斗警报演习，进行紧张的飞行和战术训练。

飞行以航空兵大队编队进行，由九到十二架四个发动机的“TB-3”型飞机组成。我们每次飞十至十二个小时，都是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不分昼夜，以最大的活动半径进行的。

后来，我被任命为飞行大队长，接替我的前任——著名的飞行员、西班牙内战的参加者霍利祖诺夫。1937年底，在多姆纳车站地区组建了第一个快速轰炸航空兵团，装备有中型轰炸机“CB”。这种飞机在西班牙被称做“卡秋莎”。我调到该团仍当飞行大队长。

不久前，我曾向外贝加尔军区空军司令部请求派我去西班牙。但在赤塔，有人建议我不去西班牙，而去中国。很快获得批准。于是，我们这些飞行员、领航员、射击员、通讯员和机械师到航空工厂去接收飞机、军械和各种设备。接过飞机后，每架都要在空中试飞八至十小时以上，调好军械系统和特种设备，并着手进行飞越蒙古人民共和国、戈壁沙漠

到中国去的长途飞行训练。

我们长途飞行航线的起点是贝加尔湖地区，途经乌兰巴托。第一个降落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以南十五公里的机场。这里要提一下，我们大家从前谁也没有到过这里，因而大家都想亲自了解一下我国东边的邻国。

不过，在机场上等候我们的，还有一些西方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代表。显然，他们想弄清，这一批批新式快速轰炸机是从哪儿来的，而在此以前在蒙古平原从未见到过。过了一会儿，许多外交使团的汽车围住了机场。我们没理由隐瞒自己快速飞机的优越性。为了扩大影响，我们试射了双联装机枪“什卡兹”^{注1}，它的射速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这种机枪一个长点射可以切断任何金属的和木质的飞机。枪声在近处震耳欲聋，在山谷中引起隆隆回声，再次提醒健忘的西方外交家们，苏联拥有现代的航空技术和射速快的武器装备。

在这种隆隆声过后，所有的武官和其他代表迅速溜走了。我们则蒙上飞机去休息，尔后参观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市容和名胜古迹。

次日拂晓前我们就起飞了，飞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最后一个居民点达兰扎达加德。天气很好，我们可以直接飞向中国境内的主要基地——兰州机场。这里从1937年12月起就成立了转运站，接收从苏联用汽车和运输机运来的武器装备。战斗机也沿阿拉木图——乌鲁木齐——哈密——兰州这条航线飞行。兰州市区，尤其是空军基地经常受到日军飞机的袭击。因此，建立了由高射炮和Ф·Ф·日列勃钦科领导的苏联志愿歼击机群组成的对空防御。任务是保卫甘肃省省

注1 “什卡兹”，是什皮塔利纳——科马尔尼茨基航空速射机枪的简称。
——译者

会这个巨大的工商业中心，以及保卫转运基地和机场免遭日本空军的袭击。

苏联歼击机于1937年底，特别是1938年初来到这里后，日本空军肆无忌惮地进行袭击的局面结束了。1938年2月，日军飞机试图轰炸兰州时，被击落三十架。日本人在3月份也遭到了同样的损失。从那以后，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停止了在这一地区的一切飞行。

我们战斗机的运送是在平静而有利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将飞机交给中国当局以后，有三、五天时间教中国飞行员、机械师和机械兵熟悉新飞机、军械和特种设备，然后返回苏联，到航空工厂领取下一批飞机。应当提一下，每送一次飞机之后，我们都是乘“TB-3”型飞机（图波列夫设计的四引擎重型轰炸机）以每小时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公里的巡航速度返回祖国的。飞机上没有乘客设备，我们不得不摸黑在每架飞机上挤三、四十个人。虽然大家都有降落伞，但谁也不能用，因为机翼、机身和全部通道的所有空隙都挤满了人。请想一想，在飞越戈壁沙漠和贝加尔湖时的强烈颠簸下，在八至十小时的长途飞行后，我们是个什么样子和滋味吧！

在空闲时间，我们就熟悉兰州和它的郊区，有时去参观长城。兰州市位于黄河上游，座落在南山山脉的山脚下，海拔二千二百米。

兰州是个很脏的大城市。狭窄的街道和胡同里有许多小铺、小商店和货摊。街道上有小酒馆和便宜的饭馆，花上很少几个钱就能吃到各种东方菜。靠城墙住有各种家庭手工业者——从陶器匠到珠宝匠。各种外国型号的破旧汽车在马路上奔驰，发出刺耳的噪音，司机不遵守任何交通规则（中国当时规定左侧通行）。我们到机场去要穿过全城。司机由于

载着苏联飞行员，加上任务紧急，因而显得傲慢无比。只要警察动作稍迟一点，司机就跳下车去，把警察痛打一顿。

在我们小组来中国之前，1937年11月，这里就来了苏联军事专家，他们受总顾问和武官米哈依尔·伊万诺维奇·德拉特文师长领导。不久，就给酒泉和兰州机场运来了苏联军事装备，首先运到的是快速歼击机和轰炸机。领导苏联志愿飞行员的全盘工作的是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雷恰戈夫旅长，政委是安德列·格拉西莫维奇·雷托夫。我们被编成若干空军机群，以便分赴华中和华南各战场。

1937年12月1日，第一批苏联志愿飞行员在苏联英雄Г·М·普罗科菲耶夫的率领下，驾驶二十五架“И—16”型歼击机在南京机场着陆，并立即投入战斗。几小时后，二十架“СВ”型轰炸机在吉达林斯基指挥下，在另一个机场着陆。不久，Ф·П·波雷宁和Г·М·扎哈罗夫率领的机群也飞来了。

普罗科菲耶夫的机群，第一天就根据战斗警报起飞了五次，并和日军轰炸机展开了空战，后者的活动在此之前是没有受到惩罚的。空战中飞行员别斯帕洛夫、科夫里金、库尔久莫夫、舒比奇表现优异，他们共击落六架日军双发轰炸机，而自己毫无损失。

我们的轰炸机群在И·И·科兹洛夫大尉的指挥下也没有落后。九架“СВ”型飞机袭击了停泊在上海港的军舰和运输船。空袭对日军司令部来说，是突然的，他们以致没来得及组织高射炮的射击。我们的飞行员成功地击沉了一艘大型巡洋舰、两艘运输船，并使另外六艘军舰中弹起火。这是苏联志愿飞行员在中国空战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每天都发生战斗行动。歼击机掩护委托给它们的目标。

轰炸机则轰炸长江上的船只和进攻中的日军战斗队形。

1938年2月中旬，在华中建成了必要数量的机场，这使空军得到了加强。例如，在汉口地区配置了一百多架飞机，包括波雷宁指挥的由三十五架轰炸机组成的机群和伊万诺夫大尉指挥的“И—16”歼击机群。

在南昌地区驻有科兹洛夫大尉指挥的轰炸机和A·C·勃拉戈维申斯基统一指挥的“И—15”、“И—16”（四十架）型歼击机。

在长沙、汉阳、成都、重庆和华南的广州、桂林等地也先后建成了机场。

当时苏联驻华空军武官是帕维尔·费多罗维奇·日加列夫（后来出任苏联空军总司令）。负责作战指挥的是П·B·雷恰戈夫。

1938年的春天来了。日本空军虽然拥有数量上的优势，但是，苏联轰炸机却日益频繁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阻止日军进攻，而苏联志愿飞行员驾驶的歼击机已成为天空的主人，在战场某些地段完全掌握了制空权。我们的飞行员很好地掌握了战区的情况和日本空军的战术，随着机场网的扩大，我们通常使用“前进”机场①，经常改变驻地，以此迷惑了日本情报部门，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1938年6月，在我们到达的时候，汉阳、长沙和广州的机场业已建成。在兰州则建成了大型空军基地，我们从伊尔库茨克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戈壁沙漠向这里运送“СБ”型飞机，交给中国空军司令部。同时对中国空勤人员进行了训练，使他们学会掌握和使用新出厂的“СБ”型飞机上的设备和军械。我们一部分飞行员，包括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日列勃钦科指挥的防空歼击机飞行员，在训练中国空、

地勤人员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同时担任空中值勤，以掩护空军基地和机场免遭日本空军的袭击。

当我们轰炸机群直接参战时（运送了六十架“CB”飞机并把它们交给中国空军司令部之后），我们已经能利用第一批苏联志愿飞行员所取得的战斗经验。在初期的战斗中，波雷宁、阿诺索夫、普罗科菲耶夫、沙利莫夫、费多罗夫、卡尔平科、克列夫佐夫、鲍勃洛夫斯基、穆拉维约夫、诺沃德拉波夫、波麦兰采夫和斯科罗姆尼科夫的机组表现突出。

下面讲一讲我们轰炸机群在中国作战的一些片断。

1938年2月初，中国情报部门查明，日军在杭州建成一个大型空军基地。为了进一步侦察目标，拂晓时分派出一架侦察机，据报告，在机场上停有大约五十架日军飞机，并正在安装跑道上的设备。我们的侦察机遭到了射击，但火力不很猛。显然，高射炮还没有全部架好。返航途中，侦察机经过杭州车站上空，发现那里有一大批列车。雷恰戈夫和各机群指挥员一起制定了作战计划，并区分了目标。我们九架轰炸机的任务是袭击中央机场，毁掉那里的一切。另一个由八架飞机组成的机群突袭停在杭州车站的列车。歼击航空兵掩护轰炸机返航，阻止日军歼击机对我轰炸机的追击。

清晨，轰炸机起飞，朝东飞去。这天天气不好，地平线上烟雾弥漫，但垂直能见度还不错。

飞机在高空越过前线后，做了偏离目标的机动，借以迷惑日军的对空观察。深入敌人的后方以后，飞机急剧转弯，从太阳方向飞到目标上空。日军高射炮开始射击。我们的飞机开始下降，整个机场和停在那里的许多飞机清晰可见。炸弹一个接一个地落下，停机坪上的飞机纷纷爆炸，机库中

弹起火。当机场被浓烟遮住，弹药用完时，苏联轰炸机开始返航。傍晚，我们从中国姓张的上校那里得知，这次轰炸摧毁三十多架日军飞机，烧掉了机库和军用品仓库。对杭州车站的空袭也收到了同样效果。

我们轰炸机于1938年2月对台湾岛上日本空军基地的轰炸取得了重大胜利。

据侦察，日军在台北的一个机场上集中了大量装着拆开的飞机的集装箱，正在机场上进行安装。雷恰戈夫和雷托夫仔细研究了基地送来的所有情报，经计算后认定，有可能实施突然袭击。日军司令部当然没有料到中国空军会这样轻举妄动。当和波雷宁机群的飞行人员研究好一切之后，决定在红军节——1938年2月23日采取行动。

确定在早晨7时进行空袭。参加空袭的是十二架“CB”型飞机，没有歼击机护航，因为台湾岛远离大陆，歼击机飞不了这么远。

雷托夫和雷恰戈夫提前来到南昌机场，再次和飞行员谈话，为他们远航送行。轰炸机群指挥员波雷金已来到机场，并向各机组下达了最后指示。天气对飞行不利，台湾地区也不例外，被云层遮盖。机群领航员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勃鲁斯科夫感到不安：怎么办？请看他事后是怎样描写这次飞行的：

“空袭台湾岛是我的第七次战斗起飞。开始天气很好。我们准确地按照预定的航向在五千五百米的高度飞行。当飞过一半路程时，我们在台湾海峡上空关闭了发动机，下降到四千一百米的高度向目标飞去。接近台湾时发现，它的东部被云层遮盖。山峰从云层中露出来。我开始按时间计算，准备轰炸数据。突然，云层中出现一个云洞，目标暴露出来

了，远处出现了一个大城市——台北，在它北面三公里是机场。正好对准目标。投弹是准确的。”

费多尔·彼得罗维奇·波雷宁对这次飞行讲得比较详细：

“所有飞行员都一反节假日的习惯——起床很早。需要再次检查飞机，检查加油量，挂上炸弹，确定航线和目标。雷恰戈夫这才允许起飞。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航线是严格保密的，中国勤务人员谁也不知道。拂晓我们就飞临台湾海峡闪光的水波上空了。我们没有氧气设备，感到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失掉高度就等于失掉距离。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当接近目标时，波雷宁机群发现轰炸目标被云层遮住。这时飞行高度是五千五百米。怎么办？是穿云还是盲目轰炸？当时我们的飞机上还没有现在这种能在昼夜和任何天气中对目标进行准确轰炸的设备。下降是冒险的，因为不知道云层底缘的高度，而盲目轰炸可能失误，投不中主要目标。很幸运，突然在云层中找到了云洞……“看来，日本人把我们的飞机当成他们自己的了：高射炮没开火，天上也没有一架敌歼击机。”波雷宁上将继续回忆道：“我们展开队形，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按照空袭计划规定的那样，开始瞄准轰炸。轰炸机机组对日军飞机的停机坪、机库、港口设施和港口内的军事运输船停泊场倾下了全部炸弹。机场上一片浓烟。我们的飞机继续攻击，开始用机枪扫射未炸中的敌机和高射火力点。”

事后，中国空军司令部通知说，这次空袭消灭了机场上的约四十架飞机，击沉和击伤一些船只，破坏了机库和港口设施，烧掉了三年的油料储备。我们则毫无损失。

波雷宁的整个机群返航归来后，我方司令部和中国司令部祝贺英勇的飞行员和领航员们所取得的辉煌胜利。2月23日晚上，航空委员会设宴招待空袭的参加者。出席的有宋美龄（蒋介石的妻子）、宋子文（航空委员会主席）、一些中国将领、苏联飞行员和外国志愿人员。率领苏联志愿人员小组的是德拉特文、雷恰戈夫和日加列夫。宋美龄在这次宴会上宣称：“对台湾的空袭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日本电台广播说，日本政府免除了台湾行政长官的职务，撤了军事基地主任的职，并把他送交法庭。”注2（机场警备司令“剖腹自杀”）。

宋美龄转向苏联志愿人员，补充说：“你们用这次空袭表明，俄国人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帮助了中国人，在危难中援助了中国人。”

我们袭击了上海、杭州和台湾的机场和军运码头以后，日本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现在中国天空。不过后来他们显然是想进行报复，派了九架轰炸机，并由十八架歼击机护航，想摧毁驻有我们歼击机和轰炸机的南昌机场。但是，苏联歼击机粉碎了敌人的空袭，消灭六架敌机。

这次空战是在南昌市民的眼前发生的。安德列·格拉西莫维奇·雷托夫向我们这些来换班的人讲述我们前任的战斗业绩时回忆道：“南昌市民欢天喜地的情景至今我记忆犹新……当天空中航空发动机的声音消失以后，市民们深怀谢意来到我们机场，给苏联飞行员送来许多筐桔子和苹果。他们握着飞行员的手，百般表达赞扬和谢意。后来又来了一些学生，向每个苏联飞行员献了花和灯笼。”

注2 未查证原话。——译者

这时，我们从苏联运到中国来的“CB”型轰炸机到达武汉地区的机场。很可能，日军司令部通过特务机关知道了这件事。总之，我们接到通报，日军司令部正准备对武汉空军基地进行猛烈的轰炸。当然，我们没有使用武汉机场，而暂停在万县地区的中间降落场。雷恰戈夫和雷托夫同歼击机群指挥员伊万诺夫、勃拉戈维申斯基和新到的机群（四十架“И—16”型飞机）指挥员扎哈罗夫一起，详细制定了抗击日本空军大规模空袭的计划。在武汉地区隐蔽地集中了所有的歼击机（总共一百多架“И—15”和“И—16”）。一切准备就绪，检查完毕，每个飞行员都定了位，规定了起飞的时间和飞行高度，指定了加强突击的兵力和掩护兵力。每个人都了解武汉的重要性，它不仅是个空军基地，而且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经济和政治中心。

所有的机组都进入了一级战备。时间过得很慢。莫非日本人突然不来了吗？可是，情报无疑是准确的。大约在上午十点钟，观察站报告说，有几群轰炸机在歼击机的掩护下正朝武汉方向飞来。指挥所升起了蓝旗，这是命令飞行员进入飞机并启动发动机的信号。过了五至七分钟，升起了红色信号弹，命令起飞。机群指挥员勃拉戈维申斯基第一个起飞。随后，按照飞行计划，其余的飞机也继相起飞了，中国飞行员也在内。

突然，日军歼击机从云中出来，开始向我们的一个机群俯冲。看来，他们是从四千五百到五千米的高度飞近的，企图缠住我方歼击机，预先为他们的轰炸机扫清空域。我们的飞行员及时察觉并视破了敌人的企图，遂以部分兵力自动转入攻击。

我歼击机主要机群在津加耶夫的指挥下继续爬高飞，去

迎击敌双发动机轰炸机的九机编队，并从有利位置向刚刚靠近武汉市和机场的敌机展开了攻击。第一次攻击击落了两架轰炸机，包括领队长机——一名日军大佐。他是被津加耶夫攻击和击落的。

剩下的七架日军轰炸机为了保卫自己，而靠拢在一起，但在我雄鹰的不断攻击下又分散开，它们胡乱地投下炸弹，便匆忙返航了。与此同时，在各种高度上展开了歼击机之间的空战。按照空战计划，我歼击机的数量不断增加。队形当然随即散开，各自为战。“И-15”型飞机比较灵活，便于水平作战，特别是盘旋动作，而“И-16”型飞机则便于垂直作战和追击。天空中不停地响着机枪点射的哒哒声。日本人现在不是冲向武汉，而是相反，向自己的机场方向逃去。但我们及时切断了他们的退路。后来的由十九架双发动机飞机组成的两个日军轰炸机群，得知第一梯队已被粉碎，把炸弹扔到山里，掉头回逃。这时，阿列克赛·勃拉戈维申斯基指挥的苏联飞行员的大机群已经起飞。他们发现了逃跑的日军轰炸机。勃拉戈维申斯基把机群整好队后，以最大速度向距离二百多公里远的敌机追去。我们的飞行员攻击了日军飞机，并击落数架。

勃拉戈维申斯基的机群返回机场的时候，油料已经消耗殆尽。日本空军对武汉的空袭就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了。被击落在地面上的三十六架日军飞机象篝火一样燃烧着。中国老百姓和地方政府用各种方式向我们的飞行员表示谢意。为苏联飞行员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会上对苏联人民及其光荣的飞行员说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话。

这次空战的结果使日军震惊，他们决定报复。1938年5月31日，由十八架轰炸机组成的日军机群在三十六架歼击机

的掩护下，对武汉进行了第二次空袭。但是，侵略者又一次遭到了失败。在这次空战中，他们损失了十五架飞机。飞行员安东·古宾科在空战中用完弹药后，就去撞击敌人，他撞落一架日军飞机，自己却在机场上顺利降落。古宾科在中国共击落了七架日军飞机。他因战功卓著而荣获中国金质勋章。

在中国作战的经验，以及在西班牙作战的经验，使得我们得出一个总的结论：具有当时相当完善的飞机，空勤人员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是同侵略者作斗争的决定性因素。

数量不多，但装备着现代化飞机的英勇的轰炸航空兵，顽强地抗击了侵略者，使他遭受重大损失，阻滞了敌人的进攻。

对军事工业目标、基地、铁路枢纽、机场和城市，以及战场上的军队实施突击的日军航空兵，主要有下列机型组成：

1. “CB-九六式”——中型轰炸机，双发动机的单翼机，有两个尾翼，起落架可以收放，发动机是气冷式的，每台六百五十匹马力。装有三至五挺机枪，乘员七人，载弹量一千公斤，活动半径两千公里，最大速度每小时三百三十公里。

2. “鹏型南进号”——双发动机轰炸机，速度每小时三百五十至三百八十公里，载弹量八百公斤，三挺机枪，乘员五至七人，续航时间十小时。

3. “九五式”、“九六式”和“九七式”歼击机，速度每小时三百五十至四百五十公里。

中国空军装备有下列飞机：

“СБ” 中型轰炸机（“卡秋莎”）；

“ДБ—3” 远程轰炸机；

“И—15”、“И—16” 歼击机；

到1938年中期，中国轰炸机在两千至四千米的中空飞行，因为日军歼击机特别是“九五式”的速度赶不上中国轰炸机。但是，自从出现了“九六式”特别是“九七式”，我们不得不爬高到七千至九千米投弹。之所以要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歼击机的数量少，主要是用来保卫机场、军事政治中心和军队的主要交通线。我轰炸机在中国的战斗行动，当时通常是没有歼击航空兵掩护的。

我轰炸航空兵轰炸的主要目标是军舰和运输船、空军基地、机场、日本空军的驻地，以及战场上的军队。

在华中战场，日军向中国内地运兵的主要干线是长江。这条干线在日军进攻武汉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日本侵略者指望占领武汉后粉碎中国军队的抵抗，并迫使蒋介石投降。中国军事当局没有岸防手段和江上舰队，所以给轰炸航空兵规定的任务是：阻止日军前进，消灭长江上的日军运输船和军舰。

为了调动军队和给军队供应粮食、弹药，日军利用了他们自己的，也利用了他们从中国人手中夺去的内河船只，甚至包括小舟和旧平底船。由各种运输船组成的船队，按四十至七十条船编成一组，在中、小吨位的军舰护航下，向长江上游行驶。

中国轰炸航空兵初期进行的空袭，完全出乎日军的意外：他们甚至没有组织防空体系。轰炸机在两千至四千米的高度行动，给敌船队造成了巨大损伤。在两、三个月内，击沉和击毁了大约七十艘军舰和运输船，其中包括日本海军的

大型军舰和航空母舰。

日军的船只和有生力量遭到重大损失后，着手组织护航舰队和长江两岸的对空防御。在船只停泊地域，沿长江两岸配备了高射炮。军舰和运输船上的高射火器也大大加强了。

为了保证歼击航空兵的行动，日军沿长江两岸开始修建机场和降落场。例如，总共在八天之内，在九江市北面的沼泽地区建成了一条跑道（在沼泽地铺上圆木，上面垫土）。当地居民包括老人和孩子，都被抓去做工。后来，在该地区又修建了三个前进机场，日军在这里集结了“九五式”和“九六式”歼击机，稍后又来了“九七式”歼击机。

随着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推进，为歼击机修建新机场和降落场的工作一直没停。敌空军各种类型的飞机都占有很大的数量优势。这无疑使中国轰炸航空兵的战斗行动大大复杂化了。

中国空军直属空军委员会，后者行使空军总参谋部的职权。该委员会形式上归蒋介石领导，实际上空军由空军委员会副主席毛邦初将军指挥。在他司令部工作的有一名苏联顾问和由八至十人组成的作战组。首任顾问是П·Ф·日加列夫，1938年中期接替他的是Г·И·特霍尔。特霍尔是西班牙共和国内战的积极参加者，他在那里进行了一百零二次战斗起飞。他到中国来过两次。1938年5月初，他曾领导接收、试飞和向中国运送“СВ”型飞机。他是一个卓越的飞行员，又是一个谦逊的人。他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他的性格好动，办公室和司令部里是坐不住的。他能驾驶各种飞机。1940年他返回祖国后，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第六十二轰炸航空兵师副师长。在伟大卫国战争初期，他立即投入了消灭敌人的战斗，他积极参加了各种战役，开着轰

炸机前去消灭集结在德聂伯河和杰斯纳河渡口上的敌坦克和摩托化步兵。1941年9月中旬，法西斯军队在基辅城下包围了我军队集群。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及其空军司令部也陷入合围。特霍尔和他的司令部也被围困在皮里亚京地区。他率领空军后勤军官和军士小组突围，在同敌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失去知觉，结果被俘。

在柏林盖世太保的监狱中，德寇千方百计地劝说特霍尔将军背叛祖国。但他忠于祖国，并在哈默尔堡集中营的战俘中间开展地下工作。

从德国的档案材料中得知，1942年12月，特霍尔将军被扣上手铐脚镣，转到纽伦堡监狱，在那里受尽严刑拷打。1943年1月，特霍尔被枪决。他光辉的一生是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服务、无限忠于祖国、忠于军人誓言的一个典范。

我们还是回到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这个题目上来吧。中国没有航空兵的大兵团。空军每个兵种只建立了由二至三个大队组成的机群。机群指挥员一般从有经验和受过良好训练的飞行员中任命。他以领导者的身份参加机群的一切战斗飞行，而参谋长则是机群领航主任。战斗起飞前，机群指挥员从比较机灵的飞行员中任命一个领队长机和两个副领队。他们的冷静和沉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机群的成功。

例如，1938年7月27日，六架“CB”型飞机编成两个中队（领队长机是谢利万诺夫），受领了轰炸长江湖口地带的日军军舰编队。机群编成右梯队队形^②，中队则成“楔”形队形。在目标上空七千五百米的高度上，长机发现约二十艘军舰停在湖口附近的停泊场上。他决定进入轰炸航路，这时遇到了厚云层，他降低高度至六千五百米，但未能穿出云层，于是又爬高，向东飞行，航向八十度，很快就发现了由

八艘军舰组成的另一个目标。

第二中队的长机断然行事，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自己的中队引向第一个目标，从七千五百米的高度下降进入云层，在大约三千五百米的高度上穿出云层，突然出现在目标上空，关闭发动机下降投弹。空袭十分突然，军舰上的高射炮都没来得及向飞机开火，只是在飞机离开时，岸防炮打了一个齐射。结果，三艘军舰被击沉，两艘起火。与此同时，第一中队向第二个目标投了弹，一艘军舰被击沉，一艘被击毁。我全部飞机都安全地返回机场。

必须指出，当时还没有很好地掌握无线电通讯，特别是飞机与飞机间的无线电通讯，因而不得不用各种信号进行指挥。因此，队形的协调，飞机内乘员之间的联系，都是事先约好，并掌握得很熟练。对战斗起飞的训练十分重视。

苏联志愿飞行员来到后，中国轰炸航空兵的战斗行动日益增多了。这迫使日军司令部扩大其空军，尤其是歼击航空兵。敌人数量上的优势和新式歼击机“九七式”的出现，使中国空军司令部下令增大飞行高度达七千五百米至八千五百米，并使用氧气，进行高空投弹。

当时，我国空军的空勤人员还没有进行高空飞行的训练，只有个别飞行员进行过练习。因此，我们从战斗行动一开始，就不得不掌握高空飞行的本领。中国空军的后勤技术部队没有氧气站，我们不得不到私人工厂去买氧气。氧气的质量很成问题，含有大量杂质，因而曾发生过乘员昏厥的情况。

1938年8月8日，五架全由苏联飞行员驾驶的“CB”型飞机组成的机群，受领了轰炸集中在长江的马台地区的日军舰队编队。僚机飞行员科托夫转弯飞向目标时掉了队，飞

入云中，与机群失去联系。他决定继续飞行，并单独投弹。靠近目标时，领航员感到注意力减退，昏昏欲睡。但是，领航员虽然自我感觉不好，他还是勉强瞄准并投了弹，关上弹舱门，并指给了飞行员返回机场的航向，尔后就失去了知觉。射击通讯员也发生过类似情况。飞行员担心遭到在目标区上空六千米高度巡逻的敌歼击机的袭击，在离开目标时开始爬高到九千四百米。飞行员按照指示的航向飞行了大约一小时，和领航员及射击通讯员都没有联系，他决定下降到五千米的高度。这时领航员恢复了知觉，开始仔细地定向，但因油料消耗殆尽，机组只好降落在长沙备降机场。

射击通讯员只是在飞机着陆后才清醒过来。他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在高空零下二十度的气温下呆了很久，脱落一只手套，冻坏了一只手，因而长期不能参加飞行。在检查氧气瓶时发现，射击通讯员的给氧设备失灵，是因为导管被冻住了。领航员的设备里氧气的质量不好。

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一个射击通讯员在执行战斗任务中需要吸氧时，立即失去了知觉。而飞行继续了大约三个小时，他一直处于失去知觉的状态。着陆后，把他从座舱里拖出来，只见他脸色铁青，手中紧握着输氧管。原来由于氧气的湿度大氧气管冻住了。

应当指出，我们没有使用无线电通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建立了很好的窃听勤务。而飞机内没有可靠的通话装置。只好使用带送话器嘴的通话软管，但在高空，软管上因呼吸结冰，可听度很差。

大家对缺氧的感觉，反应是不一样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育锻炼和机体适应氧气稀薄条件的训练。通常打开氧气开关规定标准的一半，用这种方法增大飞机在高空的活

动半径。

我在一次战斗飞行中发生过一次有趣的缺氧情况。1938年8月18日，在空军节这一天，我们由九架“CB”型飞机组成的机群拂晓从离前线不远的机场起飞。爬高是在机场上空进行的，因为日军歼击机知道我们从前进降落场起飞的飞行方向，经常进行截击。在爬高到六千五百米后，对正了航向，开始用三分之一的氧气。飞行是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多层云和浓雾）继续进行的，这就难以发现目标。在整个航线上，长江上空云遮雾障，只是偶尔在某个地方出现一个不大的云洞。在湖口附近，我们从云缝中发现了敌人一个大的军舰编队，但当我们接近时，它又被云层遮住了。远处又出现了另一个大约由三十艘军舰和运输船组成的编队。决定飞向这个目标，因为在下面六千五百米至七千米的高度上，发现有三十架敌歼击机（轰炸机群的高度约八千米）。我们长时间在目标区上空逗留已被敌人发现。当我们进入战斗航路时，敌岸防高射炮以及随后舰载高射炮展开了猛烈的拦阻射击。炸点在飞机后边一百到一百五十米处左下方。当我们打开弹舱门开始投弹时，我们的飞机猛烈地向上颠了一下，后来查明，高射炮弹的弹片炸断了氧气管。

机群做了一个防高射炮的机动之后，开始离开高射火力区，并开始返回自己的机场。过了五至十分钟，我开始感到氧气不够用，分不清周围的东西，注意力减退，难以观察自己的僚机，也难以观察发动机的工作情况和各种仪表的示度。我的意识中只记着两项基本任务：不要丧失高度，而是爬高和保持返回机场的航向（这时太阳在飞机的右边）。我一阵阵感到好像日军歼击机在向我们攻击，好像我的飞机在燃烧（这是在扭头时眼睛冒的各色火星和黑点）。为了摆脱

想象中的歼击机，我机械地做了几个剧烈的机动动作，结果偏离了下意识地一直保持的正确航向，那时感到太阳一直在右边。我的莫名其妙的机动动作，把我们九架飞机的队形给搞乱了。两个僚机中队的机组明白了，领队长机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于是独自返航了。这样继续飞了大约一小时，跟随我的只有我的两架僚机。当油料快要用完时，飞机开始逐渐下降。高度在七千至六千五百米时，我开始清醒过来，并从通话管里听到射击通讯员的声音：“指挥员同志，您怎么啦？我们往哪儿飞呀？”我还以为我们刚退出空战，而发动机停车是因为被日军歼击机的机枪火力打坏了。为了尽可能飞离战场远些，力争返回自己的基地，我保持最有利的下滑速度。在大约二千至一千五百米的高度，我打开了座舱盖，开始察看地形。周围是山地，有的山高二千至三千米以上。

飞过山谷，我寻找降落场。前面出现了一座山，而这时飞机的高度只有六百米左右了。为了避免撞到山上，我把飞机向左急转了一百八十度，由于空气的强大阻力，飞机失速，差点儿进入螺旋。我急忙前推驾驶杆，飞机几乎触到地面，尔后又猛拉驾驶杆，结果飞机又猛然上升，并开始飘飞。飞机着地后，滑了五十至七十米，停在壕沟边上。我的脸部猛撞在驾驶杆上，瞬间失去了知觉。神智恢复后，我开始爬出座舱。机组人员没有受伤，但大家都感到软弱无力和头晕。我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才出了座舱，头疼得很，周身疼痛，渴得难受，双手和脸冻伤了。我最虚弱，射击员和领航员开始拆下机枪用以组织自卫，因为我们搞不清是在谁占领的地区。过了半小时，附近村庄的居民发现了我们，他们走来，停在壕沟的另一边。我们用中国话问他们，这里有没有日本人，但听不懂他们的回答，因为他们说的是方言。

离我们不远处是铁路。过了一会儿，来了一台机车，司机朝我们跑来。我们从他那里得知，这里是江西省弋阳。我们带上机枪、降落伞和文件，请当地老乡帮助照看飞机，就向机车走去，乘机车到车站。该城的市民得知我们是苏联飞行员后，给予我们隆重的欢迎。尽管我们勉强站立着（我们谢绝坐人力车，但他们一大群人跟在我们后面），他们领我们满街参观，所有的居民高兴地呼着口号向我们致敬。晚上，为我们组织了全市欢迎大会。

正确的战术和选择航线，对苏联飞行员战斗飞行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一般是使用“前进”机场，趁天黑飞到那里。我们机群的飞行人员都有丰富的经验，并受过充分的训练，平均飞行八至十年，许多人从前是航校的教员（全体人员是从外贝加尔军区选拔出来的）所以我们能够在拂晓前的黑暗中起飞。航线通常是先进入敌后方，再从那里飞向目标，投弹后取最近的路线直线返回机场。

在拂晓飞行时，我们差不多总能看见居民点、河谷和湖泊，这些地区被烟雾遮盖着。在这种情况下，航线要选在沿山脉走向、湖泊和河流上空的云层边缘，并严格按计算好的航向和时间飞行。

1938年8月11日，五机编队在黑暗中起飞了，爬高到五千米。大队离开了线状地标进入山区，沿长江平行飞行，距离长江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公里。由于山区没有日军，机群未被发现，进入敌人后方五十至六十公里时，发现一个约由二十五艘军舰组成的大编队，停在九江的停泊场。飞机进入战斗航向，在晨六时从七千五百米的高度投弹，结果有三颗炸弹直接命中军舰起火，其余的炸弹有的落在军舰附近，有的落在长江南岸码头上。这次袭击对敌人是突然的。敌高射

炮甚至没来得及开火。我轰炸机脱离目标后，敌歼击机才起飞。所有的飞机都安全返回汉口。

当时在九江市集结了日军大量军舰和运输船，其中包括清除长江布雷水域的扫雷艇。我们预先猜到了敌人的企图，这天黄昏，又派出七架“CB”型飞机组成的机群去轰炸同一个目标。这两次空袭的结果，击沉了五艘敌舰，击伤七艘。苏联飞行员靠这些成功的袭击长时间地阻止了日军在华中战场前进。

6月到9月，华中是酷暑，经常下热带暴雨，有时连续下二十至二十五天，江河湖泊泛滥，淹没洼地和平原。由于湿度大、气温高，形成多层云，有时则形成浓积云，覆盖着广大地区。这个地区是粘质的红土壤，河流在雨后呈暗黄色，这给判断方位造成困难，因而要求飞行人员，特别是机群领队长机要有盲目飞行的经验和能准确地判定方位。曾发生过这种情况，由于长机疏忽，把整个机群带进云层，结果队形乱了，失去指挥，每架飞机只好单独行动。1938年8月4日，一个中国机群就出过这种事，当时八架飞机进入云中，破坏了队形，失去了方位，不得不在指定机场以南一百五十公里处进行迫降，每架飞机迫降地点相隔三、四十公里。

另一次是在9月2日，六机编队的大队受领了任务，在天黑前从汉阳基地向汉口转场，以便在9月3日拂晓作战斗起飞。一个经常在该航线上飞行的中国大队长犯了一系列错误。首先，他决定不要领航员。此外，飞机上的氧气瓶没有充氧，部分氧气瓶就放在罗盘旁边（他想飞到汉口再充氧）。在航线上遇到了雷雨云，长机为了绕过雷雨云而偏离了航向。他对此没有引起注意，也没有仔细地目测地标，完全相信了罗盘，而罗盘旁边放着氧气瓶，就产生了三十到三

十五度的误差。预计的飞行时间过去了，这个大队却飞到了南昌以北五十至六十公里的鄱阳湖地区。大队长认为，他是在汉口西面，因为那里也有很大的水库和湖泊，于是决定取航向九十度，而飞近了前线。

第二中队的长机确认大队长迷航了，他飞到前面去，发出“跟我飞”的信号，转弯飞一百五十度，但大队长没跟他飞。这场混乱的结果，第二中队降落在汉口机场东南一百八十公里的南昌机场，飞机加油后，到黄昏才飞到原定的机场。第一中队油料用完后，在南昌以东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公里处进行迫降，两天后才回到基地。幸运的是，他们还碰到了降落场。因为在中国，大部分平原是稻田，即使收起起落架迫降，也可能造成严重事故。

下面简要地谈谈轰炸机同日军歼击机进行空战的特点。

中国空军最初在高空的飞行，是出乎日军意料之外的。日军没有受过高空训练的飞行人员，飞机也没有高空设备，于是他们赶制了一批专门用于高空飞行的歼击机，以便保卫后方机场和长江上的运输船队。

1938年8月3日，科托夫、阿尼西莫夫和我分别驾驶的三架“CB”型飞机对安庆机场进行轰炸和战斗侦察，那里有装配日军轰炸机的基地。为了更准确地消灭目标，我们决定采用准确的单枚投弹的方法，每架飞机从七千二百米的高度对停机坪、机场设施、飞机和安庆码头上业已卸货的船只单独投弹。

由于我们在目标上空的时间过长，使日军高射炮有可能瞄准射击，在最后一次进入目标时，一个在附近爆炸的炮弹的弹片打坏了长机右发动机的增压装置。这时，天空中出现了敌人的“九六式”和“九五式”歼击机。过了十到十五分

钟，在返航途中，我们的射击通讯员发现敌机在六千五百米的高度上飞行。由于那个被打伤的发动机不能用最大的功率工作，我们用了较小的速度飞行，但采用了密集队形。又过了五分钟，射击员报告说，敌两架“九六式”正从右方飞近。当它们占据攻击出发位置时，我在右下方一百至一百五十米处看到了它们。此外，还发现有十八架“九六式”成两个九机编队从左边接近我们，而在后方，则有一个“九五式”的七机编队。

日军歼击机企图从各个方向攻击我们。我们开始爬高，并平稳地右转弯，飞向山区，离开线状地标远点，以便力图摆脱敌主要歼击机群。由于我们一直在爬高，使日军的战斗条件更加困难。歼击机没有机会从上方进行攻击。我变换着速度：时而减速，时而加速。同时根据通讯员的信号，时而左转，时而右转。

一架“九六式”飞机，很可能是机群领队长机，从右边靠近我，一直在我右侧间隔十米和后面约五米的距离上跟着我，我看见了飞行员的脸。日军飞行员在我拦阻射击后飞到右边，并单机进行攻击，企图进入我射击死角和钻到某架轰炸机的水平安定面下面。但是，他们的这一企图也没有得逞。

由于观察组织得好，射击员迅速从使用上部旋转式机枪转到使用下部机枪，加上有组织地射击和射击通讯员的协同动作（按保护友邻飞机的原则协同），使日军歼击机难以得逞。那些胆敢靠近的歼击机，被我射击员的准确火力纷纷击落了。在一次攻击后，歼击机下降，然后又开始爬高，准备第二次攻击。在这次持续五十多分钟的空战中，共击落和击中起火四架日军歼击机。“九六式”和“九五式”始终未能伤及我们。我一直盯着我的跟踪者，它也一直在同一个高度

上和我并列飞行。

敌机的最后一次攻击是空战即将结束的信号。敌机拉起机头，又爬高五十至七十米，在我后方三十至四十米处，它有一段时间从视界中丢掉了我，尔后开始俯冲攻击。我一直盯着它，在它转入俯冲的瞬间，我把飞机来了个猛烈的向左二十度侧滑。在我右边的科托夫的飞机比我高，左边的一架比我低。日机攻击时正处在我们整个中队的下方，落入我下部机枪最有利的射界，故被我射击员击落了。

从此，敌歼击机立即停止了追击，掉头回去了。我们没有损失，只有一个射击通讯员腿部受伤，但他一直坚持战斗。后来发现，我们的每架飞机上有二十至七十个机枪弹孔，但不过大家都顺利地回到了自己的机场。

这一天的空战表明，只要注意以下条件，在敌众我寡的战斗中也能取胜：要注意保持密集队形；按照“保卫友邻飞机尾部”的原则很好地组织火力协同；飞行中不是降低高度，而是要爬高；一次也不要让敌人从上方攻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油箱中的汽油蒸汽一中燃烧弹就会起火，而从下方命中的燃烧弹在凉汽油中可以被扑灭。

我们也有过困难的日子。在一次空战中，日机曾击落我方由五架“CB”型飞机组成的机群。机上十五名乘员只有六人跳伞得救（他们延期开伞）。飞行员邦达连科是最后一个被击落的。飞机起火时，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把飞机拖回我方占区，当飞行服已经烧着时，他才弃机跳伞。身上起火的飞行员落在了到处是水蛇的湖里。他驱开一团团的蛇，向岸边游去。在防御前沿的中国士兵不区分是哪一边的飞行员，就朝他扫射。邦达连科神奇地游到岸边。当人们得知他是俄国人时，徒手抬了三昼夜才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过了八个

月他才恢复健康，重又开始飞行，后来英勇牺牲。他安葬在中国土地上。

参加这次空战的一个射击通讯员讲述道：

“这是1938年8月12日的事。当时我在大队长那个机组。我向他报告，我发现在我们下方有二十七架“九六式”日军歼击机，三架为一个中队。他们开始包围我们。有些飞机爬到比我们高的一侧位置（看样子是机群指挥官和大队长）。我们的队形已被破坏，成了纵队，飞机之间距离很大。我们开始下降。日军的主力从各个方向攻击我们。我开始射击离我最近的一架，并从五十到六十米的距离上用下部机枪迎头将它击落，眼见它起了火。第二架从右方出现的敌机的驾驶员没有看见我，以为我这个射击员已被打死，于是他靠近到三十至四十米的距离，并继续靠近，准备攻击。我用下部机枪开火射击，这架歼击机抖了一下，机身起火，坠落下去了。过了一会儿，我感到背部被狠狠地一击，便失去了知觉。当我清醒过来时，发现我的伞已张开了，我已飘在空中。我们的飞机燃烧着反俯冲下去，飞行员和领航员都已牺牲。我不记得是怎样开的伞，也许我是机械地干的，或者是伞衣在气流冲击下自己打开的。跟在我后边监视我的日军歼击机开始向我俯冲并射击，结果，降落伞被打穿了几个洞，但没伤着我。这时，日军飞机就冲向我的伞衣，很可能是想把我挂在起落架上，作为战利品带回去。我积极地自卫，开始把伞侧滑，迅速降低高度。日本人对我攻击了三、四次都不成功，只好丢下我，我则顺利地降落在中国军队驻防地区。”

虽然8月12日空战的结果对我们是痛苦的，损失了五架“CB”型飞机（当然，敌歼击机也有五架被击落），但我

们不得不在没有歼击航空兵的掩护下继续作战。我们开始在高空以大机群活动。后来，中国飞行员也开始和我们共同行动。

起初，苏联志愿飞行员的一切战斗行动都是单独进行的。中国轰炸机执行他们司令部的命令，而我们则执行我们指挥部的命令。我们的目标也不同。许多中国飞行员英勇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也有些飞行员胆小，还没有飞到轰炸目标就中途返航了。

1938年7月28日，中国飞行员驾驶七架“CB”型轰炸机去执行任务。领队虽然军衔不小，但却是一个没有受过充分训练的飞行员。不过，他有一个好副手。中国飞行员在二千五百米的高度上接近目标时，在战斗航路上发现高射炮的炸点。长机怯阵，丢下僚机，开始爬高，躲进云中去了。这时，他的副手积极主动地率领其余的飞机再次进入目标。他以勇敢的行动和正确的反高射炮战术机动，保证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必须指出，当时中国空军的人员基本上是由上层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后裔组成的。他们当中许多人不肯拿生命去冒险，不愿在不利的条件下投入战斗，于是就丢下自己的战友临阵脱逃。有些人则故意把自己的飞机搞坏：在机场外迫降，经常造成事故。他们用这种办法使自己长期脱离战斗活动。

后来，根据我国顾问的建议，中国司令部决定把所有中国轰炸机飞行员编入苏联机群。我们所有的共同飞行自始至终都是很成功的，战果辉煌，在同日军歼击机的空战中，互相支援和火力协同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在轰炸机编队中并肩飞行，苏联飞行员在左边，中国飞行员在右边，驻在

一个机场上，生活也在一起。吃的不一样，他们吃中餐，我们则吃西餐，但经常在一起会餐，当我们中间许多人学会用筷子吃饭，而他们学会用叉子和勺子吃饭时，大家都很高兴。

苏联飞行员肩负着带领中国飞行员参加战斗的最困难的使命。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感到有信心，作战很勇敢，从不离开编队。必须指出，共同的战斗行动把我们连在一起，我们的友谊是真诚的，是在对共同的敌人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中国空军对日军的军舰编队、机场和地面部队的成功的空袭，使日军决定对武汉的中国轰炸机基地进行一次报复。

1938年8月19日晨9时，二十七架日军轰炸机编成两个机群来到武汉机场上空。日机遭到高射炮的射击和十二架中国歼击机的攻击，日机从三千至四千米的高度轰炸了一个空机场。苏联飞行员在前一天对长江上的日本军舰编队，进行成功的空袭后降落在居安（在基地西面一百八十公里）的“前进”机场。日机在高射炮射击和歼击机的攻击下，损失了两架轰炸机。我方轰炸机成功的机动使日军没能完成预定的任务。而受到破坏的跑道，在两三天内就修复了。

日军轰炸航空兵是从上海和南京机场起飞进行空袭的。日军占领武汉后，他们的轰炸机转场到武汉中心机场。空袭由两三个机群进行，每群有六架、九架或十二架飞机，编成楔形或菱形队形，高度为二千至四千米。

日机在其占区上空沿长江直线飞行。他们越过战线后绕着大居民点和躲开中国的观察站。他们从一旁接近目标，先飞到目标后方，然后一百八十度转弯，进入战斗航路。日机是按照长机的信号投弹，用拉开距离的方法连续投弹，用最快的速度脱离目标，不作任何机动飞行。

当目标有高射炮掩护时，日军就从太阳方向进入战斗航路。队形间隔稍稍增大，并作反高射炮机动飞行。他们的飞机涂成银灰色或深绿色，有时在接近目标时机群分成五到十架一组，从各个方向进入目标。

日军对中国机场的空袭未获成功，因为中国空军有充足的机场网，中国轰炸航空兵可以从日军的突击下及时地撤走，而歼击航空兵则可以起飞抗击日军的袭击。

例如，1939年2月20日，日军空袭了华北的空军基地——黄河岸边的兰州市。11时30分观察站报告，在基地以南一百八十至二百公里发现由三十架飞机组成的日军轰炸机群。

12时发出了战斗警报。日军的战术企图是：迫使中国歼击机提前起飞。但在离目标六十至七十公里时，日机开始转圈，企图使中国歼击机提前耗尽油料而被迫着陆（它们的这些动作起初是得逞了）。但是，中国空军司令部根据我们的建议没有命令歼击机起飞，而是继续观察敌人的行动，每隔三、五分钟从观察站获得情报。

1时10分，由八架飞机组成的第一个歼击机群起飞了。过了五分钟，又有十一架飞机起飞。尔后又起飞了两个机群。总共起飞四十架歼击机。

经过相同的间隔时间，日军三个轰炸机群出现在兰州上空。它们都遭到了歼击机的迎击。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战术行动，在这次空战中击落九架日军轰炸机，击毙六十三名机组人员。只有一名苏联飞行员负伤，但也安全着陆。敌机未能到达空军基地，而把炸弹投到兰州市内，炸坏了一些住房。

1939年2月23日，日机再次空袭兰州。出动了一个强大的机群，共有五十七架双发动机的轰炸机。飞到中国机场的

只有二十架飞机，其余的把炸弹投到预备目标就返航了。我方歼击机及时地发现了敌轰炸机，还没等它飞到机场上空就对它进行攻击，结果击落六架敌机。歼击机没有追击其余的敌机，而是返回所保卫的目标，因为担心会有别的机群飞来。但是，日机没有飞到目标就返航了。

如果我们有可靠的地面和空中的联系，并有专门用于追击的歼击机群的话，击落敌机的架数还要多得多。歼击机长时间追击敌人后，不一定都要返回自己的机场，可以在就近的降落场着陆。为此，歼击机飞行员必须熟悉半径为二百五十至三百公里的作战地区，并以自己飞机的最大活动半径去大胆地追击单架敌机。

苏联飞行员在同敌人的空战中积累了战斗经验，他们善于识破敌人的战术企图，在空中攻击中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巧妙地利用敌轰炸机的防御薄弱处和死角。

后来，日军司令部不再白天对有高射炮和歼击机掩护的空军基地进行空袭，而主要转入夜间作战。夜间袭击通常是在月夜和无云的夜间进行。每进行这种空袭之前，大约在晚五点和八点之间，日军对目标进行单机侦察。

在进行空袭时，日本特务经常在地面上指示目标，方法是放火烧目标附近的民房或点篝火，以及用手电筒发信号。1938年10月8日夜至9日凌晨对我们驻扎的武汉机场的空袭就是这样搞的。当日军轰炸机接近时，特务分子放火烧了军需库。火是在空袭警报时放的，当时军队和市民离开了城市上山躲避（那时中国没有避弹所）。军需库靠近机场，因而是轰炸机很合适的地标。火灾从夜间11时延续到凌晨3时，使日军三个轰炸机群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瞄准投弹。

此外，中国的探照灯部队经常过早地打开探照灯，暴露

了机场。但是，尽管有特务活动和防空组织工作上的缺点，敌人没有取得特别的成功。虽然日军在10月8日至11日连续轰炸了三夜，机场一直照常使用。

有六架“CB”型飞机受到损伤，其中有三架一天后修复，其余的两天后修复。有一架歼击机在空战中被击落，飞行员死亡。我方一架飞机在地面上起火，市郊有十栋民房遭破坏，平民约六十人死亡。

在三夜的空袭中，日军共投入六十九架双发动机轰炸机，投弹五十吨。中国人击落了四架轰炸机，击毙二十七名空勤人员，俘获一名日军飞行员。日军投弹命中率很低。一切依靠领队长机，每个机组不能自行瞄准。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炸弹是近弹。杀伤炸弹的比例不大，爆破炸弹只是在直接命中时才破坏目标。

日本人使用了无线电通讯，引导轰炸机飞向目标。显然，在中国领土上潜伏着特务电台，它发出信号，引导敌机飞向目标……

我们一天的活动日程如下：如果我们不准备战斗起飞，也不飞到“前进”机场，一般不能远离开自己的飞机，以防日军航空兵的空袭。我们飞行员、领航员、射击通讯员和机械师住在市里，离机场三至五公里，宿舍每个房间住二至六人。我们只在昼间飞行，因为机场没有夜航设备。不论天气如何，天亮前一小时飞行员必须去机场，机械师和其他专家去机场还要早。来到机场后，我们都进入二级战备。如果得到情报说，空中有日军轰炸机，并正向我们机场飞来，我们就进入一级战备。这时，全体空勤人员（飞行员、领航员和射击通讯员）都进入飞机，发动机已试车完毕并准备启动。指挥所发出信号（一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就一架接一架地

起飞，摆脱敌人的攻击，飞向离机场四十至五十公里远的待机空域。在空域飞行四十至五十分钟后，机群领队长机或大队长用超低空飞行侦察自己的机场，如果机场完好无损，并且摆好了“丁”字型大块白布，长机就飞回机群，并带领机群着陆。如果机场上摆上“十”字信号，我们就视储油量多少而定，或者继续在空域飞行或者飞向备用机场。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突击日军的交通线，轰炸敌商船队和运输车队。尽管敌人有对空防御和歼击航空兵的抗击，我们还是用轰炸来经常提醒敌人：中国有自己的空军。

前线的情况迫使中国指挥部把地面军队的计划同航空兵，首先是轰炸航空兵的活动结合起来。我以武汉北面的防御战役为例来简要地谈谈怎样组织这种协同动作的。

1938年9月，日军指挥部决定进攻武汉。计划从三个方向实施进攻：南路经南昌；中路沿长江；北路沿郑州——汉口铁路。

航空兵对日军运输船的轰炸阻止了敌人沿长江推进。日军在中部和南部战场上损失惨重，于是把大量兵力调到北部战场，于1938年9月下半月占领了武汉以北四十五公里的罗山。中国指挥部准备反突击，在该地段集中了自己的军队，并决定让航空兵压制罗山北郊和西北郊的敌炮兵和军队。为了制定计划和组织同地面军队的协同动作，向前沿派出了空军部队的代表。

这个组的成员有机群领航主任维克托·捷尔列茨基、大队领航主任塞罗巴巴和我。我们确定了乘“福特—8”型汽车出发的时间，计算到恰好在夜间乘渡船过汉水，因为白天渡口遭到日军航空兵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

我们大约在夜里一点钟到达渡口，和中国士兵一起登上

渡船，他们是去加强罗山部队的。

拂晓，我们来到一个中国步兵师的指挥所，遇到了我们的军事顾问。在制定了协同计划、确定了时间、地点、信号和中国军队防御前沿的明显标志以后，我们和中国指挥部的代表以及我们的顾问去看地形。我们从一个高地上观察了日军阵地。四周一片寂静，只是在前沿地区三千至四千米空中，有一架日军侦察机逍遥自在地盘旋。我们绘制了敌我双方配置图，吃午饭时回到了师指挥所，稍事休息并谢过了主人的殷勤款待之后，我们在傍晚往回走，希望再次在夜间赶到渡口。过了十五到二十分钟，我们超过了几群中国伤兵（每群有五十到八十人）。我们的翻译督促司机加快速度。他没懂我们的意思，便回答说，开快了伤兵会把我们打死。伤员挤满了道路，稍远一点的公路上堆着石头。

我命令停车。果然不出所料，士兵们争先恐后向汽车奔来，有的坐在挡泥板上，有的坐在散热器上，一句话，约有十五至二十人把车子团团围住。其余的人露着伤口，惊奇地、恶狠狠地看着我们，像是盘算着要把我们从车上扔下去。我不得不命令立即低速行驶。

1938年至1939年，驻华首席军事顾问工程兵中将卡利亚金在他写的《在陌生的道路上》一书中，叙述了国民党指挥部在野战军中的医疗勤务：

“我问一个上尉，伤兵从哪儿来的，他们为什么待在这里？”“伤兵从河对岸来的，躺了两天了，没有人力车和担架把他们送到医院去”。那个军官泰然自若清清楚楚地说。

“包扎、运送和整个对伤兵的护理，在国民党军队中糟透了。各级指挥官把伤兵看成累赘，极力尽快地把他们甩掉……当时大力推行的办法是，发给伤兵一些纸币，让他们各奔前

程……目睹这些真正的英雄们，这些爱国者躺倒在码头上，在痛苦中抽搐，心情是很沉重的。”③

这就是蒋介石军队中对伤兵的态度。我们也是这些情况的目击者。把英勇的中国士兵丢下不管，让他们去听天由命，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我们返回基地后，就着手让空勤人员作好战斗飞行的准备，而机械师则检查和准备飞机。

按着协同计划，罗山地区的地面军队应于1938年9月27日晨6时发起进攻，而航空兵对日军阵地的空袭在晨7时开始。

9月26日黄昏，我们从汉阳机场转场到汉口的“前进”机场，在这里补充加油和挂上炸弹（百分之七十是杀伤炸弹）。我们是第一次同中国歼击机飞行员一同行动。空勤人员仔细地研究了任务。确定了基本突击目标和预备目标，制定了遇到低云层的战术方案。歼击机的任务是在空中掩护轰炸机和对敌军进行突击。

9月27日晨5时55分，我们起飞去执行任务。我们和歼击机在事先约定的孝感（武汉西北五十公里）空域会合。一小时后，我们轰炸了敌人的阵地。这时日军转入反攻，所以炸弹不仅落在了炮兵阵地，而且落在了日军集中的地方。日军反攻破产了，开始退却。

中国歼击机编成两个机群飞近目标：第一机群掩护轰炸机，第二机群进入俯冲，用机枪扫射从东面接近罗山的日军纵队。当这个机群返航时，发现罗山西郊还有一个日军纵队，机群同样成功地进行了攻击。应当说，中国飞行员十分高兴，因为他们和我们配合得很好。他们作战勇敢，积极主动。

完成任务后，所有的飞机都返回了自己的基地，无一损失。航空兵对日军地面部队作战成功，是由以下条件决定的：我们突然出现在战场上（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正确地规定任务，空军与陆军巧妙地配合作战；轰炸机和歼击机准确的协同动作和战斗中明确地区分职责。在9月27日的成功行动以后，指挥部决定今后将使用空军去支援陆军作战。

1938年10月2日，在研究了与陆军以及为我们轰炸机护航的歼击机的共同行动的所有问题之后，我们从武汉机场起飞了，在事先约定的空域同歼击机会合后，我们向目标飞去。

歼击机以两个六机编队把我们护送到目标。在我们投弹结束后，歼击机没有遇到日军飞机，于是攻击了地面目标。

轰炸和歼击机攻击的结果，罗山郊区的日军纵队及其辎重损失惨重。

黄昏时分，全部飞机都顺利地落在武汉机场降落。后来，10月4日和5日的空袭也取得了成功。这迫使日军指挥部为其陆军紧急组织对空防御，调来了高射炮，日军歼击机开始在空中巡逻。

10月6日，在例行的空袭之后，我们同日军歼击机遭遇。它们攻击了我们，但是，我们飞机上武器的准确射击和密集的云层使我们避免了损失。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又转移到别的战场展开积极的行动。

我们从罗山战役中得出一个结论，当敌人在空中占有八至十倍于我的优势时，小机群与陆军的协同动作在某个战场上只是在短期内（三至四天）有效。超过这个期限，敌人就会调来高射炮和歼击航空兵，并组成相当可靠的防御。

到1938年秋，我们飞机发动机的摩托小时快用完了，需

要更换发动机，因为我们每架飞机都超过飞行指标一百五十多小时。当时大修基地在兰州。

11月底，接到暂时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转场到后方，飞机进入大修并更换发动机，而空勤人员需要休息。这个决定是及时的，因为我们飞行员从1938年初起，负担太重了。截至1939年春季，我们从航空工厂接受了六十多架飞机，这些飞机要试飞十至十五小时，然后送到中国。这种长途飞行共飞了三次。我们把头两批飞机交给了中国飞行员，而驾驶第三批飞机参加了战斗。

我们在乌兰巴托一般逗留两三天。在长途飞行后需要仔细地检查飞机，因为下一条航线要飞越多丘陵和沙丘的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我们经常遇到沙暴，虽然我们飞在四、五千米的高空，甚至牙缝里也能飞进沙子。发动机过热，能见度降到极限，不得不进入盲目飞行。在这种不祥的烟尘中，太阳变成暗红色，隐约不清，不断地改变着形状，产生各种离奇的幻景。

当没有风暴的时候，地平线看得很远。下面可以看到大群野羊，它们听到发动机的响声而四散逃走。丘陵经过风沙的吹打，形成了神密的拱顶。

在这种长途飞行过程中，脑海里清楚地出现了不久前空战的情景、我们的战斗生活、我们同志的牺牲、他们在遥远的中国土地上的葬礼、我们的哀悼和中国劳动者的悲痛……

在一次战斗飞行中，我们有一架轰炸机被敌高射炮击中。这架飞机落在机群的后面，飞行员C利用飞行的高度把飞机滑到我占区。他必须紧急降落，因为这时一台发动机已经停止工作。下面是山地，但山谷中有块稻田适合迫降。

有严格规定：迫降时要用机身着陆，不放起落架。在着

陆前领航员又向飞行员提醒了一下。

飞行员C很可能是想保住飞机，也可能没明白领航员对他说了些什么，而放下了起落架。这是事故的根源，飞机在滑跑结束时拿了大顶，翻了过去。领航员和射击通信员从飞机里爬了出来，并赶紧去救机长，但是，飞行员头朝下栽进一个不大的水坑里，他无法解开座椅上的带子，呛了水。

当把飞机翻过来放好时，飞行员已经死了。这是我们头一次遭到损失，大家心里都很难过。当地居民把遗体隆重地运到城里。这件事发生在江西省弋阳市附近。按照这个省的风俗，死者要在夜里运出城，在东门外有一块义地。飞行员的遗体停放在这里，并有警卫看守到天亮。

我们准备把飞行员的遗体运到南昌去安葬，但是，地方当局请求我们开追悼会，并使居民有机会同为了中国人民的独立而英勇献身的苏联飞行员的遗体告别。

当我们一苏联志愿者的代表来到告别地点时，我们看到那里人山人海。人们不断涌来，许多人是在神职人员的带领下来的。这里有各种宗教派别的代表，其中有佛教徒、天主教徒和伊斯兰教徒。

飞行员的遗体安放在白布上，身上盖着白单子。旁边停放着一个高大的柞木棺材，上面撒着石灰。

我们到达后，群众大会正式开始。市长讲了话，他热烈地赞扬苏联、苏联政府和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不惜献出生命的苏联志愿者。最后，市长号召全体居民在战斗中帮助苏联飞行员。然后他呼口号，人群跟着喊：“万岁！”

市长讲话后，还有几个人讲话。然后，给我们留些时间，让我们向自己的战友和同志说些告别的话。我的话在广场四周有六名译员同时翻译出来，在我讲话过程中，人们低

着头，根据领导人的信号，举起右手，高呼中苏人民友谊万岁的口号……

我们还是把话题回到在中国的战斗生活上来吧。

应该指出，中国的侦察工作是不错的。如果我们的飞行有了战绩，不等我们返回到机场，该军区的中国首长就会在我们降落时前来迎接我们。假如因天气不好而提前返航的话，他们就尽量不注意我们，谁也不来迎接，连场站站长也不来。

到1938年12月，我们同中国最高当局的关系开始恶化。蒋介石时常破坏和苏联签订的协定，越来越投靠美国人。

我们发现，中国服务人员更换了，食堂来了另外的炊事员和招待员。伙食质量下降了。我们提出的问题时常得不到回答。我们被告知少出门，特别是晚上。只允许三五人一组集体进城。

我已经说过，我们轰炸机的机群这时已用完摩托小时。但是，为了不使同中国当局的关系尖锐化，我们转场到后方机场，并奉命训练中国技术人员。在得到新发动机时，我们必须马上开始把它们安装到自己的轰炸机上。

我们在新四军和八路军驻地的航校工作时，遇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包括朱德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我们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谈，他们向我们谈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询问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苏联人民的生活情况。

在我们短期的休息期间（我们修理自己的飞机，训练中国飞行员和各种专业的机械师，以便尔后把飞机交给他们），我们的业余文娱小组在驻地组织了几场晚会，为中国部队、空勤和地勤人员、当地居民以及路过兰州空军基地的我国志愿人员演出。我们的歌唱家、音乐家、舞蹈家在临

潼、西安和乘运输机回国途中的其他空军基地——从兰州到阿拉木图经过的酒泉——哈密——乌鲁木齐——伊宁等地进行了演出。

我们定期召开党的会议。我们机群有一个政委名基查，也是党组织的书记。他是乌克兰人，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忠诚勇敢的军人。他参加了所有战斗飞行，从未掉过队，也从没有比别人早返航过。

我们的战斗飞行是经过周密准备的，首先是把任务摆在共产党员面前。每次起飞——不论是战斗起飞或是训练飞行，或是飞到别的机场，当天在机群内仔细分析有利和不利的方面。假如发现在起飞、编队飞行、目测和降落时有错误，立即指定该飞行员、该机组做练习飞行。对轰炸的结果也是这样严格评价的（当时我们飞机上安装有长焦距照像机，它能检查高空轰炸时杀伤目标的情况）。

在我们机群的战斗活动中，我们严格遵循每架飞机单独瞄准目标的原则。为了准备杀伤目标的数据，为了更好地判断方位，组织了练习飞行。为了确定轰炸数据，我们设立了自己的靶场。

在所有的战斗飞行中（共三十多次，约有二百五十架次），我都是领队长机。只有一次因右发动机故障迫使我不得不紧急从战斗中返航。但是，这一次战斗飞行也取得了出色的战果，因为在机群中还有我的两个副手。

应当说明，中国空军指挥部一直都知道我们是去执行战斗任务，并通过防空系统观察我们。

完成对中国空、地勤人员的训练后，1939年春，我们乘运输机从兰州经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回到了阿拉木图

.....

现在让我们做几点结论。

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给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帮助，包括援助中国作战飞机和派遣苏联志愿飞行员。在战争的头几年，中国从苏联得到八百八十五架作战飞机。仅仅在我们机群来到中国期间，就交给了中国一百五十架“СВ”型和“ДБ—3”型轰炸机，一百五十架“И—16”和“И—15”型歼击机。约有二百至二百五十名苏联飞行员（不算机械师以及各种勤务人员和空中航线上的服务人员）参加了1938年至1939年的战斗行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斗在中国天空的我们的飞机和我们的人，在战争第一阶段担负了对日本空军的主要突击。只要提一点就够了：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我们的歼击机飞行员在空战中击落日军飞机一百余架。

我们的轰炸机群在同侵略者的斗争中也做出了不小贡献。从1938年5月到10月，我们击沉七十多艘敌军舰和运输船，消灭机场上的三十架敌机，在空战中击落了十五架歼击机。消灭了运输船上和战场上的大量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

在中国领空同占优势的敌军进行空战时，苏联人英勇善战，不少同志为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而献出了生命。有二百多名苏联飞行人员为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幸福而英勇牺牲。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了许多战友的坟墓。我们机群的六十人中，只有十六人返回祖国。

我记得歼击机飞行员科斯佳·基达耶夫惨死的情景。他一个人在夜间战斗中驾驶“И—16”型飞机攻击了二十七架日军轰炸机，击落两架敌机，但自己也在枪林弹雨中牺牲。

1939年夏，大队长勃达依采夫大尉牺牲了，他是奥塞廷

族人。在日本空军对重庆的一次夜间空袭中，勃达依采夫起飞去拦截。在追击敌轰炸机并进行攻击时，他中弹受伤。勃达依采夫跳伞后摔死在山上。人们把他隆重地安葬在重庆。

当我们的战友在远离祖国的地方被埋葬时，我们感到万分悲痛。为了永久地纪念他们，我才决定写这篇回忆，并想提一提：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我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做了些什么。

附 注

作者简介：

C·B·斯柳萨列夫（生于1906年）—1929年参加苏联共产党，预备役近卫空军中将，苏联英雄。1930年从航校毕业后，历任红军空军各级指挥职务。1938年5月至1939年2月，在中国任苏联志愿轰炸航空兵指挥员，亲自参加了空战。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历任西南方面军空军司令员，第二十五集团军航空兵指挥员以及其他职务。曾参加克里木、利沃夫、散多梅希、柏林、布拉格等战役。战后任外贝加尔军区空军集团军司令员。1950到1951年，再次出差到中国，帮助组织上海的防空，以防蒋介石军队的空袭。

①靠近前线的前进机场。

②飞机向右边排一架挨一架的编队。

③见A·Я·卡利亚金著《在陌生的道路上》，第172—173页。

（何飞译）

在 战 斗 的 中 国

C·C·别洛利佩茨基

由萨雷奥泽克到汉口

1938年五一节前夕，我作为一名志愿军医，由塔什干来到了战斗的中国。

和我同行的有 И·Д·伊茨科维奇副教授。土西铁路注1线上的萨雷奥泽克站是我们这次旅途中的第一站。列车到达该站前不久，我从前的一位部下维克托罗夫助理军医来到了我们车厢。他身穿一套制服，头戴一顶便帽。大约一年以前，他就已和阿鲍津、托罗波维奇、库里连科和叶鲁萨利莫夫等几名中亚军区的军医一起在中国工作了。

“他们现在在哪儿？”我问维克托罗夫。

“阿鲍津在兰州工作，托罗波维奇和库里连科在中国南方某地，大概是汉口工作，叶鲁萨利莫夫不久前在兰州附近一次飞行事故中牺牲了。

“怎么牺牲的？”我吃惊地问。“因为什么，发生了什么情况？”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叶鲁萨利莫夫这人，我早就认识。他是塔什干军区医院一位年轻有为的外科医生。他生病的妻子和孩子们都留在塔什干。

注1． 即土尔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译者

“叶鲁萨利莫夫曾离开同志们，暂到西安工作。当他去汉口工作之前，因事飞到了兰州。在返回西安途中，刚刚飞离兰州不到二十公里，飞机突然起火，浓烟滚滚地栽到了地面。我自己呢，——维克托罗夫补充说，——现在在孝感到西安这条路线上工作，为我们的汽车队人员服务。”

不久，我们到了萨雷奥泽克。这是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的一个小站，周围看不到任何草木。我们要在这里等待下一步命令。当时，也就是三十多年以前，萨雷奥泽克总共才有几座石头房子，如车站、学校等等，居民主要是住矮小的土房。

我从车厢的窗口朝列车运行的右方望去，看见土丘缓坡上有一个很大的黑方块地带。那是停放有几百辆新型载重汽车的露天停车场，也就是我们这支“远征军”的战略运输预备队。车辆密密麻麻左右成行，车身新漆和挡风玻璃闪闪发光。

我们被安排在司令部那座小房的一个单间里。基地主任就住在这里，另有一部小型行军电台也设在这里。我们换了便服：蓝布装、棉布鞋、鸭舌帽。

地方上的医疗所没有多少事可做。我们眼巴巴看着一趟趟列车朝塔什干——我们家属留住的地方驶去，内心不免阵阵惆怅。同时，在中国服役期满而返回祖国的志愿人员不断来到萨雷奥泽克。每天晚上，他们都向我们介绍他们艰难而危险的工作情况。

五月底的一个深夜，我们正待就寝时，隔壁电台马达哒哒地响了起来，很快又没声了。这是同莫斯科保持例行的无线电联系。一分钟后，无线电报员进门问道：

“哪两位是伊茨科维奇和别洛利佩茨基？”

我们应声回答。

“来了一份电报。你们明天一早必须动身去阿拉木图，然后从那儿飞往汉口。基地主任指示，四点整汽车准时送你们出发。请做好准备。”无线电报员说完便离开了。

……我们抵阿拉木图的第三天，会见了一批由中国归来的同志。他们是从兰州直飞这里，途中没有降落。一个个兴致勃勃，津津乐道地谈论自己的感受。其中一人是4月29日在汉口空战中负伤的飞行员。我们给他换去了湿透的绷带。

从这些同志那儿，我得知我的几位塔什干老乡的情况。托罗波维奇在汉口，库里连科在南昌。领导他们的是И·М·茹拉夫列夫，此人我还在萨雷奥泽克时就听说过。

由莫斯科开来的晚班列车又送来一批派往中国的志愿人员。其中有各兵种的军事顾问、随军记者和一名军医。我们得到通知，明天我们这些人将一起飞往中国。

我们乘坐的那架飞机（原是一架轰炸机，现已改作运输机），为了飞越天山山脊的隘口，一直在拔高。我们左右两侧近在咫尺是巨块山岩，层层叠叠，令人望而生畏，宛如一条条时断时续黑白相间的带子一掠而过。悬崖峭壁上没有雪迹，望去像是黑色的群岛；而慢坡缓壁则终年积雪，犹如一块块白色台布。

从飞机上居高下望，可见奇峰林立的高山峻岭连绵不断，有的地方寸草不生，有的地方林木密布。眼下哪里是中苏分界线，从飞机上很难分清。

很快，群山便被抛在后面。眼下展现一片黄土平原。地平线上出现了一座城市。飞机在它上空兜个圈子，便降落了。一些身着我们从未见过的军服的人们朝我们迎面跑来。我们到了伊宁。

我们就在机场的励志社就餐和休息。住在我隔壁房间的

是一位年轻人，他几天以前就已来到伊宁，在这里等候便机准备飞往中国内地。他说他刚刚从驻西班牙的一个国际旅归来，叙述了共和派军队同佛朗哥军苦战的情景，还讲到如何历尽千难万险才穿过法国境地。现在，他甚至连顺路回家探亲的机会都没有，便来到了中国。

第二天清晨，我们便飞往乌鲁木齐。眼下又是一片一望无际的黄色沙漠，在它南面依稀可见连绵起伏的皑皑雪山。

我们从乌鲁木齐机场前往市内，在一个古城堡里的宿舍住下。在一个宽敞的房间里放着一个弹子球台，人们正在打台球。距我最近那位正在打台球的人，是个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汉，他身穿白衬衣，敞着领口，叉开两腿正瞄台球，转头瞧我一眼，为了打得更准，他并没有改变瞄球的姿式。我向他问好，他反问道：

“刚刚来到吗？”

“是。”

“坐什么飞机来的？”

“TB—1。”

“是去汉口吗？”

“是。”

“那明天同我一起坐‘TB—3’去。”

这就是全航线有名的飞行员、一架大型飞机的机长。当时，我自然不可能料到，他会在六个半月以后惨遭不测，而我则只因一个偶然机会才得以幸免……。

第二天早晨，我们登上这架大型四引擎飞机的前舱，坐在装有降落伞的袋子上。

机头很大，半球形座舱盖装有大块玻璃，前后左右上下视界都很开阔。飞行员和领航员的座位高出我们一头。操纵

板上仪器之多令人吃惊。中舱更加宽敞，光线透过天棚上用以安装旋转式机枪的圆孔上端的玻璃罩射进中舱。通过机壁里两个一人多高的大凹部，可以看到机翼的内貌、复杂的撑管和张线系统以及挂在它上面的燃油柜和滑油柜。机身两壁和天棚装有投弹架。底板中设有自动关闭的供投弹和跳伞用的舱口。尾舱内有一通道，通往装有一挺双联装机枪的玻璃圆舱。四个发动机舱安在两翼（每边两个）。双叶片螺旋桨宛如巨大甲虫掀起的长须。

我们在哈密过夜。“远征军”的这个基地比伊宁和乌鲁木齐的基地大得多。这里已有我们的地面警卫部队。机场上苏联教练员正在教中国人学战斗飞行技术。

抵近兰州时，我们的飞机在南山山脉上空作高空飞行。测高表指向五千多米高度。我们有些不舒服：由于缺氧，感到恶心，可是谁也没有携带供氧设备。

兰州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它位于黄河河畔，几乎是在中国的正中心。黄河水的确又浑又黄。市内绿荫稀少。黄河平缓的右岸至今保留着古河道的遗迹。

黄河对岸（左岸）高而多山。这一带人口众多，虽然并不十分密集。屈指可数的几条山路沿坡蜿蜒而上，山顶有座佛教寺院。石砌的高高的院墙后面，低矮的单层建筑物之中，高耸着一座匀称的佛塔。透过锁着的栅栏大门，可以看到寺院的内景，五颜六色的塑像分布其中。

兰州附近有座横跨黄河的高桁架铁桥，六个孔道，石制的桥墩，汽车和兽力车均可通行。桥是美国人建的。耐人寻味的倒是那些小筏子，中国人大胆地驾着它沿着宽阔而湍急的黄河顺流而下。筏子是用竹排做的，用巧妙剥下的整张马皮、牛皮或水牛皮充气作浮筒。中国人可以把这种轻便筏

子背着走。

在机场上我们看到了战争迫近的最初迹象：日军击落或烧毁中国飞机的残骸，机场边缘几乎是直上直下的山坡上挖成的掩体，门上布满了弹片的痕迹。市中心广场上树着一个巨大的，高约五米，涂以显眼颜色的炸弹模型，突出的尾翼朝上，圆头则对着防空洞的入口处。

兰州军医院已有苏联志愿军医在工作。我们的“TB—3”给医院运来了几箱药品，由B·Γ·阿鲍津医生领去。此人我在中亚军区工作时就已认识。他在中国服役已近期满，不久即将回国。

傍晚得知，我们刚到兰州的两名医生中，有一名要留在当地医院工作，另一名要去汉口。让我选择。我决定继续前进。

由基地领导人和我们军医小组联合召开的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会议研究的内容是如何安全到达汉口。由于临近前线，遭到敌歼击机袭击的危险性更大，飞往汉口的确有些冒险。因此决定先乘汽车到西安，然后再由西安乘火车到汉口。当然，这条路线也不是没有危险，因为铁路紧挨着黄河右岸，而左岸已被日军占领。西安到郑州一段路，只能夜间行车，而且不许开灯。这段路每一米的地方都在日军炮兵射程之内。

第二天早晨，我告别了伊茨科维奇，从此我俩便分道扬镳了。我同其他一些顾问乘坐一辆敞篷载重汽车。前面有一辆小车，坐着几名记者。开始时沿黄河河岸朝东南而行，河岸越来越陡峭而险峻。然后黄河离开公路折向左面向东北方向流去，渐渐消失不见了。

不久公路进入一条小小的河谷，到处是果园和菜园。这

里不久前下过一场暴雨，我们的汽车都陷进黄土泥泞之中。多亏附近劳动的农民帮忙，才得以通过这段难行的路程。

我们在甘肃和陕西两省交界的平凉市过夜。记得这个城市有一道很厚的城墙，瓦顶的城楼富丽堂皇。不久前，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辟了一条通过平凉山隘口的大道。从山隘口往下眺望，风景美丽如画，群山绵亘，谷地起伏，一直伸向远方。一块块狭窄的稻田别致地紧贴在山坡上。沿陡壁峻岭开辟出来的一条山路在万丈深渊之上蜿蜒而行，奥妙莫测地盘山螺旋，弯弯曲曲顺坡而下，弄得我们那辆汽车沿悬崖断壁忽左忽右拐来拐去。

就在平凉地区这一高山路段上，当我们顺利通过之后不久，苏联的一支往西安运送军用物资的汽车纵队遭到一次武装袭击。经过一场短暂的战斗，击退了这次袭击。为了急救伤员，立即把外科医生特罗菲莫夫从兰州召来。半年以后，我和他在中国南方再次相遇并成了朋友。

这次旅行第二天行将结束时，在离西安十到十五公里的地方，中国的军事关卡叫我们停住。由于临近前线，只有等待天黑才能继续前进。

当我们过渭河大桥驶进陕西省城时已是深夜了。这桥是一座铁桥，桁架高而精致，但桥面的车辙木板很窄。借车灯的光亮可以清楚看见，桥面上两道车辙板之间露出一道道粗大的横梁。这个国家建筑木材奇缺，要节省木材这可以理解，但驾车驶过这样窄的车辙桥板，特别是对窄底盘的小型汽车来说，却未免十分危险。存心作恶的破坏者就常常利用这一情况，还有一些纯属幸灾乐祸的人也有这么干的。例如，大约两个月之后我们从南昌返回汉口的途中就曾从这样的桥渡过一条水流湍急的山河。这事发生在白天。前面那辆

汽车的司机发现桥的一道车辙板上有一捆稻草，随即停车。打开一看，稻草底下藏着一大块鹅卵石。干这种坏事的人显然希望我们这辆车的轮子从窄窄的车辙板上滑下，然后一切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苏联志愿人员西安基地的励志社同美国领事馆设在同一地方。我们是在美国无线电广播声中吃晚饭的，开饭时间很晚。

我醒得很早，听到从值班室（为使同志们都能睡好，凡在途中过夜，大家轮流值班）传来低沉的音乐。在听到一阵阵迅速变换、不时互相干扰的音乐声之后，突然传来了莫斯科播音员的熟悉声音：“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广播新闻”。我们大家顿时从床上跳起来，只穿着裤衩和背心，带着睡眼惺忪的面孔，聚集在收音机旁，倾耳凝听着祖国的声音。凡是长时间离开祖国投身远方异国的人，一旦听到莫斯科的声音，都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使人既欢欣鼓舞，又令人怀念亲友……。

西安比兰州大些，树木也多，城市建筑很好。这里大多数建筑是欧式的。城的四周有一道城墙，城门巍峨高大，城楼檐下有卫兵警戒。街上人多嘈杂，眼花缭乱。叫卖小贩到处皆是。经常可以看到他们肩上一条竹扁担，挑着两个箩筐，筐里样样俱全，甚至连小孩子也放在筐里挑着。

人行道上，靠墙根儿蹲着一个藏医。这医生听完患者的主诉，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便从一个大木箱——一种提携式“药箱”里取出药来。街当中，一群中国人身着法国巴黎公社时期法国士兵服装，头戴法军军帽，军装上衣佩带着带穗的镀金肩章，招摇过市引人注目。他们用擦得铮亮的管乐器奏着一种雄壮的进行曲，手里象举军旗似地举着一张花花绿

绿的彩画，看不懂画上汉字是什么意思。翻译解释说：

“这是一张地方戏的海报。”

我们从一座阴森森的高大建筑物旁边经过，四周全是砖墙，墙上架有铁丝网。有个士兵在拐角的了望台下，拚命地敲打挂在他脖子上的那面小鼓。一问翻译，才知道：“那鼓手是在通告全市居民，监狱院里此刻正在处决一名凶犯”。

这个濒临前线的城市的和平生活经常为警报器的阵阵悲鸣所破坏。向居民发出的这些空袭警报，有时是演习，也有时是真的。

我们到达西安第二天，苏联的一个“CB”机即快速轰炸机值班支队在西安机场着陆。这个支队很快便向汉口方向飞去。接着警报器声时断时续，发出了战斗空袭警报。我们的邻居——美国领事馆的那位瘦高个男人和另一位带着一副墨镜的干瘦的美国女人，嫌领事馆屋顶上已有的那面从空中清晰可见的美国国旗还不够，连忙又在院里铺上一面醒目的巨幅美国星条旗。

全市进入了紧张状态。邻近街区的居民急忙跑进就近的挖在很厚的城墙里的防空洞。我们也来到了这里。这时传来了越来越大的均匀的轰鸣声。我朝着人们边跑边指的方向望去，好久我才在一望无际的蓝天里看见了那闪烁着 的白十字。这是一架日本侦察机。它朝机场那边飞去。

城墙上站着一个士兵，身背一具轻便测距仪。士兵身后有个军官俯视着测距仪，他显然是在为高射炮兵准备数据。

快速轰炸机支队在西安只作短时停留，敌人侦察机随即出现，这两件事显而易见绝非偶然：要么是日军发现了它（日军阵地就部署在离西安不远的黄河左岸一带），要么就是有奸细向日军通风报信。我们料想，继敌机侦察之后，恐

怕会马上出现敌轰炸机。但这事并未发生，显然敌侦察机已回报说西安机场已经空空如也……

有一次，在苏联志愿人员基地，我曾同一位瘦瘦的，左臂用纱布吊着的年轻飞行员谈话。这人就是中国空军歼击机群的群长Г·М·扎哈罗夫。他马上就要回国。Г·М·扎哈罗夫曾获准驾驶一架缴获日军的九六式歼击机回苏联。结果飞机暗遭破坏：敌人往油箱里撒了糖，起飞后汽油导管堵塞，只好在山地迫降。这架飞机被损毁了，扎哈罗夫的左臂负重伤。他还向我谈了苏联医生在汉口和南昌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第二天，空袭警报之后，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天气已不适于飞行。尽管如此，一架往返于兰州——汉口之间的班机还是从兰州飞来了。这架从地面一点也看不见的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很久，它利用无线电通讯沉着而巧妙地穿过厚云层，终于安全着陆。这样，当天我们这个小组的一半人员，便搭乘这架飞机飞往汉口。

两天以后，正赶上西安迎接中国空军副总司令毛邦初将军。为欢迎这位高级长官，航空委员会特地派出一个代表团在军乐队的伴奏下来到机场。飞行场旁边临时搭起一个讲台。

一架属于德华航空公司（即“欧亚航空公司”）制造的“U—52”三引擎客机掠地飞行着陆。从飞机上走出一位年轻的、衣着讲究的将军，拿着一根手杖，牵着一只小狗。迎接他的代表团头头是个瘦长、但精神饱满的老头，戴一副墨镜，头顶宽边草帽，身穿一套长长的白礼服，在国歌声中向将军致敬。他们一再相互深深鞠躬。然后，这位欢迎者走上讲台，从白发苍苍的头上摘下草帽，讲了十五分钟的话。

当这位毛将军和他那只小狗乘车扬长而去，机场已空无行人时，有人建议我们坐这架飞机去汉口，因为自从开封失守以后，再乘火车从直接靠近日军阵地的地方到汉口去，显然更加危险。

我们这架“U—52”飞机从右面绕过巨大的隐没在绿荫下的汉口，掠过烟雾弥漫的工业城市汉阳的上空，飞越宽阔的长江，便降落在武昌的一个民用机场上。一辆汽车把我们载到江岸街的“英国码头”。我们乘一艘小小的轮船渡过雄伟的长江，踏上长江左岸——汉口。这里，有几辆小汽车来接我们。我们沿万国租借地的一条华丽的柏油马路奔驰而去。马路两侧是一道道高高的篱笆，篱笆里边是一座座漂亮的花园。我们经过法租界线上架起的一排排的铁蒺藜，驶入一条林荫夹道，在一座两层楼房的院子里停下。这就是苏联顾问的宿舍。我被领到二楼曾是医生住过的房间。这房间现在正空着。过了一会儿，楼梯口下出现一位身穿灰衣，脚登一双黑色矮靰皮鞋，左臂弯挂着一根讲究的手杖的男人。他的面孔给一顶银灰色的毡帽遮住了。待他步上楼梯高处时才抬起头来。这时我才认出，他就是我在中亚军区工作时非常熟悉的С·Я·托罗波维奇大夫。

看来，斯捷潘·亚科夫列维奇·托罗波维奇事先知道我要来。我俩相互问长问短，谈论着熟人的情况。我从托罗波维奇口中得知，他曾在列宁格勒医生进修班学习好几个月，然后从那里直接来到中国，路过塔什干时，在爱人那里只呆了几个钟头，顺便带点随身用的东西。和他一块离开塔什干的，还有叶鲁萨利莫夫和库里连科。前者牺牲在兰州附近，后者现在在南昌。再过几天我也要到南昌去。来自基辅的那位茹拉夫列夫大夫今天晚上将要回国，他在中国已经工作一

年半多了。

我们谈话时，进来一个年轻人，年纪虽轻，但已秃顶。他精神饱满，有着一副聪明而又果断的面庞。他情绪激昂，面带不满。托罗波维奇惊讶地跳起身来：

“彼得·米隆诺维奇，怎么啦？为什么没走？”

“走不成了，”来人垂头丧气地把手一挥，嘟哝着，“飞机起飞时掉进一个没有填结实的弹坑里，把起落架弄坏了。现在只好等修好以后再说。”

“没关系，宁肯出师不利也比最后失败好得多！现在，让我们来认识认识……”

说话的正是那位茹拉夫列夫大夫，关于他的好多有趣的事，还在萨雷奥泽克和在阿拉木图时我就早有所闻。他今晚回国险遭不幸。

彼得·米隆诺维奇也开始和我攀谈起来。他知道我的专业后便扬声说道：

“已经有了一位神经科医师——库里连科，又派来一位神经科医师。战争中需要的是外科医生而不是神经科医师，他们竟把这一点给忘了！”

茹拉夫列夫说，他出差来中国以前是驻基辅的某骑兵师的卫生勤务主任，二十年代在塔姆波夫申曾于当时同安东诺夫匪帮作战的科托夫斯基部队里当过助理军医。在来中国南方以前，他曾当过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的医生。那时他还曾经和其余同事一起拿起枪来抗击叛乱者的袭击。他曾荣获战斗红旗勋章……

一个静静、温暖、潮湿的早晨，我被街上传来的报童的响亮的叫卖声唤醒：

“新华日报！新华日报！”

吃过早饭以后，茹拉夫列夫和托罗波维奇领我去司令部驻地晋见我们飞行员的主管首长。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摆着一套软皮沙发椅，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中年男人，头发理得短短的，脸刮得光光的，眼神果断有力。十七年以后，当我在塔什干再次见到П·Ф·日加列夫时，他已经当了空军主帅，穿着一套漂亮的军服，和在中国那时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巴维尔·费多罗维奇·日加列夫十分关切地询问我长途旅行之后身体如何，并向我介绍了面临工作的性质。

汉口机场位于一片宽阔的草原上，东连汉口市区，南临汉水河口，西是西湖。停在机场一边的是我们号称“喀秋莎”的“СБ”快速轰炸机。对面停着的是歼击机；“И—15”双翼歼击机，别号“黄雀”；“И—16”圆头单翼歼击机，别号“燕子”。飞机尾翼上都涂有中国的识别标志。

机场的场站建筑物隐没在一片棕榈和芭蕉的绿荫之中。在一个很大的圆顶遮棚底下，备有很多躺椅和竹床，中苏空勤组成员携带全部航空装具在这儿休息，随时准备起飞。

托罗波维奇领我到指挥所去见轰炸机群群长。这是一位高个子年轻人，身着便服，戴一顶浅色毡帽，穿一双和我一样的漆皮鞋，正在用电话向某人一字一句地下达命令。过了半分钟，他把那张活泼而愉快的脸转对着我们，经斯捷潘·亚科夫列维奇介绍，知道我是何许人之后，便向我伸出手来。他手里拿着话筒，自我介绍说：

“我叫安德列耶夫^①。太好了，这是对我们医务工作的加强。现在请您接受一次战斗洗礼，有十二架日军轰炸机正在飞近我们。”

场站建筑物的旗杆上升起的不是往常那面粉白相间的条

纹旗，而是一个红色警告信号。飞行员们边束装具，边朝飞机跑去。整个机场都行动起来，一片发动机的吼声。飞机滑上起飞跑道，随即起飞，卷起滚滚烟尘。

然而，日军飞机刚刚飞近汉口上空，只要迫使中国空军起飞之后，他们突然改变航向，把炸弹扔在别的地点。显然他们考虑的是，中国飞机每进行一次多余的起飞和着陆，势必加速发动机寿命的损耗，增大汽油的消耗量，使发生二、三等飞行事故的机会增多。当时中国汽油奇缺，所有汽油都需要靠各种运输工具（包括骆驼队在内）用经过焊修的美国油罐经缅甸公路由远方运来。但日军一遇到我们的飞行员却不敢轻举妄动。

同这位安德列耶夫—赫留金交谈之后，我才了解到，他当时年纪虽轻，但却无所畏惧地同数量上占优势的日空军兵力作战，而且早在西班牙共和国的天空，就已取得了同法西斯空军进行空战的经验。在汉口，以及后来在南昌，我经常遇到这位出色的飞行员。他以善于驾驶轰炸机攻击敌人军事目标而闻名。

四年之后，1942年冬，我曾多次在卡恰林斯卡亚车站注视着苏联轰炸航空兵庄严而威武地从我们头顶高空掠过，朝列宁格勒那个“大包围圈”方向飞去。当我欣赏这些威风凛凛的飞机排着整齐队形凌空掠过时，还不知道，他们是在执行空军第8集团军司令T·T·赫留金上将的命令。

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39年春在索契疗养院。那时，赫留金已是一位苏联英雄了。“我回国以后还没有见到你呵！”——季莫费伊·季莫费耶维奇·赫留金很高兴地欢迎我说。

他于1953年7月去世。名雕塑家乌切季奇为这位伟大卫

国战争英雄——T·T·赫留金精心创作了一座雄伟塑像。

……现在我天天都到机场去，有时是一清早随飞行人员一同前往，有时稍晚一点搭那辆送早餐的车子去。一天，机场一边的汉水上空，我看到一架飞得低低的大肚子、纱锭状的银白色飞机。我断定它是一架飞艇。有人纠正我说：这是一架“C—47”美国飞机，是蒋介石的私人专机。果然不错，一分钟后这架飞机转了一个弯，那机翼便清清楚楚露出来了。人们告诉我，这个大元帅有一次乘这架飞机曾遭到日军歼击机的袭击，险遭不幸。是中国飞行员救了他的命。

汉口这座城市，我是在每天往返机场的途中逐渐熟悉的。这是一个美丽的大城市。由于战时从日占区来了大批难民，城市人口剧增。自政府由南京迁往此地，汉口便成了中国的临时首都。

靠近长江的街区被称为“万国租借地”，它现为法租界。这里，热带植物成荫，一栋栋豪华的别墅隐没其中，外国使馆云集于此。各使馆对面，都沿江边修建了浮码头。每个码头的顶盖上都分别用醒目的颜色绘上了本国国旗，此外，各使馆建筑物屋顶上也都悬挂着国旗。这都是为了防止日本空袭。每当发出空袭警报之后，经常可以看到人们成群结队地向这里跑来，觉得这里比较安全，一直到解除警报以后才离去。

由万国租借地折向市中心，高高耸立着一座市政大楼，它的最高处是一个很漂亮的钟楼。法租界周围架有防坦克的障碍物，并缠着生锈的铁丝网。武装警卫不断地沿着这些障碍物来回巡逻。

同外国的相比，中国街道最明显的不同点就是狭窄、弯曲、肮脏。房子矮小，多为平房。窗户常常没有玻璃，只糊

上一层薄薄的卷烟纸。屋里简陋得象个棚子；没有天花板，抬头就可瞧见屋顶；套间也没有门，而用一块布帘代替。外屋门往往用一块直木板代替，晚上装上，早上卸掉。

汉口由中国人和外国人开的大商店为数甚多。钟表店多得惊人，有几家占好几层楼房。摆钟表的玻璃柜一排挨一排，中间留有过道。顾客一上门，店员就紧紧跟随在后，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准备随时依照顾客心意把这个或那个玻璃柜子打开。老板则坐在一张斜面的高账桌后面注视着店员的一举一动。通常，这中国商人身着一件从上扣到底、长得象一件袍子的黑衫，领子竖着，肥大的衣袖搭拉着；头戴一顶黑圆帽，帽顶上缀着一个大黑扣；足登一双露出厚厚白底的布鞋。

老板怕热，不断地摇着扇子，他显然嫌那面风扇没有带来足够的凉风。这风扇式样特殊，用一块长长的横布做成，有房子那么宽，装在店铺的天花板底下，借滑轮来回摆动。

到处可以看到乞丐。商店内常常可见到这样一种场面：乞丐进门来要求施舍，但好久都没有人理他。这时他便开始（最初是轻轻地，尔后越来越响地）把挂在脖子上的那串钥匙之类的小铁片摇得叮当作响。如果仍然无济于事，这乞丐便从腰间取出一副竹板使劲地敲打起来。这一招果然见效，把老板弄烦了，他只好往乞丐的脚跟前掷去一个铜板。

街上拉人力车的很多。司空见惯的情景是：人力车夫踮着一双赤脚，弯着腰，有节奏地拉着车子奔跑，而乘客则坐在车上，傲慢地靠着车背。乘客中有不少是外国人，如那些从军舰上下来的美国水兵。我们是苏联人，当然不愿利用这种交通工具。但是，这些实际上属于半乞丐的穷人力车夫为了挣钱谋生，常常央求我们坐他们的车，弄得我们大伤脑

筋。例如，一个没主雇的人力车夫向你这边走来，请你上车。你向他挥着手。这中国人还是装着没有听见或不懂似地仍然继续拉着车子跟着你走。这时，如果你想摆脱这个护卫以免惹人注意，那你最好是给人力车夫一角五或两角钱（相当于一次中等路程车费）。这中国人满意地离开了，你呢也感到满意。然而，一会又会有另一个人力车夫向你跟来。接着还有第三个、第四个……。

雨季时一天要下几次暴雨。七月中旬，雨季终于结束。夏季的这种大雨不仅不能带来凉意，反而使人感到更加闷热。而现在，这南方的天空，万里无云，碧空无际。

两天以后，我便随A·C·勃拉戈维申斯基率领的一个志愿人员小组到南昌去，接替库里连科夫。托罗波维奇则留在汉口。

在飞行员中间，和安东·古宾科会面

直到前不久，我们由汉口到南昌的路线，都是搭轮船沿长江而下直达九江，然后再转乘火车。但最近日军已占领九江，我们只得坐更长时间的火车，绕道湖南省的主要城市长沙前往南昌。

和我同行的，有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格里戈里耶夫。他从阿拉木图起一直是我的同伴，还有一名姓曾的上校他是首席翻译。车厢里电扇虽然在不停地转着，还是又热又闷。很快便进入了一个没有月亮的亚热带黑夜。待我凌晨醒来时，列车已在汉口到长沙的途中奔驰。窗外风光如画，优美动人。列车穿过一片茂盛的灌木。眼前展现的是一个平静的蓝色湖泊，岸边竹木丛生，湖心有一小岛，隐没在一片绿荫之中，一座白墙红顶小屋点缀其中。湖上漂着几艘渔船。

那朝霞光艳夺目，美丽异常，使你误以为是舞台上的布景，或一幅水彩画。

一位中国列车员静悄悄地走进包厢。他往几个茶杯里撒下几小包绿茶，倒进开水，再用漆黑的盖子盖上。在中国，到处都请人喝凉茶。炎热的夏天，凉茶的确很解渴。

我们在长沙逗留一昼夜。一辆大型德国轿车把我们载往专门为我们准备的住所。人群尾随在我们车后面奔跑，热情地欢呼着什么，两手紧握着举过头顶向我们示意。不需要翻译就已明白：人民感激苏联人在同侵略者的斗争中所给予的奋不顾身的国际主义援助。

不久，我们便到了南昌这个江西省的主要城市。傍晚吃晚饭时，励志社的餐厅里挤满了人，非常热闹。中国当局请志愿人员喝啤酒，而这种情况一般只是在空军打了胜仗之后才会有的。

在这里，我遇见了那位将由我来替换的M·K·库里连科医生。他对我说，今天日军空袭时，歼击机飞行员奥帕索夫在空战中击落了一架日本飞机，他已准备返航，但临快要着陆时，飞机突然急转直下，机毁人亡。人们从飞行员身上没有找到火器伤痕，只发现水平安定面和升降舵上的那块顶板被一个机枪点射击穿。显然，由于是在低空，飞行员已无法跳伞，这时飞机便失去了控制……。

我们在二楼医生的房间住宿。我选了茹拉夫列夫过去睡过的那个床位。我同米哈伊尔·基里洛维奇一直谈到深夜。两人一起回忆留在塔什干的家属、熟人和同事。库里连科向我介绍，我们现在住的这所南昌励志社是一座两层楼房的最好的欧式建筑物，设备齐全，有一个漂亮的花园，一个水泥游泳池，属蒋介石的一个儿子所有。我曾记得，大约十年以

前苏联报纸上刊登过他的一篇演说（当时蒋介石的这个儿子在莫斯科留学）。由于蒋介石推行罪恶的反苏反共政策，这个儿子曾骂父亲无耻，表示过要革出教门，并且公开声明要同他脱离关系。可现在又如何呢？他竟然从他老子手里接受了一系列房产。

我着手熟悉一下自己新的工作环境。库里连科领我去看位于城市另一尽头的志愿人员的第二栋宿舍。这里有两个航空机械师患病，一个患肺炎，另一个患疟疾。给这两人看完病，视察了厨房和检查完食物的质量之后，我们便前往机场。

这里有两个机场：小的紧挨着城市，大的离城很远。有一条很好的公路通往这两个机场。小机场仅驻有歼击机；大机场既有歼击机，也有轰炸机。大机场的西北角上是一座两层石砌场站建筑物，飞行场的南沿有一座砖砌平房，这是一所中国医院。我们所需的药品就是由这所医院的药房供给的。场站建筑物和医院之间是一些飞机库，一部分已被日军炸毁。这里正日以继夜地修理飞机。有一个飞机库前面的水泥场地已被一枚重型爆破炸弹破坏。

这机场系由意大利的一家航空公司修建，战前是一个民用机场。因此，航空医院为什么就设在机场旁边，这是可以理解的。令人无法理解的只是轰炸开始以前为什么没有把它迁移到较安全的地方。

场站建筑物前的水泥场上，支起一架凉棚。帘子和架子都是竹子做的。棚底下摆着一些桌子、椅子、躺椅、轻藤沙发。轰炸航空兵的飞行员、领航员、射击通讯员就在这里吃早饭和午饭，以及在空袭警报解除时在这里休息。

我和库里连科在场站建筑物旁的广场上正碰上一辆送午

饭的炊事车。人们就着汽水吃起饭来。突然出现了一片混乱。中国人一个个连忙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迅即朝那两辆随时准备把人从机场拉走的大轿车奔去。我也莫名其妙地随着向那边跑去，差点跌倒在那辆已经首先发动、人挤得满满的汽车底下。

“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我边跑边问那位我在沃利斯克工作时就已认识的航空机械师。他默不作声地往空中指了一指。原来，在不下两千米的空中，有十多架双引擎的轰炸机正从西向东迅速地往机场这边飞来。

“嗯，这是我们的‘喀秋莎’啊！”我纳闷地喊了起来。

谁也不信我的话。又继续乱了一阵。但我并没有看错：这的确是“CB”快速轰炸机，机组是中国人。

后来，有人对我这个新手解释说，按规定，自己的飞机飞过机场上空时必须在低空作近乎超低空的飞行。而这一点，中国飞行员显然是忘记了：这些轰炸机当时的飞行高度，恰恰是通常投弹的那种高度。此外，发现得也比较晚，几乎是在快飞临机场上空时才发现的，当时已来不及确定飞机的型号和国籍了。何况有过这样的情况：曾在类似的条件下把敌人的轰炸机误认为自己的飞机。

第二天，我来到大机场，库里连科则留在宿舍作归国准备，这时突然拉响了警报。这警报声晌晌停停，停停晌晌，一声高于一声。场站楼的旗杆上升起的不是粉白相间的条纹旗，而是一面红旗，这是空袭的信号。

大伙立即行动起来，飞行人员连忙向自己的飞机奔去，我们则乘大轿车离开机场。眼看着轰炸机为了免遭攻击，迅即起飞，扬起一股股浓密黄尘，紧接着歼击机也起飞了。从

城市那边很快传来了高射火炮频繁的射击声，随后便是在西安就已听惯了的日本飞机的轰隆声。这隆隆的声音，我早就熟悉了，到后来一听到飞机响，我就能准确无误地分辨出它是日本飞机还是当时中国空军所装备的苏、美、英、德飞机响声。这时，我头一个看见了日本的轰炸机。

这些轰炸机采取九机编队，从西面的高空成楔形队转弯朝机场这边飞来。轰炸机的上方是几十架担任护送任务的歼击机。飞机一飞临机场中央上空，便将无数颗炸弹一齐投下，机场上顿时象乌云密布似地冒起股股浓烟，瞬间形成一堵高高的参差不齐的烟墙。有些地方升起一道道乌黑的尘柱和火焰。随着日本飞机离去，在越来越低的轰隆声中，不时地传来一阵阵机枪点射声。这就是说，我们的歼击机已投入战斗。

机场上，歼击机飞行员索科洛夫正在等我。他在今天的空战中经受了一场战斗洗礼，降落时小腿负了轻伤。这时，他对我说：

“开头向敌人接近时是有点害怕，后来临到开始‘玩旋转木马’时，已顾不得害怕了。你必须及时躲开，不让敌机咬住尾巴。怕的是眼瞧着敌机向你迫近。”

索科洛夫不幸牺牲于1938年10月。那已是深秋时节，我在成都听说，汉口失守那天，有一架“C—47”客机从汉口起飞后在空中起了火。我二十二名志愿人员，其中包括索科洛夫，同乘这架飞机，都给烧死了。

到南昌第三天，我送别了M·K·库里连科。他坐的是一架美国的双引擎卫生飞机。当时坐卫生飞机其实也和坐客机一样，都没有降落伞，而且大家都知道，对这个红十字的标志敌人也是不予理睬的。然而，米哈伊尔·基利洛维奇还

是安抵汉口，由这里转乘英国公司的轮船沿长江逆流而上到达万县，然后乘一架苏联运输机飞往兰州。

我们每天很早便开始工作。每逢清早四点钟，宿舍各房间里所有的旅行闹钟都准时响了起来。这闹钟小巧得象个烟盒，我们大家都把它放在枕头底下。人们象听到警报似地立即起床，开开门，匆匆地洗嗽一下，穿好衣，边走边就着一杯红茶吃点饼干，连忙向等在门口的大轿车奔去。

通常，我总是随大家一起赶到机场。如果须留下来检查伙食部门或者早上巡视病员，那我就推迟一下乘那辆送早饭的汽车到达机场。

如果没有警报，大家都可以在大机场场站楼前的棚底下休息。很多人都是在这里再睡个够（飞行员的说法是“歇歇脚”），有的坐在藤沙发上，有的躺在躺椅上。对我来说这样的机会不多，常常有人来喊我看病和救护。

晚上回宿舍后，我们可以洗个淋浴，换上我们不在时为我们洗净烫平的短裤、汗衫和短袜。吃过晚饭，疲倦不堪的飞行员们赶紧躺下睡觉。如果没有病号，我也这样做。但如果有，特别是离我很远的那栋宿舍有了病员，那巡诊一次就得费一个半到两个钟头的时间。这样，我至少要到十二点以后才能躺下，再过三个钟头又该起床了。

凡属重病号和伤员，都送中国地方医院和军队医院住院治疗。我们这些苏联医务人员仅负责对志愿人员进行例行的巡诊。因此，我身边总是带着一个盖上饰有红十字的小药箱，里面装满了所有医生都熟悉的急救药品。当时中国碘酒奇缺，曾广泛用样子象碘酒的溴仿来代替。然而，象奎宁这种特效的抗疟剂，拨给我们的却不受数量限制。

本来，机上急救箱对于在迫降的情况下用来进行急救是

很有效的。然而，飞行人员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弃机跳伞时，一旦着陆受伤却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因为急救箱已被飞机带走了。因此，我向我轰炸机群和歼击机群飞行人员提出，每人身边必须带一个小急救包，内装药棉、纱布、一小瓶用毛玻璃塞或橡皮塞盖紧的碘酒、一卷消毒橡皮膏带和一盒防烧伤油膏。纱布绷带也可当止血带使用。这种急救包放在飞行服口袋里绰绰有余。

遗憾的是，当时志愿军医当中外科医生太少了。其实，任何一次战争，按照伟大的皮罗果夫的准确定义，它首先是一场“流行外伤病”。

在南昌大机场上，时常听人讲到一位姓古宾科的人。一会儿讲古宾科在某次空战中“击落鬼子机一架”；一会儿讲他“使一架‘三菱’冒了烟”；一会儿又讲他救了一个战友，如此等等。

“请告诉我谁是古宾科？”我向身旁的人打听。

“就是那个坐在沙发椅上看报的。难道你没听过他空中迎头撞击那件事吗？”经对方这一提醒，我才想起还在苏联时我曾在一张中央报纸上见过一则通讯，标题是《中国飞行员的功勋》。

而如今这位“中国人”就在我眼前。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留着平头，满头浅栗发，身体结实，神情严肃。当我同古宾科认识以后，我好容易才说服他把他的战斗生活中这件轰动一时的事讲了出来。

“现在我驾驶的是一架‘燕子’，”安东·古宾科有点勉强地说，“而当时驾驶的是‘黄雀’。这种双翼机，起落架是固定式的，速度不快，但机动性能好，装备四挺通过螺旋桨射击的机枪。

敌空军装备有‘九六式’单翼歼击机。这种歼击机装备有两挺大口径机枪，因而射程较远，但其射速却比我们的7.6毫米‘什卡兹’^{注1}机枪慢得多。‘九六式’是一种固定式起落架飞机，在速度上当然比不上我们‘燕子’这种收放式起落架较现代化的飞机。因此，我们所采用的‘双机空战’战术是：用‘И—16’追击和拦截敌机，并同其展开战斗。接着动作敏捷的‘И—15’及时赶到，发挥其机动性能牵制住敌机。在那一天，我参加了多次搏斗，进行好几次攻击，连连射击。”

“打赢了吗？”我禁不住问道。

“在集群战斗中，很难准确地说谁打下了几架敌机。在这次空战快结束时，我碰见了一架‘九六式’单机。我绕到它后面，瞄准好，便按了板机……机枪哑了，子弹打光了。显然，这时机长和航空机械师责备我点射时间过长，结果很快耗尽弹药，这是非常正确的。

但放过敌人又不甘心。我决定逼它向我们的机场迫降。加大油门以后，我便同它并肩飞行了。那飞行员见我离他这么近，脸都吓白了，东张西望起来。我紧握着拳头威胁他，连连向他打出朝机场方向下降的手势。这敌人明白了，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向下盘旋了一会便大角度地下降。我的飞机则紧压着它，把它牢牢盯住不放。

快要着陆时，‘九六式’突然猛地一拐，企图逃走。看来，他也没有子弹了。我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位重新追上敌人，决定进行撞击。

开始时我想切掉敌机的尾翼，但想了想，便决心用螺旋

注1. “什卡兹”是什皮塔利纳-科马尔尼茨基航空速射机枪的简称。
——译者

桨打掉它左翼的副翼。‘黄雀’经这一撞抖动了一会。‘九六式’立即往下坠落。我的飞机也因此象发疟疾似地颤动起来。我知道螺旋桨已经变形，随即降低发动机的转速，勉强维持这个速度降落了。

航空机械师们跑近一看，发动机架梁已经折裂，发动机勉强地支在上面。这说明发动机是在低空脱落的，在这种高度我是无法跳伞的。”

听完古宾科这番谈话，我满怀同胞的自豪感望着这位外表非常平凡的人。古宾科归国不久，大约过了一个月，我们在南昌收到的一张《红星报》上见到了这位飞行员的照片，下面写着：“苏联英雄A·古宾科空军上校”。他是继契留斯金式的人物之后第一批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

在一次空战中，我曾亲眼看到古宾科的飞机被打中。他一直延迟到最后才拉开伞，这时他发现敌机向他追来，用机枪向他射击。但安东·古宾科并没有慌张，他迅速地一把握住吊伞绳，加速朝下滑去，猛然间摇摆了一阵，背部和后脑先着地。他并没因此失去知觉，牢记敌机正在追来，赶紧将降落伞搂在怀里，隐藏在灌木丛中。这样使日本鬼子找不到这位英勇无畏的空战英雄，只好盲目射击。

一连几天古宾科向我诉说他头疼。我给他开了一个暂时免除飞行的假条，但他却一次也没有用它，一再讲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必须给别人作出榜样。安东虽然受了内伤，仍然坚持飞行和参加空战。

晚上，敌人通常不来骚扰我们，歼击机飞行员总是在机场上空练习飞行。一天晚上，我正大声称赞一个素不相识的飞行员在我们头顶上空巧妙地进行高级特技飞行。跟我并肩而立的古宾科带点儿责备的口吻对我说：“嗯，大夫，想必

您还从没有见过出色的飞行吧！”

第二天晚上，一架“И—16”正在机场上空盘旋。这飞机进行着各种最复杂的高级特技飞行，一个接着一个，诸如“横滚”、“殷麦曼”、“涅斯杰罗夫触头”等等。这些特技飞行大胆、准确，特别动人，象是在进行优美的“航空书法表演”。我在观众中来回扫视，就是没有见到古宾科。我马上猜到这空中的飞机肯定是他驾驶的。为了弄清楚，我还是问道：“谁在飞行？”“古宾科嘛！”人们回答我。

在结束这次飞行时，安东做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令人提心吊胆的弧形飞行动作：他由高空急转直下，发动机轰隆的吼着，后面拖着一股浓烟。飞机快落地时，又突然由急俯冲转为急上升。人们告诉我，这一机动飞行是古宾科所演练的新的高级特技飞行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一次，在古宾科顺利地完例行飞行之后，我问他：

“照您看，您取得战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

“那显然是因为我当过航校的特技飞行教官”，他答道
.....

1938年6月底，安东·古宾科乘那架飞往兰州更换发动机的“СВ”回国去了。回国以后，他曾在明斯克任白俄罗斯军区空军副参谋长。不久，《红星报》报道说，安东·古宾科在演练新的高级特技飞行中因飞机坠落而牺牲。我真不敢相信，这位优秀的飞行员，这么一位有毅力的人，一年以前还在遥远的中国机场上竹棚底下跟我谈笑风生，今天竟不在人间了。在中国天空的空战中他多少次出生入死啊，如今竟然在和平的环境中牺牲在祖国的土地上。

古宾科的名字将与世长存，永志不忘。他是空中撞击战，即在高空与敌开展惊心动魄白刃战的创始人之一。伟大

卫国战争期间，大批苏联空军英雄都以他为榜样，毅然果断地同法西斯飞贼展开了殊死的空中撞击。假如古宾科能活到同德国法西斯决一死战的时刻，那他肯定会以其惊人的飞行技巧，舍己为人的勇敢精神，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在保卫苏联领空的空战中表现出他在中国履行其国际主义义务时所表现出的那种英雄气概。

轰 炸 之 下

(1938年7—8月)

我到达南昌的第一个周末，经受了一次真正的战斗洗礼。将近中午时分，市警报器拉响了，接着机场警报器也呜呜响起来。听到警报，轰炸机随即起飞进入“待机空域”，歼击机也立刻腾空迎击敌人。但有一架歼击机却是例外，那是新任大队长雷松金的飞机发动机象有意作对似地捣起乱来。场站楼旗杆上的那面红色警报旗已经换成了一面黑旗，这是敌机接近的信号。所有由于某些原因未能飞离或者来不及离开机场的人都向我们这辆救护车奔来，以便赶紧远离飞行场。唯独雷松金仍然在那里徒劳地试图使发动机发动起来，而我呢当然认为，只要他未能起飞，或者他丢开这发生了故障的飞机和我一块离去之前，我无权将他一个人留在这空空如也的机场上。这时，离敌机出现只剩很有限的几分钟了。

就在这时，一辆起动车从机场很远的角落朝雷松金那边开去。“И—16”的发动机嘎嘎地响了起来，吼了一声，冒出一股股浓烟，又怒吼了起来，雷松金终于起飞了。起动负责人库兹涅科连忙乘一辆小车离开，接着那辆吨半起动车也随着他开走。在最后面“压尾”的就是我们那辆老掉牙的低

速救护车。

“快点，快点！”人们催促着司机。这司机是一个瘦瘦的中国老人。其实用不着催促，他已经在竭力使这辆残废汽车尽可能跑得更快一些。

这汽车好容易才开到机场门口，拐向左边那条公路，加足油门沿机场篱笆驶去，但突然又停住了。人们赶紧跑下汽车，向四面八方散开。我一时莫名其妙，抬头顺着有人指示的方向一看，西面空域约两千米的高度，发现了三个九机编队的“三菱”双翼轰炸机。那些样子酷似处死刑用的十字架般的银白色飞机，编成整齐的“楔形队”进入了机场上空。

转瞬之间，铺天盖地是一片不可思议的隆隆声。几十颗炸弹同时在近处爆炸，长时间的轰隆声震耳欲聋。在一阵阵小型杀伤炸弹的爆炸声中，可以清楚地听出重型爆破炸弹的爆炸声。整个地面都在颤动，胸膛受到猛烈冲击。虽然炮声隆隆，我还是听见那致命的弹片发出吱吱的啸声向四面八方飞去，这声音真有点象一阵狂风从破墙缝里穿过似的。

轰隆声突然停止，出现了离奇的沉寂。我爬起身来，抖了抖灰尘。机场篱笆外面升起了大团棕黑色硝烟。随着日本轰炸机朝东面鄱阳湖方向飞去。在一片轰隆声中间开始夹杂着机枪的嗒嗒声。这是我们的歼击机投入了反击强盗的战斗。

不久，一架歼击机从空战战场返航，飞抵机场上空开始降落。很可能需要医疗救护，我立即前往机场。附近没有救护车，只好搭航空机械师的车把我送到机场。

机场因遭到破坏和火灾，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出口旁边那座木头房子被炸成一堆破烂木头；跑道起点旁边的油库正冒着红黑色的熊熊烈焰；一垛垛盛满汽油的新油罐油桶在爆

炸，在燃烧；场站楼几乎一半被炸毁，楼顶上那面黑旗垂在被折断的旗杆上。

从空战战场返航的那个飞行员已经着陆，一下飞机就向我们迎面跑来，一边打着手势，一边喊着：

“赶快回去，第二拨又该来了。”

我们带着飞行员，调转车头，向回驶去。路上这飞行员向我们说：

“滑油箱被击穿。另一颗子弹打在仪表板上，横着弹了回来，打在我的肚子上，我象狠狠地挨了一拳。幸好那厚实的跳伞背带把我救了。”

几分钟后发出了解除警报的信号。这就是说，敌人第二拨轰炸机没有上我们这边来，到别的地方轰炸去了。

这时，我们又重新返回机场。敌机扔在场站楼前广场上的炸弹，把凉棚炸得无影无踪，家具也炸个粉碎。广场的水泥场地上满布杀伤炸弹的弹痕：一个个浅浅的弹坑周围堆积着水泥碎块。不远处，一架通信机给烧掉了，因为空袭警报发出后没来得及离开。前面起跑跑道上被一颗重型爆破炸弹炸出一个大弹坑。我想走上前去看看。刚刚绕过正在燃烧着的油库，右后方突然迸发出一道强烈的火光，接着是震耳欲聋的一声爆炸，我差点被这炽烈的气浪冲倒。正挑着土前来填弹坑的中国人赶紧扑倒在地。恰尔麦兹工程师从刚刚发生爆炸的地方向我跑来：

“大夫，看看我的头怎么啦？”

原来，这工程师的头被爆炸时抛出的一块土块打伤了。幸亏震伤并不严重。至今我还不清楚，这是日本的一颗定时炸弹爆炸呢，还是附近我们自己的一颗炸弹因汽油着火而给烧爆了，因为当时机场上多处堆放着一箱箱百公斤航空炸弹。

很少有不发空袭警报的日子。我们已经学会了一套能在警报器拉响之前就判断出有无空袭危险的本领。比如，“空情主任”屋子里的电话铃只要一响，棚子底下休息的人们便会立刻警觉起来。继电话铃响以后，勃拉戈维申斯基总是一面从场站楼下达一些指令，一面习惯性地拿起那件皮短外衣往左肩上一搭。于是大家也就明白了：空袭警报。

我曾多次看到，当警报器呜呜地响了起来，这城市白昼生活是怎样停顿下来的。街上转眼间空无一人，一切活动都停了下来，城市的嘈杂声没有了，很快就感觉到这异乎寻常地降临在白昼的万籁俱寂中包含着何其紧张的气氛。街上连人影都没有，甚至连狗吠声也听不见。一切都躲避和隐藏起来，人们沉浸在敌机来袭的担忧之中。而当那解除警报信号徐徐发出后，整个城市又复活了，路面上又响起了步履之声，街上和广场上出现了行人，接着，商人的叫卖声，汽车的喇叭声，人声鼎沸，所有这一切又重新汇集成一个和平的闹市。

飞 贼 的 下 场

我们离开南昌前不久，我亲眼见到一架日本侦察机对南昌大机场贸然进行突袭的情景。那是一天下午，它悄悄钻进高空，乘观察哨没有发现，突然向机场俯冲下来，瞬间又作超低空飞行，由西往东横向掠过机场，随即急转爬高，就这样一弹不发地马上消失不见了。

我们的飞行员立刻朝各自的歼击机奔去，边跑边戴上飞行帽，但那架飞机早已无影无踪了。

“飞得真快！”尼科拉延科说。

大家反驳他说：

“从这种高度加速，一点也不稀奇。”

由于谁也没有见到这架侦察机的起落架，所以大伙只能凭飞速推测这是一架‘九七式’歼击机（几天以前中国空军的战利品中发现有‘九六式’改进型歼击机的残骸，这是一种带收放式起落架的、改名为‘九七式’的歼击机）。

第二天，日军对南昌小机场进行袭击。敌机从超低空进入，中国观察哨又未能发现。我们的几架歼击机随即起飞迎击敌人。其中有一架敌机突然转弯，朝我们宿舍这边飞来，低速从我们上空掠过，接着以超低空飞行朝赣江大桥方向飞去。这架歼击机显然打算炸这座大桥，但在那里遭到了中国高射炮兵的迎击。一连串的曳光弹和小口径弹迎面射去，形成一条条白色链带，以看来很慢的速度相互交炽着，一会儿在敌机的肚皮底下爆炸，一会儿又在它座舱上方爆炸。‘九五式’显然被这一招吓怕了，慌忙东逃。

这时，在城市南郊机场右面和大桥左面不太高的上空，一架“И—16”同一架‘九五式’展开了空战。经过短时间周旋，敌机急转爬高，接着一个急转弯，居高临下用机枪朝“И—16”打了一个点射。“燕子”当即跌落。看样子敌机赢了。但它却忽然间“垮了台”，紧擦着“燕子”朝地面栽了下去。

飞行员沙拉伊驾着这架“И—16”顺利着陆。机身弹痕累累，一发子弹正好将弹药箱击穿，飞行员双腿因此多处受伤。我用很长时间才从他伤口里用钳子取出了大量锌铁碎块和铜弹壳破片。

事后，从搜出的文件得知，这个被击毙的日本飞行员原来是一名真正的王牌飞行员。他的飞行地图上用彩色铅笔标满了他飞过的战斗航线，从安庆一直延伸到长江。我们在这

个飞行员服装上找到了一根长长的象电报纸条似的布带子，上面写满了汉字。翻译官读过后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佛教寺的和尚写的一道“护身符”，有这么几句咒语：“敌弹尔勿畏，危险尔勿惧，尔将永生……”再往下还是这么几句反复重复。深夜，尼科拉延科接替勃拉戈维申斯基的班以后，用电话向汉口П·Ф·日加列夫汇报了这次空战情况。

……我两名顾问突然来到南昌励志社。这俩人都是不久前由阿拉木图到西安时我的旅伴。他俩刚刚由前线回来，在和中国军队一块撤离九江时，途中遭到包围，后在一名中国翻译官的协助下，克服重重困难，越过高山险壑，连日来忍饥挨饿，总算突出了包围。到达这里时已经风尘仆仆，满脸胡须，疲惫不堪。经过几天休息之后，我们这两位同胞便由一名向导带路重返前线。

……由于连续不断同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进行空战，驻南昌的中国空军实力逐渐遭到削弱。到7月底，日军对南昌两个机场的目标实施了密集的突击，开始时仅使用歼击机从超低空进入，实施攻击。我“燕子”和“黄雀”支队接到警报后随即起飞，由于不能同地面保持无线电通信，只好徒劳地在高空巡逻，以便随时同敌人展开空战。而他们却不知道，恰恰这时敌人正在我机场上空胡作非为。

8月初，中国空军认为，再在南昌呆下去已不适当了，决定转场到汉口。飞机自飞汉口，机场地面设备则用汽车运输。

我们那位“非编”翻译萨沙被留在南昌。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山东大学的学生。他是我们翻译官当中最年轻的。这位青年之所以取了俄国名字，是因为这个名字与他原来的中国名谐音。从他那均匀的身材和那张讨人喜爱的开朗的面庞来看，萨沙真有点象一个温柔的少女。萨沙对苏联的一切

也颇感兴趣。他爱看苏联电影，闲时总是阅读俄文书刊和苏联报纸。他盼望什么时候能到苏联去看看。他办事非常认真负责，不管到哪里，总是寸步不离地跟着勃拉戈维申斯基。勃拉戈维申斯基回国时赠给萨沙一块怀表留念。

我们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了萨沙。他送给我一张小小的照片，上面写着“赠给俄国友人”。

不久，我们这支不大的车队便上路了。难忘的赣江大桥已被抛在后面。展现在左边的是屹立在汉人公墓西北边缘的一座座不太高的金顶佛塔。公墓左边远处的小丘上是火车站。有一天，就在这车站的月台上，我遇到了一小队武装警察押送一个身穿黑工作服的中国人，这人拱着腰，两手被倒铐在背后。翻译告诉我，被逮捕的是一个日本特务。也正是在这里，我初次看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国军运列车，士兵们头戴法式军帽，背着一顶宽边草帽和一双草鞋，坐在敞蓬平板车上，一手打着伞，一手摇着蒲扇。

原定在长沙宿营，但我们未能在天黑以前赶到这里。晚上在山区，我们遇到了一场热带倾盆大雨。我们乘坐的是敞蓬吨半卡车，浑身都淋透了。汽车挂在头档上小心翼翼地前进，车轮不时地在泥泞中打滑。道路弯曲盘旋，忽而急剧上坡，忽而突然下坡。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远方闪电一亮，又突然变得通明耀眼。瞬间，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梦幻般的图景：山岩嶙峋，阴森可怕；黑暗深渊紧靠山路，令人望而生畏。

拂晓才到长沙。由于一夜未睡，我们在这里把衣服弄干，休息一天，第二天继续前进。途经一片片美丽如画的亚热带丛林。中午时分，我们在一条静静的小河边休息片刻。河边有一座空荡荡的古塔。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中国临时首都汉口的郊区，驱车驶进苏联志愿人员宿舍大院。在“医务室”我遇见了托罗波维奇。从他那里听到一些消息：空军大队长П·Ф·齐加列夫已回国，前来接替他的是Г·И·特霍尔。他不久前参加了西班牙战争，年纪虽轻，但身经百战。

我又开始天天到机场去，每晚进行门诊。我和托罗波维奇每天要到一家英国大夫斯金纳私人医院去一两次，我们常常把需要住院治疗的伤员送到那里。

其中有一位伤员，是个宽肩膀，身材魁梧的领航员，从一架燃烧着的“СВ”跳伞才幸免于难，脸部和两手被烧伤。整个脸部，除有眼镜和飞行帽保护的部位外，都受了一级灼伤。他一边指那伤痕斑斑的脸，一边向我们问道：“现在我妻子已经知道了吗？”

自从中国空军主力由南昌转场到汉口以后，日本轰炸机在歼击机的护送下对这一地域的袭击更加频繁了。其中一次正发生在我由机场回来的途中。路过那个当中有纪念碑的街心公园时，清楚地看到它背后燃起了大火。一个大型木板货亭被炸弹炸着，燃起熊熊烈火。对面公园的栏栅旁边，一架被击毁的“三菱”大肚子银白机身坠落在那里。

另一次，日军又来空袭汉口，当时我们正在机场。午饭快结束时，电动警报器突然拼命地号叫起来。轰炸机赶紧进入“待机空域”，歼击机立即起飞迎击敌机。机场顿时空无一人。我随一个航空机械师小组朝机场附近西湖堤坝那边奔去。

很快传来了非常熟悉的日本飞机的嗡嗡声。这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不一会从云层里钻出来二十架带双垂直尾翼的双发动机轰炸机。

为了不让我高射火炮射中，敌机象往常一样，从太阳方向飞来。炮弹一齐朝空中射去，敌机周围出现一团团白色硝烟，但不是靠前，就是靠后，忽而偏高，忽而偏低，逐渐在空中弥漫消散，始终不能使敌机遭到重大损失。

第一个九机编队把炸弹投在机场中央。飞行场顿时笼罩上一片黑褐色烟云，仅几秒钟功夫，却令人感到时间很长。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同第二个九机编队的炸弹爆破声汇成一片。继第一个九机编队之后，第二个九机编队成左梯队朝我们这边飞来，几乎把全部炸弹一齐投在我们头顶，但因惯性作用，炸弹都落在机场西段，而那里在一道相当密实的环形土墙后面正是飞机掩蔽部，停有几架待修的轰炸机。

我们所选择的一个避弹所很不安全：敌人完全可能把一部分爆破弹抛在土坝上，将堤坝炸毁，这样湖水经缺口涌出，就势必把我们冲走，将机场淹没。

解除警报之后，我们在返回机场的途中看到飞机掩蔽部四周出现了许多弹坑，但飞机没有直接中弹，隐蔽在里面的飞机没有受到损失。

这时，我们的轰炸机都已回到停机坪上，我们的歼击机同敌人的歼击机展开一场力量悬殊的空战之后也陆续返航。大队长慢吞吞地走下“燕子”，低着脑袋，谁也不理睬，走进机场值班室，双手支着头坐在那里。凑在他身旁的人也都默默不语，猜想着准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大队长最后挺起腰来，拭干眼泪说：

“我们有两位战友牺牲了。”他说出了他俩的名字。

“只顾撕杀，不顾安危，同自己的机群失散了。他俩的飞机在湖的上空被击毁。两人跳了伞，但敌机向他们扫射。待我飞近他们时，他俩已被打死。我眼看着他们沉进水里。”

姓彭的主任翻译官在我耳边低声地说：“一个人为自己的祖国捐躯，这好理解。可你们的人却是为我们的事业而献身……这当然值得崇敬，但终不免有点令人难以理解。”

我回答他说，“1918到1919年，中国志愿人员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在我们国内战争的战场上也是同样流血牺牲。他们在同白匪帮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英勇斗争中曾奋不顾身地支援了红军。”

转 调 衡 阳，雷 松 金 之 死

（1938年8—9月）

到8月中旬，日本空军对首都的袭击越发频繁，航空委员会决定将空军主力转移到湖南省衡阳市机场（位于汉口和广州之间）。

托罗波维奇留在汉口，我随飞机飞往衡阳。飞往衡阳的三架“CB”的飞行人员天还没亮便早早来到机场。临别前的那天夜晚是令人不安的。就在几小时以前，敌机轰炸了机场，炸出了不少深深的弹坑。工人们借安装在几辆卡车上的弧光灯的照明，匆忙地把跑道上的弹坑填平。他们一直为我们这次起飞忙得不可开交，担心第二天一早敌机再次来袭。

我从未坐过“CB”。机上仅有两名乘客，一名是我，另一名是航空机械师。整个飞行过程中，我们一直注视着射击通讯员那副神态：他不断地转动机枪，机警地盯着天空。我突然发现射击通讯员俯下身来，用下面那挺机枪打了个短点射。我的同伴告诉我：“我们正在洞庭湖上空飞行。这是射击员为检查武器朝水面打的！”

……我们住的是一栋非常舒适的欧式两层楼房，院里栽满奇花异木，四周围以高高的铁丝网。从我那间二层楼房窗

户口望去，可以看到北京——汉口——广州铁路线上的一些车站设施。铁路那边便是机场。从二楼南面阳台极目平视，可以望到河对岸的市容。不远处的环形掩体内隐蔽配置着一个高射炮连。高射炮兵每天长时间进行操练，眼睛紧贴着接目镜。不断地转动测距仪的大镜筒，“捕捉”掠过的飞机。

在衡阳机场，除我国的战斗飞机以外（当时，在南昌和汉口同敌优势兵力展开艰苦卓绝斗争之后，我快速轰炸机群已大为削弱，歼击机群更是微不足道），还有几架美国豪克公司制造的战斗机。这种飞机装备有大口径机枪，体积庞大笨拙，航速很低。因为它的发动机响声特别大，我们飞行员给它取名为“乌鸦”。

这是中国从美国买来的几架已经过时的战斗机。为拆箱和装配，美国派来一个航空机械师小组。组长是个年轻人，栗发，留英式分头，脸刮得光光的。由于闷热不堪，他常常只穿着短裤、翻领短袖衬衫或网格衫，在机场上溜达。

每当我“CB”战斗返航着陆时，这位美国人总是情不自禁地连声称赞：“All right, all right!”（真好，真好！）

这位工程师有一架双座的双翼小飞机和一名私人飞行员。这个飞行员是个敦实、有点驼背的人，手显得很长。一天，这个笨小伙子着陆时“目测高了”：飞机来了个“拿大顶”，栽到深沟里摔坏了。这倒霉的飞行员头擦破了，工程师吓了一跳。

衡阳机场跑道之短，即使对于轻型飞机来说，也有危险。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轰炸机的战斗飞行从未发生事故，显然是由于我飞行员技术高超。

降落场条件差，终不免时而带来严重困难。机场主人决

定扩大机场面积，加长跑道。几百名头戴宽边草帽的中国人开始用丁字镐和圆锹把机场西北面的一片高地铲平，用独轮手推车把土方运往机场东边的一道深沟里。一个监工的负责给每辆装满泥土的手推车发签条，凭这些签条计算挖土人数。午间休息时，挖土工人便坐在手推车上用筷子或干脆用手吃起饭来。每当发出空袭警报，他们就赶紧推着空车离开飞行场。

这机场边缘是一片荒芜的古坟地。经常发现厚厚的棺材，里面装着已经碳化的尸体（中国安葬死人时总是在尸首上撒一层生石灰）。机场面积靠铲平高地填补低处的办法而逐渐扩大，土松的地方靠人工用粗圆木夯实，再由几十个人拖着沉沉的石碾压平。

敌机投在这里的炸弹常常不爆。这些哑弹深深地钻进松土里，留下了祸根。

即使落在实土上的日本炸弹也有不爆炸的。在我们用餐和休息的棚子附近就有这么一颗炸弹埋在土里。没有任何把握说它不是一颗随时都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我们决定消除这个隐患，把水灌进洞里。军械师沃洛佳·皮克冒着危险把这颗凶弹刨了出来，用拖拉机将它拖到地面上来。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消除了这一隐患。

后来，凡场地上出现不爆弹所形成的洞孔，解除警报之后，机场警卫士兵便马上在其附近插上一面小红旗。这些士兵经常是蹲在机场周围的小掩体里，轰炸时身临其境。因此对轰炸灾难的感受既直接又深刻。每当敌机轰炸之后，把他们从掩体里弄出来时，不少人都处于垂危之中：有的耳震聋了，有的震伤了。他们所担负的任务，首先是扑灭炸弹爆炸所引起的火灾……

从我们宿舍窗户向外望去，是一片菜园，园子里有好几个显然有意挖的池塘。这些水汪汪的池塘，常有怕热的水牛久久地呆在里边，露出那宽头大角。

有时可见这些塘边有一种独特的水车在车水。水车架用四根立柱和几条横木做成。两根前柱比后柱的两根要高一些，前柱和后柱之间用横板相连结。两后立柱之间安装一块横板，可供几个人坐在上面。前立柱的下方装有一个转轴，中间有一个齿轮，两边有几块蹬板。这水车架装在池塘边上。水车齿轮底下有一个长约十米的正方形截面的木槽一直通向水底。木槽末端又装着圆形转筒。从上面的那个齿轮一直到底下的那个转筒，套着一条装有许多舀水叶片的传送带。

从早到晚，在一个用竹竿支撑着的布棚底下，老是有三个赤胸露背的中国人背着水塘坐在水车架上，双手靠在面前的横杠上，打着赤脚不停地踏着蹬板，通过齿轮带动传送带，舀水叶片便接连不断地把水从几米深的池塘里带上来，注入水渠。每当池塘的水被车干时，可以借机拣到几筐相当大的鱼。

……我们励志社的社长姓魏，他身材瘦削，中等个子，留着平头，外出时从来不戴帽子，身着草绿色的短袖翻领衬衫和同样颜色的短裤，脚穿一双快到膝盖的长筒袜子，和一双尖头漆皮鞋。

他很少有哪天不进城去。据说，他在城里不但有公务，而且经营着一个很能赚钱的私人企业。一次，魏某在赞赏正返回宿舍的苏联志愿人员雄纠纠的英姿时，对我说：“大夫，您瞧你们的人多魁梧、多劲、多健康！他们当然因为没有女人而苦闷。我们要不要请些姑娘来开个跳舞晚会？您看怎样？”这个善于钻营的商人当即遭到我断然拒绝，后来

他再也不提这类事了。

苏联一个航空工厂派来的军械小组在我们这里工作了十多天。他们整天整天地用“И—16”装备的“什卡兹”机枪进行试射。据飞行员的评价，机枪经改装后，我歼击机的战斗性能更加提高了。

这里顺便提一下，当时，日本、美国和德国的机枪射速还远不如我们的“什卡兹”。“什卡兹”的射击声连成一片，根本听不出有射击间隔。用“什卡兹”射击时，其声音就如同一大幅特别结实的棉布从高处拉紧，猛地一下撕裂开了似的。夜晚，曳光弹形成一条绵亘的火链，而每两发曳光弹之间还有好几发不曳光的看不着的弹丸呢！

当时，不少外国军队都很希望有这样高速的机枪。日本人曾试图根据他们（从所击落的中国飞机上）得到的“什卡兹”进行仿造，但没有成功。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超级耐热钢材的制法。用日本钢材造的枪管装在“什卡兹”上，打几梭子子弹就熔化了。

随着中国空军转场到衡阳，敌机对这个城市的袭击也接踵而来。这时，由日空军基地到衡阳的距离已超出‘九六式’的行动半径，日本“三菱”轰炸机只能在没有护送队的情况下来袭。果然不出所料，8月18日，日本飞机又飞来“庆祝”我们的空军节。接空袭警报后，我们随即乘车出城。敌机好久没有露面。看来，他们在故意拖延时间，以便打乱我飞行员的计划，待我歼击机把燃料耗尽不得不着陆时，再来动手。这样，我歼击机不但威胁不着敌机，本身反而成了轰炸的牺牲品。

我们当时曾判断：敌机已去轰炸别的地方，不会到我们这里来了。大家正向隐蔽在灌木丛中的汽车走去，准备回

去。就在这时传来了熟悉的隆隆声。很快出现了二十七架轰炸机，分为三个九机编队，成楔形队，朝机场方向飞来。

这时，我们十分惊讶，看到机场上空紧挨敌轰炸机的下方，有我们一架“CB”在单独低空飞行。我方飞机根据空袭警报起飞，已有长时间在“待机空域”巡逻。这架飞机正是从那里返航，想通过超低空飞行弄清机场上是否升起了准许着陆的信号旗。

机场上没有发现这种信号旗。但场站楼旗杆上挂着的不是红旗，而是一面寻常的粉白条旗在飘扬——“解除警报”。这飞行员带着这个好消息返回“待机空域”，以通知其余飞机返航。然而，突然间出现了“辟谣”：右边闪出了一道轰炸火光。机场顿时乌云密布，烟尘翻滚，发出了惊天动地的轰隆声。爆炸波猛然使“CB”向左摇晃。这飞行员在未完全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处于“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只得猛拉方向舵，加大油门。

机场上等待我们的是令人悲伤的消息：空战中两架“豪克”被击落。两名中国飞行员都被打死。第三个人颞部受重伤落到地面。第四个人，也是个中国人，是在地面上被打死的。

在场站楼废墟旁，我一群志愿人员围着一个人，听他谈话。凭嗓门判断，这谈话者是一个外号叫“二胡子”的航空机械师。他从头到脚浑身沾满了污泥，谁也认不出来了。

“大夫，您瞧”，这航空机械师冲口对我说，“我这模样够瞧的吧？险些比这更糟……”

原来，他当时正在机场尽头的深沟边上修理一架飞机，深沟底部是一片稻田。听到空袭警报信号，这机械师连忙向场站楼奔去，那里每逢警报时总是有一辆大轿车载着地勤人

员离开机场。但他来晚了，汽车已经开走，于是他又返回去，想顺着稻田田埂越过深沟，然后再爬上对面斜坡的一个坚固的防空洞。

但不知是谁的过失，机场上错误地发出解除警报信号，人们纷纷离开防空洞时，这个“二胡子”也随着朝他刚才搁下工作的地点走去。他走到沟底便望见了正在低空飞行的“CB”。这表明警报确实已经解除。这时，机械师突然听到在“CB”的隆隆声中夹杂着日本轰炸机的响声。

一个赤脚的中国工人，头戴草帽，肩挑一副空筐，喘着粗气，追过航空机械师。离防空洞只差几步了，传来了投弹的啸声，在通向斜坡的羊肠小道上，机械师和中国人之间突然迸发出一道火光。一阵灼热而震耳欲聋的气浪将机械师冲倒在地，他往下滚去，接着另一颗炸弹落在那肥沃的稻田里，一团团沉甸甸的稀泥飞溅到他身上……

半小时后，我前往现场察看了一番。一个个边上已被烧成红褐色的黑弹坑已积满了水。弹坑周围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泥团。在通往防空洞的小道尽头，有一个炸弹炸出来的浅坑，周围的草已被烧光，扁担和箩筐被炸成碎块，草帽被炸得稀巴烂。当初，这工人要是在炸弹落下时不追到我机械师的前面，恐怕只不过满身弄脏罢了。

顺着宽宽的深沟走回来时，我看到头戴圆锥形草帽的农民已在平安无事地劳动，正在收割水稻，宛如刚才那致人死命的弹片根本没有打这里飞过似的。他们用镰刀割下稻子，随即脱粒：把稻子捆成扫帚般大小，不停地在--一个大木箱边上摔打着，每摔打一下，稻穗上的谷粒便象下雨似地落进木箱里。

几天以后，半夜里警报器又拉响了。我们照例乘车出城

躲避。周围一片黑暗，万籁俱寂。突然，在黑漆漆的城里一个地方闪现出一丝亮光，猛然间冒出了熊熊火焰。一场火灾……而敌轰炸机随时有可能出现。如果不马上扑灭这火灾，它肯定会把这城市 and 那河流照得暴露无遗，给敌机提供准确的地标。由此不禁猜想到：火灾和敌机来袭时间上的吻合，这决非偶然。这正好说明为何在这么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武装干涉者竟敢贸然来袭！

待敌机出现时，火灾已蔓延开来。敌机乘这通红的火光极其准确地轰炸了机场。后来查明，得克萨斯股份公司的一个油库烧着了。这火灾一直持续到清晨。

第二天，航空委员会派来的一些中国人，请我无线电专家帮助他们破获曾不断向空中发出“我是女人！我是女人！”的探测信号的一个秘密间谍电台。人们告诉我，纵火烧毁油库的日本奸细第二天便被抓到了。

每当夜间空袭，我们不得不离开市区，整夜整夜地呆在郊外，身边总是带着防寒衣服，以便在两次轰炸之间随便在哪儿睡一会儿。我们三五成群地聚集一起，低声地唱了起来，一往深情地唱着乌克兰歌曲（我们中间不少人是乌克兰人）。航空机械师谢尔戈丘克一天对自己的老乡开玩笑说：

“小伙子们，我常常一边惊奇地瞧着你们，一边琢磨着你们是打哪儿到这儿来？”接着他自己又答道：“我们从遥远的乌克兰到这里来，为的是给中国人民谋幸福！”

苏联报纸和杂志到我们这里要晚一个多星期。我们总是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有时甚至怪有趣地读着有关劳动人民星期天如何休息的报道，出神地望着休假者如何在疗养区海滨浴场欢度假期的照片。所有这些同我们这里动荡不安的生活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在衡阳，我们从报纸上看到关于优秀飞行员B·П·契卡洛夫牺牲的消息，还读到格里佐杜鲍娃、奥茜品科和拉斯科娃这个妇女机组英雄般地飞往远东的报道。

我轰炸机群的战斗行动是由西多尔·瓦西利叶维奇·斯柳萨列夫指挥的。他是个瘦高的淡黄发男子，具有很好的军人风度。他话不多，对自己和部属都很严格。几个月来，我方几个快速轰炸机大队（有苏联机组，也有中国机组）在斯柳萨列夫指挥下，对日本武装干涉者所占领的华南地区一些重要目标进行了多次大胆的突击。

机场西南角有一个孤零零的一面坡的竹顶小棚子。这是我们集合和研究讨论战斗行动的场所。我曾记得C·B·斯柳萨列夫在一次讲评时这样说：“日本的‘九六式’歼击机改装成‘九七式’以后，时速提高了二十六公里。现在我们的‘卡秋莎’已很难摆脱它。空战变得复杂起来。但飞行时如能保持队形应有的密度，很仔细地进行对空观察，巧妙地使用武器，也还是可以战胜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

军事形势更加复杂。日军已逼近汉口，中国政府不得不迁都重庆。Г·И·特霍尔、政治部副司令叶尔绍夫、参谋长M·H·格里戈里叶夫等我方几位首长以及随从医生C·Я·托罗波维奇坐汽车来到了衡阳。途中，在长沙附近某地，车队曾遭到空袭，幸好一切安全无恙。斯捷潘·雅科夫列维奇·托罗波维奇同我住一间房子，其余的人住在湘江岸边另外一所较宽敞的楼房内。

这时，英国医院业主斯金纳大夫也来到了衡阳。形势越来越紧，他认为继续留在中国已危及个人安全，急着赶到广州去，以便尽快飞回英国。

九月中旬，我和托罗波维奇又见到了П·M·茹拉夫列

夫，他回国短期休假以后又来到了中国。这时，歼击机群政治副群长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马蒙托夫负了重伤。我们三人（茹拉夫列夫、托罗波维奇和我）轮流去市医院内科在他床边值夜班。这里经常听到轰炸声。伤员的病情继续恶化。于是决定请兰州医院的一位外科大夫来会诊。

外科大夫瓦西利·伊万诺维奇·特罗菲莫夫很快便从兰州坐飞机到了这里。在此以前我只是久仰这位大夫之名。我们认识之后很快便成了朋友。现在，我们这里有了三个塔什干老乡：托罗波维奇、特罗菲莫夫和我。

经会诊，不需要给马蒙托夫做手术，特罗菲莫夫准备回兰州去。但情况有了变化：没有顺路的运输工具。瓦西利·伊万诺维奇只好暂时留在这里。我们继续轮流在马蒙托夫床边值班（这时特罗菲莫夫也参加了）。

有一天，我下夜班之后，正赶上早晨空袭警报而好久不能返回宿舍。敌机这次轰炸了市区，将一座原先已遭破坏的市发电站炸毁。这时，茹拉夫列夫来找我。我们一块刚离开医院，在一条街的拐角处见到人行道上躺着一个中国人。走近一看，他腹部给炸伤了。我们立即把他送往医院。彼得·米隆诺维奇留下准备参加手术。而当我正要过河去时，警报器又响起来了。

死神简直就在你身边晃来晃去。在敌机对衡阳进行的一次昼间袭击中，一颗爆破炸弹朝机场附近的一个防空洞那边落去，正好掉在防空洞倾斜出入口和那堵沙袋护墙之间的一块窄窄的空地上。防空洞里挤满了机场工作人员。由于这次爆炸，几十人受伤，不少人死亡。

继这一不幸事件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满载着中国飞行人员的敞蓬卡车驶过机场附近无人

看管的铁道路口时给列车撞翻了，造成十二人无谓牺牲。而当时中国空军干部本来就为数甚少，竟然又遭此不测！

和我志愿人员并肩作战的许多中国飞行员表现了真正的英雄主义和高度的飞行技巧。

一天，我们应邀参加在励志社新邸举行的宴会。我们这些苏联志愿人员同中国飞行员交错地围桌而坐，席间频频为反对武装干涉者共同斗争中的胜利干杯。

中国一位姓王的勇敢的歼击机飞行员参加了这次宴会。两个月前在汉口机场时，我就和他认识。他被我志愿人员团团围住，谈起他战斗生活的一个片断：“我往上看去，尽是敌人的飞机！……”讲到这里，姓王的飞行员眯着双眼，连连地摇着头，说明当时在他上空敌人的歼击机多得是。

在衡阳这里，这位勇敢的飞行员和我们的奥尔洛夫、雷松金两位歼击机飞行员曾多次对敌人阵地进行大胆的“猎击”，有一次还差一点遇难：迎面气浪把他那架飞机的发动机罩给掀开了，姓王的飞行员通过巧妙的机动才得以操纵住飞机。

这一期间，敌机仍不断来袭。

一天夜里，大队长亚历山大·伊拉里昂诺维奇·雷松金同其部属叶甫格尼·奥尔洛夫决定以双机同日本轰炸机展开空战。

晚上十一点钟左右，一轮明月当空，我们接空袭警报信号后便驱车前往机场。我带着那个从不离手的急救药箱，同雷松金并排坐在一辆小车里。他默默不语，陷入沉思，偶尔不知何故用手电筒照了照那双穿着漆皮鞋的脚。下车时，亚历山大·伊拉里昂诺维奇说了一句话，这话是對我说的，但看来也是对他自己思想的一个回答。

“法国人常说：‘打仗就打仗’，而我们是俄国人，还要再加上一句：‘要么立功受奖，要么战死疆场！’”

白天非常熟悉的机场，在幽灵般的月光照射下变得面目全非，几乎认不得了。场站楼废墟旁边停着几辆载重汽车，车座上装着大功率的弧光灯。雷松金和奥尔洛夫已穿好全套装具，系着降落伞，背着图囊，手持信号枪，通过翻译官同机场主任杨将军商定：

“借月光起飞。不用弧光灯。待敌机轰炸完毕，高射炮兵应立即停止射击，探照灯应立即指示敌机飞行方向。请求着陆，使用白色信号弹。”

一分钟后，我和团政委伊万·伊万诺维奇·苏林看到，在银白色的月光中，两架圆头“燕子”猛地加足马力，相继从我们面前疾驰而过，接着爬高，消失在夜空中。

根据越来越远的发动机声音来判断，这两架歼击机是朝城市西南方向飞去。突然，一道红色曳光弹的闪光从天空朝着地面射去，并传来了一个机枪点射声。继而从另一方向又传来了第二个机枪点射声，随后是第三个点射声。后来我们才知道：雷松金和奥尔洛夫是受中国指挥部的委托，利用这种办法“灭掉了”衡阳各地的灯火。在严加灯火管制的情况下竟有人继续使用灯火，不是无组织无纪律，就是故意破坏……

翻译官领着我和伊万·伊万诺维奇进了一个利用机场旁边的很大的铁道涵洞改建而成的防空洞。很快，这令人警觉不安的黑夜的沉寂被一阵发动机的低沉的轰隆声打破。发生了第一次爆炸。紧接着，几乎觉察不出有片刻间隔时间，相继发生了几百次爆炸，汇合为一片极其可怕的轰隆声。地动山摇，乱石横飞。近处的爆炸震耳欲聋，灼热的气浪扑面而

来。距离炸弹爆心这样近，我这还是第一次。

这极可怕的爆炸声猝然停止：最后两三颗炸弹轰然几声响过之后，四周又归于可怕的沉寂。我同苏林连忙爬上路堤，希望看看我英勇的歼击机如何迎击朝南飞去的空中敌人。一道道蓝白色的探照灯光紧对着远去的敌机。

机场烟尘弥漫。我们聚精会神地看着和听着，但什么也没有发现。只是伊万·伊万诺维奇突然喊了一声：“大夫，请看那边好象有什么闪了一下！”

敌轰炸机发动机的轰隆声已经消失，我探照灯随即关闭，我歼击机的油料也已将耗尽。这时，杨将军宣布：“敌机第二拨正在接近，第三拨已经出动。”

然而，仍不见雷松金和奥尔洛夫归来。终于空中传来了单发动机隐隐约约的隆隆声，接着朝地面发射了一颗白色信号弹。这是我们一架飞机已经返航，正在请求着陆的信号。但另一架在哪儿？它为什么没有返航，出了什么事？

我们相互之间一面提出这一连串令人不安的问题，一面又非常担心这位返航飞行员来不及着陆而遭敌轰炸。但这时飞机已在地面滑行了。

我们焦急不安地又等了一会，但飞行员却仍在那里继续机动飞行，显然是在寻找新弹坑之间的间隙地滑行。这飞行员多半没有意识到他面临的危险。苏林忍不住了，他派航空机械师到机场去，接返航的飞行员回来。发动机终于停了下来。也就在这时，远处又传来了“三菱”后续机群清清楚楚的隆隆声。

当航空机械师和已返航的叶夫格尼·奥尔洛夫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我们防空洞跟前时，敌轰炸机已经带着可怕的嗡嗡声飞临机场上空。待我们刚刚挤进已经挤满了人的防空洞

时，炸弹就轰隆一声爆炸开了。

“雷松金在哪儿？”

“不知道。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我们向日本人发起攻击的时候。日本人用猛烈的火力回击。我以为亚历山大已经回来了……看来，他出了什么事。”

现在大家都清楚，雷松金是不可能平安归来了，因为他的汽油早已用尽。虽然如此，我还是走出防空洞，不由自主地用眼睛在天空搜寻，或许从那会出现一颗众人盼望的白色信号弹；我凝神倾听，会不会听到歼击机的发动机的响声。然而奇迹并未出现。只好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飞行员跳伞上。

离机场不远处冒起了一股浓烟烈火：地面一架美国豪克公司的战斗机被敌机炸毁了。机场主任杨将军通告说：“敌机第三拨正在接近，第四拨已经出动……”

我们在黑夜将尽时回到励志社，听到一个痛心的消息：从距衡阳市西南三十公里的一个居民点来了电话，说那里坠落一架中国飞机，摔死一个飞行员。

黎明时，苏林、奥尔洛夫和我在翻译官的陪同下乘一辆救护车前往出事地点。很快就到了那个居民点，再往前行就只能徒步行走了。我们让救护车连同司机一块留下，然后顺着水汪汪的稻田之间一条弯弯曲曲的人行小道走去。

因焦虑不安，我已连续几夜不能睡眠，感到疲惫不堪，忍着脚疼，吃力地跟在几个比较年轻的同伴后面跋涉。有人领我们到一个地方坐船渡过一条静静的并不很宽的小河。当太阳升起时，我们来到一个小村庄，在村长家里吃早饭，他向我们谈了谈出事的一些详细情况。

早上十点左右，我们到达了目的地。人们成群结队地和单个地从四面八方朝出事地点奔来。在一个四周灌木丛生的

窄长湖泊那边，在长满青草的湖岸上，停放着一副自制的担架，底下用四根一米半高的楔进土里的柱子支撑着。死者雷松金就躺在这副担架上，两只手笔直地伸在身体两侧。死者的头前和脚下，象守灵似地一边站着一名手持红缨枪的警卫。

歼击机的残骸露出水面，亚历山大·伊拉里昂诺维奇戴着飞行帽，但风镜不见了（后来在座舱里找到）。右额骨上露出一个致命性伤口。其余部位没有发现任何伤痕。从死者的飞行帽和衣服上没有找到任何弹迹。只是从座舱装甲靠背的软套上发现一个大口径弹头，这弹头可能是雷松金以前迎击敌人时留下来的。

根据大家分析，雷松金的飞机在空战中就已受伤，使他无法继续飞行。本来应当跳伞，但飞行员显然是想保存飞机，于是便驾着它朝在明月的照射下显得十分平坦的空地（实际上却是一个湖泊）降落下去。当飞机往湖里降落时，飞行员受了致命性外伤，在巨大惯力的作用下头部正好撞在他眼前的直接瞄准筒上。

我们同中国当局商谈了安葬的时间和地点（中国人提议将这位英雄安葬在离他牺牲的地点不远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高地上），并就墓碑的碑文交换了意见，然后十分沉痛地踏上了归途。

雷松金牺牲后的第二天晚上，敌机对衡阳机场进行了三次袭击。第二次袭击之后，天空出现了云团。当第三拨敌机投弹完毕转身返航时，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几架日本轰炸机的许多挺机枪突然而猛烈地开了火。子弹从我们附近飕飕而过。一道道曳光弹迹，有的朝水平方向延伸，有的朝下斜方向延伸。水平弹迹要多得多。这就是说我们并没有

成为主要目标。只不过一些流弹偶然朝我们这边飞来罢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日本飞行员当中，有人因前夜遭我歼击机的大胆夜袭而吓破了胆，竟疑神疑鬼地把自己的飞机当作我们的飞机，慌手慌脚地首先开了火。遭袭击者以为这是中国人搞的，当然也就给以回击。至于其余的“三菱”机组人员就更难以弄清情况了。就这样，敌机凶狠地乱放了一阵机枪以后，便溜走了。

这天夜里，敌人损失十一架轰炸机。中国人将这一战果归功于高射炮兵。其实，最严重的损失，无疑是日本人自己给自己造成的。这同时也是我英勇的飞行员雷松金和奥尔洛夫奋不顾身的行为的直接结果。我们明白这一点，但没有作声。

我曾看见人们把几架坠毁的“三菱”运往湘江岸边的情景。压扁了的大肚子机身，双垂直尾翼，美制星型气冷式发动机，残损的三叶金属螺旋桨……

日本人这次遭受了如此明显的损失，以致于一段时间内停止了对衡阳的袭击。

从 衡 阳 到 成 都

（1938年10—12月）

我们呆在衡阳的日子即将结束，因为日军已接近长沙，对衡阳也造成了实际威胁。1938年10月上旬，下达了准备撤离的命令。机群空勤人员由斯柳萨列夫率领乘自己的飞机飞向新的驻地——芷江。特霍尔和格里戈里耶夫早些时候乘坐美国客机“C—47”飞到重庆去了，和他们同行的有托罗波维奇和病愈的马蒙托夫。茹拉夫列夫和一群记者乘坐轻便汽车取道桂林和昆明去重庆。И·И·苏林已不在这里，不久

前他应召回莫斯科去了。代替他的是Я·И·杰文斯基，他是前不久从苏联来的。

我们的车队由数辆各式各样的汽车组成。领头的是航空委员会的中国领导者乘坐的小汽车。他们后面是一辆部分志愿人员乘坐的大轿车。再后面就是几辆载着服务人员和我们的物品的载重汽车。载重汽车后面是志愿人员乘的第二辆大轿车。队尾还有一辆小汽车，车上坐着以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叶尔绍夫和政治部副主任特霍尔为首的我方领导者。我和特罗菲莫夫并排坐在头一辆大轿车上。

我们宿在路上。黎明时分，我们到达离长沙不远的湘潭附近的湘江渡口。那里聚集着许多汽车、马车、牛车和驴车。人们很焦急，大声地争吵不休。每个人都想尽快渡到左岸去。一个外国军人谩骂着，拿手枪在一个力图维持渡口秩序的中国士兵面前晃着，进行威胁。

我们走下车，乘第一艘渡船到了对岸。汽车上只留下司机和我们小组的几个人。我们渡过江后，焦急地等待着我们的车队从对岸过来。在下游离我们不太远的地方，帆船队密集地排成一队沿湘江顺流而下。

这时从东方飞来一架小飞机，这是日军空中侦察机‘九五式’。它在湘潭渡口转了一个圈，就向西北方向飞去了。

谁也不怀疑，侦察机用无线电报告了湘潭附近聚集着许多人和汽车，并且日军轰炸机马上就会袭击这里。但是，使我们惊讶的是，敌人的航空兵并没有来。

下午，我们车队的头一批汽车终于来到了。我们沿长沙——常德公路走了大约一公里半，又停下来等待其余汽车渡江。

中国军队从我们身旁走过：步兵用扁担挑着生活和战斗

用的一切必需品。轻型火炮拆开用马驮着，野炮则用当时常见的马拉着。

只是到了下午，我们最后一批汽车才从渡口过来，我们希望天黑前赶到常德，计划在那里吃晚饭和过夜。但是，我们休息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当我们快到常德时，看到十来辆汽车残骸翻倒在地，被拖在路边上。从迎接我们车队的人那里得知：这是日军轰炸机今天空袭的痕迹。

要是不是在湘潭意外的耽搁，我们就会在常德赶上日军航空兵来袭，尝到日军飞机的炸弹和枪弹的味道了。在常德没有停留。

蜿蜒的公路紧贴着悬崖。疲惫不堪的司机强打起精神开着车。在一个危险的转弯处，我们大轿车的司机伏在驾驶盘上睡着了。坐在他身旁的叶列缅科工程师察觉后，及时拉了手闸，坐满人的汽车才在悬崖边上停了下来。

决定让司机休息。派人带几挺机枪去担任警戒。当我巡视车队时发现，不仅司机睡着了，而且所有的人，甚至连抱着机枪的人也难以克制地入睡了。

首席翻译通报了令人不安的新消息：日军已经占领了长江岸边的宜昌，他们的摩托快艇在离这儿不远的洞庭湖上开来开去。他们随时都可能上陆，并切断我们的道路。考虑到这种危险情况，不得不叫醒刚刚睡了大约半个小时的司机。

拂晓时分，我们在树林里停下来休息。车子停在路边，用树枝伪装起来，我们自己则到路旁的林中空地上休息。我们吃了早饭，喝了啤酒，吃了面包片和罐头。将近中午的时候，在高空沿着公路稍偏一点，自东向西飞过一架小型飞机——敌人的侦察机。

傍晚，车队继续行进了。半夜，在沅江渡口旁停下来。趁渡船在月光下把我们的汽车运向对岸的当儿，我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躺在水边的草堆上打瞌睡。翻译向我们走来。从他口中得知，今天中午十二架日军轰炸机炸了这里的渡口。

我们在早晨到达芷江，这是湖南西南部沅江岸上的一个小镇。我们被安顿在一个宽大但不舒适的木质平房里。我和特罗菲莫夫住一间。我们暂时无事可做，因为我们的飞机刚刚转场到这里，还没有恢复战斗活动。

……我们在芷江庆祝了十月革命二十一周年。晚上组织了文艺演出。我们很和谐地齐唱一支进行曲“愿我们的鸟飞得高些，再高些”。中国人表演了魔术、耍标枪和许多别的节目。我们的飞行员和中国人赛腕力，并取得了胜利。

在芷江呆了九天，我们小组奉命继续向重庆前进。轰炸机现在转场到苏联志愿人员的主要基地兰州。

我们吃过早饭便出发了。这一次我和特罗菲莫夫是分开走的：我坐第一辆大轿车，他坐最后一辆。

大约在离芷江二十五公里的地方，队尾的小汽车超过了我们的大轿车，并突然停下来，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原来是找我的，最后一辆大轿车翻车了。有受伤的，需要急救。

在出事地点我看到了那辆破烂不堪的大轿车，它倒向左边，玻璃都碎了。在它周围，激动的乘客互相给予力所能及的医疗救护。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一瘸一拐地（因为他自己也伤了脚）把通讯员从休克中急救过来，后者胸腔受了伤。事故的肇事者——司机腿上流着血，坐在旁边的石头上，用手抓着头，号啕大哭起来。“不好，真不好”，在我给他包扎伤口的当儿，他低声埋怨着。

出事故是司机的过错：在通过沅江上的一座桥时，他没有掌握好速度，在道路的急转弯处翻了车。人们分头乘坐其余的汽车，车队又继续行进了。特罗菲莫夫医生把通讯员送到芷江，他们俩人在那里住了半个月左右。

快到重庆时，又出事了，我们差点儿碰到土匪。事情发生在下午，将近黄昏的时候。车队的设营员、航空委员会的一个官员坐小汽车先走一步，去准备过夜的一切必需品。在一个长满树林的山区僻静处，他的汽车被不知是一伙什么人拦住了。他们用枪威胁着要钱。强盗们抢了中国人，劫走了他们的枪逃走了。这个官员赶到宿营地，报了警。

我们对所发生的事儿一无所知，因而也没有留意路两旁出现的岗哨。不久我们得知，他们是按照那个官员的警报来保护我们的安全的。

后来在路上没有发生意外的事。次日黄昏，我们到达重庆郊区，在离陪都约二十公里处停下来。

我们住在一栋两层的大楼里，从堆放着的医疗设备来判断，这栋楼属于没有办公的某个医疗机构。这里有高压锅，理疗设备等。房子座落在一个大花园里。在精心修砌的整洁的道旁，摆着长靠椅和有大理石座基的花盆。高洋灰墙围着一个大水池。山陡峭多石，林木繁茂，深谷令人头晕目眩，谷底则是稻田。公园里长着许多被剥去树皮的大树。

在我们住处的西南方，在远处的山头上，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式建筑物的金色屋顶。据说那是蒋介石的别墅。可能这是真的，因为在我们到达重庆郊区的第二或第三天，翻译宣布“大元帅今天要从我们的宿舍旁边经过，命令禁止车辆通行，并把车辆好生伪装起来。”

在高地的东坡上有一所学校。孩子们在露天上课，因为

虽然是12月中旬，但天气温暖。离学校不远，工人们在打石头。我观察着两个石匠在干活。一个小伙子用重锤一锤一锤地猛击钎子，钎子放在大石块的缝里，由另一个和他合作的人扶着。每当要打一锤，石匠就瞪着钎子，大喊一声，并在锤子落下时变成尖叫声。似乎锤工用拼命的叫声来增强打击的力量，并且好像是吓唬这块石头，叫它听话。

我们全机群的人到重庆去过几次。十八公里长的公路在狭窄的山谷里盘旋，两边是山和森林，谷口在长江右岸。长江在这里差不多和在武汉一样宽，只是水流更急。

对岸高耸多山。重庆就座落在那里。城下面的陡岸上有许多山洞的入口，山洞可用作避弹所。人们不得不长时间地攀登几乎是垂直的阶梯。居高下望，可以看到壮观的长江景色。在涛涛江流的中间有一个高出城市的长长的沙洲，改造成了机场。重庆的欧洲式建筑比汉口少。在中央大街，除了轿子之外，我没有见到别的交通工具，甚至连人力车也没有。在台阶路上，上下只能步行，整个街道都是石板铺的。街道岗峦起伏，简直不可思议。郊区不那么高低不平，因而各种交通工具，包括汽车在内都可通行。

在重庆的励志社，我们遇到了茹拉夫列夫和托罗波维奇。后者早就从衡阳飞到这里来了。茹拉夫列夫在我们到来前不久，刚刚同一群记者在南方各省做了一次有趣的旅行。……不久，我们的车队乘轮渡过了长江，以便继续向四川省的主要城市成都进发。茹拉夫列夫暂时留在重庆，特罗菲莫夫和受伤的通讯员留在芷江。托罗波维奇和我们一道去成都。他获准交通方便时就返回祖国。

在离开重庆的时候，最后留在记忆中的是长江的景色：在下面，它那宽阔的蓝色江水向东、向被日军占领的汉口流

去……

在成都，有一架要返回兰州的大型运输机等待着我们，以便把同路的人带走。如果天气好，它明天就起飞。

“斯切潘·雅科夫列维奇，您真幸运。”我从心眼里羡慕地对托罗波维奇说。“东西已经在兰州，您自己明天飞走就行啦。不必再为等机会而苦恼了！”但是，令我惊讶的是，他并不高兴。相反，他在耽心着什么事。突然，他活跃起来，好像产生了幸福的想法，出人意料地提议说：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您如愿意，我把机会让给您吧。不是您父亲生病叫您回去吗？”他的声音里带着我不理解的愿望。

“这是不可能的，斯切潘·雅科夫列维奇，您知道，我还没有获准回家。即使获准，我也不好意思比您早回去，因为您在这里服役的时间已超过规定的一半了。”

“既然如此，那就给家里准备一个包裹，写封信吧，我带走。”他说。

经过一路风尘之后，洗了个淋浴，吃过午饭后，我们去观光市容。

成都的房子大多是中式平房。树木很少。某轮船公司的巨大广告醒目地招揽水运生意，这使人有点吃惊，因为成都离长江支流——岷江上的最近的码头灌县的距离还有五十多公里。南昌到处是人力车，而这里这些贫穷的“人力车夫”缠着我们死气白赖地揽生意。

当天我们就去机场了。机场四周的地势逐渐向北和东北升高，而与远处的青山相连。可以看到日军轰炸机破坏的痕迹。我们参观了一小队美国“马丁”公司制造的双发动机轰炸机。这是一种机身宽大下垂的单翼机。在跑道旁边一点，

同跑道成直角，停着一架从兰州来接我们的“艾伦”牌飞机，它是“TB—3”的改进型，发动机的功率比较大，有四叶螺旋桨，戏称“风车”。低矮的四轮起落架轮架换成了一对巨大的轮子。后边的小轮在飞机的重压下一半陷进泥泞的土里。这架大型飞机的尾翼画上了蓝色和白色的横条，而在每个机翼的下面，在蓝圈底色上画着十二角的星(国民党徽)。

回到住处，我收拾了一个小手提包，里面装着给妻子和女儿的礼物，给她们写了一封信。

晚上，谈起了最近的飞行事故，特别提到“C—47”的失事。它在从汉口飞往西安的途中原因不明地起火烧毁了。二十二名乘客——苏联志愿者和三名中国机组人员无一得救。他们在飞行中没有(按客机规定)带降落伞。清查死者姓名时，看到有歼击机飞行员索科洛夫的名字，我在南昌给他治过头部的伤。这是他在第一次战斗起飞时受的伤。在“C—47”型飞机上牺牲的还有航空机械师伊万诺夫，我还是在沃尔航空技术学校工作时就认识他。他是一个严肃认真、意志坚强的人。他在汉口管理机场的器材库。

我们也议论了歼击机飞行大队长马特维耶夫和他的三个僚机飞行员的死。他们是飞到兰州去更换使用期满的发动机。飞行是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油料不够。在山区迫降，以悲剧结束。他们都是勇敢的人，在中国人民困难的岁月，他们以自我牺牲精神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苏联空军的这些军官曾积累了宝贵的战斗经验。

回 国

(1938年1—4月)

第二天，我们送别我们的同志们，托罗波维奇医生也在

内。航线上的天气预报是令人不安的。但是，机组和机场勤务部门还是决定冒险。这次冒险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几小时后，飞机遇到了暴风雪，撞到山岩上粉碎了。只保全了两个人的遗体——弗拉吉米尔·卡罗塔耶夫和亚历山大·加洛甘。我们沉痛地埋葬了我们的同志，他们完成了援助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使命，而与世长辞了。

不久，我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出发的准备时间不长。12月30日早晨，吃过早饭我们就来到机场。九点钟左右飞来了一架三发动机的“容克”式飞机。走下飞机的是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特罗菲莫夫，这真使我惊喜交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已经康复的他的病人——在芷江附近车祸中受伤的那个通讯员和因肠伤寒住过重庆医院尚未痊愈的航空机械师。他们也都去兰州。

留下的同志祝愿战友一路平安，一小时后，我们就起飞，踏上了返回祖国的路程。

下面是无边无际的群山：时而是暗灰色的，时而是褐色的，被蓝色的宛如许多血管似的河流所截断，时而又是覆盖着绿茵似毯的森林。就在前天，我还在这些崎岖的山路上行走，疲倦而激动地度过了最后的日子。就在我们下面这块土地上有摔坏的飞机残骸，有尸骨未寒的我们战友们的坟墓。

我看着头戴飞行帽的中国飞行员，更加怀念战友，心想：假如失事的飞机驾驶员科瓦里当时能同地面进行无线电通讯，可能就不会失事了。

在西安，在中断了七个月之后，深夜，我们怀着喜悦的激动心情收听了莫斯科的广播。在华南和西南，由于高山阻挡，虽然我们的短波电台和莫斯科保持着不间断的无线电联

系，但我们听不到苏联的广播。苏联国歌的庄严乐曲，克里姆林宫钟楼的自鸣钟声，我国广播员熟悉的嗓音，使我们倍感祖国亲切。记得夏天我们在西安励志社收听莫斯科无线电广播的情景。当时我们是忐忑不安未卜莫测……一切还有待去做。而如今已经完成了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准备动身回家了。

在西安，我们不仅从无线电里听到了莫斯科的，而且也有上海的俄语广播！某个商品推销员向“俄国侨民区”的居民（看样子是白俄）祝贺即将来临的新年，称他们是“亲爱的同胞们”，祝他们“幸福长寿”。然后，突然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商店去，说是商品“物美价廉”，吹嘘了一番然后又进行新年广播，过了几分钟，又满不在乎地自卖自夸。接着还是重复这一套。

我们在兰州遇到的是干燥的，几乎无雪也无风的严寒的冬天。虽然这里离苏联国界还很远，但是，越过群山来到苏联志愿者的主要基地后，我们感到几乎是已经到家了：这里有我们的军医院，西安到萨雷奥泽克的陆上交通干线从这里经过。我们的车队沿这条路为战斗着的中国运送弹药。

在励志社吃午饭的时候，见到了亲切的И·Д·伊茨科维奇。他给我看了他的科学著作《兰州地区的流行病》，是准备发表的。有一天伊茨科维奇听了航空兵在前线的战斗故事后说道：

“可是我还没有见过日本飞机呢。我呆在兰州期间，这里没有过空袭。”

“不要把话说绝了，”我开玩笑地说，“如今，我们来了，你会不断地看到和听到，日本人是怎样轰炸的。他们到处跟踪我们。”

果然，不久，十二架“三菱”型飞机轰炸了兰州，但这是伊茨科维奇·特罗菲莫夫·阿勃津回国以后的事了。

一月中旬，当我们等候飞机的时候，出现了下述情况：苏联国防人民委员指示：在未经特别许可前，禁止在中国领土上空运送旅客。禁止的原因当然是令人可疑的日益增多的飞行事故。因此，只有乘汽车了。

一月底，从重庆和成都来这里还要留在中国的志愿人员：叶尔绍夫、格里果里耶夫、茹拉夫列夫、达林斯基、格罗莫夫、彼得罗夫等。他们是坐汽车经南充和西安来的。在山区长途旅行是很困难的，他们都很劳累。在兰州休息几昼夜后，茹拉夫列夫和叶尔绍夫经莫斯科的特别许可，乘单发动机的双翼机“P—5”回国了。

有一次，白天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警报器发出悲鸣。一年来兰州市的居民对此已经习惯了。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勉强听到了日本飞机的响声。声音很快越来越大，飞机飞近了，从有佛塔的那座山后边窜出了十二架“三菱”型轰炸机。它们来了个向左急转弯，从我们头上飞过，横过黄河，顺着河右岸向机场飞去。这时，从云上太阳右侧突然钻出了我们的两架歼击机。

事后得知，其中一架是苏联志愿飞行员佐洛塔列夫驾驶的，第二架是中国飞行员驾驶的。歼击机从上方和后方对敌轰炸机勇敢地俯冲，进行了猛烈地射击。日机射击员用旋转式机枪对进攻者进行了猛烈的还击。曳光弹的弹道在空中交叉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紧张地看着无畏的歼击机是怎样不怕占着优势的敌人，积极地进行攻击。我方歼击机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它们迫使惊慌失措的日军飞行员提前丢下了炸弹（大部分炸弹没有投到机场）。炸弹落在了一个墓地。我和斯柳

萨列夫乘敞蓬大汽车赶到了那里。

遭轰炸的墓地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那里住着看坟人和管理埋葬事宜的人员。墓地入口处的高门楼被炸弹炸歪了。支撑着尖顶盖的雕有花纹的门柱被弹片炸裂了，顶盖也炸开了很大的窟窿。

村子里也有炸弹坑，坑里布满了碎石、砖头、玻璃碴、木片，到处是飞起的沙土。在一座木板顶盖的矮厢房里，一群人围着一个被炸伤的老头，他躺在炕上，用手抓着头，大声地哼哼着。在过堂屋的地上，躺着一个被炸死的中年妇女，一个像是她丈夫的人跪在她身旁，默默地盯着死者的脸，一动也不动，愁苦极了。

我和斯柳萨列夫从村子赶到离墓地不远的机场。这里也落了几颗炸弹，同样，到处是弹坑、碎石、沙土以及里侧被火药烧得很光滑的锋利的弹片。在几架没来得及飞走的“СВ”型飞机上，保暖蒙布上的棉花被烧红的弹片烧着了，冒着烟。

三月初，宣布要我们尽快回国。几乎所有的汽车车厢（共有二十多辆汽车）都蒙上了毯子。在这样暖和的车厢里，可以坐在长凳上或躺在铺着厚厚的干草的帆布上。给我们发了暖和的冬装：棉裤、毛皮背心、毡靴、带皮领的羊皮短大衣、护耳皮帽和飞行手套。

车队由机群参谋长М·Н·格里戈里耶夫少校率领。我们和这个刚毅的人作为志愿者一道来到中国，而一年后，现在我们又一道回苏联。

从中国西南部来的苏联志愿者几乎全部回国了。在兰州只留下了刚来不久的达林斯基和飞行员格罗莫夫。和我们一道走的有卡罗塔耶夫和加洛甘，以及在兰州的最后一次空战

中在我们眼前表现得很英勇的歼击机飞行员佐洛塔列夫。

当我们长长的汽车行列开始长途旅行的那一天，阳光灿烂，天气微寒。黄河上的钢筋混凝土大桥已经留在后面了。这是城市的西郊，不久前，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日本轰炸机的最近一次空袭，以及同他们的空战。道路向右转弯，蜿蜒在像巨大的干草垛一样的山前巨大岩石之间。兰州隐没在这些岩石的后面了，而在兰州的后面则是黄河的高高的左岸，那里有佛寺的白色围墙，最高处耸立着整齐的佛塔。

宽敞的石头道路，深深的壕沟（这是用苏联筑路机挖成的），沿着南山山脉的山前地区左侧通向西北，右侧是蔓延数百公里的长城的遗迹。当时，这个巨大的建筑物宽四米，高八米以上。如今，长城像个土墙，宽约一米半，高度就像在我们中亚各共和国随处可见的两三个土围墙那么高。长城在许多地方完全毁坏了，接连几十米只是宽宽的一条隆起的粘土，并且被雨水冲散了。但在有的地方，仍保存了巨大的箭楼，它们像两座四方形的横切的、两千多年间已石化了的土质金字塔。箭楼高几十米以上，底部宽不下六米。这些粗糙的金字塔上面无任何东西相连接，它们沉重地矗立在宽阔的大道两侧。

大约在离兰州三十五公里处，在古浪，长城从我们经过的路上向右拐，并分成两部分。右边的向东，伸向遥远的北京。一路上很长时间都能看到，这个神奇的古代建筑物像一条曲折的暗黄色带子，沿着南山的支脉消失在高山之间。左面的长城划了一个弧形，又转过来，在永昌附近回到我们“远征”的路上。

我们所经之处荒无人烟。一路上只遇到一支有二十匹载货的骆驼队。一天走的路不超过两三百公里。经常短时停

车，等待掉队的汽车。在路旁的居民点过夜。早晨，吃过早饭，发给我们干粮留在路上吃。我把我的暖水瓶灌上甜茶水，以便在路上给病号喝。

在吐鲁番很安静，天气像春天般的暖和，阳光灿烂，树木发了芽，小草从解冻的土地上露出了头。过路的骆驼队在休息，晒着太阳，骆驼懒洋洋地反复咀嚼着食物。

过了乌鲁木齐，路愈来愈高，深向山里。我们从东南面绕过了圆形的赛里木湖，沿着陡峭的被水冲刷的湖岸走的是弧形路，从岸上向下看去，深处可以看到冰。耀眼的冰湖在太阳映照下十分刺眼。

塔勒噶伊山口风景如画。在积雪的准噶尔阿拉套山的山顶上，长满着挺拔的松树和云杉。这里有一个只有几间房子的不大的林场，住着伐木工人和锯木工人。我们在这里度过了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夜。一直到黄昏，都能听到隐约的锯木声和斧子的砍击声。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中国边卡的矮长的平房前停下来，办理出境手续。当车队进入“中间地带”时，从我方的了望台上跑出一个端枪的士兵。我们大家都看着他。在寂静中有人抑制着激动的心情，小声地，像是自言自语地，用亲切的声调说：“这就是他——苏联士兵”。

这个边防战士同坐在第一辆车上的人谈得很简短：他和了望台上的观察员交换了信号，我们就继续前进了。

这是1939年4月初的事，要理解长期在国外做危险的工作之后返回祖国的愉快心情，需要亲自去体验一下。

在我们背后是一个苦难的、战斗着的中国。如今有许多东西把我们同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在同侵略者斗争的具体环境中，我们每个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所能献出的都献

给了它的人民。我们的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而献身，他们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始终怀着忠诚地履行义务的感情……

我们乘新西伯利亚至塔什干的晚班火车到达阿拉木图。全组志愿人员很快就出发去莫斯科了，我则被指挥部允许去塔什干回家探亲。

假期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要去莫斯科，汇报在国外的的工作。在莫斯科遇到了比我早到的几乎所有的同志。在遇到的第一批人中，我首先祝贺西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斯柳萨列夫荣获金星奖章——苏联英雄称号。我回到塔什干一个月后，又重新在土耳其斯坦军区的区军事医疗委员会工作。

……1942年秋，我被调到野战军工作，当我来到莫斯科，在帕维尔火车站吃午饭时，发现对面坐着一个人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抬起头，看到一个年轻的飞行员胸前挂满了勋章和奖章。他用熟人的快乐目光正在看着我。我立刻认出来了，他是曾在斯柳萨列夫的轰炸机群工作的一个射击通讯员。我们相互问好后，便攀谈起来。我的交谈者在最近三年成了一名战斗飞行员。他讲述了我们的朋友们的一些情况。我从他那里得知，轰炸机大队长A·П·沃夫纳（在衡阳时他和我同居一室）在1940年冬季，同芬兰白军作战中，外出执行战斗任务，再也没有回来。

П·М·茹拉夫列夫的命运是悲剧式的。1943年夏季，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医务主任乌斯季诺夫少将把我召到方面军野战司令部，给方面军司令员托尔布欣上将看病。我从乌斯季诺夫的谈话中得知，茹拉夫列夫已经死了。他死前是军医少将。茹拉夫列夫以苏军卫生部副部长的身份去前线作短期

视察时，在路上碰上了地雷。

*

*

*

我们在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时，处处感受到中国人民对我们的真挚情感。我们看到，中国人是怎样衷心地感谢我国人民给予的及时、巨大和无私的援助，没有这种援助，中国同侵略者未必能进行多少有效的斗争。中国人高度评价苏联人为了维护中国的民族独立而做出的不小的牺牲。他们把苏联人看成是在困难的岁月中前来相助的亲兄弟。

我相信，我们的同胞洒在中国土地上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苏中友谊的传统将再次获得胜利。

附 注

作者简介：

C·C·别洛利佩茨基（生于1899年）是预备役医务上校。他作为神经科医生在苏军中担任过各种职务。1938—1939年，参加苏联志愿军军医小组到过中国。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

①安德列耶夫是T·T·赫留金的化名。

（李壮译）

往事追记

C·П·康斯坦丁诺夫

1938年7月间，我和一批苏联志愿人员一起飞往中国。路上颇费了些周折才抵达指定地点。飞机从阿拉木图向新疆省省会乌鲁木齐飞去。我们降落的第一站是边界小镇伊宁，从前这里是伊犁苏丹国的中心。随后我们又沿着乌鲁木齐——哈密——兰州——凉山这条航线飞行。每到一站都有新疆督办（省长）盛世才的代表迎接。

新疆省被绵延千里的天山山脉辟成南疆和北疆。大部分地区是沙漠，气候干燥，即使绿洲之中树木也很稀少。极目所至，无非是游牧人、帐篷、羊群、野驴和马匹，再就是骆驼队。天山北坡长满森林。新疆的这一带地方自然景色美丽动人：岩石嶙峋，瀑布飞溅，经年的参天树木之间杂草丛生，难以通行。在林中空地上，顺着山溪的谷地里座落着地主的山庄，寺院和村落。其间有盘桓于山岭隘口之间的石板小路相通。新疆是“特别省”，居民民族成分驳杂，共有五百万人口，其中汉人只有五万左右。

新疆一直为英美和日本殖民主义者所觊觎。他们竭力想以它为基础拚凑起一个穆斯林的缓冲国。部族间的殴斗引起了多次暴动。最后一次发生于1931年，盛世才崛起之时。他曾参与镇压维吾尔封建主的暴动，后来留在新疆。1933年发动政变，窃取了政权，自称督办。此人冒险成性，奸诈狡

猾。中日战争初期他“玩弄独立”，一度并曾扮演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盛世才周旋于少数民族之间，得心应手，在新疆站稳了脚跟。蒋介石迫于无奈与他眉来眼去。一直到1938年盛世才才正式宣布支持抗日统一战线，而事实上他始终躲避抗战。1934年他却狂热地卷入了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

那时节新疆正流行霍乱。由于天气不好，我们在兰州停了许多，等候起飞。我在这条“战线上”经受的第一次考验是染上了霍乱。兰州是来自苏联的运输队的转运基地。后来我们克服了飞行条件险恶的秦岭山脉，在凉山着了陆，但立即遇上了轰炸。我们目睹日本人炸毁了半个城市。地方当局拒绝为我们提供去汉口的飞机，声称中国军队似乎已经放弃汉口，而政府业已撤往重庆。我们指挥部的命令切切嘱咐必须去汉口。于是我们只好转飞长江沿岸的港口城市万县，以便再坐船去汉口。

到万县去，一路上走的是林木茂密的山隘，那些隘口或峭壁重迭，险峻非常；或似亚热带灌木郁郁葱葱，不透阳光。在凉山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一带不时有红胡子出没，但我们没有遇上过这号人。

重庆将近，但命令总归是命令。我们不得不蜿蜒前行，穿过中国的西部和中部，到南方才能与自己人会合。这一段充满艰难险阻的旅程化了近三个月时间。通讯联络中断了。军事总顾问的指挥部以为我们小组的人员早已葬身了。

我们亲眼看到日本人三次轰炸万县城的情景，大半个城市陷于一片火海。往汉口方向的交通中断。扬子江上飘浮着士兵的尸体，以及被炸毁的船只和帆船的残骸。我们只好找江面上的“海盗”帮忙，他们索价高昂，用上个世纪的小快

艇把我们送到要去的地方。日本空军对扬子江上的所有活动目标狂轰滥炸。沿江两岸中国的军队在乱糟糟地撤退。“海盗”们送我们到宜昌上岸，就溜走了。偌大一座江城宜昌，被炸后到处是火。我们失去了一切联系。去汉口的命令依然没有撤销。

宜昌城里比较平静的地方只有外国租界和外国轮船公司的码头。远洋轮船自由自在地在扬子江上行驶着，并不耽心被炸。意大利轮船公司拒绝售票给苏联军官。英国人倒让我们上了船，但中途收到日本人已占领汉口的无线电报以后，船长又要我们上岸。这家伙一直叼着那管老式的烟斗，俨然一只典型的海狼。他扬言不会送苏联军官到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城市去。可是，我们已没有别的出路了，因为第一，我们奉命去汉口；第二，沿江两岸已经见不到后撤的中国军队，人地生疏，联络中断。

船长让我们在最近的一个码头上岸，说是要在那里装一批货，他让我们摸清形势，他愿稍候，如果需要的话，他还可以接我们再上船。当夜轮船停靠在一个荒凉的码头上。我们看透了船长的花招，因而拒绝下船，理由是我们买的是到汉口的船票。果然，根本没有什么货要装船。轮船又启航前行了。

两天以后，10月24日拂晓，就看到汉口了。这座城市虽存犹死。中国军队的统帅部和军事总顾问的指挥部早已撤到南方去了。政府和各外国使馆当时都在重庆。一到汉口就有人告诉我们说，出城的所有路口子都已布了日本岗哨。我们搞到一辆汽车。车子开得飞快，大家都十分警觉。远方传来一阵阵火炮的轰隆声，一路上我们搞掉了日本人的游动侦察班，通过了危险区，成功地避开了日本飞贼的轰炸，终于赶

上了正在撤退的中国部队的后卫队。它们已失去通讯联络，也没有人指挥。

一幅极不寻常的情景突然映入眼帘，中国指挥部在慌乱之中扔下伤员于不顾，任其惨死路旁和渡口。

我们在汽车上把渡河时受重伤的一个同志安排好，就继续南行，赶赴军事总顾问的指挥部。沿途经过武汉、岳阳、长沙、株州、衡阳等城市。

在中国大地上这次漫长的旅行（我们几经辗转迂回才抵达大本营），使我们初步了解到国民党统治者所控制的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后来的许多感触又充实和发展了最初的了解。

老百姓的赤贫令人发指。他们居住在城关，那里房舍密集，一间间被烟熏火燎，早已暗黑了。到处是肮脏不堪的市场和小酒馆。既没有供水设备，也没有下水道。污水沟顺着多半已破碎的长石板砌就的人行道延伸开去，人们把污水污物倒进沟里。拥挤、闷热、恶臭、苍蝇成群，这在贫民区都已司空见惯。在狭窄街巷和胡同的每一个拐角处可以见到的不是齷齪的饭店，就是强行拉客的妓女。

中国农民的辛勤劳动实为世所罕见，可是他们过的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地主、富农霸占着大量田地，强征收成的绝大部分。赋税苛重。中央政府、各省督办、宗教寺院都伸手向农民征收税款，有的竟预征五——十年以后的捐税。

穷家子女从童年起就得担负繁重的劳动。孩子们很小就开始干活儿。凡人手能干的活儿他们都得去干。孩子们幼弱的双肩上要背盐、扛煤、挑劈柴以及别的重物。一路上可以看到一群群五六岁的孩子背着箩筐，拿着笤帚和簸箕，在马路

上来往拣粪积肥。任意侮辱他们，用汽车压死他们，不会受到惩罚，这样的事屡见不鲜。

有一次，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我们遇见一些背干树枝的孩子鱼贯走下山来。看样子他们要到集上去卖柴。他们当中那个最小的孩子背得过重，压得不时摔倒在地。跌倒了，爬起来，又去追赶别的孩子。我给了这个受尽折磨的孩子一点钱，心想这样也许可以使他摆脱重荷。孩子拿了钱，向我道了谢，一直等着我走开，然后他又重新折回去拣起他已经扔掉了的那捆干柴。

在中国我多见的是人们在哭泣，没有听到人民的歌声，没有见到百姓的欢乐。整个中国都沉浸在哀丧之中，到处是死亡和苦难。

不仅仅战争，而且与战争相伴而来的流行病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猖獗一时的霍乱症我不啻在新疆看到了，而且正如上文已经提及的，曾经亲身染疾。消灭霍乱所采取的是这样一种“极端”的办法：疾病流行的居民点首先由军队包围起来；于是形成了一个让当地居民死绝的检疫站；沾染地区的任何人都不准外出，房屋要烧光，尸首则全部扔进河里。我曾不止一次地亲眼见过这样的做法。

导致流行病的根源俯拾即是。每一个街区都有成千上万只大老鼠窜来窜去。卫生防疫工作根本不开展。老百姓都只好自己去对付老鼠，办法就是养猫，在新疆还有养鹰灭鼠的。我不止一次看到中国人搬家；大车上装着几件简单的傢具什物。车上挤着一群孩子，其中一个挎着篮子，里面藏着一只猫。穷人家没有别的办法去消灭这一大祸害……

中国的法律不保护老百姓。我曾多次遇到过穷人挨警察揍的情形，原因无非是没有在规定的地方穿越马路，或者偶

尔碰撞了正在赶路的老爷们或外国人乘坐的轿子。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最初行经新疆时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滞留在兰州，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城里闲逛，跟中国人友善地交往：不反对穷苦百姓成群地围观我们；买东西不讨价还价；无论如何不坐人力车。结果市内的人力车夫派了代表团来见我们，要求我们不要瞧不起这种“活交通工具”。他们千方百计证明，说我们拒绝坐人力车，就砸掉了他们的饭碗。

中国的老百姓在上层统治阶级眼里是一文不值的。这种情况我们真不知碰到过多少。他们认为“中国人多”，断送几条性命不足挂齿。在重庆我们曾遇到过一桩很典型的事例。水源丰富的扬子江将这座城市隔成两半。重庆附近长江水势尤其汹涌。一城两地之间的来往靠私人的渡船沟通。船主想多赚钱，总是把渡船塞得满而又满。船舷一般都用粗绳揽住。当浪头袭来，船身剧烈晃动时，站在边沿上的人每每会掉落江中。我曾亲眼看到过一次。落水者在江水汹涌的漩涡中拚命挣扎呼救。没有人对此做出反应。钩竿、篙子、救生圈一概没有。这些东西压根儿就没有准备。陪同我的一个国民党军官见我想帮忙，就漫不经心地说道：“您激动什么？这种事每次摆渡都有。我们人多。这就叫自然淘汰”……

中国在一场战争的火海中燃烧。一切正直的民族力量抛开了内部歧见，奋起保卫祖国。

爱国志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三千万无家可归的和平居民成群结队地在全国各地流浪。难民们被炸死，饿死，死于流行病。而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一群唯利是图的傢伙，加上一帮外国佬却沉缅于纸醉金迷之中。在每一座旅

馆里，上自阔绰华贵的大酒家，下至穷乡僻壤的车马店，无不备有色彩鲜艳的美女册，上有照片及标价。这种“货物”与菜单和其它服务项目一起登在广告上。每座旅馆的招牌上都写着：“本店备有最佳女色”。出于进步力量的压迫，政府颁令，战争期间一律关闭妓院，但事实上妓院依旧存在。

有一次，我和我的副手一起在一家旅馆里同操持这类行业的一名姑娘谈话。她是一个破了产的佃农的女儿，外表很迷人，而遭遇十分不幸。她给我们讲述了这种摧残青春的可怕的手段。每个省都有这类“托拉斯”，它实际上在各个居民点都设有代办处，其任务是：物色年青漂亮的姑娘，把这些姑娘的父母弄得一贫如洗，搞得他们把家里的一应财物当尽卖绝。地方当局和警察局暗地都合伙参与这种买卖，支持“托拉斯”。“托拉斯”的经理借给这些破了产的、走投无路的家长们一笔款子，条件是把他们的女儿赎放到“公寓”去当抵押品。家里的债台愈筑愈高，到头来无法赎回女儿。中国的姑娘就这样给葬送了。

在达官贵人中间依然保留着一夫多妻的现象，当然这是政府法令所禁止的。可是法令并不是为限制这些人物而制定的。比如陆军部长何应钦就有好几个老婆供他在各省的别墅里玩弄。国民党的其他头面人物亦然如是。国家命运的主宰者竟无人认为这是一种社会恶行。美国的、英国的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顾问们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

人民憎恨国民党制度和外国压迫者，中国老百姓称后者为“洋鬼子”。在内地经常发生农民打死在中国到处游荡的令人憎恨的“洋鬼子”的事情。对于文化不高的中国人来说，所有外国人都长得一个模样（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内）。

应当说国民党政府已注意到这一点，所以预先给我们发了护照，上面写明我们是志愿者，是客人，是从苏联前来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者进行解放战争的。

我们曾不止一次地确实看到，“苏联”这个字眼对于农民产生一种魔术般的效力。我和我们所有的人都常常深受感动的是，在最偏远的人烟稀少的地方，有时候方圆左近只有唯一的一个识字人，勉勉强强能念懂护照，但就在那种地方，人们也知道苏联，尊敬苏联。只要识字的人给凶狠地死盯着我们并准备给我们上私刑的农民一解释，说我们是苏联人，整个情绪一下子就会转变过来，人们的脸上绽开了善意的微笑。他们就会象对待最亲近的朋友那样欢迎我们。每个人都争着握手，一边还说着：“苏——联”、“苏——联”。各家各户都邀请我们去作客。把所有的人家都串遍当然是办不到的。但我们所到之处，有时候整个村子的人都会聚拢来。充满友谊的谈话不绝于耳，各种各样的问题接连不断，我们感到置身在亲人中间。

这一切与领导集团中的人物对待我们的态度成了鲜明的对照。官员们表面上对我们关心备至，笑脸相迎，但背后时时潜伏着的却是仇恨。他们之所以容留我们，只是出于需要：国民党的头面人物需要苏维埃国家的援助，而这笔援助倒真是相当可观的。

中国军队的技术装备直接受制于水平很低的民族经济，没有自己的军工基地。武器尽是外国的牌号，式样陈旧，品种各异，口径不一。日军入侵前夕，中国武装力量拥有约一千门火炮、五百架飞机、七十辆坦克。炮弹和子弹匮乏。

1938年7月以前，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了两笔条件优惠的贷款，总数达到一亿美元。为了发放这两笔公开贷款，苏

联曾在穿越新疆——甘肃的高原通道的复杂条件下不间断地为中国运去最新武器（包括飞机、坦克、装甲车辆，野战炮和高射炮、机枪、步枪、炮弹、炸弹、子弹、石油，载重汽车）。苏联为中国提供援助的出发点是：我们所帮助的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民，而不是统治集团。

应当指出，苏联的信贷是按照年息不超过百分之三的利率借予的，用以偿还支付的主要是农产品和矿产。美国和英国的年息是百分之六点五，条件非常苛刻，偿还支付的是稀缺的军用战略原料（锡、钨、锑等等），而且所定价格要比国际标价低四分之一。苏联运给中国的是比日本武器先进的新型武器。对空军的援助尤其突出。中国向英法两国购买的飞机往往不适用于作战。

在日本侵略者进犯以前，中国没有统一的军队。有中央军，各地方军阀的部队以及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红军。没有统一的指挥部，没有明确的组织体制，武器和供给混乱不堪，——这是战争第一阶段的特点。亲日派分子的活动阻碍了中国军队的联合，妨碍了组织统一的指挥部，影响了武器的划一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实现。

可是，中国指挥部计划失败的原因不仅仅是军事技术装备和组织体制的落后。原因还在于帝国主义列强的顾问们参与了制订这些计划，他们很少考虑到中国的民族独立。既然军事系统和民政部门的大小官僚都是卖身求荣之徒，指挥人员庸碌无能，得不到士兵的信任，那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

在著名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之后，中央政府被迫改组军队（已为时甚晚），可是这种改组进展得极其迟缓。战争初期在将官和省长这一级上出现了不少不战而放弃许多

战略要地的叛徒。军队里的许多爱国者对指挥官的叛变行为反应强烈。日本人刚入侵华北，第十三军和二十九军的军长，第三十七师和三十八师的师长同侵略者开始谈判时，这些部队的官兵撇开了司令部机关的叛徒，奋起战斗，抵御了敌人的进攻。

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书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明确纲领。共产党答应停止反对南京政府的斗争；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全国军队指挥部统辖；苏区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

国民党三中全会没有接受共产党的建议。只是在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之后，国民党领导人的情绪才发生急剧变化，1937年9月他们被迫正式同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红军被纳入全国统一的军队体制，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稍后共产党人又组成了一支新四军。

在我们苏联顾问来到之前，中国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庞大的来自美、英、法、德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国军事顾问团。他们的任务根本不是来帮助中国人民战胜侵略者。所有这些人都与本国情报中心过从甚密。虽然他们提了“有益的建议”，中国军队在战争初期的准备状况仍大体相当于欧洲1914年的水平。

各国代表团代表和使馆官员的足迹遍及全中国，他们主要是刺探情报。比如美国武官就十分关注西部各省的情况，因为那几个省是从苏联输送物资来华的主要转运干道所经之地。这个武官还把他的副手派到了八路军的防地。

除去美、英、意和其他国家的军事代表团之外，一个人数相当多的德国代表团常驻中国达十余年之久。在中国的德

国侨民总数有五千多人，其中包括各企业、公司的代表和传教士。我国志愿人员抵达中国时，正值德国代表团领导易人。接替福尔凯哈森将军出任代表团团长的是希特勒的亲信、前此曾与德国总领事克里贝尔一起负责中国境内德侨事务的克莱因将军。福尔凯哈森的秘书齐赫夫人仍然留在中国，她跟美国人关系密切，在谍报工作中起过不小的作用。

美国的反动势力否决了进步人士所提出的限制日本获取美国军用物资和原料的建议。美帝国主义在中立政策的掩盖下企图使日中两国在相互厮杀中消耗力量，唆使日本发动对苏战争，为美国统治中国和太平洋地区准备条件。1938年1月，美国国会否决了一项授权总统在日军撤出中国前中止美日商务关系的法案。向日本出口战略原料不仅在继续，而且大大增加了。

1937年9月13日中国向国际联盟控诉日本的侵略。因美国没有加入国联，英国便充任了帝国主义集团的主要辩护人。英国驻国联代表克伦贝恩竭力反对通过制止侵略的决议。甚至连日本侵犯中国一事他也认为只是“冲突”而已。并没有就遏制侵略者，援助中国的具体措施通过决议，只是向国际联盟成员国发出了毫无约束力的呼吁书，号召制止足以损害中国的行为。只有苏联代表公开提出日本进犯中国乃是一种侵略行为，并号召国联不仅从道义上声援中国，而且应当给以物质援助。

这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的大半河山，其中包括许多重要的中心地区。空军轰炸和焚烧大后方居民的和平城镇，日本军阀惨绝人寰地对待沦陷区的中国人民。

不久，日本政府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集团提出了“媾和条件”——接受奴役性的条件，丧权辱国，屈

膝投降。

从当时流传的官方文件看，蒋介石似乎拒绝了日本所提出的条件。但是，过了很久，中国人民的叛逆汪精卫公布了蒋介石政府国防最高会议的纪录，其中清楚地暴露了这位大元帅的投降意图。

从后来公诸于世的文件可以看出，早在布鲁塞尔会议（1937年11月）之前，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就曾建议美、英、德、意等国外长劝蒋介石主动提出和谈，提出了一些条件，接受这些条件就意味着确认日本对中国的全面控制。

帝国主义势力并不完全赞同这样的条件，因为一旦这些条件付诸实现，必然导致日本国实力之大大加强。而国民党集团之所以不下决心与侵略者狼狈为奸，一则是受着美英的影响，再则也慑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进步力量和广泛的社会舆论反对妥协、维护民族独立的联合力量。

同时，全世界共产主义的报刊开展了一个广泛的声援中国人民的运动。1938年夏，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号召共产党人、工人阶级、一切和平民主的维护者广泛而全面地支援中国人民。

苏联人民在各地举行的各种集会上对侵略者的行径深表义愤。1938年5月8日，加里宁在苏维埃大厅发表演说时宣布，苏联人民将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苏联志愿人员、军事专家怀着帮助中国人民的愿望一批批地来到中国。他们把自己的力量和知识全部贡献给了争取中国民族独立的事业。许多人战死沙场。中国人民将始终怀念和景仰他们。武汉解放公园里建立了一座方尖纪念碑，纪念1938年曾保卫过这座城市的苏联志愿飞行员。纪念碑上镌刻着这样的题词：“苏联空军志愿队的烈士们将永远活在中

国人民的心里。让这种属于工人阶级的高贵的国际主义精神永远发展和巩固着中苏两国人民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当时的军事和政治情况极其复杂，但我国还是提供了无私而真诚的援助。最初，我们对中国军事指挥部门并没有抱什么不信任的态度。因为要共同决定战斗任务，也不能不这样。随着苏联军事装备和第一批志愿军事人员的相继抵达，战场上出现了战争爆发以来前所未有的转折。此前，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占城夺地，所向披靡。

南京防守了五天，广州只一天，由于苏联志愿军事人员，主要是飞行员参加了保卫战，武汉则一直坚守了四个多月。

我国的志愿人员一到中国便投入了最危险的战斗，每次都是全力以赴。他们由于连续参战而精疲力竭。于是不得不经常更换战地军官，尤其是飞行员。做了大量工作的军事总顾问德拉特文就由切列潘诺夫接替了……

形式上中国的所有武装力量都隶属于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员长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指挥部热衷于无休无止的改组，花去了许多精力和时间，但前线的情况毫无进展。军队都是照外国（主要是德国和日本）的，而且是过了时的条令训练的。没有一个总的诸兵种协同作战的计划，也没有进攻战役计划。

蒋介石所争取的，首先是加强嫡系的实力，而不是抗战的胜利。为了独揽大权，他改组了军事委员会，赋予其立法和执行两种职权。随后又建立了一个最高国防会议，旋又改组最高国防会议为最高国防委员会，由蒋介石自任主席。副主席是蒋介石的黄埔同事，1925至1926年东征和北伐时的同僚何应钦。当时何氏正任军政部部长。

国防军事会议（委员会）下设若干部门（后来改称部）：由徐永昌将军领导的作战部^{注1}；徐培根将军领导的情报部；白崇禧将军领导的军训部；政治部则由陈诚将军任部长，陈诚的副手一个是国民党人黄琪翔，一个是中共党员周恩来。

所谓最高统帅办公厅，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部门，由原甘肃省省长贺耀祖将军出任主任。

贺耀祖实际上是最高统帅的主要助手。他主管蒋介石的情报部门，搞的尽是秘密活动。一切军事、政治和行政机构的报告、情报都要经过贺耀祖之手才能送到蒋介石那里。所有的指令实际上也都是通过他才下达的。蒋介石的私人警卫也由他把持。

抗战初期曾组建过四个“战区”：以省长阎锡山将军为首的晋察战区；由蒋介石自任司令长官的冀鲁战区，他并任命原参谋总长程潜将军为其副手；浙沪战区（江苏沿海一带），由冯玉祥元帅所统辖。最后，还有一个闽粤战区（南海沿海一带），由何应钦将军指挥的部队防守。

就兵力而言，相应战区的中国军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来犯的日军，但这并没有造成中国的优势，因为日本人在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方面都占上风，尤其在空军、炮兵、坦克和其它专业兵团方面更是稳操压倒优势。此外，诸防区的领

注1 据台湾《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三卷载：“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月二十八日沪战爆发，国民政府为适应形势需要，于二月六日成立军事委员会……”“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军兴，……决定扩大军事委员会为抗日战争最高统帅部。……中国统帅机构至此始见正式成立。”当时下属机构庞杂。民国二十七年（1938）一月进行改组，原有秘书厅及第一至第六部等取消，改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此处作战、情报两部恐误。——译者

导人物都不过是一些徒有其名的司令官，他们不参加实地战役，也没与地方部队配合。

当时，中国军队没有坦克兵团。待苏联坦克运来之后，才组建了第一个机械化师。这个师的全部人员由我们的顾问和教练员负责训练。当日本人击败中国人顺势南下时，该师已作好充分准备投入武汉会战。但蒋介石拒绝了令该师参战的建议。由于军事总顾问切列潘诺夫的坚持，还是把一个团编入了作战部队序列，它在阻止日军进攻中起了重要作用。嗣后，以我国的战斗技术装备为基础，在我国顾问和教练员的帮助下组建了第五机械化军。

此时中国上层仍然热衷于调整改组。1938年初，撤销防区，建立了“战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又是更换高级指挥班子。蒋介石不中意的一些将军相继免职，可是局势依旧未见好转。从1938年3月起，指挥系统的隶属关系是：最高统帅——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司令——军团长——师长——团长。所有这些官长都是要么固守原地，要么向后撤退，都不考虑坚决进取。前线将士求战心切，但接不到明确的任务和协同作战的计划。各战线境况雷同。尽管前方官兵英勇顽强，中国军队还是节节败退。但也应当指出，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日本人伤亡惨重，因而需要长时期地改变日军兵力部署。中国军队数量上的优势和向南去的道路极难通行，为中国人造成了有利条件。

应当说，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切列潘诺夫的意见是经常与中国军事指挥部所主张的时空“机动”战略相左的（中国人把这种战略称作“消耗战”）。基于这样一个根本目的，中国的指挥部采用了片面的战术，在各战区一味退却。我们的军事总顾问司令部认为单靠防御作战是不可能赢

得战争的。切列潘诺夫建议组成一些突击群，在个别地段转而进行一些局部性的进攻战役，以为总攻的先声。虽然最高指挥部同意了切列潘诺夫的计划，但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却障碍重重。其实，这样做对于提高军队和人民的士气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武汉和广州沦陷之后，军心涣散，士气低落。

切列潘诺夫经过仔细考虑提出的建议规定改组军队，各军兵种协同作战时全军服从统一的指挥部，特别要加强军队的情报工作。但是，最高指挥部只不过表面上同意了这个建议，后来并无下文。

日本人急于攻下长沙。切列潘诺夫建议采用由设伏实施反突击的战术。在南昌和长沙两地采用这一战术取得了极其成功的战果：南昌城一直防守到1939年3月才陷落，而日本人直到1944年6月才占领长沙。应当指出，1938年11月，还在日本人进攻长沙的时期，城里发生过一次大火，烧毁全城一半的房舍，弹药储备、武器也被焚毁殆尽，居民死亡近五千人。大火在居民中引起一片慌乱。后来真相大白，原来火烧长沙城是蒋介石统帅部的一大阴谋，此举实出贺耀组之手……

我想大致叙述一下中国指挥部的立场和军事总顾问工作的复杂性。1939年初，前线各地都很平静。只是在个别地段偶有战斗发生。空军和情报系统行动积极——一直在摸索和找准目标。这似乎是双方在决战之前的一种平静。中国方面，统帅部接受了军事总顾问的建议，自1939年6月起开始准备总攻。这时，中国军队的兵力较日军多一倍。就武器装备而言，日军仍占优势，但他们受到游击队的牵制。此外，日本国内由共产党领导的左派力量的反战斗争此起彼伏。在

这些力量的影响下，1938年间日军内部就已出现了反战起事。

华中战线的武汉区，中国军队的兵力占有很大优势，这一地段对于进攻来说具有决定意义。在这一方向歼灭日军就能保证中国军队向纵深突进。西北战线也出现了这样的态势。这一切在军事总顾问的建议中已估计到了。

1939年6月中旬，军事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总攻计划。会上有些将军总是少不了发表一些蛊惑性的言论，对于游击运动也不免数落一番。A·И·切列潘诺夫的计划基本上得到了认可。但各战区的具体任务和进攻时间却并未明确。

经切列潘诺夫一再坚持要明确进攻时间，才确定于7月27日进行总攻。后经进一步说明，并征询各战区司令长官的意见，旋又定为8月15日。

就在这一时间发生了引起中国指挥部密切关注的哈拉哈河事件。它迟滞了进攻的展开。其实，当时的情势对于转入进攻是再有利不过的了，因为日军的很大一部分兵力被钳制于哈拉哈河一带。

日中战场的各个战区，地方性的战斗接续不断，双方互有胜负。1939年5月在华中战线进行了襄阳——南阳战役，它显示了许多中国前方部队的战斗力。但是总攻一直没有展开。中央军各部，各地方部队人员间普遍掀起了一场“政治教育运动”，运动的核心是维护现行制度和反对“危险思想”。

作为这些事件的目击者，我要强调指出，国民党军事领导的墨守成规和因循守旧和蒋介石的两面手腕妨碍了我们许多建议的实施，这些建议本应受到重视，得到支持。平庸无能的国民党将领总是竭力限制苏联军事顾问发挥作用。蒋介石

石分子害怕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对中国人民产生影响。许多时候他们总是企图把我们同中国士兵和居民隔离开来，或者派特务监视我们，盯梢等等。

当中国处于十分艰难的时期，苏联人抛下自己的事业和家庭，怀着善良的意愿和纯真的心地来到这遥远的国度。我们每个人都以为国民党政府一定会同样真诚地接待我们和我们的援助。不料，当我们身临其境之后，便发觉在那种友善的微笑背后潜藏着窃居了国家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狡诈的奸计。

看清这种种现象，对于我来说并不费什么周折，因为我当时任首席军事顾问，我的职责范围包括参与研究日军状况和披露日军指挥部的计划和意图。

国民党中国非常重视对内调查和国外情报。在那里间谍机关林立，但缺乏联合其行动的统一的中心。每一个政治领袖，每一个省长，每一个部长、官僚、军阀都拥有自己的侦察机关。

国家内部不统一，情报部门的状况也反映了这一点。各政治集团的领导人把自己的心腹派往邻近的省份，派往相与角逐的派系的司令部，甚至派往中央政府的部门。这些做法无非是出于维护和加强本身的权力，当然是无裨于统一战线之形成的。

国民党的显要人物陈立夫所领导的情报机关，工作规模最大，实际上起着国家情报局的作用。起初这是国民党的一个内部调查组织，后来发展成为包括向国外派遣特务的全国性机构。与这个机构平行的还有一个由相当有影响的国民党人戴笠所主持的庞大的反谍报系统。这是国民党最活跃的一支间谍队伍。

戴笠的反谍报机构分布极广。全国各地，包括军队在内，无不在他的魔爪控制之下。这一机构还依靠另一个人数很多，从银行老板到地痞流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的“青帮”开展活动。蒋介石广泛利用这一组织作为施行秘密恐怖手段的工具，以打击政敌、排斥异己。“青帮”有自己的规矩、经费、暗语和严格的章法，泄密和背叛必遭杀身之祸。

戴笠所依靠的还有另一个亲法西斯的新组织“蓝衣社”，其出笼以至活动受德国间谍机关的直接影响。

戴笠的这个独霸全国的反谍报机构把惨无人道的中世纪亚细亚的酷刑同欧洲的现代化手段结合了起来。审讯室和种种刑罚是这个机构的拿手“杰作”。逮捕根本不通过预先的法律程序。受害者都是秘密地受到搜捕，被关押在恶劣到难以置信的牢房里，如地牢和无法弯腰的小笼子等等。脖子上挂枷具，脚上带镣铐。普遍流行当众处死的作法。有时杀头，有时在市内广场枪决。枪毙人犯不是瞄准单射，而是成批扫射。严格禁止亲属收尸，违者亦有杀头之虞。为了儆戒后人，尸首要在广场停放若干星期，任恶狗拖来拖去。国民党当局声言处死的是“红胡子”或叛逆者，实际上主要是共产党人。

尽管与中国共产党订有协议，但国民党集团的反共斗争从未自日程上取消。戴笠的侦探在全国各地游荡，灾祸说来就来，即使有影响的国民党人，也时时受到死亡的威胁，心惊胆战。

在国内阶级斗争无休无止的条件下，争权夺柄连绵不断，帝国主义之间在华的矛盾纵横交错，国民党进行反苏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国民党情报工作的作风，其特点便是兼采狠毒和狡诈的各种手段。国民党人对各帝国主义

情报部门的代表，主要是美、英、德等国代表的建议也很重视，注意用欧洲的方法增强自身的本领。总之，他们是兼收并蓄，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欧亚“情报混成体制”，这一体制的鼻祖就是陈立夫和戴笠一类恶棍。一提这两个人的名字，即使在他们周围的亲信中间，也要不寒而栗的。

除了由陈立夫和戴笠所领导的情报机构之外，还有一个极端秘密而又十分庞大的国际间谍组织，这个组织由国民党著名人士王芃生所主持。此人一直幻想出任中国的主要“谍报头子”。无论是陈立夫、戴笠，还是王芃生，他们都在日本本土以及日军占区开展情报工作。

关押在华的日本战俘，尤其是被俘军官的条件和关押中国人的地方大相径庭。日军高级军官被俘后简直就象住疗养院一样，甚至还专门从俘虏士兵中挑选勤务兵和朝鲜女人服侍他们。显然，这表明国民党人是在百般讨好日本人，在政府上层人士的整个活动中这种现象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商震，蒋介石的宠臣，是一位比较年轻的将领，他狡诈圆滑，善阿谀奉承。在军事委员会主持外事局工作，并兼任军事委员会秘书^{注1}。他受蒋介石所委，组织了一个政府内部的反谍报机构，专事审查蒋介石的亲信。外国顾问到达后，商震又被任命为代表，以“照料”顾问的工作。这个刁滑的伪君子忠实地为主子效劳。

除开商震所主持的那个部门以外，没有一个情报机构向

注1 据郭桐著《国共风云名人录》一书载《商震》一文所述：“……一九四〇年商震一度被调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驻衡阳。数月后，又被调往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外事局第一任局长。”见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6年初版该书第55页。——译者

蒋介石全部公开他们手里的底牌。因此，战事初起之时，蒋介石曾借口加强抗日斗争，下定决心要一统在中国各地活动的主要情报机关，以期由此而全部控制之。

这样，就成立了一个联合情报局，起名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蒋介石委派自己的外甥——徐佩诚(音)将军出任情报局局长。徐佩诚相当聪明，但却是个大酒鬼。戴笠深知上司的这个弱点，力图借机将新组织的情报局抓到手上，塞进自己的人。徐佩诚的副手郑介民将军就是一个极端的戴笠分子；情报处长姜将军，是年轻人，少有的残暴而无耻的戴笠分子。起初他们只是把这位意在推行自己一条路线的徐佩诚排挤出实际领导，后来则索性调唆他违反蒋介石的一项命令而把他彻底搞下了台。戴笠巧妙地利用了蒋介石病态的自尊心，终于把徐佩诚撵下了情报中心首脑的宝座。此事的具体情节是：蒋介石迫于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无奈发布了一项节制娱乐的政府命令，限制娱乐活动，尤其禁止餐厅和舞厅的夜生活。违者必予严惩。命令主要出于宣传目的：既然蒋介石捞到了国家领袖的名望，“值此前方将士流血，人民生活贫困之际”，他自然该当号召大家寡欲清心。但这一命令倒也确实拘束了躲在大后方终日于下流场所荒淫度日的那帮阔老阔少。戴笠突然向蒋介石报告，说他的亲外甥漠视命令，带着一帮朋友来到重庆一家餐厅，混在喝得半醉的女人堆里，同时还利用职权和裙带关系吩咐店主违令延长餐厅营业时间，于是一场纵酒跳舞……

蒋介石否定了戴笠推荐的几个接替徐佩诚的候补人选（尤其是郑介民），选中了持比较中立姿态的海军将官杨某继任。杨氏善于同各色人物周旋，应付各种政治变故。

联合情报局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进行广泛的政治活动。有

时候我还能听到一些有关中国“内幕情报”的轶事。比如中国情报部门深入意大利军队参谋总部一事，就是一桩迥非寻常的事情。在意大利参谋总部按中国情报部门指示活动的一名间谍，原是出身“名门”贵族的军官。物色对象的工作早在此前许多年就已通过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开始酝酿，当时这位父母虽已破产但仍有豪门苗裔之称的后生尚在军校学习。他接受了好心的舅舅从中国大使馆领到的津贴，以后当上了军官，被派到参谋总部工作。忽然，中国的情报部门找到他头上要他作出抉择，要么丢职罢官，死路一条；要么当特务，替蒋介石分子效劳。

考察中国的情报机构，我不能不作一定的联想，这真象罩在玻璃罐里的几只毒蜘蛛。戴笠那一帮人总想挖陈立夫这一伙人的墙脚，而戴、陈两家又都拚命跟踪王芃生那个系统的特务，盯他们的梢。特务机关在相互收买对方的人，施展各种阴谋诡计，对于不合心意的和不听使唤的，就从肉体上予以消灭，在这方面戴笠尤其突出。

国民党情报部门的领导人一面要对付内部的尔虞我诈，相互鲸吞，一面还要与中国境内遍地皆是的世界各国特务机关的许许多多代表周旋，因此他们尚能容忍苏联军事志愿人员，实乃出于某种必要。反谍报活动的矛头首先正是指向我们的。不时有人跟踪我们，这些人看起来十分忠实可靠，但却偷偷地潜入苏联使馆、武官处等机关，当然也少不了闯进苏联军事志愿人员的驻地。

与此同时，我还常常觉察到进步人士，尤其是青年一代对苏联所表示的真诚的同情。我们志愿人员自然也受到了他们所表露的这种情意。虽说谈话时十分小心谨慎，但可以肯定地说，各界人士中，包括军人在内，都有进步的爱国力

量，他们能够帮助中国获得民族解放并实现其社会经济改造。我们的中国朋友在谈话中都说必须实现民主改革，指出农民对号召参军反应冷淡，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前途，不愿去保卫地主富农的利益。他们认为，要是能给中国的农民和工人阶级提供一个美好未来的前景，能够减轻地主对他们的压迫，人民是会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

戴笠分子残酷无情地镇压革命。谈话渐渐涉及到更远更深的题目：关于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关于政府要员贪污成风，财主老板大发国难财的问题；关于半殖民地的中国无独立自主可言的问题。

至今我仍然记得当年我会见过并与之谈过话的那些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年轻的共产党人的名字，他们不想再过旧生活。国民党中国许多真正的爱国者的命运是艰窘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终于落入戴笠的爪牙之手而牺牲了。

从那以来岁月消逝，事态变迁不已，但我未曾忘却在中国度过的那些值得怀念的日日夜夜。我清晰地记得所有这些人，他们的善良，他们光明磊落的心地。我知道，他们都曾经历过一段艰难的生活，但我深信他们仍然是正直的、高尚的人，是真正热爱祖国的人民、热爱曾不止一次地在困难时刻帮助中国人民的苏维埃国家的人……

不能说国民党对居民没有进行任何爱国主义的教育。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做过这一工作。在城市里，在尽可能吸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组织，如新生活同盟等一类组织参加下，组织了爱国主义的示威游行，搞了青年学生报名参加义勇队的工作，建立了各种宣传队到前线和农村去进行政治宣传。这些宣传队基本上都是颂扬“领袖和民族英雄”蒋介石。

电影院放映的是美国影片，美国顾问吹嘘说这对中国人民的教育是一大贡献。国家电影事业开始发展起来了。摄制了一些“带美国倾向”的和宣传“救星”蒋介石的爱国主义影片。每场电影开演之前总要放映和银幕一样大小的大元帅的头象。观众必须起立，向蒋介石像致敬，同时播放国歌。

令人奇怪的是，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应召参军的只占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富家子弟都在后方闲散着。尽管爱国主义的宣传搞了不少，农民还是不肯上前线。我曾不止一次地看到，为了防止逃跑，把新兵（被称为义勇兵）一个个用绳子拴着押解到集合地点。根据所颁布的总动员令招募壮丁成了发财的手段。官吏们免除银行家、商人、地主、高利贷者和乡村财主家的子弟服兵役，从中收受贿赂。官长们领到的饷银是每天每个士兵一角五分，可是用去的不到一角，余下的钱都给克扣掉了。

中国人不大讲究饮食，士兵尤其如是。很难想象，他们吃这么一点点大米小米掺和着的饭和青菜怎么能够顶得下来，更何况还要打仗。军官对待士兵的态度通常是很残暴的。我曾亲眼见到过，新兵训练时就进行急速转入进攻的课目，这对未经训练的士兵来说，难度的确很大。许多新兵挺不住劲儿，累倒在地，结果班长还按军官的命令将他们打个半死。

在作战过程中还暴露出了各省长的分裂主义倾向，他们既和政府发生冲突，彼此之间也是矛盾重重。中央军和地方部队行动上不统一。整个中国军队的一百六十九个步兵师，四十七个独立旅和十二个骑兵师中，直接受中央政府调遣的只有七十一个步兵师，十个独立旅和一个骑兵师。中央各集团军的指挥官是张发奎、汤恩伯、程潜、卫立煌、孙连仲等

将军。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依靠这些人遏止各省省长的分裂主义。

四川、广西、山西、云南、新疆等省的省长拥有最强的军事实力。他们都竭力想首先保住军队，这是他们在本省维持统治的根基。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本来完全有可能歼灭日军的某一部分兵力，但是省军队的指挥官却不战而把队伍撤了下来。这种情形尤其多见于几省交界处，这时候哪个省长也不肯首先打响，总是等候邻省的行动，想随后出动，以求保存实力。

四川省主席刘湘去世（1938年1月）之后，地方首脑不接受蒋介石委派的继承人商震将军到任。为了施加压力，他们将川军从前线召了回来，以此胁迫蒋介石任命他们的人主政。云南省主席龙云与蒋介石讨价还价，提出种种借口，1938年10月以前他从未派兵打过日本人。

1938年4月，日本人减弱了对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兵力部署。日军第十师在向沂水撤退时遭到了包围，但由于李宗仁只知伫候中央军前来而未能将该师歼灭。日军迅即调来第五师团，于是不仅突出了包围圈，而且还占领了沂水。蒋介石统帅部收到的捷报是假的。五月间，日军南北两组兵力合拢包围了李宗仁的部队。李和中央军失却了一切联系，于是仓促调出士兵。前线溃乱。日本人占领了战略要地蒙城和永城。李宗仁嫁罪于一个师长，把他枪毙了，以此向蒋介石交了差。蒋则撤了中央军第三十七军军长冯治安^{注1}的职。日军此时仍在继续前进。1938年10月李宗仁未能按时将部队

注1 据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纂的《中日战争史略》一书所编“国军战斗序列”载，冯治安当时系第七十七军军长，隶属第一战区第一集团军辖下（见《中日战争史略》上册，一九六八年二月台湾初版，第201页）。——译者

拉到罗山方向，因而破坏了预定的战役。诸如此类的情形数不胜数。

蒋介石怎么也调整不好与第二战区的关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省长阎锡山深怕中央军进占该省，因而不准他们进山西省境，以免发生冲突。地方部队和中央军经常兵戎相见。朱德所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作为东线的一个集团军隶属阎锡山辖内。朱德和阎锡山关系还不错，但阎氏竭力提防共产党人在他的部队里扩展影响。

我之所以要追述这些细节，并不是要责怪中国的军队，而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当时来中国的苏联军事志愿人员的工作有多么复杂。的确，那时候朋友和敌人都眼睁睁地盯着我们。对我们持友好态度的人，相信我们的能力和经验的人，期待着前线迅即出现转机。为数不少的中国人民的国内外敌人——他们同样也是我们的敌人——则但愿中国灭亡，且期待着中国灭亡。

应当说，纵然障碍重重，人民和军队却一直坚持斗争。为国捐躯的前方将士，比起在大后方醉生梦死的高级官长来，受到了无与伦比的敬仰。统帅部的命令朝令夕改，后方的腐化糜烂以及叛逆变节引起了前方将士的愤懑。戴笠的特务系统工作得十分卖力，他们到处搜捕和枪杀假叛徒，这无疑损伤了军队的战斗力。

日本反谍报系统的活动格外积极。他们坚决取缔足以影响日军士气的一切因素。因此，凡派到沦陷区和直接派到日本本土的中国军统特务，都经常遭到失败。有时从搜集到的情报中可以看出，日本反谍报系统的工作是何等细致、何等周密。他们并不把力量分散在搜捕个别间谍身上，而是集中精力于侦破秘密据点。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军统领导指令所

属间谍停止在各秘密据点会面，而在公共场所接头（在市场、饭店、剧场、影院、办事处等等），并指示他们在不致引起嫌疑的、不列入侦探机构编制的社团和个人中间扩大关系。

日本人赢了这“一局棋”。他们分析了中国象棋中“马的跳法”，周详地研究了值得怀疑的各种人物之间的各种联系，逐日记载下所有的会面，结果发现有些人之间的接触是很有规律的，在固定的日子和固定的钟点。这些人便是中国的特务。中国的军统于是又变换了方法，再摆“棋局”。大工商业集团的代办，达官贵人，甚至日本反谍报机关的工作人员作为中国侦探机构的成员出现在日本领地上。金钱、美女、讹诈，一切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中国军统在日本招雇的许多间谍就这样果然没有被破获。

日本情报机关在中国的活动要如意得多，预谋的叛卖行径接续不断足资佐证。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在国民党内部，整个这段时期内，都有一个势力特别大，很有影响的亲日派在活动，为首的就是臭名远扬的汉奸汪精卫，这股势力中包括陶希圣、陈公博、周佛海以及在党和政府内身居要职的国民党人。1938年12月，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公开倒向了日本人方面。

汉奸汪精卫的崛起，他之成为国内继蒋介石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从反面证实了国民党，首先是蒋介石本人，奉行着一项投降政策，一项两面政策。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重庆，逃到昆明，公开投向日本人方面。随后假道香港去日本。追随其后的有陶希圣以及其他国民党的要员，包括陈公博、周佛海。

许多撰写中国问题书籍的作者强调说，当时人们都不清

楚蒋介石对待汪精卫的态度。1939年5月15日《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在《当代》杂志上写道：“当人们问到为什么汪精卫和他那一伙人居然会在政府和国民党内身居如此重要的职位时，得到的答复是：蒋介石以为让这些人在政府内，比之他们在政府以外，害处倒要小些”。其实，事情并不至于此，汪精卫的投降，以至最后叛变，都是与蒋介石本人的政策分不开的。

早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前，无论蒋介石，还是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就已看清汪的真面目。国民党的整个政策为这次背叛做了准备。而当背叛铸成事实之后，蒋介石为平息民愤，就不得不既保护汪精卫，又保护他自己。这就是汪精卫之所以能够从容地跑到日本的原因。在汪精卫从重庆“出逃”之后，为了转移视线，而出动了警察和宪兵队。所有的情报机构，包括调查统计局在内，都在“寻找”汪精卫，而此时他却经蒋介石认可，正在华南一座富丽堂皇的别墅里休憩，而且隔不多久便由一些地位显赫的国民政府委员帮助，从容地转到了日本。可见，连戴笠加蒋介石，对汪精卫在飞往香港之前的“藏身”地都是了如指掌的。

我曾向杨将军提出过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制止汪精卫的逃跑呢？杨开着玩笑回答道：“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危害了，就让他活着罢。”这次谈话一个半月之后，汪精卫就到了日本，而1940年3月他就成了日本人在南京扶植的伪国民政府的主席。

“就让他活着罢”这一公式不啻适用于汪精卫一人。汪精卫跑了，但他的投降政策在中国依然起着作用。这一政策得到许多日本特务，甚至包括蒋介石亲信们的支持。我们周围也有不少专门派来的日本奸细在活动。向国民党官员正式

提出这个问题是办不到的。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

日本人占领武汉之后，重庆成了民国的陪都。政府、统帅部都设在这里。日本空军经常来渝空袭。市内有些地方被夷为平地，成千上万的和平居民丧生，连尸首都来不及从瓦砾堆中挖出来。成纵队的机群一天几次前来空袭，主要目标是商业中心和贫民区。政府官邸从未挨过炸。日本空军投掷炸弹相当准确，显然特务情报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我曾几次见过蒋介石。最后一次是1939年和苏联驻华大使卢加涅茨-奥廖尔斯基一起去见他的。蒋介石中等个子，瘦瘦的，看上去不止五十一岁。他没有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也并不显得智慧过人。他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中国人民不仅在前线，在大火中，在日本空军的轰炸下牺牲，而且还惨死在戴笠的刑讯室里，——这是蒋介石所认可、所同意的。

“中国第一夫人”，蒋介石的太太宋美龄给人留下的却是全然不同的印象，她长得很漂亮，聪明伶俐，殷勤可亲，很能吸引谈伴。可是，在她那艳丽的外表背后潜藏着的却是满腹的诡谲。宋美龄已经和中国人民毫无共同语言了。她的青年时代是在美国度过的，她在那里求学，培育她的美国富翁的情趣比之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情趣更投合她的心意。

宋美龄从事国务、军事、商业等各种事务。她是航空委员会的理事长，兼顾空军事务，又是各种慈善团体的保护人（例如江西基督教会的会长），等等。在她的鼓励下美国情报部门的代表渗入到所有这些团体中去。比如参与情报工作的美国传教士团的舍费尔德主教就是她在江西基督教会的秘书。

宋美龄利用同她姊姊，孙中山遗孀宋庆龄的亲属关系从

事投机。宋庆龄是一位极为高尚的女性，一位革命家。她的另一个姊姊宋霭龄则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国民党极其反动的一翼）的委员，大财阀孔祥熙的妻子。有过一段时间宋美龄同蒋介石元配夫人之子蒋经国不睦。蒋介石的这个后裔当时年方二十八岁。他曾在苏联住过多年，在那里学习和工作。那时候他与苏联青年相处甚厚，甚至还颇接近共青团组织。后来他与一位俄国姑娘结了婚，当他1937年返回中国时，他们已生有两个孩子。宋美龄起初不让这个儿子带着俄国妻子踏进家门。蒋介石也有很长一段时间疏远他。后来还是象俗话所说地那样“生娘后娘反正都是娘”，蒋经国终于同父亲和继母找到了共同语言。以后他又到戴笠那里去受训，在反共中立下了一点“汗马功劳”。后来几年他出任过东北外交事务委员，又主管过台湾的秘密警察，担任过国防部长，最后当上了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

我们这些人深深地领教了在蒋介石伪善的微笑和宋美龄迷人外表后面潜隐着的阴险狡诈。应邀前来帮助中国的苏联志愿人员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牺牲生命，但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包围，成了各种情报机构实施诡诈，进行挑衅的对象。可是，我们同志的坚贞不屈粉碎了国民党情报机关的一切计划。

举个例子。志愿人员K是无线电通讯方面的专家。他办事专心，认真负责。戴笠手下的特务死乞白赖地要跟他结交，对他“过分关怀”。K非常尖锐、非常坚定地斥责了这一策反意图，弄得国民党领导不得已而向军事总顾问抱怨说志愿人员K实在“太不通人情”了。这样的抱怨倒是一种很高的评价。

为我这个小组服务的中国人当中，最突出的要数邱司机

了。他开车很猛，载着我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无论遇到多么复杂的境况，或者碰上轰炸，或者步入前线极端泥泞的道路，邱都能使车子保持完好无恙。平时他总是朝气蓬勃，豁达开朗。他衣着整洁，手上老戴着一副非常干净的司机常戴的白手套。我常常感到纳闷，这位娇生惯养的司机怎么竟如此能干，那辆车子简直象精致的钟表一样可靠。一次偶然的机会冰释了这个疑团。当日本人准备进攻长沙的时候，我恰巧在那个地区，好几次我坐在车上遇到轰炸。的确，日本飞行员对每辆轿车都是盯住不放的。只有西方外交官和顾问的车子是例外。这些车子的车顶就跟西方官员住宅的屋顶一样，漆成了与他们的国旗相同的颜色。这是治外法权的标记，由此就可以避免轰炸。此外的一切则必遭残酷轰炸。

有一次，我们的车子因躲避飞贼，一下子栽进了沟里。由于爆炸波我受了点轻伤。邱跑去找人帮忙。他出去了很久。我知道细心的邱把东西都放在后座舱里，趁他不在，我打开了后座舱的盖。这一下可把我惊呆了。那里面藏着一个小矮子中国人，原是秘密给邱当机械士的。这样，“万事通”邱的神话也就被戳穿了。后来这个表面上亲匿可爱的人成了戴笠军统系的军官，干了不少坏事。

甚至在三十多年之后，每逢想起当时我们周围那些国民党人的阴谋诡计时，心里仍然感到不快。我们每个苏联顾问的翻译就都是戴笠、商震、贺耀组手下的特务。他们当中就有1929年反苏战斗^①的参与者。

现实生活迫使我们每一步都要把原命令所没有包括的指示纳入计划。往往没有时间商议，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也就这样做了，因为我们认识到，个人的行为不能与中国人民的斗争事业相提并论。

对我们周围那些戴笠的特务需要时时加以防范。我和他们的关系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在某一时间内我显然已经在阻碍他们进行挑拨离间。有一次，他们曾企图离间Φ顾问，并破坏他的名誉。当时我和我的副手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什麦廖夫会同Φ顾问本人一起采取了十分坚决的措施，致使戴笠分子又打算假邱司机之手搞掉我们。

这事发生在华南。公路绕着岩石重叠的山岗蜿蜒前伸。右侧乱石嶙峋，左边则是陡峭的悬崖，崖下为深渊。汽车在爬坡前就开始失灵了。邱从驾驶楼里跳了出去。左前轮飞掉了。车子向悬崖滑去。我们迅即跳出车外，只见一个轮子正向山下滚去，脸色煞白的邱直挺挺地站在我们眼前。他的样子实在可悲。这位爱取笑的人忽然失去了长于言辞的天赋，无法解释眼前发生的情况。

我们检查了一下车子，弄清了固定左后轮的螺钉是有意松开了的，其中一半已经脱落，剩下的几个螺钉眼看也要掉下来了。

事情真相已经明朗。爬坡以前邱司机以排除“故障”为名，把左侧前后轮的螺钉都松开了。他们的企图简单明了，等车子爬上山顶，顺坡而下时，左侧的两个轮子飞掉，车子就会从悬崖上滚下去。邱过于紧张，没有算准距离，把这一“着”给毁了。山下是浓雾萦绕的深渊，扔下几块石头连回声都传不上来。感谢上苍救了我们一命，我们继续赶路，丝毫没有显露出一已经猜透了邱及其主子的预谋。

军事总顾问切列潘诺夫当时正在前线，所以我们到达重庆之后，我向苏联驻华大使伊万·特洛菲莫维奇·卢加涅茨-奥廖尔斯基汇报了戴笠分子离间Φ顾问的罪恶行径。最后我国使馆正式向蒋介石提出了抗议。我们为此事去见蒋介石

石时，感到他虽然佯装不知，但实际上一切情况他都已了解。我详细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他答应要弄清真相，并对苏联的志愿人员表示深深的敬意和爱戴，用词显得有些过分。

正式会见结束之后，蒋介石想进一步了解某些细节，请我留下，并下令把杨将军召来。这时宋美龄也来了，不一会杨和商震也都到场。于是我只好把已经讲过的事又详尽地重述一遍。蒋介石恶狠狠地坐着一言不发。商震一个劲儿在喝茶。杨注意地听着，一会儿望望蒋介石，一会儿看看宋美龄。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宋美龄把话题转向社交界，说起了客套话，问我怎样消磨时光，是否感到寂寞。她夸奖苏联顾问，对飞行员的英勇善战称赞备至。她迷人地微笑着，说那件事全是误会，因当事人头脑不够机灵所致，务必要向他们严厉问罪。随后她又对杨下了简要的指令，要他整顿秩序。蒋介石从牙缝里挤了几句话出来，向顾问们表示了敬意，并祝愿他们取得成绩，接见至此即告结束。

不久，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直接参与这几次阴谋事件的戴笠分子被撤离了调查统计局，降了级。由同样一些“对我们心怀好意的人”替代他们的工作。

情报工作如疾病一样，总是乘虚而入，一旦发现工作人员的警觉性和对事业的责任心有所减退，特务们就渗透进来。有些人曾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那是在中国的某一座城市里。有一个年轻的衣衫褴褛的俄罗斯女性，瘸着一条腿，拦住了我。她环顾左右，请求我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听她诉说。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莫非这又是戴笠设下的圈套。但女子恁般真诚地哀求我，我的心软了下来，更何况她还是一位漂泊异乡的俄罗斯女性呢！几分钟之后我便弄明白了一出悲剧，这是一位虽则

有些轻佻，但仍不失为一个正派的苏联姑娘的一场悲剧。姑娘系莫斯科人，约在1936年还是1937年由于自己失足，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来到中国。她是独生女，父母都是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当时她正在大学念书，认识了在中国大使馆工作的一个漂亮的副武官。他殷勤周到、彬彬有礼、柔情脉脉，博得了这位纯真的少女的好感。她当真爱上了他。当追求者发誓永远爱她时，她答应了嫁给他。父母亲反对。她那时已经堕入情网，恰似着了魔一般，没有经过深思便同意私奔到中国。副武官给她描绘了一幅幅雍容华贵的幸福的家庭生活的图景。但她说，她对这些并无多大兴趣，主要的是因为这是她的初恋，是她的热烈的爱情。她于是被装在一只为外交官们装行李而专制的大筐子里，随着爱人来到中国。年轻的丈夫带她去的那座别墅确实富丽堂皇，可是那里已经住着他的两个中国妻子。这新来的第三个被指派到厨房去洗餐具。副武官对她的爱情自然早已枯竭了。原来他是戴笠的特务，按照特务机关的任务把姑娘拐来，准备让她当特务的。在“受训”时姑娘常常挨打。最后还截了她一条腿。倘若她向苏联大使馆或者向苏联志愿人员提出申诉，她就有被杀死的危险。但是她还是下决心要申诉。她含着眼泪请我帮助她返回家园。按照她所提供的特征，我毫不费劲地找到了那个搞特务活动的勾引者。此人是混血儿，仪表堂堂，足以征服女人的心。他给我讲述他在苏联当副武官时的情形，说他很尊重和爱戴苏联人，当然对于“婚事”只字未提。我也不能问及此事，怕伤及那个不幸的女人的性命，因她再三叮嘱我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跟我见面一事。我正在想方设法营救她，但显然戴笠的特务发觉了我们的接触，姑娘就此失踪了。

想起横遭中国侦察机构迫害的这位女性，不免又连想起

由于各种原因流落到国外，在他乡异国浑浑噩噩苟且度日的许多俄国人的境况。他们当中有高尔察克、恩琴、谢苗诺夫等残部的将军和军官，以及其他白卫军中的败类，也有并未在白卫军中服役的旧军队的各级军官，还有官吏、神甫和贵族。一部分白卫分子完全腐化了，他们心甘情愿地当了戴笠手下的特务。不甘堕落的人生活拮据，他们思念祖国，向往故土家园，愿祖国谅解他们，接受他们。有些人在街头遇见我们时，走上前来抱怨自己的遭遇，叙说亲身经历，请求我们帮助他们返回祖国。

按人性讲，那些出于无知而外逃的人，尤其是那些在国外出生的跟父辈的作为毫无干系的年轻人，是值得怜悯的。男人们总算找到了一些有损人类尊严的粗活，女人则被补充到妓女的行当中去。这不仅是为贫困的生活所迫，有时简直是被逼而去。国民党那帮狐群狗党，各种各样的老鸨、掮客把她们当作商品来作交易，就象他们拿中国女人来作交易一样。他们开了许多妓院，组织了人贩子的行会。甚至连无奈过着独身生活的中国女人，也得不到法律保障而受到奸污。一些在前方作战的军官的妻子，常常也要躲到美国教会几乎在每一座城市里都开设的“基督教青年会”一类机构里去，以免受辱。

在长沙的一家餐厅里，有一次一名俄国厨师来到我跟前，他长着一张知识分子的脸，一双知识分子的手。话题同样也是怎样才能返回苏俄，回祖国去。当我搞清楚他是贵族阿斯塔霍夫，而且又是辛比尔斯克省某地一个庄园主的儿子时，我对他的注意就不同寻常了。这类故事恐怕只有按导演的构思在电影里才能遇到：站在我面前的是和我农奴的家族有某种关系的那个古老的贵族之家的后裔。我的曾祖父就是

辛比尔斯克省基斯洛夫卡村贵族庄园主阿斯塔霍夫家的农奴，老人家是照地主的命令被鞭笞致死的。那个地主就正是眼前这个阿斯塔霍夫的曾祖父。我爷爷当年参加了农民暴动，那次暴动遭到了近卫军官也就是这个阿斯塔霍夫的祖父的残酷镇压。我爷爷后来跑到北高加索，在那里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

就这样，阿斯塔霍夫和康斯坦丁诺夫在国外相遇了，他们不仅仅是阿……和康……，而是两个敌对阶级代表的后代，一个是被推翻的阶级的代表，另一个则代表了多亏十月革命才抬起头来的阶级。曾几何时，拥有无限权势的俄国贵族的子胥，现在却请求农奴的子孙给予帮助。由于先辈的罪孽，这个人已经经受了不多少磨难，为了不致戳痛他那带血的伤口，我没有告诉他我们两家人之间过去曾经有过的那种紧密的联系。

附 注

作者简介：

С·П·康斯坦丁诺夫——退休上校。1919年在弗拉季高加索市（即今奥尔忠尼启则市）加入共青团地下组织。北高加索苏维埃政权建立后，С·П·康斯坦丁诺夫积极开展共青团工作，并参加了打击反革命和白匪帮的斗争。嗣后几年在边防军服役。1938至1939年作为苏联志愿人员在中国工作。С·П·康斯坦丁诺夫是伟大卫国战争的参加者。1944至1945年任罗马尼亚联军监察委员会副参谋长。

①指奉系军阀武装占领中东铁路和在苏联远东地区的武装挑衅（1929年7月至11月）。

（元吟译）

沈阳卫戍司令

A·И·科夫童—斯坦克维奇

伟大的卫国战争结束了。莫斯科胜利的礼炮也已鸣毕。战胜了法西斯德国的军队正在陆续返回祖国。我指挥的步兵师在战斗行动即将结束时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后来接到命令，要以行军队形开进罗马尼亚的梅迪亚什城，拟在那里临时驻防。7月6日晨，各团开始行军。

我们去布达佩斯的路线与我师当初的进军路线相同，只不过方向相反。现在我们走的是旧路。几个月前，我们一路艰苦奋战，打击万恶的敌人，用自己的胸膛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处处留下了艰苦顽强战斗的痕迹。

我们在布达佩斯城郊休整了几天，得机会更仔细地观光这座城市，曾几何时，我们师为了解放匈牙利首都艰苦奋战了一个半月。在那些日日夜夜，为争夺每一段街区、每一幢房屋，我们都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就在这里，在布达佩斯的大街小巷，不知有多少我的战友和朋友献出了生命。

我们久久地伫立在佩斯城埋葬我国军官的纪念碑前。他们的名字用金字镌刻在纪念碑的基座上。我们向这个纪念碑和布达克西公墓都敬献了花圈……

不久，我应召到集团军司令部，并从那里得到通知，飞往莫斯科去接受新的任命。

我告别了为我们师争光的士兵们。我们共同经过了从顿

涅茨河畔一直到伏尔塔瓦的战斗历程；共同拿下了布达佩斯、布拉基什劳和维也纳；在捷斯卡—布界维茨——戈谢克举世闻名的作品《好兵帅克》的故乡城镇结束了战争。

我并不清楚为什么召我去莫斯科。我与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长比尔曼将军谈话时，直接了当地问：

“请您告诉我，您知道为什么召我来吗？”

“说不太准，但能猜得到！”他回答。

“究竟为什么呢？”

“东方战机已经成熟。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司令部的全班人马已开往赤塔，您可能也要去那里。根据种种情况判断，不排除对日作战的可能性。不仅召回您，还有一大批师长呢。”

我们从康斯坦查乘飞机去莫斯科。和我同机的，还有我在前线的邻居索科洛夫斯基将军。我们曾在奥地利并肩战斗，又同时在捷克斯洛伐克打到战争结束。在莫斯科，我们这次又同时奉命飞往赤塔，听从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苏联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的调遣。

* * *

在赤塔，我晋见了苏联元帅马林诺夫斯基。他派我去见参谋长扎哈罗夫大将。在这里他们俩的军衔都是上将，但姓氏不同。有一次我去找扎哈罗夫，按习惯称他为大将时，他微微一笑，用手指指肩章，教训我说：

“真怪，你连军衔都分不清啦。从今后我是上将了，明白吗？”

“明白，上将同志。”我也微笑着回答他。

“这就对了。你去找巴甫洛夫斯基，他向你介绍情况。”

尼古拉·奥西波维奇·巴甫洛夫斯基，这位方面军作战部长，我在西线战争中就了解，他很有教养、学识渊博。他象接待老朋友那样接待了我，并介绍了四伏的战机。

“我相信，你会明白为什么你突然来到这里？”我一到巴甫洛夫斯基那里，他便问道。

“大致了解一点，但不知道详细情况，特别是不清楚我将担任什么工作？”

“现在谈工作，为时尚早。问题在上头那里，在三巨头会议上已经通过了决议：再过整整三个月，西线战争结束后，我们就应该对日作战。这就是说，我军应于8月9日转入进攻。目前，这些情况要严格保密。大本营已批准由各方面军司令员挑选，从西线调一部分将军。你算是被召回者之一。至于你在这里干什么，这要看事态的发展了。暂时待命。你抓紧空闲时间认真研究一下有关中国东北的文献吧。”

这次谈话是在七月底，我根据巴甫洛夫斯基的建议攻读了军区图书馆里的全部书籍。从卡拉—穆尔扎教授的著作中和情报部出版的小册子里获得了许多最宝贵的资料，研究了现有的各种地图……

8月6日，巴甫洛夫斯基命令我到驻扎在博尔集亚市的第三十六集团军司令部担任方面军司令部的代表。在一次密谈中，他说：

“如果不发特别命令，方面军将于8月9日凌晨转入进攻。命令可能经你下达。因此，8月8日你不要离开司令部外出，可在司令部里熟悉进攻地带的情况。”

没有发生变化。1945年8月9日夜，集团军在边境村镇旧粗鲁海图附近强渡了额尔古纳河，开始向中国东北腹地挺进。最近的一个目标是中东铁路线上的海拉尔市，离边境一

百二十公里。和我们同时沿铁路线进攻的还有福明科将军指挥的一个纵队。

比起西方战区，我感到中国东北荒无人烟。从国境线到海拉尔市整整一百二十公里的地段上，我们只见到一个不大的村镇，里面只驻一个伪满边防军分队，还有一个象我们革命前那种老式的小酒馆。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这里几乎根本没有道路。近海拉尔市郊时才见几条土路，很像我们乡间的那种路。

在海拉尔市我接到返回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方面军司令部当时设在蒙古的塔姆察克布拉克市。该市曾以1939年哈勒欣河事件而出名（我军统帅部大本营当时设在这里）。我们乘车沿成吉思汗故道驶过多伦湖和哈拉哈河。同行的有军报的一位记者。一辆汽车载着工兵，跟随在我们车后。

在多伦湖，有人提醒我们说，沿途有未撤出蒙古的日本散兵游勇。我们驶近贝尔湖时，正赶上一个多雾的早晨。湖畔有大群大群的野鸭。我们颇感惊异，它们并不怕人，安静地在草原上觅食，也不注意汽车。司机按喇叭，它们也不怕。可是当我们下了车出来的时候，鹅群便嘎嘎叫着飞上天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一阵，又落到湖面上去了。

在驶近哈拉哈时，我们遇到了赶着畜群游牧的内蒙古居民。没有压平的道路，各种地图标示又不一致，我们只好找他们问路。于是，我们亲眼看到一个有趣的场面：有一位酋长决定亲自给我们指引到哈拉哈的直路。他说一口蹩脚的、过去当地人同俄国人谈话时用的那种俄语。我们请他坐上车，他同意了。但是，当酋长坐进我们的“维利斯”，其他牧民就都离开蒙古包，跨马急驰跟踪而来。我们毫无办法，只好减慢车速。走了大约二十公里，我们才明白，蒙古人为什么

要这样拚命地急驰飞奔。只好让他们的头人下了车……

*

*

*

我们赶到方面军司令部时，已经很晚了。我马上去找巴甫洛夫斯基。他立刻叫我去见方面军司令员。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接见了，并命令我做好准备，飞往沈阳。日本投降后，方面军司令部要换防到那里。我被任命为沈阳卫戍司令。从坦克第六集团军编成中抽调一个摩托兵营由我掌管，担任警卫任务。必须靠这些兵力整顿好拥有二百多万人口的城市秩序。而且，已投降的日本军队还没有全部撤离沈阳。坦克第六集团军的部队也正开往沈阳。但由于道路被暴雨冲坏，进军受阻。

8月20日早晨，我、我的助手科拉夫钦科中校和全营摩托兵从塔姆察克布拉克机场起飞去沈阳。在那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呢？……

机场到了。从空中下望，只见一个宽阔的场地上停满了飞机。领航员说那都是日本飞机。有几架飞机滑上了起飞线。我们的飞机着陆了。这时有两架日本战斗机腾空而起。谁给他们起飞的权利？这可是违反投降条件的。机场上一个日本高级军官说，谁也没有批准他们起飞。从他的眼神里显然可以看出他在说慌。在我们调查情况的时候，那两架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几圈，逐渐上升，尔后有意进入螺旋，钻进地里，在离我们飞机不到二百米远的地方爆炸了，传出一阵轰鸣。飞机的碎块凌空四飞。只要再靠近一点点，我们的飞机也就玩完了。从日本官兵的面部表情看来，他们很钦佩本国飞行员的行为。事后查明，这两个飞行员不赞成天皇投降的命令，而决定以飞机代替战刀，剖腹自杀。幸好他们

没有俯冲到我们的飞机上。

我们就这样来到了中国东北的第二大城市沈阳。我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页。

到外贝加尔方面军来以前，有关中国东北的情况，我主要是从文史资料中取得的，特别是从斯捷潘诺夫写的长篇小说《旅顺口》中了解的。到外贝加尔方面军参谋部后，我了解了后来时期描写伪满洲国政治体制和经济状况的一些著作。但是，我在东北的见闻和书本上写的并不相同。从文献资料中我了解的是1932年以前，即占领前的状况。

在后来的年代里，日本资本家热衷于攫取廉价的原料而发展了一些工业部门，首先是采煤业。年产量在占领前约三百万吨的抚顺煤矿，到1944年最高年产量竟超达一千三百万吨。由于很多地方得天独厚，既有油母页岩，又有煤，便使日本人得以开展油母页岩加工业和提炼他们当时奇缺的合成汽油。油母页岩和煤矿是露天开采的。

在中国东北加紧修筑战略铁路，主要是朝着我国边境方向修。鸭绿江建的水电站有一半发电量供给伪满。日本人还加紧开掘铀矿和金矿。这就是我们到来前伪满的状况。

为更好地了解我担任沈阳卫戍司令时的局势，我想简要介绍一下沈阳市及其居民的情况。

沈阳掌握着伪满的经济命脉，这里的加工工业部门占伪满的三分之二，有汽车制造厂、拥有先进技术装备的橡胶联合企业、兵工厂、黄金选矿厂、纺织工厂、制药厂和食品加工厂。到1944年底，全市人口实际上已超过二百五十万。市里还有几家大银行，最大的是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实际上都是这家银行的子行。仅在沈阳一地国家银行就有二十二个办事处。这家银行的办事处一直延及美国。三菱康采恩的代理

人也在这里设了点。

伪满的正式首府是长春，而实际上最重要的城市却是沈阳。难怪这里和长春一样，也有溥仪皇帝的行宫，他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就是在这里被我军俘虏后押送赤塔的。关于这段经历下面我再详细讲……

盛行吸鸦片，这是沈阳的一大祸患。大批地下企业不顾官方的禁烟规定而生产鸦片。市政机关主管鸦片生意，我们在市府大楼的地下室里发现许多吨日本机关的鸦片烟土。吸吮鸦片有致命的严重后果，这在统治者手里不仅成了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推行殖民政策的重要手段。

在沈阳，和在东北其它城市一样，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车。这种车有数万辆。二、三十个老板掌握着这些车，把车租给人力车夫，从中捞取收入的一大半。占领者为利用中国这支庞大的苦力队伍，凡有条件使用廉价劳动力代替汽车时，他们就不用汽车。

这就是沈阳的情况。在被占领期间整个伪满的情况大体上也是如此。

* * *

从今以后我们，即我、我的助手科拉夫钦科和摩托化兵营的军官们就是我们军事当局在沈阳的代表了。应召到机场来的市长和警察局长让我们乘坐他们的汽车。于是我们便在数辆摩托车的护送下开进城里。

我们到来的消息早在我们人到之前就已风传开了。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到处可以听到热烈的欢呼声。汽车几乎开不动。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跳到车前，和我们握手。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诚挚的欢乐神情。到处都可以听到：

“长官好！”，“日本人不好！”的喊声。我的副官兼翻译把欢迎的话一一译给我听，并用中文回答他们。这使居民十分敬佩。这种欢迎场面，甚至在停战的那天，我在西方也没有经历过。市长和警察局长感到窘迫。他们没有料到人们竟对我们表现出如此的好感。

我们暂时住在“大和”旅馆。没到旅馆以前，我们先到了方面军司令部政治部所在地“故宫”。该政治部的领导是普利图拉将军。他是前一天带领私人警卫和一个翻译乘飞机到日军司令部来谈判投降问题的。

普利图拉非常高兴我们的到来。正式见面后，他说：

“现在我好过了。不管怎么样，总算有了作战部队，尽管人数不多。你们没来以前，我感到特别不舒服。在这里还碰到一段关于溥仪皇帝的插曲呢，就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我把溥仪弄到赤塔去了……”

“溥仪在赤塔？”我脱口问道。

“是的，他已经在赤塔了。他没有来得及从东北跑掉。”普利图拉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他就讲起了俘虏这个伪满洲国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皇帝的经过。

“当我们的飞机降落在机场上时，”普利图拉接着说，“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溥仪就在沈阳。从整个迹象看来，他准备飞往日本。别管怎么样吧，我们在机场上发现有架飞机准备起飞。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正在这时，有一个身材匀称，身穿军装的相当年轻的人朝那架飞机走去。我们拦住了他。经审问查明，他就是皇帝。我决定逮捕他。恰好我们的飞机就在跟前。我通过一个女翻译和溥仪一边谈话，一边不知不觉地将他逼近我们的《Лн-2》飞机，我们很有礼貌地缴了他的武器，把他请进飞机，押送赤塔。这一切进行得

十分麻利，所以当溥仪的警卫和机场人员了解到所发生的情况后，我们的飞机早已升空了。这个傀儡皇帝的生涯就此结束了。”

“日本人当时怎么样？”

“他们没有采取什么公开对策，但对投降却一味拖延。日军不顾关东军司令部的停火命令，仍在前线很多地段上继续进行顽抗。现在让我们到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去吧。到那里就地细谈。”

从普利图拉的谈话中我清楚地感到，关东军司令部在故意拖延军队的投降时间。必须责令他们履行规定，停止流血事件……

天晚了，我们下令布置警卫，看守国家银行，然后就回到“大和”旅馆吃晚饭和休息。然而，并没有休息成。各地发来报告发生抢劫的消息。有的地方还听到了对射的枪声。当地机关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只是惊恐地回答：“红胡子！”

“红胡子！”。至于地方土匪（红胡子），我在关于中国东北的各种资料中都读到过。各股土匪四处作乱，使老百姓惶惶不安。现在，我们这个卫戍区实际上是有名无实，而日本人又不愿担负警卫，这就使土匪活动大有可趁之机。当地警察不仅不采取任何措施，据掌握的情报看来，他们自己也参加了抢劫。警察局长答应采取措施整顿秩序，可是，我同他谈话后得出的印象却是：这些抢劫——都是警察局一手策划的挑衅行为。我和科拉夫钦科不得不把摩托兵营划分成若干个小分队，在沈阳俄侨的帮助下采取了制止抢劫的必要措施。到早晨，摩托兵营各分队恢复了城市秩序。我严厉地训斥了警察局长，并提醒他应承担起维持市内治安的责任。

对这个占领者的傀儡能有什么指望呢？应该撤换他，但

是谁替他呢？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甚至不知道该同谁联系和依靠谁。处境简直是糟糕透了。

卫戍区司令部里也是乱糟糟的，漫无秩序。8月21日一早就来了很多人。屋里挤得水泄不通，而且什么人都有一——有中国人、朝鲜人、俄国人、犹太人、印度人、鞑靼人、格鲁吉亚人、日本人、法国圣莫尔天主教协会派来的传教士、瑞士布里涅尔商行的代办，还有一些身披白色短斗蓬的修女。他们各有所求、各有所诉。有些从修筑中东铁路起就居住在中国东北的俄国人前来自我介绍。还有各党派的代表，我让他们去找科拉夫钦科。副官向他们宣布说今天不接待，但人们仍然在那里等着，不离去。

白天，我召集当地市政代表人物开会。到会的有省长、市长和警察局长。陪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参议和翻译。我宣布，从现在起他们应该向我报告自己的行动，城市生活应该正常。同时，我在认真观察他们，想判断一下谁可靠，谁又应该马上被撤掉。非常遗憾，我弄不清哪些人可以信赖，甚至找不到可与之商量此事的人。

到会的科拉夫钦科中校报告说，有一批国民党员想接管领导岗位。没有足够的根据可以相信这些人。我们找个理由回绝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国民党是否承认他们是国民党员，他们自称拥护蒋介石，这并不等于国民党领导就承认他们。

整整谈判了一天。随市长来了三个老者，他们提出了近乎最后通牒式的要求，让我允许他们建立政协理事会。我很感兴趣，问他们代表谁，怎样理解这个理事会的工作。他们自称是“士绅”代表，职业是搞“慈善事业”。他们说他们加起来已有二百三十岁了。令人感到这帮人才是真正的“本城元老”，他们躲在阴暗处，但实际上左右着全部生活。他

们为什么又跳到前台来了，我一时还没搞清楚。我答应考虑他们关于政协的要求，一周后给予答复。

俄国侨民和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在这里居住的俄国人都想打听，能否在我们这里谋点事干。当时我们急需翻译、技术人员和食堂工作人员，所以录用了一些人。还来了一些中国人想帮助我们。其中有一个姓徐的，是一个四十岁的筑路工程师，他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精通俄文。我也答应录用他。

一到晚上又开始抢劫了。连企业部门和日本人的住区都遭到了抢劫。有的地方还发生了火灾。我下令采取严厉措施镇压抢劫犯，并且可在犯罪现场就地正法。我的命令立刻译成中文，很快印成数万份传单，开着汽车在大街小巷向人群散发。几乎各处的抢劫都已匿迹。但是在火车站、仓库和纺织工厂里，土匪们仍在活动。警察显然不想采取措施对付这些横行霸道的红胡子。我带领数名冲锋枪手赶到车站。我们的到来并没有改变局面。我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冲锋枪手合围了仓库，逮捕了几名强盗。人群安静下来，等待最后结局。我知道他们的心情。若是我的命令不能执行，那明天全城就变成红胡子——强盗的天下了。

不知为什么徐工程师出现在我身边。大概因为他是铁路职工，所以他在车站上。我请他向汇拢来的居民再次宣读命令（这里已集聚了好几千人）。他用中文大声宣读了命令。人群中发出了“好！好！”的喊声。

我在徐工程师的协助下，在汽车旁就地审讯了被捕者。他们皱着眉头看着，朝你嘻皮笑脸——显然是一帮刑事犯。严厉措施确实起到了绥靖作用，抢劫止住了。

夜里，我把恢复秩序的措施向新到的军事委员会委员杰

夫钦科夫作了汇报。他表示赞成。随他又来一批军官，担任各分区卫戍司令，由我统一管辖。斯列季上校也来了，给我当副手，办理军务工作。我委托他立刻组建卫戍区司令部。

我就是这样初步认识了这座远方城市——沈阳。当天，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部率部开进了沈阳城。我们总算是站住脚了。

* * *

省长、市长和警察局长一直在怠工，开始并不明显，后来就愈来愈明目张胆了。我们的指示，他们干脆不执行，或者故意把好事给你办坏。撤掉他们已是势在必行。但是叫谁来顶替呢？

蒋介石的接收大员秘密地潜入了沈阳，同占领者原来豢养的走狗秘密勾结。那群走狗为求保留一官半职故乐于执行蒋介石政府的命令——在将沈阳移交蒋军之前仍履行原职。因此，市政当局时常有意寻衅，试图搞一场反对我们的运动。组编非法的土匪武装队伍，诸如“朝鲜支队”，“自卫队”等等，就是他们的谋划之一。

必须用一批思想进步的人物，哪怕首先取代那些代表反动势力的主要负责人员也好。当时沈阳已经出现了共产党员和中国红军（原文如此。——译者）的政工人员。据他们的建议，请中国名将张作霖^①的幼子担任了辽宁省长。全城舆论都赞成这个任命。各社会团体、各阶层代表团纷纷到卫戍区来表示感谢。全省也都衷心欢迎他。

市长的人选也合适。一名受到共产党员信赖的下级职员被任命为警察局长。市政首脑更换后，我们的工作方便多了。

但是，蒋介石分子也没有放松警惕。他们通过自己的情报机关了解到共产党正在招募志愿兵加入东北民主联军，于是也着手组建杂牌部队，诸如“共产党支队”、“国民支队”和“国民党支队”等等。他们还按宗教原则建立部队。在东部地区，两个“共产党支队”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冲突的目的显然是挑衅性的——千方百计地在市内制造混乱。我们要求解散这些队伍，国民党答复说，他们和这些队伍毫无关系，说这都是“共产党的”，说我们找错了对象。类似沈阳这些杂牌队伍，在东北各地建起了很多。我们知道，这些挑衅的终极目的，就是挑动武装叛乱，我们还知道蒋介石给各地国民党分子下达了一道训令。这条训令要求诱使我们公开参加朱德八路军方面的军事行动，从而使蒋介石分子能够有“合法”的口实请美军出兵支援他们。我们得到命令，为避免冲突应立刻勒令停止所谓“共产党”支队的活动。

这些队伍的解除武装和解散引起了其组织者对我们的猛烈攻击。他们指责我们说，好象我们不设法让八路军解除武装。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应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不偏不倚。我们声明，我们解除一切人的武装，而且苏军在中国东北期间，市里不应有任何作战部队。

解除这些反动的杂牌队伍以后，苏联卫戍司令部的威望大大提高了。现在，人们来找我们解决各种问题，甚至有家庭问题。我们成了解决冲突的法律程序的仲裁者，成了解决各种争论问题的仲裁法庭。

*

*

*

我想谈谈侨居中国东北的俄国人的情况。我同他们初次短暂的会见是在海拉尔。到沈阳和哈尔滨以后，更详细地了

解了他们的情况。沈阳约有一千五百户俄国人，其中有一部份人早在革命前就居住在这里，另一部份是侨民。

俄国人当中有不少是谢苗诺夫白卫分子。帝国主义者把他们看作是一股对付苏联的实际力量。甚至有过将谢苗诺夫分子组成几支军事队伍的打算。但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以后，日本人认为这些新编的队伍不可靠，就缴了他们的械。我们到来后逮捕了包括谢苗诺夫在内的白卫军上层人物，送交苏联法庭审判。

居住在中国东北的许多俄侨对苏联的态度都是规规矩矩的。这在1946年2月最高苏维埃进行选举时表现得非常鲜明。选举前，我们给他们颁发了苏联出国护照。他们满怀自豪的心情展示了小红册子——护照！如今他们又有了祖国。组织起来的宣传站大力开展工作、学习苏联宪法和选举法，并组织了与候选人巴特拉科夫少将的见面会。选举那天，早在投票开始前，他们就来到选区门旁排队，早晨九点钟选举完毕。统计选票后揭晓，全体选民一致选举共产党和非党人士的联盟候选人。

我们帮助许多俄国侨民同他们在苏联国内的亲人建立了联系。

俄国人在中国东北的影响到处可见。绝大多数俄侨对中国人的态度是很仁慈的，决非资产阶级国家代表所能办到。关于这一点，中国人颇有感受，他们对俄侨的态度也是如此。

* * *

有一次从长春打来电话预先通知我说，蒋介石政府任命的东北宣慰使莫德惠——一个极端反苏分子——即将到达沈阳。不久，我就同这个人见了面。他已上了年纪，中上等身

材，有一双小而奸诈的眼睛，目空一切——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就是这副样子。他此行的目的，是探测工业界和金融界人物对待蒋介石制度的态度，企图拼凑一班人反对我们，以及收集经济情报。我已知道他们在一个日本占领期间曾开办过银行的当地财阀家里开过多次秘密会议。他的挑衅行为证明，蒋介石政府虽然已经同我们签订了条约，但对苏联推行的是一套背信弃义的政策。

莫德惠企图耍弄我们。他请我们赴宴。但我并没有出席他的宴会。我简直是厌恶同一个曾写过大量反苏文章的作者同坐一席。

四大家族的代表、蒋介石经济命脉的实际掌权人、财政部长孔祥熙也访问了沈阳。他是一个小矮胖子，有五十岁左右。他在同当地财政工业头面人物——银行家、煤矿主、工厂主见面时，俨然以东道主身份自居。我的翻译来不及译出他讲话的全部内容，但是看得出来，他的命令说一不二，受命者俯首贴耳。

当地大资产阶级代表为了欢迎这位宾客——财政部长的到来，举行了宴会。席间只是举杯敬酒。很快部长就讹称疲劳退席了。但过了几个小时，我得到情报，说他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宴会只是一种伪装，企图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开会时讨论了许多办法以破坏我们费很大力气才开办起来的银行工作。讨论了货币改革问题，旨在破坏当时东北货币周转。不过，我们在东北期间，这个计划并未实现。

在这里谈谈这个期间东北的经济状况是适当的。我们进驻以后，日本人都靠边不管事了，大工业者、批发商、银行家停了业，关闭了银行，缩减了批发贸易。他们的情报机关放风说，我们似乎就要没收工厂、银行和矿山了。总之，谣

言四起。百废待举。我们必须着手恢复正常生活。

沈阳各企业部门每月需煤十九万吨。冬天将近，还要保证市民用煤。由于及时贷款，抚顺煤矿很快就开始了正常工作。我们靠苏军军用车辆消除了运输工具的不足。但是使各企业部门开工生产总要比保证他们所需贷款容易一些。没有银行的活动是应付不了局面的。煤矿、食品和纺织工厂的厂主们合理地向我提出贷款问题，否则他们不能保证本企业所用原料和给工人发薪水。和财阀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外交谈判，才说服他们开办贷款银行。于是财政业务开始了。经济生活步入正轨。蒋介石代表的到来使我们颇费力气恢复起来的各企业、运输和财贸工作受到被破坏的威胁。必须采取更坚决的措施来稳定和巩固东北的经济。银行家和企业家初起的动摇情绪克服了。我们避免了蒋介石集团力图制造的一场危机。

不久就有一个新市长董（文琦。——译者）先生及其随员持蒋介石的委任状前来上任。对蒋介石分子的到来，大多数市民都持敌视态度。工人和小职员们很了解原来的市长，因为他是他们的自己人。现在从重庆来了这么一个人，除了一小撮工业资本家和银行家，谁也不了解他。

董某的职业是工程师，是反动的国民党分子，他毕业于美国大学，显然是亲美派。在一次正式宴会上，他稍有醉意，开始抱怨，说他无力制止卖官鬻爵的现象。我问他华中情况如何。董回答说那里更糟。说这话的是蒋介石当局竟任命为东北主要城市市长的人。由此便不难想像出华中的情况了。

随着蒋介石“当局代表”的到来，亲国民党的人物嚣张起来。他们开始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用相当公开的方式去进行反苏宣传。国民党分子在沈阳大学的学生中间展开了疯

狂的工作。我们甚至得到了他们建立暗杀小组的情报。其中一个小组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人群拥挤的地方杀害了曾与我们一起工作的徐工程师。当时，他们还想暗杀卫戍司令。由于我住宅的哨兵及时发现了恐怖分子，这次谋杀才以恐怖分子的被捕而告终。

国民党分子很快就和尚未回国的日本反动分子找到了共同语言。不过，这不足为奇，因为蒋介石早在战争期间就一直认为他的基本目的是击溃和消灭人民解放军^{注1}和镇压共产主义运动，而绝不是同占领者斗争。国民党分子想借日本人的帮助在沈阳闹事。这次暴动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筹划的。暴动的组织者们估计沈阳市民会支持他们打我们。市内各区的卫戍司令部被确定为第一批攻击目标。

在12月某天的夜里，几批荷枪实弹的人先包围了第一卫戍区分部。有几个自愿应募来我们这儿的雇员在回家的路上被打中后脑而毙命；卫戍区其他各分部附近也都发出了对射的枪声。报警的消息传到了卫戍区司令部。当时，我正在“大和”旅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助手伊万诺夫上将那里。旅馆和卫戍区司令部同在一个广场上。旅馆的警卫——我们的军官报告说，市里开始打枪了。经伊万诺夫将军允许，我立刻返回卫戍区司令部查明情况。

为了赶到已开始对射的现场，须要把停放在我住宅院中的汽车叫来。趁等车的时候，我想通过电话打听一些消息。比我先到现场的阿列辛上校和斯列季很快就返回来报告说：第一卫戍区分部一带正进行着战斗；卫戍区第三分部一带的情况他们不知道，因有射击不能前往。摩托兵营闻警报全营

注1：从上下文看，这里指的是抗日战争刚结束时。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称为八路军和新四军。——译者

起床，奔赴战斗地点。我们那几辆装甲车很快就整顿好秩序，到早晨就平息了暴动。被捕的暴乱分子在审讯中闭口不语。我们将其转送侦讯机关。

我的汽车来晚了。原来我的住宅也遭到了伏击，警卫被枪杀。有人还往院内扔了几枚手榴弹，但并没有伤着人。

起初，我们还以为这次暴动一定是日本反动分子策划的，对他们这种卑鄙行径颇感惊诧。后来才弄清，这次卑鄙行动的真正策划者是蒋介石第五集团军司令部。

在12月暴动前不久，我听说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打算到沈阳访问。幸好，因对我们统帅部大本营的不成功访问，她只在沈阳机场她的专机里露了一面。没打算在沈阳停留。

* * *

根据苏中两国政府特别协定，国民党军队应开进沈阳。我奉命正式迎接蒋介石军队的指挥人员，不准发生任何事件。

但是，这些部队一到，我们就发现他们蓄意闹事。苏联卫戍区的要求，他们概不执行。国民党先遣部队拒绝停车受检。只好诉诸武力了。蒋介石司令部抱怨“苏军不恪守协定”，试图向我们提出抗议。我们据理论证他们的要求毫无根据，于是他们又将抗议收回去了。应该说，蒋介石派往沈阳的是他的精锐部队。这支部队由美国教官在缅甸一手培训，全套最佳美式装备。部队的军官基本都在美国陆军学校受过训。这支队伍因在缅甸作战有功曾获得近卫军奖旗。

蒋介石分子派这样一支部队到东北，满以为能长期霸占这个地区，而不让朱德的八路军扎根东北。集团军司令员彭必谦^{注1}瘦削矮小，还相当年轻，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毕

业于美国军事学院。

彭必谦的司令部大肆活动，国民党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也在建立情报网，蠢蠢欲动。同时在该省的城乡招兵买马，准备和人民解放军较量。在营口附近双方真枪实弹大打了一场，结果，人民解放军大败号称“缅甸远征军”的部队。

我们力求避免我们的士兵同国民党发生冲突。苏联军人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严守纪律。连蒋介石分子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奉公守法。

国民党“缅甸远征军”进驻沈阳以后，财阀和地主为了得到蒋介石刺刀的庇护，从东北各地纷纷逃来。他们当中有个姓马的百万富翁，在哈尔滨开烧酒厂，东北各城市也有他开的其他一系列企业。马氏精通俄文。革命前，他在旅顺口到伊尔库茨克的铁路线上进行频繁的商务活动，与俄国资产阶级和白俄侨民交往甚密。我们当时正通过中国商人进行大宗采办军需物资的业务。这位马姓者想充当专卖商。我们婉言谢绝了他的要求。

顺便说一句，蒋介石的要员同我们谈话时，马氏一直充任翻译，颇得他们的信赖。

国民党分子同日本人之间令人吃惊地迅速找到了共同语言。其实，这甚至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因苏军阻碍了蒋介石军队指挥人员的挑衅活动。看来，他们把我当成是一切失败的罪魁祸首。这就是又一次策划了谋杀我的事件的原因。为此挑选了一个日本亡命徒。一天夜里他钻到我准备乘坐的汽车底下，图谋进行爆炸，让我和他同归于尽。幸好司机决定把汽车往前开，离大门近一点。这个谋杀分子暴露了，被

注1：据《文史资料选择》第四十二期杜聿明写的“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记载，集团军司令员应为杜聿明，而不是彭必谦。——译者

送交我们的审讯机关。后来在审讯时，让我看了看他。由此可见，谋杀的组织者的各条线索都归向“缅甸远征军”司令部。不过，那时我们已经决定换防，陆续离开沈阳。也就没有时间详细侦察破案了。

*

*

*

1946年3月9日，我们得到命令，不迟于3月11日撤离沈阳，将全部政权移交给中国人。这道命令使我们感到有些惊奇，因为前来沈阳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3月5日和我谈话时，还叫我更好地安排，原因是我还要长期留在东北。

但是，3月9日突然接到命令，让卫戍区全体人员立刻撤离沈阳到哈尔滨。这个出人意料的变化，其真实原因，稍晚一些时候我们才搞清楚。原来是因为蒋介石分子想让他们军队开进我军驻扎的各个地点。他们想利用我们作挡箭牌，掩护他们免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打击，换句话说，就是想靠苏军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势力。前边我所提到的宋美龄的访问，就是为了同我军统帅部协商让苏军长期占据东北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大使馆也在莫斯科同外交部谈判这个问题。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以粉碎蒋介石分子的阴谋诡计。

市民舍不得我们离去。很多人照实明言。我们真正相信这是他们诚心诚意的请求，因为我们了解国民党统治国家的那些办法。不过，第五集团军司令部却洋溢着一片无法掩饰的欢乐气氛。国民党军事当局认为，蒋介石政权已牢固控制着沈阳，然而，事实证明这是自欺欺人。

我们在沈阳的最后几天是处理卫戍区的善后工作，已经没有功夫解决市里的问题了。国民党分子在城里胡作非为。军队在大街上耀武扬威。我们腾出来的办公大楼，蒋介石的

人马上就占了去。苏军战士乘坐的最后一辆汽车刚刚驶向火车站去上军用列车，蒋介石制度的政敌立刻就遭到逮捕。城市沉默了。城里大街小巷，除掉国民党士兵和美国“旅行家”以外，很少看到行人。居民都躲藏起来，仿佛在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

到车站来与我们告别的有一位银行经理。他顺便说起，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在城里，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他属于大财阀和大资本家之列，尚且如此。离开沈阳以前，我们拜谒了俄国公墓。在那里埋葬着日俄战争中在沈阳阵亡的俄军官兵，也埋葬着为将日本占领者驱逐出中国东北而牺牲的苏军将士。

都上了车，待命出发。我的几位助手凑到一起。机车鸣笛。我们向沈阳投了最后一瞥，它同我们已经很有感情了！昨天还是灯火辉煌的沈阳城已陷入茫茫黑暗之中。

* * *

我们知道指定的停车站是哈尔滨。但到那以后我们究竟干些什么，却一无所知。早晨到达长春——远东苏军总司令的司令部所在地之后，我向司令部参谋长作了报告，从他那里得到指示，令我主持哈尔滨卫戍区。总司令的司令部也将布置在那里。哈尔滨是中东铁路最大的铁路枢纽。我的任务是保障这座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城市秩序。哈尔滨市的政权把持在国民党手里，市民是多民族的。

为了祝贺我就任卫戍司令，国民党市政当局举行了宴会。一般说，东北盛行请客吃饭之风，动辄因一点小事由也要大吃大喝一顿。应邀参加这次宴会的还有蒋介石大本营在哈尔滨的代表杨（绰安——译者）将军。他在美国受过军

事教育。在卫戍区接见的一批批哈尔滨居民，象跑马灯似的在我眼前闪过。规定每周接访两次。接待工作按哈尔滨习惯进行。凡有事前来者，十六时前都聚集在会客室里。十六时整，我在副官陪同下走进会客室，逐个询问。凡是立刻能满足要求的，就当场解决问题，副官便立刻记录下卫戍司令的命令。如果需要详细审理诉讼情况，那就请来访者或在办公室等待或者另约时间。按这个办法节省了很多时间，而且工作进行得卓有成效。

到卫戍区来的有市民中各个阶层的代表，提出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一次，做父亲的来找我告他的儿子。他叫儿子念中学，孩子跑了。能不能叫儿子去上中学呢？儿子是一个白净的十一、二岁的少年，看来很淘气。我问他为什么不愿意上学，他回答说：“他们都讥笑我，说我是工人的儿子，我不愿意和资本家一道学习。”有一个作丈夫的来找我，希望我劝他的妻子回到他身边来。妻子又坚决不肯，说：只要丈夫不忌酒，她就不回去。对这些请求和诉讼，我不能置之不理、不闻不问。他们把卫戍区看作保护人民利益的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当时，到卫戍区来要求接见的，还有另外一类人物——记者、作家和律师，他们全是持白匪思想的人。我们来到东北之前，他们写过诽谤性文章，发表过诬蔑性演说以制造“舆论”。他们毫无原则，竟愿在苏联报界供职，要求准许他们开办各种商行、各种娱乐事业等等。我们当然一概加以拒绝。

在哈尔滨，我们碰到了买卖人口这种极为恶劣的现象。一次，一个当地的中国人来访。他的诉讼使我大吃一惊。他欠高利贷者一笔钱。到期后，这个穷人无钱还债。那个债主就拿他女儿作抵押，抓去给他当半年小老婆。这个来访者并

非控告女儿蒙受侮辱，而是说已经过了六个月，那个高利贷者还没有把女儿还回来。原来，买卖女孩子当时是东北比较普遍的现象。我们同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极其严重的罪恶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哈尔滨和沈阳一样，也有黑市。由于出现了投机倒把案件，我才了解到黑市。我们开始获悉城里有买卖苏联钞票的情报。国家牌价与黑市所定牌价截然不同。因此，兑换货币的生意格外兴隆。犯人很快就被揭露，并受到应有惩治。在这方面兴风作浪的是非法买卖外币者，他们与当地执政者狼狈为奸……

我们在哈尔滨没有呆多久。1946年4月中旬获悉苏军全部撤离东北的消息。国民党竭力想背着我们巩固其地盘，而我们不想充当他们的挡箭牌。部队根据既定计划撤退。最后撤退的是载运卫戍区人员和物资器材的两列火车。

中国居民为苏军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约二十万哈尔滨市民和城郊农民参加了大会。尔后，苏军举行阅兵式，由广场直开车站。大部队撤离后，卫戍区进入大忙时期：要彻底弄清个别公民的要求，维持秩序和保护那些已取得苏联护照的俄国人的利益。我们急速做完了收尾工作。

就这样，我们又上了列车。火车头鸣响了告别的汽笛。于是列车加速行驶起来，哈尔滨车站渐渐留在身后了。前方停车站是牡丹江，再向前驰去，是戈洛杰科沃城，就到我们亲爱的苏维埃土地了！再过一两天，我们将在祖国迎接五一节。4月29日夜，30日凌晨，卫戍区人员所乘坐的列车越过了国境线，朝哈巴罗夫斯克驶去。

附 注

作者简介：

A·И·科夫童—斯坦克维奇， 退役少将。191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国内战争参加者。1919年志愿加入红军。在邵尔斯师服役， 后来又在普里马科夫指挥的契尔沃纳哥萨克骑兵团服役。1927至1929年从事党的经济工作。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 参加了敖德萨和塞伐斯托波尔保卫战。担任师长职务时， 参加了解放罗马尼亚、 匈牙利、 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斗， 攻下了布达佩斯和维也纳。1945年参加解放中国东北驱逐日本侵略者的战斗。1945至1946年担任沈阳卫戍司令。目前从事青年军事爱国主义教育。

① 张作霖（1876至1928年）中国军阀， 奉系军阀首领。与日本帝国主义者联系密切。与其他军阀多次作战， 1924至1928年期间实际上掌管了北京政府。1928年他想改换门庭， 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接触。后被策谋火车事件的日本人炸死在火车上。这里说的是张作霖的幼子张学祥（应为张学思。——译者）。

（智涛译）

在中国土地上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湖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97千字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册

统一书号: 11190·048 定价: 0.84元

(限国内发行)

封面设计：尚 佩 芸

书 号：11190 · 04

定 价：0.84

(限国内发行)